

谢国桢

瓜蒂庵文集



书趣文丛……③



辽宁教育出版社

瓜蒂庵文集

谢国桢

书趣文丛……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瓜蒂庵文集/谢国桢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9
（书趣文丛；第三辑）
ISBN 7－5382－4532－4

Ⅰ．瓜…　Ⅱ．谢…　Ⅲ．杂著－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Ⅳ．I26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810 号

瓜蒂庵文集

谢国桢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3.75　339千字　插页：2
印数：10 001—16 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约校对：良莹娟　责任校对：马　慧

ISBN 7-5382-4532-4/C·158
定价：18.00元

《书趣文丛》第三辑序

过去说过，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于是产生了这套《书趣文丛》。现在，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作为编者，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

单说“书趣”，不免会有种种“别解”。“趣”之一词，现在时髦得紧；当然，越是时髦，越是会生歧义。究竟来说，“趣”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因何生“趣”，原因各异。可以说因书生趣，但书又何其多也。报刊上有句流行话：过去无书可读，现在有书不可读。那么，过去不能谈书趣，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当然，此话太绝对。现在之不可谈书趣，只是说不可笼统谈，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如此而已！

由是，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这一来，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其实不然。在读书大家手中，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因为，凡认真读书的人，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

>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
> 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不盲从，不趋时，不随俗，不成为一个机器人，一个情欲奴隶，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并且以之为“趣”，以“趣”谈书——这是我们的标的。自然，时代各异，情况多歧，所谓“思想”，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以今日之模式，规范昔日之种种，此理易明，读者诸君，幸鉴谅焉！

脉望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书趣文丛

第三辑

音尘集　黄裳
书与回忆　周越然
清明集　周劭
苍洱之间　罗常培
欧游三记　宋春舫等
瓜蒂庵文集　谢国桢
愉快的思　叶秀山
寻常的精致　杨泓　孙机
书城黄昏即事　董桥
天鹅之歌　郑异凡

瓜蒂庵文集

目录

论述

序　跋

散　文

游　记

旧　诗

书趣文丛……③

瓜蒂庵文集

论述

清明寒食考

一

早是伤春梦雨天，
可堪芳草正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
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
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昇平事，
暗喜风光似昔年。

——韦端己《长安清明》。

我们读了这首伤春感旧的诗，把清明时节的景物，描写的蕴藉可爱，亦足使我们心醉了！但是历代的诗人为什么对于寒食清明时候有这种特别的感触？历代的美术家、画家，为什么对于这

个时候要有特别的供献？或是表在图画上面，谱在音乐里面。以我推测起来，其中约摸着有三个缘故：

（一）寂寞惨淡的冬天，好容易的过去了，这时候变换了一个美丽而可爱的世界，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好像正在昏送疲倦的当儿，猛然间被一个美人儿轻轻的笑语温柔，把你拍醒了，那时候你心中试问你当怎样慰藉？正如邱迟所说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又如《小窗自记·杂著》上说：

春归何处？街头愁杀卖花；客落他乡，河畔生憎折柳。

但是人们的同情心，非常的重；可是与你最同情的，那不用说，就是你的爱人了！天下的事，一年才一度中秋，花好月圆的事，哪有这样的多，要是和如花美眷的腻友，“同步花阴，共看明月”，那是怎样的快慰！正如宋人的词：

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柳带，试结同心。

我们读了这上半阕的词，假若是能“好语温柔，同步花阴”，那是怎样的高兴？但是我们若继续读下半阕的词，其中情味，又当如何？下半阕的词是：

日边消息空沉沉，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

所以趁此佳节，触景生情，更增悲思。儿女的文学，因之清明节也就发生了。可是文人学士，感怀伤游，和一生不得已的，感这阳春的景象，就触动文思的也不少，但是也不外这一种的情怀。

（二）节候的关系。如《荆楚岁时记》：

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又因历史传流的关系，如周裴《先贤传》：

太原风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到唐代时候，对清明时节非常注意，有特别的游戏和应时的食品。大概这一天，上自皇帝，下至人民，趁着春草初绿的当儿，未有不出去踏青游玩的。那些文人，又把它粉饰一番，所以人民响应于耳鼓里最深。

（三）中国人民最崇尚祭祖，清明是人民祭祖的一个时期，“慎终追远”在一班人的心理上是最易感动的，而那些文人学士，感到生老病死苦的感触，不免咬文嚼字起来，所以流传的作品也不少。如高九万的诗：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一滴何曾到九泉”，那又何等的沉痛！

总看以上三个原因，清明节的风俗，就深中我们人民的心理上，以至传到如今，对于寒食清明的观念还是非常的重。

我拟作《清明寒食考》，就是基于甲子清明，我们约着几个朋友乘船逛东直门外的二闸。那时是二三月天气，在北京的天气，依然是初春，两三条柔柳，荡漾在曲塘上面，来往有几个小的鸭子在水上漂来漂去，一抹斜阳，映在城墙角楼上，城上的角声，徐风扑面吹到我们耳边，那时我们不知不觉仿佛是醉了似的都笑起来，却怪我们也不知道笑从何处来的，因此我们认定是已经达到同情心安慰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趁此就结合办了一个清明社，凡同游的人都算清明社的社员，后来又办了一个清明中学校，它的校址是在内务部街大方家胡同就算是清明社的产儿。

到今年清明我们的清明社成立已经四年了，无端把我的考证癖被四周岁小孩子的清明社引起来，我就想把清明时节的缘起、风俗、掌故、诗词、歌谣，征集在一块，作一篇《清明寒食考》，但是我正治清代学术史，又加之懒于动笔，要不是我的朋友张贯一督催着我，我恐怕永不会动笔。

但是我先声明一句，我不是考证家，手头书不甚多，只把我所见的抄辑下来，要是像《执改考》之高皇典则，那是敢告不敏的。

底下我又声明一句：我这个稿子，作好了差不多有一年。已经搁在一旁，不去问它，后来为着《国学月报》的第二期出报的时节恰又在清明时候，我就又把它重新整理一下，权应个景儿，这篇就算我作的《清明寒食考》的缘起。

二

清明是我国历代相传下来的春天的一个节气，以阳历合计起来，在四月五日或六日这两天。为什么我们清明与寒食并提呢？我们看《荆楚岁时记》上说：

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这一条的注上说：“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清明与寒食，日子又这样近；而且在历史上又有许多相连的关系，所以民间的传说，“清明”和“寒食”差不多都相提并论；就是类书如《太平御览》及《艺文类聚》都把它抄在一块。

以上把清明和寒食的关系说过。以后再说它的缘起。

大概清明传来极久，在上古榛芒时代，人民将知用火的时候，这清明的掌故，已经印到我们脑子里了。我们从《周礼》在《司爟》和《司烜》这两条上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司爟》上说：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

《司烜》上说：

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我们拿上两条可以看得出来：上古石器时代，人民不知道用火，那时候有知识的人，就教他们怎样取火，所以郑司农的注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教民取火的一点意思，但是那时候人民才见了火，那是又怎样的惊讶、奇怪。若没有节制，那末，三代时候的洪水世界的舞台上，又要多唱几出“火灾”。所以当春天阳气上升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就发出号令，击着柝，摇着铃，教人民“小心火烛”了。又加清明时候的天气，正是仲春时候，天时和物象的变迁，更为显著，在天时方面，据顾亭林《日知录》上说：

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

大概古时，事理还不明白，在在取天时以定人事，所以取火和禁火这一着，也免不了取之于天时。

其次，《气候集解》上说：

清明三月节——按《国语》曰："时有八风"历独指清明风，为三月节；此风属巽故也。万物齐乎巽，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

桐始华——(集解略)

田鼠化为鴽——(集解略)

虹始？——(集解略)

气候和天时上既有这样变化，又加上禁火的印象深中人的脑海——可以说这样印象自太古时代就留下来。《太平御览》引刘向《别录》："寒食蹋蹴，黄帝所造，本兵势也。"黄帝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流传下来是很早的了，至于今还不绝。

复次，到汉朝时，民间的传说，又加上一段介子推的故事，更把寒食节弄得"五色灿烂"。这段故事，据《太平御览》上说："皆因流俗所传，据《左氏》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顾亭林《日知录》上已经辨它是假的，大概这事的传说始见于《庄子》，《庄子》上说：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烧死。

燔死这一点，是从此处说起。这段故事的演成大概由燔死以至于禁烟，是经过一个经久的时期。在西汉的载籍上并未有多少提到此事，到东汉，从范晔的《后汉书》我们可以看出一点来。而且寒食这个日子是无定的，如何人死能无定日？顾亭林据《琴操》已辨他为五月五日而非在三月里了。至于这事演化的经过，据《艺文类聚》卷四寒食条上引周裴《先贤传》曰：

太原旧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引陆翙《邺中记》曰：

并州俗冬至后百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之糗是也。

大概当汉末至魏晋的时候，由介子推的故事，由禁火，一变而为禁"炊烟"。那时候人民很成了一种风气。后来变本加厉，卒至人民不堪其苦。并且这种风俗，不但流传的时代久而"幅宇"还很广。《后汉书·周举传》上说：

周举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景之忌，至其日咸言神灵不禁举火，莫敢烟爨，岁多死者。举作吊书置子推之庙言："盛寒去火，非贤者意"。今则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还温食，活者甚众，风俗顿革。

我们看这上文，"莫敢烟爨，岁多死者。"可见当世人民被这风俗牵累之苦。我们细审这事的情形，周举仅作一府的知府，那时风俗又这样的蔓延，恐怕是不能断尽。试看魏晋间的诏令还有甚于这件事的。《艺文类聚》引魏武帝明罚令曰：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这一道诏令，有怎样的严厉，这种恶习，才稍稍改除。后经六朝金粉的渲染，到了唐朝，才不但不禁火，还要赐火。唐谢观有一篇《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其中有句云："木铎罗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落，赐新火于公卿。"其他唐代作者，赋清明赐火的诗也不少。

又加唐玄宗是一位风流皇帝，因起先的些旧玩意儿玩够了，他翻出来了许多新花样，什么秋千啦，白打钱啦，打球啦。并且那时候民间，因为那一种提倡，又兴出来许多异味的"小吃"，教我们写的人至今还要流涎。你看那时候有多么热闹，真是所谓：

花发洞中春日永，
月楼西畔好风多。

等我下篇即将遗事游戏和饮食，一一写出。要之：当时还有踏青和祭祖，也是促成清明佳节的次因。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于清华研究院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七年）

《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看详》一卷、《目录》一卷，宋李诫奉敕撰。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曾祖讳惟寅，故尚书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讳惇裕，故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讳南公，故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赠左正议大夫。元丰八年，哲宗登大位，正议时为河北转运副使。以先生奉表致方物，恩补郊社斋郎，调曹州济阴县尉。元祐七年，以承奉郎为将作监主簿。绍圣三年，以承事郎为将作监丞。元符中建五王邸成，迁宣义郎。时先生在将作且八年，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遂被旨著《营造法式》。书成，凡三十四卷，诏颁之天下。先生尚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皆不传；《营造法式》独显于世。先生及其父南公事迹，已详于《宋史》及程俱《北山小集》中。

是书首为《看详》，释方圆平直，规矩准绳之事。第一、二卷为总释，释建筑之名物，说明算术之定例，及当时功限格令等

事。第三卷为壕寨及石作制度。第四、五卷为大木作制度。第六、七、八、九、十、十一诸卷，为小木作制度。凡屋宇之结构，属之大木作；凡门、窗、栏、装饰、器用，属之小木作。第十二卷为雕作、旋作、锯作、竹作制度。第十三卷为瓦作、泥作制度。第十四卷为彩画作制度。第十五卷为砖作、窑作制度。第十六至二十五卷为诸功限。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为诸作料例。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卷为诸作图样。总计是书所列先为名例，次为制度，再次为功限、料例，末为图样；纲举目张，条理井然。

瞿宣颖先生称是书约有六长：“疏举故书义训，通以今释，由名物之演嬗，得古今之会通，一也。北宋故书，多有不传于今者，本编所引，颇有佚文异说，足资考据，二也。凡一物之制作，必究其形式，尺度程序，咸使可寻，由此得与今制相较，而得其同异，三也。所用工材，虽无由得其价值，而良窳贵贱，固可约略而得，四也。程功之限，雇役之制，搬运之价，兼得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五也。华纹形体，若拂菻、师子、频伽、化生之类；得睹当时外族文化影响，六也。”据此，《法式》一书，不独为研究吾国建筑规矩准绳之书，即其书中所引诸书，如《周髀算经》：“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一条，多出四十九字；足以是本校勘古籍。而总释中所述宫阙殿楼爵头铺作之名，博引训故，通以今释，吾国建筑术语，尚无定名，欲编词典，舍此莫由。是则《营造法式》一书，为宋以后吾国古籍中创获之作；而为研治吾国建筑之秘典已。顾其书原刊久佚，传钞诸本，互有异同，非藉资众长，广事雠校，不足以见原书之真相，而供学者之研究。桢于建筑一道，所知甚鲜，仅于宋代《营造法式》之所以编制，与版本传钞之流传，举其一得之愚，以为研治是书之一助焉。

按明仲官将作监之职，《法式》为将作监之官书，《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志》四云：

将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工匠之政、京都缮修隶三司修造案；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盥手、焚板币之事。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土木工匠版筑造作之政令总焉。办其才干器物之所须，乘时储积，以待给用，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寒暑蚤暮，均其劳逸作止之节。凡营造有计帐，则委官复视，定其名数，验实以给之。岁以二月治沟渠，通壅塞。乘舆行幸，则预戒有司洁除，均布黄道。凡出纳籍帐，岁受而会之，上于工部。熙宁初，以嘉庆院为监，其官属职事，稽用旧典，已而尽追复之。元祐七年，诏颁将作监修成《营造法式》。八年又诏本监营造检计毕，长贰随事给限，丞簿、复检。元符元年，三省言将作监主簿二员，乞将先到任一员，改充干当公事，候成资替罢。从之。崇宁五年，诏将作监应承受前后特旨应副外，路并府、监修造，差拨人工物料，遵执元丰条格，不得应副。宣和五年，诏罢营缮所，归将作监……

章钰《读书敏求记校证》云：

此书《宋志·史部·仪注类》《营造法式》二百五十册注：元祐间卷亡。《子部·五行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诫、诫字少异，不载《目录》、《看详》，而卷数相符，知即此记著录之本矣。

是此书《宋志·仪注类》称二百五十册，《子部·五行类》称三十四卷，盖《法式》原书犹如清代工部之则例，裒举甚繁，先生乃

删繁就简，定其名物，一其制度，定为成法，于建筑之功不可谓不伟。至《看详》称总三十六卷，而原书目录及《宋志·子部·五行类》，称三十四卷，或疑制度一门阙二卷，当为后人合并。铁琴铜剑楼瞿氏乃谓："其实目录一卷，《看详》中已言之，《敏求记》亦言《目录》、《看详》各一卷，合之正三十六卷。"其说当不为谬。

至《法式》一书之刊刻，共有二次；一为崇宁二年本，一为绍兴十五年本。崇宁本刊刻之由来，原书卷首所列劄子云：

> ……窃缘上件《法式》，系营造制度工限等关防功料最为要切，内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镂版，依海行敕令颁降取进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

此崇宁本之所以刊成。至绍兴本则由丁丙八千卷楼藏钞本附录有一条，兹照原式钞录于后：

> 平江府今得
> 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
> 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
> 左文林郎平江府观察推官陈纲校勘
> 宝文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提举
> 劝名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王唤重刊

又文津阁四库本是书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图样佛道帐经藏有"行在吕信刊"五字，同卷第二十二页天宫壁藏有"武林杨渊刊"五字，吾人由此数条可以知绍兴本之所以从来矣。

吾人所必须研究者，崇宁及绍兴间因何而有刊刻《法式》之事，此诚可以注意者。盖在北宋徽宗之时，承平日久，徽宗喜事园林土木，故有建筑艮岳等举，而先生在当时有建筑五王邸、辟

雍、尚书省、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营房明堂等事。至南宋之时，高宗即位，临安草莱初辟，甘守偏安，无收复失地之心，当时主和之臣，若秦桧之流，从中怂恿，偷安苟活，又当时有市舶司之设置，与海外交通，经济赖以不匮；故临安踵事增繁，顿成承平气象。吾人读《梦粱录》卷八有大内德寿宫、太庙、景灵宫、万寿观、御前宫观等条，又徐松辑《宋会要》方域门记载：绍兴以来，建筑宫殿太学贡院等事，按时记载，历历可考。又吾人更可注意之一事，重刊《法式》之王唤，为秦桧妻王氏之弟。据《宋会要》：绍兴十三年知临安知府，后又知平江府；平江即今之苏州，光绪重修《苏州府志》卷五十一《职官》条云：

> 王唤字显道，华阳人，绍兴十四年三月以宝文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任，十七年正月提举太平兴国宫。

又《杂记》条云：

> 秦桧妻之弟王唤，字显道，绍兴初知府事，峻于聚敛，酷于用刑，然其施为亦有可取，兵火之余，故墟瓦砾山积，乃录入城小船，出必载瓦砾以培塘，人以为便，石之破碎者，积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赋于民，而利有余，……

当南宋之时，临安、平江均为刻书最佳之处，王唤为秦桧之妻弟，又峻于聚敛，故能迎合高宗苟安之志，而有刻《营造法式》之举，荟萃良工，雕为善本，虽其用心固未必佳，然要不可不谓有功于建筑之学者也。

自《营造法式》刊行以后，北宋时晁载之即钞录其书于《续谈助》，南宋庄季裕亦著录其书于《鸡肋篇》。晁氏钞于崇宁五年，

距《法式》刊行时仅三年，则其书见重于时可知。

然自靖康南渡，王室荡然，宗器古物，均虏掠而北。于是东都刻书之胜，由汴京而移平水，宋室故物，已略无余烬；南都则首推临安，所刻版片，降及元明尚有存者；叶德辉明《南廱志经籍考序》云："明时监本，多从宋元版补修，近日藏书家群相推重。"故明《文渊阁书目》，《法式》有五部，未详卷数；《内阁书目》有《法式》二册又五册，均不全。《南廱志》作三十卷，注云："存残版六十面"。是知崇宁刻本《法式》，自靖康之难以后，世间已成绝响；即南宋绍兴刻本，《内阁书目》已仅著录残卷及版本残片而已。故历明清两代，私家著录，竞尚影钞，其绍兴原刻，已成星凤，吾人欲复《法式》旧观，亦惟有私幸发现内阁所余之南宋残本，庶乎可以稍识本来面目。自清季以还，迁内阁大库之书于国子监南学，由南学展转迁徙于午门及京师图书馆等处，即此残存数卷已荡然无遗。幸于其中发见《法式》第八卷首页之前半页，又八卷内第五全叶，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说者遂谓崇宁真本复现于世。然吾窃疑清代内阁大库，承明之旧，明代内阁所藏监本，多因宋元之旧，《法式》为官修之书，则亦与监本为同类之书，且吾观文津阁四库《法式》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四库本依据范氏天一阁进呈影钞本，其缺第三十一卷，由《永乐大典》本补出，四库诸书，格式皆同，故不照原式。又丁丙八千卷楼钞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丁本号称张蓉镜本，然未可为据。惟晚近故宫殿本书库，发现钞本《法式》，有钱遵王之印，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卷后且有平江府一条，与丁本相同，行款格式，皆与内阁所发现号称崇宁本之格式皆同。

是书《天禄琳琅书目》未著录，惟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条有："礼部等衙门，遵旨议复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如得遗书，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酌定价值，汇送礼部，其无刻版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缮

写，交礼部汇缴。”是书当于是时进呈内府，虽非钱氏原本，然必由钱氏原本影钞而出者，故所钞皆较他本为工，因此可知昔人以绍兴本为十行本为误，则昔人所谓崇宁本者，殆即所谓绍兴本欤。自张氏爱日精庐影钞《法式》以后，若皕宋楼陆氏、铁琴铜剑楼瞿氏，皆有影钞本；安得合众本而一校之，或再能重发现有绍兴年号之宋本残片，则崇宁本与绍兴本之疑问，不难自见也。

《法式》一书，自《宋史·艺文志》收录以后，历代藏书家著录甚繁，兹将耳目所及各书，钞撮于后，而《法式》流传之胜衰于此可见一般。

宋明以来各家书目著录《营造法式》表

宋	明	清
宋史志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 文献通考（误作李诫）	国史经籍志 明南廱志经籍考 明文渊阁书目 述古堂书目（故事职官类） 天一阁书目（孙本四册） 也是园书目	绛云楼书目 读书敏求记（述古堂即钱氏斋名） 四库提要 张氏藏书志 带经堂书目 秦汉十砚斋书目 传书堂书目 铁琴铜剑楼书目 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 仪顾堂题跋 善本藏书志 观古堂藏书（著录杨墨林刻本）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山西杨氏新刻丛书本）

由上表可知清初各家书目著录极鲜，自钱氏传钞本流传于

世，于是各家皆竞尚其书，洎乎晚清江南丁氏、瞿氏、陆氏皆有传钞之本，几乎各守一编矣。

要之，《法式》一书，在宋时仅有崇宁、绍兴两刊本，崇宁本既不传于世，绍兴本吾人可知者，仅有残页及影钞本。至《法式》刊行以后，钞撮其书者，在宋则有晁载之之《续谈助》，有《十万卷楼丛书》本、《粤雅堂丛书续编》本。庄季裕之《鸡肋编》，有《碧琳琅馆丛书》本。在明则有唐顺之《稗编》，明刻本陶宗仪之《说郛》。惟通行本编目不同，多不载其书。

至影钞宋绍兴本，在明代吾人可知者，钞本有三：一，明人钞本，据邵渊耀跋；二，天一阁钞本，四库本即据天一阁本及《永乐大典》者撮合而成；三，述古堂钱氏钞本。钱氏盖本诸牧斋，故《绛云楼书目》有《法式》六册，钱曾跋称："是书牧翁得之天水长公。己丑春从牧翁购归，牧翁又藏梁溪故家镂本，庚寅不戒于火，独此本流传人间。"其后张金吾月霄氏得影写述古本于郡城陶氏五柳居。道光间张蓉镜又影钞张月霄氏之本，洎后清季各藏书家如铁琴铜剑楼瞿氏、皕宋楼陆氏、八千卷楼丁氏，各有藏本；吾疑以上诸本非由钱氏之本，即由张氏之本所出。即故宫新发现之影钞本《法式》，亦由钱氏本所出也。当时又有带经堂陈氏本。陈徵芝《带经堂书目》卷三跋云：

> 此从影宋本传钞，陈氏之书大半归周季贶，季贶挂误远戍，所藏遂归吴中蒋凤藻香生。

则密韵楼蒋氏传钞本，殆亦钱氏之别裔欤。

自明以来，翻刻《营造法式》者，则梁溪故家刊本著录极罕，叶德辉《观古堂书目》谓藏有道光□□杨墨林刻本，莫友芝《郘亭书目》著录山西杨氏刻丛书本，所谓丛书者，指杨氏《连筠簃丛书》而言；今本丛书目下注嗣出二字，吾意道光去今未远，何以

所刻之书，未流传人间。然道远僻塞之地，刊本不易流传，如方玉润之《诗经原始》，原刊本极不易得；然至关中则所见不鲜，是则杨氏刊本，或犹存人间，亦未可知也。

往者藏书诸家喜藏《法式》一书，不过叹为秘籍而已，于建筑之学，为《法式》本身之研究，尚未暇及之也。民国八年，紫江朱桂辛先生启钤南游金陵，获见江南图书馆藏丁氏本，惊异宝爱，亟请商务印书馆影印，《法式》一书始流传于世。越六年，既发现内阁大库宋本残叶，爰属武进陶兰泉先生湘取文溯本，暨吴兴蒋氏密韵楼本、丁氏本，互相勘校，重为绘图镂版行世，《法式》一书，始稍稍可读。当此书传布之后，英人叶慈氏 (W. Perceval Yetts) 曾有评论，登载《英伦杂志》中，德人德米维尼氏 (M. P. Demieville) 亦有评论，是此书出版之后，响应于世界可知。至民国二十二年春，陶君编故宫所庋藏殿本书目，发现影钞宋本《营造法式》，行款格式，与宋本相同，陶君亟以相告，惊为奇迹，乃由刘敦桢、梁思成、单士元诸先生及桢等，用丁本相校，复取陶氏刻本与文津本及《续谈助》相校，其图样则用《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漾字韵《营造法式》卷三十四残本像片相校，可以补旧本不足者甚多。

《法式》一书，版本传钞之繁，既如上述。英人叶慈氏所著《营造法式》之评论中，首列一九二五年版《营造法式》材料之来源及所引证之书籍图表，征引版本，尚有可以补证之处；然借此可以略见一般。其文刊在《汇刊》第一卷中，兹不另述。

今据诸本相校，可分文字、图样二类。兹先言文字之异同：四库文津阁本，改十一行为八行，改二十二字为二十一字，故胥吏钞写，自多舛谬；即如丁氏本改十一行为十行，字数亦多不齐，惟行款字数不一，则易脱落。故丁本卷六，与故宫本相校，脱第二页全页，其脱落处，正十一行本由第一页至第二页衔接处也。其书又缺小木作一页。又《法式》卷第四第三页文内，遗漏五

曰慢栱一条，用故宫本补足，其文：

> 五曰慢栱，或谓之肾栱，施之于泥道瓜子栱之上，其长九寸二分，每头以四瓣卷杀，每瓣长二分，骑栿及至角则用足材。

此条为前刻诸本所无，尤为重要。是校雠之事，当以古本为善。然亦有不能专恃古本者，即以此书而论，晁载之之《续谈助》，钞于崇宁五年，其书可谓古矣；乃吾取与刊本相校，可以补正刊本者，正复不多，是非熟读其文，深知其意者，不能详校而贯通之。

因此，于版本互相雠校之外，以意汇通其书，于不可解之文字，可以稍得其解者，可得数例：

(一)以数学校《法式》例　《法式》卷四第三页华栱转角斜出跳之长，故宫本、丁本皆作“假如跳头长五寸，则加二寸五厘之类，后称斜长者准此。”陶本二寸作二分，梁思成先生以三角术证之，知五寸正方形，其斜角线应长七寸零七厘强，仍以故宫本、丁本较近。

(二)以本书校本书例　如《法式》卷十第十三页，“牙头护缝”下疑有脱简，刘士能先生据《法式》卷二十五彩画作功限，“牙头护缝，应抹绿，或解染青绿”，补其言之未备。

(三)以他书校本书例　如《法式》卷十四第四页五彩遍装制条云：“四曰团窠宝照”，诸本“窠”均作“科”，或作“枓”；朱桂辛先生据《新唐书·车服志》：“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断应作窠，其文自通。

(四)贯通本文例　如“伏兔”、“搏风”、“举折”为本书之专有名词，如“伏兔”而写为“伏免”，“搏风”而写为“博风”，则

知其必讹矣。

以上数例，不过举其尤著者而言，至如数目等级等名，少差一字，其谬已多，非熟于其事，不足以言营造之用。故校雠是书，必须于版本校雠之外，而能贯通其理，目验其事，然后其书庶乎可读矣。

至本书图样，原于解释本书而设，工匠之事，其理至精微，非别为图解不能明也。如本书卷四大木作制度，栱枓之制，原分华栱、泥道栱、瓜子栱、令栱、慢栱五等；如无卷三十《栱枓等卷杀之图》以明之，则其文即不知其作何解矣。故工艺之有图，犹读史之有表，其用乃尤重于文字。本书所列图样至繁，兹先就大木作、彩画作而言之：

(一)大木作　丁本大木作制度，据梁思成先生研究，间架构造，误者不少，与故宫本相校，如卷三十一第五页，殿堂等五铺作、本四柱，丁本乃多而成五柱，其谬殊甚。卷三十一第十三页，八架椽屋乳栿对六椽，少一柱；又第二十页六架椽屋，错画安柱地位，少差分毫，其事即不可应之于用。文津阁四库本图，似较丁本为胜，大木作间架亦不误，然其书为厚宣纸钞本，细部已失其本来面目矣。

(二)彩画作　彩画之制，其事极为细微，累经传钞，则尤不易辨识。丁本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彩画制度，与书中原则多不一致，其谬甚繁，可以与丁本相校者，除故宫本外，尚有《永乐大典》所存《营造法式》第三十四卷残本像片可以取校。今按彩画之制，其地分青绿红金白五色；通用者多为青红绿三色，金则用之于极贵重之处，白则用之于极普通之处，其用甚鲜，均为例外，如彩画全用白地，则已失去本书之旨。且也建筑彩画等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如宋代之建筑而用清代之制以推测

之，则已非本来面目矣。丁本界画不明，故难以揣测。标示颜色之线，又失去其指定地位标准，故难以设色。故宫本之线，部位较明，如与此图相校，则可知其指定其地为大青，其花为赤黄，其叶为绿，其瓣为红，其边为大绿，则部位自明，易于设色矣。

又丁本卷三十四第三页，五彩装净地锦，颜色浑乱，与《永乐大典》本相校，其地为青，其瓣为红，其边为绿，则其疑自解矣。故《永乐大典》本，可以补正斯书彩画之误者甚多。

以上诸例，皆就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研究所得者而言；梁刘二君均著有专文当另行刊布，以飨读者，桢之此文，仅举其大概而已。

要之，自陶本刊行之后，引起世界研究吾国建筑之兴味，开创之功，自不可没，后人踵事而研治之，其便已多。然学问之道，日进无穷，使后之治建筑之学者，对于现在研究之问题，更进而研究之，则吾国建筑之学，岂不更进步乎。必谓吾文既出，旷古绝今，斯则吾人所不敢自期，亦不敢期于人者也。

（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

记辽陵石刻及其他关于讨论辽陵之文字

一

《辽史》纂修极为简陋，文字刻石，流传极少，尤以契丹文字，仅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五字，其他片纸无传，已成绝书，为研究《辽史》者一大憾事。自发现辽陵石刻，颇引起国人治辽史之兴趣，杂志季刊，皆有不少关于讨论辽陵之论文。惟此项石刻，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尚无人注及。当是年春间，热河告警，因该处为清代历代帝王驻跸之所，且为招徕蒙藏，同钦教化之处，热河行宫及大招等寺，实藏不少经卷古物。北平图书馆即派刘子植君节、于君道泉到承德与当局商洽，将经卷等物移北平图书馆或其他相当地点保存。其实河山国壤既遭强寇侵占，如此肩小经卷又安足惜！不过吾人能尽一部分责任即尽一部分责任，且存置荒山野寺，转不如公诸社会以供学术界之探讨。刘君到承德未久，热河即行失陷，刘、于二君困居危城，馆中同仁皆以二君安全为念。袁守和先生乃命桢及彭色丹君由大连绕道到沈阳，

探听刘、于二君消息。以桢私人关系与金毓黻君商酌通行办法，但烽火频惊，朝阳路阻，旅人行踪，莫可究诘。吾人宗旨既未达到，而是时南满医科大学教授日人山下泰藏君，已拟议作热河探险之工作矣。余旅居沈阳，百无聊赖，金君毓黻乃出示辽陵石刻，余惊喜过望，金君并以一份惠赠北平图书馆，未几桢即返平，而刘、于二君亦间关遄返，吾人此行，所获者仅此而已。

但为时不久，上虞罗振玉君即撰《辽陵哀册跋尾》，刊于《辽居杂著》，金毓黻君复辑有《辽陵石刻集录》刊行于世。至于因北平图书馆所获石刻原本，而作专文讨论者，则有孟森君《辽碑九种跋尾》，王静如君《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厉鼎煃君《契丹国书略说》等文刊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杂志中，而傅斯年君关于辽陵石刻亦欲撰为一文，惜未成篇。国人对于辽事，尚独具热肠，从事探讨，不可不谓幸事也。

二

辽圣宗永庆陵在热河林西县东北，其地有高大白塔，俗呼为白塔子，距林西县治百八十里，东北去林东设治局约二百里，据刘振鹭《辽永庆陵被掘纪略》："即辽上京之庆州。"《契丹国志》"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庙号圣宗。"惟陵迹湮没，无人知其为陵寝者。民国二年，林西县长某以查勘林东垦地发现碑文，识其为辽圣宗遗物，至西历一九二二年法人牟里氏(Mulle)曾详勘该地，发表《蒙古巴林之大辽故都》一文于《通报》，记述其事，而国内尚未有人注及也。民国十九年，汤玉麟主持热河省政，乃将此物据为己有，复将原石运至沈阳私邸，其事稍传闻于外，然其余物庋藏甚秘，人所罕睹。自九一八事变发生，汤邸被日人所查抄，乃

发现原石移存于伪邦之图书馆，计原石为：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文并篆盖　汉字拓本，篆盖外缘有十二支神像，四角有花纹

圣宗仁德皇后哀册文并篆盖　汉字拓本，篆盖外缘有十二支神，四角有龙

圣宗钦爱皇后哀册文并篆盖　汉字拓本

兴宗神圣大孝宣皇帝哀册　原石未见　国书

兴宗仁懿皇后哀册文　原石未见　国书

兴宗仁懿皇后哀册篆盖　汉字拓本

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　汉字拓本

同上　国书拓本

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篆盖　汉字拓本

同上　国书拓本

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文　汉字拓本

同上　国书拓本

道宗宣懿皇后哀册篆盖　汉字拓本

同上　国书拓本

辽相国贾师训墓志铭并篆盖　汉字拓本

上原石拓本凡十七件，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遗物，均在于斯，且半用契丹国书所写，发前人所未闻，保存史料及已绝之当时语言文字，尤足珍异。考契丹文字有大小字之别，辽太祖命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制成契丹文字（见《辽史》本传）。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制契丹字数千，以代木刻之约……。”其契丹小字，实仿自回鹘，为太祖皇子迭剌所制，详《辽史·皇子表》。此等国书碑文，王静如君所撰论，研治最为详尽。当辽之初叶，崛起草莽，本无所谓文化，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予契丹，契丹实力始延及中土。后晋叛盟，于晋出帝开运三年（西历九四六）契丹入据大梁，掠汴都所藏

宝器文物以去，辽人始得见中华文物，俗习风气，顿改旧观。降及辽穆宗时与宋室澶渊之战，宋室不惜岁币数十万赠予契丹，于是契丹始大。而辽代人士均沾汉俗，帝室酷爱华风，后妃擅长音乐书画，载在《辽史》。于是耶律庶成则撰《实录》，兼定律令（见《辽史》本传）；耶律俨、陈大任则撰《辽史传记》、《辽礼仪志》、《辽朝杂礼》，国俗汉仪记载甚详。使原书俱存，后人纂修契丹国史，当不如此之简陋也。故辽圣宗兴宗二朝南北议和，太平无事，实辽朝之黄金时代。其于陵寝石刻，寺宇建筑，遗迹流传皆有足述，而当契丹史阙有间之时，借此流传遗迹，亦有足资考订史迹者焉。

至辽圣宗庆陵之缘起，据《辽史·地理志》云：

> 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

《金史·地理志》：

> 北山有辽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城中有辽行宫，比他州为富庶，辽时刺此郡者，非耶律、萧氏不与，辽国宝货多聚藏于此。

而辽代有特殊之风俗，不可不注意者。《辽史·营卫志》一：

>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

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是辽代对于陵寝极为注意，建筑之华丽既如上述，而复有兵马扈从，其伟壮可知。圣宗既爱庆州山水之优美，卜葬于此，则兴宗、道宗两朝即附葬于此，亦理所当然。惟辽代诸帝所居之宫皆有专名，如《辽史·营卫志》所载："圣宗曰兴圣宫，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则其陵寝亦必有专名。惟碑中所记仅《道宗哀册》所述为永福陵。刘振鹭称圣宗为永庆陵，当有所据。其他因寝殿残破已甚，不能辨识为可惜耳。至辽代陵寝，当天祚时曾遭金人残毁，然所残毁者，恐对于陵之外表而言，至其内部则恐非必遽摧折耳。

辽陵《哀册》所记名称事实，大致与《辽史》相同，撰碑之人如耶律俨、张俭等，皆为辽代文士，《辽史》有传，字迹秀丽，文章优美，惟其所记者多腴墓颂圣之辞，然其称引之官爵年号，文字制度，则可以补《辽史》之缺，借供学者之讨论。举其大者，约有数端：

（一）契丹文字久亡，所存仅有陶宗仪所举五字，《辽史》及《契丹国志》所释之称谓名物如"捺钵"等类，仅有其音，而无其字，今有契丹国书发现，实为研究契丹语言文字之重要史料，可与西夏国书互相并重者也。

（二）由其称引可补《辽史》之缺者：

甲、《辽史》道宗年号"寿隆"乃"寿昌"之误；又"太康"及"太安"乃"大康"及"大安"之误。

乙、《辽史》"钦哀皇后"为"钦爱皇后"之误；宣懿皇后，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大康初宫婢等诬后与伶官赵维一私通，赐后自缢。此《哀册》云："载衾宠渥，失于奸臣……青蝇之旧污知妄，白璧之清辉可珍。"可与《辽史》相参证。而王鼎所撰之《焚椒录》虽语多增侈，而事则非妄也。

丙、《道宗哀册》撰文耶律俨，书食邑六千五百户，用“五”、“六”字，书实封则作“伍”、“陆”字。圣宗撰文张俭款亦书食邑一万户，实封壹仟户，亦有“一”、“壹”之别，此必当时之惯例。而所书爵邑，亦与《辽史》本传所载不同，此可补证《辽史》之缺者也。

丁、辽相贾师训，《辽史》无传，据罗振玉氏考证，贾师训即贾士勋。《辽史》于汉臣多不立传，且人名称谓多用译音；致辗转沿袭，已失原名意义。经清代改订《辽》、《金》、《元》三史译名，更失其真。有此一事，可以例证者也。

（三）关于辽代之文化，《辽史》所记，如东丹王擅书史，懿德皇后喜音乐，罗衣轻之善舞，已可见一般。更由辽陵雕刻、辽代建筑可知辽代之文化。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实为辽代最兴盛时期，三朝陵墓所雕刻花纹均极烂熳，道宗帝后之篆盖中央篆书谥号，其周围设双线，线上雕刻八卦及唐草花样，其外则雕刻十二支神像。似此雕刻及十二支神像，何时传至辽代？均有研究之价值。其他如新罗好大王倾向华风，其陵墓石刻，均有足纪。又如近来发现之辽代建筑，补助研究东北史迹不少资料。吾意研究边疆历史，当以文化为中心，则异域民族本地之习俗，华风之倾慕，皆可于此考见，而东胡民族之华化亦可因之而考定焉。

由上三端，已可见辽陵石刻，在辽金史学上为最重要之发现焉。

三、

辽陵石刻原委，既如上述，至纂辑辽陵石刻史料之书则为金毓黻氏之《辽陵石刻集录》。是书计分六卷，卷一绪言，卷二石刻正本，卷三哀册考证，卷四国书考证，卷五国书旁证，卷六论著，附录《通报》。卷二石刻正本，即裒辑辽陵石刻及大金皇弟都

统经略郎君行记，共石刻十八、钞本二。卷三、卷四为罗振玉氏撰跋尾及其子罗福成氏所撰释文。卷五国书旁证，为裒辑朝鲜京城素王博物馆，上虞罗氏所藏镜、鱼符、玉盏、官印等类。卷六论著，译自法国《通报》、日人论著及《艺林旬刊》之文。是书绪言述辽陵发掘之经过。其讨论辽陵文字，多宗罗振玉氏之说。主要之点约为数项：其一，以契丹小字之制，既在大字之后，且数少而赅贯，则兴宗道宗二陵内《国书哀册》必契丹小字。其二，碑中避讳之字，据罗振玉氏所释，其中"光"字避太宗讳作"光"，"贤"字讳景宗避作"贤"，"明"字避穆宗讳（穆宗本讳璟，曾改名明）作"明"或"明"，按碑中尚有"成"字作"成"、"威"字作"威"，此亦因避讳而改，所当考证者也 其三，乾隆四十六年改订之《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提要云："以索伦论为本。"金氏则谓："契丹一族，近于索伦无宁谓近于蒙古 达呼尔语，同于蒙古而音小变，或即为契丹之遗语。若索伦语，本与满洲语同源，其族亦必出于女真，辽史语解所释，未为得实。"其说均有确见，而是书搜集详尽，排比得宜，为研究辽陵遗迹最完备之书。至卷六论著，采择容或未尽，亦有可删节之处，此则或限于时间，或囿于见闻，要不足为此书病也。

至讨论辽陵史迹之文，则有罗振玉、孟森二君之跋尾。罗氏之文谨据《辽史》，互相证明，虽采辑未广，而于《辽史》未备之处，用碑文补之。如《圣宗哀册》与《辽史》相补证者，共有五处。《仁德皇后哀册》，后初葬祖州，大康七年自祖州迁庆陵，则《传》所失载，可据以补史氏之阙。《道宗哀册》撰人张俭，《宣懿皇后册》撰人张琳，与《辽史》所书官爵不合，可与《辽史》互证。《贾师训墓志》，贾师训即《辽史》列传中之贾士勋，此为罗氏之创见，据此《辽》、《金》史译名，互有不同，非通蒙古、满族语言不能通其语根变化之故；可为治边疆史者开一通例。惟罗氏之文，如能繁征博引，逐类旁通，则其所获，当必不致如斯。此则美中之不

足耳。孟君之文，较罗君征引为广，其论道宗纪年"寿隆"，碑文作"寿昌"，引毕沅《续通鉴考异》，以征实其事。"明"字缺笔，以避景宗讳小字明扆，非熟于辽金掌故，不能为此。惟《贾师训墓志》未能举出其人，为遗憾耳。

关于讨论辽陵契丹语言文字者，则有王静如、厉鼎煃二君所撰之文。王氏用顾炎武《音学五书》推证之法，罗列已有契丹国书，与碑中文字互相比较．如寿昌二字，王氏疑辽人译意，以昌字置前，昌有"大"意．则寿昌二字．应译为大寿，契丹文则应作［又令个〇］．以类而推．《大金皇弟郎君行记》碑文，当金代初叶时金文与契丹文并用，此碑用契丹文所书，则"大金"二字，契丹文应作［又山］，此用推证之法，至少可十不失二三，犹不失王静安先生治学遗意。据厉君所撰《契丹国志略说》所引洪迈《夷坚志》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为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雅住。'"实字居前，动词置后，此条可以补证王君之说。其推测契丹文字，约得结论三项：

(1)契丹字的组成上，字体上绝不同于西夏文，契丹小字。

(2)契丹字组成方法上与女真字近，不同女真小字。

(3)契丹字，字体上与女真小字近似(非同)而音意绝不同，与女真大字异。

抑余更进有言者，契丹女真造字，皆有大小字之别，即清初造满洲文字，亦有大小字之说。犹渤海有五京之建设，而契丹、金代亦有五京之设立，是则创造文物，因革沿袭，必有其故，如能详审其史迹，从而考订之，亦治史学盛事也。厉氏所撰《契丹国书略说》一文，征引较王氏为赅博，而结论未能如王氏之精详。所引符牌等字，以与契丹文作参考，然《辽史国语解》(百衲本二十四史《辽史》卷百十六)及《契丹国志》所举语言可以互证者甚繁。至契丹文与索伦语相较，金毓黻氏则以为契丹语出于达呼尔语，

非出于索伦，其证极详审，是厉氏之文亦有可以商榷之处。惟语言之学，非专门名家，不能知其甘苦，固不敢妄论。如以文字体裁而论，则王氏之文较简净矣。

甲戌除夕前一日草成

（原载《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

一　缘　起

曩读梁任公先生所辑《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内载《时务学堂学约》，时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课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于此可以知近代书院学校之演变，而为今日教育可以借镜者甚繁。因思自清乾嘉间阮文达倡立学海堂、诂经精舍以还，人材辈出，学风丕变，在吾国教育史上，实有注意之价值。乃缀辑其史迹，整理其故事，爰分为：（一）乾嘉以来书院建置之沿革；（二）书院之课业及光绪间新旧学程之条议；（三）吾人对于今日教育之感想。共分三章；而书院学校因革利弊，亦附见于其中。猥以研治辽金史事，兼治目录之学，乘其余暇，摭拾成篇，未能搜辑完备，畅所欲言。阮文达云："元不能为古文，但能效唐人经疏分析事物，期明其意。"桢窃取其意，乃条陈由书院改变学校制度之原委，间附末议，备学者参考焉。

二　乾嘉以来书院建置之沿革

按书院之制，其来甚久，起于唐而盛于宋。清代书院，仍沿宋明之旧。自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设。《清会典》云：

凡书院义学，令地方官稽察焉，京师设立金台书院，每年动拨直隶公项银两，以为师生膏火，由布政司详请总督报销。直省省城设立书院，直隶曰莲池，山东曰泺源，山西曰晋阳，河南曰大梁，江苏曰钟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鳌峰，湖北曰江汉，湖南曰岳麓，曰城南，陕西曰关中，甘肃曰兰山，四川曰锦江，广东曰端溪，曰粤秀，广西曰秀峰，曰宣城，云南曰五华，贵州曰贵山，皆奉旨赐帑，赡给师生膏火。奉天曰沈阳，酌拨每学学田租银为膏火，令有志向上，无力就师各生，入院肄业。

然当时所设立书院，率为士子课习制艺之所，兼设古学，或为师儒讲习理学之地，其研治经史考证之学者盖寡。自阮文达元督学浙江时，创立诂经精舍，总督两粤时，创立学海堂。其学以考证经史为宗，兼及天算推步之学。于是士子闻风竞起，所向景从，学风为之一变。后钱仪吉讲学大梁，复游粤东，集徒授学，崇尚汉宋。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王先谦督学江苏，创南菁书院，黄彭年于直隶重整莲池书院，于吴中正谊书院内设学古堂；凡此诸事，其宗旨虽有不同，而与兴学施教，则同导源于阮氏，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此一时也。自道咸以后，外有敌国之厄，内逢洪杨之变：人士渐知徒讲考证之学，不足以救亡。于是忧时之士，群欲改弦更张，重树学风，以救时弊，其说

可分为两途：若曾国藩、倭仁诸君，以为汉学之弊，在救之以宋儒义理之学，非存养省察，不足以有为，此一派也；其他学者若龚自珍、魏源诸君，则宗西汉公羊家法，兼治时政；以挽饾饤破碎之弊，此又一派也。世风日亟，国事蜩螗，于是康梁继之。康氏在粤讲学长兴里，梁氏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大声疾呼，融和汉宋，崇尚今文，兼治西学，力破陈说，务求新知，不可不谓吾国学术上之一大变动！当时崇之者推为圭臬，毁之者詈为洪猛；然清代学风自此而一变矣。当时张之洞氏亦知时势所趋，非容纳新学，不足以图存，所撰《劝学篇》，实含有开放之意，非如王先谦、叶德辉辈，徒守成说，食古不化者也。自光绪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亡命外国，时务学堂亦被封禁。湖南学使徐仁铸，本识时之士，亦被窜逐，更易俞廉三为湖南巡抚，改时务为崇实书院，以黄舒呙为山长，力崇程朱之学，以祛康梁之说。于是叶德辉、苏舆等人，大肆厥辞，撰《觉迷要录》、《翼教丛编》等书，以力诋康梁，虽徐仁铸氏为德辉之师，亦不能免焉。吾人平心论之，康梁之说，虽识见较远，而亦不能无语病。叶苏之辩，固多诬妄，然亦有其见解；昔日争端，已成陈迹，然在今日视之，两家学说，亦均持之有故，非可一概抹杀也。嗣后外患日迫，西学东渐；昔日占毕时艺，不足以有为，既讲习经史，研治汉宋，安足以知西国科学之长，武器之利哉！始也秉教育者，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后乃渐知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昔日抱残守缺，执版升堂，坐书院中，吟哦经日，时风所趋，如潮水然，有不得不改革之势；虽有守旧之士，力反其说；亦莫可若何，此时事所迫者，非一二人力所能为也。降及清季创设学堂，改革学制，于是书院废而学校兴；书院两字遂成历史上之名词矣。惟民国十四五年间，北京清华学校设研究院，犹存书院之遗意焉。总观清代书院，自阮氏以经学考古倡导以后，学风丕变，究其原委，可分为嘉道以来书院制度概况，及近代书院学

校制度之变迁两事。综其始末梗概，分述于后。

甲　嘉道以来书院制度概况

昔日书院为士子讲习课艺之地，或为师儒敦切品行，省养存察之所，前已言之。自阮文达倡立诂经、学海，乃专示士子以考证训诂之学，兼习天算推步之术，士子各以性之所近，志其所学，学有专门，已含有分科之意，训诲之方，已较昔人为善。按诂经精舍，设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建立于嘉庆六年，许宗彦《诂经精舍文集序》云：

> 吾师云台先生，以名世之德，为人伦藻鉴。先是视学两浙以行谊经术厉士，士风旷然一变，既奉命镇抚是邦，纲举目张，百为具理，鲸鲵就戮，江海如砥。于湖壖立诂经精舍，祀许洨长、郑司农两先师，择十一郡端谨之士，尤好古力学者，萃处其中，相与讲明雅训，兼治诗古文辞，公暇亲为点定，并请王兰泉、孙渊如两先生为之主讲。二年，得文集若干卷。

又阮元《西湖精舍记》云：

> 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尝病古人之诂散而难稽也。于督学浙江时，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纂诂》百有八卷。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诸生请业之席：则元与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兖汴曹济道阳湖孙君渊如迭主之。诸生谓周秦经训，至汉高密郑大司农集其成，请祀于舍。孙君曰：非汝南许洨长，则

三代文字不传于后也，其有功于经尤重，宜并祀之。乃于嘉庆五年五月己丑，奉许郑木主于舍中，群拜祀焉，此诸生之志也。

其诸生课文，刻有《诂经精舍文集》，凡至八集，并有《诂经精舍章则》及《藏书目录》。李元度《阮文达公事略》云："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述，东南人材称极盛焉。"诂经精舍历时最久，代有闻人，至光绪初年俞荫甫樾，尝主讲诂经精舍，缪荃孙《俞先生行状》云：

先生历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等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至三十一年，为历来所未有。其课诸生，一禀阮文达公成法，王侍郎昶、孙观察渊如之绪，至先生复起而振之。两浙知名之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材者，不可胜数。门人为筑俞楼以与薛庐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与乐道其地不绝。先生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蔚然为东南大师。晚岁忧伤时局；常语人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中学为体者道也，以西学为用者器也。"病中犹以毋域见闻，毋忘国本，垂为家训。

阮氏于嘉庆八年立海宁安澜书院；二十五年总督两粤，立学海堂，以经古学课士，略如浙江之诂经精舍。按学海堂建于广州之粤秀山。林伯桐《学海堂志》云：

仪征公于嘉庆丁丑，持节督粤，迨辛巳政通人和久矣。始设经古之课，不专一题，俾得所近；不速其期，俾尽所长；既以粤士为可教，遂辟学海堂。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

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枕城面海，因树开门，荆榛则薙之，古木则培之。公于政暇，躬亲指画，经始甲申之秋，阅一时而蒇事，行礼讲业，具得所依，高下自然，曲折有意。自是以来，诸童入塾，下邑横经：或闻风而聿来；或游观而不舍，蒸蒸然多所兴起矣！

按学海堂建置规制，较昔日书院略有不同。考其课程章则，其主要者约有五端：(一)昔日书院首设山长，今者改为学长。《学海堂志·设学长》条云：

此课之设，首劝经史，而诗赋备具，应课者，各有所长，司课者宜兼众力，是以丙戌之秋，设立学长八人，同理课事，俾各悉心力，以俟大吏裁定，而昭布焉。

仪征公谕云：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既劝通经，兼该众体，非可独理；而山长不能多设。且课举业者，各书院已大备，士子皆知讲习。此堂专勉实学，必须八学长，各用所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永不设立山长；与各书院事体不同也。

(二)季课：每岁分为四课，由学长出解经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分别散给膏火。学长如有拟程，可以刻集，但不给膏火。

(三)专课肄业生：道光十四年总督卢坤始札学海堂增设专课肄业生十名，并厘定应行事宜数条。

(四)经费：自道光元年至六年，所有膏火，俱由总督阮元捐廉发给，六年六月阮元改官云贵总督，筹画在官无碍田地租息，拨充公用，其征入掌之于官，请领动支，皆有成式，复以堂费浩

繁，捐银四千两，发商生息，为之协济。

（五）雅集：每年正月二十一日，即阮元生日，期会团拜。七月五日为郑玄生日，即于堂中行祭礼。此外花朝上巳，盛夏曝书，中秋坐月，九月赏菊，长至观梅，皆于佳日举行小集一次。（以上皆据《学海堂志》）

占毕之暇，继以吟咏，胜地佳会，至今令人健羡。学海课业既纯，办理亦善，故历时甚久，人材尤胜。且兼及刊书之业；士子课艺则刊有《学海堂文集》，自阮氏以迄陈澧凡刊有四集，九十卷，作者五百人。又仿纳兰容若《通志堂经解》之例，辑有清一代经师注疏，刊有《学海堂经解》，凡为书一百八十种，一千四百卷，成绩伟然可观。其继阮氏后者，道光十四年卢坤总督两广时，嘉兴钱仪吉蔼人来游是邦，坤属修《两广盐法志》。仪吉为阮元弟子，元属仪吉与学长林伯桐、吴兰修、曾钊，商订专经课士之法。其时人材辈出，其历任学长，及堂中高材生，若林伯桐、吴兰修、曾钊、张杓、张维屏、侯康、陈澧、谭莹、黄培芳诸君，各有著述行世，均一时俊彦之选。书院创始于道光元年，迄于光绪末载，凡九十年，老师宿儒讲学其间，历祀不绝，尤以陈澧掌院为最久。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年二十五岁，为专课生，三十一岁补学海堂学长，迄七十三岁卒；身在学海堂垂五十年。学兼汉宋，著述等身，为粤中耆宿。同治六年方濬颐创设菊坡精舍，聘为山长；弟子成就者甚众，刻有《菊坡精舍文集》。当张之洞来总督两广，澧已前卒，之洞躬诣墓前，称私淑弟子。复有诗云："洸洸陈先生，深入五经郛。尽郏汉宋畛，兼握文笔珠。"盖纪实也。自光绪初叶张之洞来莅斯邦，立广雅书院兼开广雅书局，刊刻名贤著述，不下数百种，粤中人文，赖以蔚成，其流风余韵，至今未泯也。

书院之风，自经仪征阮氏倡导以后，远在陇蜀，近及吴越，设塾立学，所在成风。其在河南者阮氏弟子钱仪吉氏主讲大梁书

院，成学尤众。苏源生《记过斋文稿·钱星湖先生遗事》云：

道光丙申春，应河南巡抚桂公聘，来主大梁讲院，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导之，或问性理，或谈诗文，咸因材教督，不拘一格。颁日程课，读经及语录文字，旬日考定甲乙，随课升降。又属河道张公捐置经史诸籍，励诸生学，辑《赋选评注》，刊刘念台《人谱》，又属方伯张公刊《近思录集注》，颁发书院诸生。游其门者，如固始蒋湘南、商丘陈凝远、密县翟允之、洛阳曹肃孙、祥符徐镂龄，皆彬彬有以自见。

钱氏主讲大梁时，尚辑刻《经苑》一书，亦经学之佳选也。又李兆洛申耆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远近受学，其杰者，考道著书，学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计；次亦勤习举子业，得指受知所宗向。主讲东南坛坫者垂二十年，极一时之盛。自是而降，各省书院，皆有研治经史，讲求实学之举。以吾所知者，若保定之莲池、成都之尊经、湖南之岳麓、江阴之南菁、苏州之正谊、济南之泺源、关右之关中，其尤著者也。当清光绪初年，提倡学风最力者厥为黄彭年子寿，其在关中则修复关中书院，其在直隶则修复莲池书院，其在苏州则修复正谊书院。时士子均从事于八比之文，黄氏教士之方，则于课艺以外，另辟学古堂，督课经史，使生徒逐日札记，以验其学之臧否。其修复关中书院也，刻有《课艺志学斋日记》，时当光绪十四年之秋，陕抚叶伯英序云：

自明代创立关中书院，至于我朝，多士讲诵其间，造就人才，指不胜屈。……冯展伯中丞抚秦时，添设志学斋，甫有规模，即解任去。余既奉抚秦之命，与贵筑黄子寿方伯，筹商经费，先后添建斋居七十七间。凡经史子集及经世有用之书，分类购得善本，储置院中。议定志学斋章程，及读书

课程，勒之于石。复以子俊孝廉主讲味经，训迪有方，著有成效，因请其主讲关中，兼理志学斋事。俾士子讲求实学，余复逐月召诸生至署，课以诗文，给予奖赏，学者皆奋兴焉。

按是书所辑，均为诸生课艺，惟《志学斋日记》，则为诸生诵读经史札记，间有考辨之文。至保定莲池书院，亦倡于黄氏，于诸生课艺外，另设学古斋。黄氏去后，继之以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张、吴虽主桐城家法，而吴氏识见，最为锐敏，不主故步自封，实较叶德辉、苏舆诸人之识见为善，河北学风为之一变。吴先生之子闿生《吴门弟子记序》云：

当前清同治中，曾文正、李文忠先后来督畿甸，咸殷然有振兴文教之意。其时先大夫实刺深州，修孔庙，兴乐舞，括义学废田，大开书院，州人士忻忻向化。……及罢官，主讲莲池书院，于是教化大行，一时风气，为之转移。盖河北自古敦尚质朴，学术人文，视东南不逮远甚，自廉卿先生来讲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

其时著籍成学之士，若贺涛、马其昶、赵衡、李刚己、贾恩绂、王树枏、柯绍忞诸君，皆足以开前启后，发奋有为，而为吴先生侪辈中所奖借者，若严复、林纾诸君，亦为一时特异之士，盖吴先生宏奖人才不主一格，此莲池学风之所以盛也。

黄氏来任苏藩时，又于正谊书院内别设学古堂，以敦课古学。按吴中本为文物之邦，自宋元以来代有学人。清初则有惠氏父子，研治汉学，称为吴中学派。乾嘉间则有宋翔凤、顾广圻、

陈奂诸君。洪杨变后，学风稍息。黄氏之办学古堂，成材颇众，若胡玉缙、章钰年登老寿，皓首穷经，至今尚矍健无恙，为灵光硕果，堪为人师表者也。雷浚《学古堂日记序》云：

吾吴夙称人文渊薮，自乾嘉两朝，上溯国初，其成名以去者固已千秋俎豆矣。就浚所及见，有专精经古，而不以科举为事者，宋刺史翔凤、顾文学广圻、陈徵君奂也；有从事科举之业，而兼通经史者，吴侍郎钟骏，冯宫詹桂芬也。其时未经兵燹，郡城藏书家尚在，有无相通假，坊间多善本有用之书，有力者求之即得。老师宿儒未尽亡，学者有所折衷；故三十余年前，吴中士风颇不同，兵燹以后，非其旧矣。大吏知其然也，设书局先刊朱子小学诸书，为学者言行之本。《十三经》、《廿四史》以次告成。又搜集诸家经学、小学之书，有藏稿未显于世者，刻印流通。其嘉惠后学之意甚盛；而寒士限于力者，仍难快睹也。前冯宫詹为正谊院长，尝议及此，故宫詹主讲时，正谊书院颇有藏书。惜乎一人之力，捐书无多，未从学者之求。今方伯贵筑黄公，深知寒士得书之难；于书院西偏，得隙地而经营之。建堂曰学古，建藏书楼，聚书六万余卷；招诸生有志读书而无书可读者，资以膏火，肄业其中。设日记，每日所读之书，有所得，有所疑，皆记之，以俟论定；而谬以浚之为长。月终诸生汇录所记，各条呈于学长，评是非，定甲乙；善者奖之，不善者纠正之；有跅弛不受约束者则屏之，法至周也。

诸可宝《学古堂记》云：

学古堂之建也，实维著雍困敦之岁；而落成于次年三月，时则贵筑黄公来藩于苏州。公好学爱士，不厌不倦；先

以翰林告养日久，主讲莲池讲席，储书分课畿辅，至今称道之。莅官后，百废具举，谓浙有诂经精舍、粤有学海堂，若鄂、若湘、若巴蜀、若豫章，无弗有藏书、督课之地，独苏大邦，阙焉未备，甚非谊也。于是勾核库帑，得闲款如干缗，乃创筑室购书之议，度地乎可园，而基立已。可园者，水木明瑟，庭宇清旷，故为正谊院长泾朱赞善之所居，有记见《小万卷斋文集》中。工既庀，次第恢拓，……规模完美。会公权巡抚事，遂筹巨金二万两，常存典肆，岁取什一之息以供用。聘学长雷深之先生主讲席。高材生胡君玉缙、章君钰为斋长，任典守渐陶之责，嗣复拔余及门吴生寿萱为算学斋长，示有专家；察诸生之勤惰，而以时考其言行，则委监院吴校官履刚充之。以余为诂经旧生徒也，于训故词章，六书九数，曾识途径，檄令理董其事。又参仿莲池事例，订定课程，率循罔越。开堂逾岁，敬业乐群，彬郁可观。公欣然曰："吾之心力已尽，节目纲维，容多未备，惟后贤善补苴之矣。"

黄氏所办书院，莲池而外，当推正谊之学古堂，刻有《学古堂日记》，硕人尚存，流风未息。若各地所办书院，江苏上海则有龙门书院，主讲者为刘君熙载。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云：

公讳熙载，字伯简，一字融斋，江苏兴化刘氏，当道请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凡十四年以终。其主讲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尝午夜周览诸生寝室，其严密如是。自六经子史，天文算法，字学韵学，下至词曲，以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尤以躬行为重。尝曰："所贵于学者求尽人道而已。"

其在江西，则有经训书院。李文敏、洪钧《经训书院改章原奏》云：

江西省城旧设三大书院，曰豫章，巡抚主之；曰友教、曰经训，藩臬司主之。经训创于道光年间，臬司刘体重所建。他书院课时文，此则专课经解，古文诗赋，衔华佩实，相辅而行，法至善，意至美也。乃行未数十年，寝就废弛，臣文敏在臬司任内，以其不实不称，改课诗赋，思加整顿，旋即升任。臣钧抵学政任后，深究废弛之由，力求振兴之道。乃选士择师，改章设课。约举更定章程大端有四：一书院向以甄别取士，现仿浙楚等省书院之制，由学政岁科试时，择高材生，送院肄业。一非住院者，不准应课；庶不至徒有应课之名，而无肄业之实。一聘延山长，不拘名位籍贯。一书院向无书籍、山长束脩，士子膏火，皆形菲薄，既议酌增，并多购经史子集，存储院内。本年工竣后，以新章开课，经经纬纬，课艺顿觉改观。江右缙绅佥以为宜，且请奏明定章，庶垂久远。……

按经训书院，重建于光绪壬午，与课者有朱锡庚、郭宗翰诸人，刻有《经训堂书院文集》六卷。

其在山东济南则有泺源书院。缪荃孙自定《艺风老人年谱》云：

光绪十七年辛卯二月，东抚张勤果公曜招东游，聘主泺源书院，院为山东名胜地，《小沧浪笔谈》有垂柳、苇荡、方池、鳌簪石、铁狮峰五咏，今一切如故。……山东诸生，经学则胶州黄象棫，博洽则诸城尹彭寿、日照丁文瀚小门人王崇文，词章则世昌、王鹤年、单蓉镜、单步青、刘彤光等均优，是科大半中式。

缪氏之先，道州何绍基曾主讲泺源。其后则有宋书升主讲尚志堂书院，刊刻经籍，惠迪士俦，亦书院后起之劲也。

当时书院讲学之盛，继学海而起者，厥为江阴之南菁，为学使黄体芳所建。延黄以周、缪荃孙主讲其间，训迪士子，提倡古学以启为学之法；刊刻经解，纂辑丛书，以示读书之门径，传古人之著述，励士子之传习。缪荃孙《黄先生墓志铭》云：

先生讳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厅人。黄漱兰侍郎视学江苏，建南菁讲舍，延先生主讲，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门弟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宗湘文观察，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先生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

又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云：

光绪十四年九月，杨蓉浦师督学江苏，招至邑城，命主讲南菁书院。书院延两院长，黄元同以周先生专课经学，荃孙分课词章，诸生正额八十人，附额不计数。

当时于督课经艺以外，兼继阮文达学海堂《皇清经解》之业，纂刻《续皇清经解》及《南菁书院丛书》。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云：

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部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

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

是书刊刻既成，先谦复属缪氏编《南菁书院丛书》，专刊有清一代考订之作，书分八集。其第四、五集，则选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观览兴起，尚益覃精术业，偕登于作者之林，此南菁书院所尤长者也。先谦返里后，复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先是淮南北盐局，以曾文正规复盐纲，湘人受惠者多，鸠资建祠，郭侍郎嵩焘建议于祠旁为思贤讲舍，聚徒课学；申景慕之义，并刊刻经史诸书，以便利学子。延王祭酒先谦主讲其中，其宗旨与南菁书院同。其时成均课士，亦尊经史，研治实学。张百熙《成均课士录序》略云：

国学旧事课艺，似数年一刻。乾隆六十年，法梧门先生官祭酒，刻《课艺第一集》。嘉庆九年，又续刻焉。……穆宗即位，诏以经史策论课士，有留心时务，通知古今者，优奖之。洎管监事翁叔平先生、宗室盛伯羲、同里王益吾前辈，奉扬文治，奏举入监肄业。天下喁喁向风，人才浸渐，萃于南学，至今日而益盛。百熙奉命来承诸公后，念士之讲习所及，发为文章者，必有可观。适同里刘学正钜，承翁先生命，裒集上舍生课作，以去取商诸百熙，因与同官崇君厚庵、熙君吉甫，相与抉择，付诸手民。其文自制艺外多经史词章之作，亦有涉及时务者，不敢盭穆宗垂训之旨。

百熙为祭酒之时，为光绪二十二年，正当维新变法之际，故士子课文，间涉及时务。其时为祭酒者若王先谦、王懿荣，皆积学敦品之士，而南学诸生极一时人材之选。南学讲治实学之风，极盛一时，实前此所未有也。

以上所述，由学海、诂经以来书院之建置，其课士之方，爱尊古学，以考订训诂为宗。此清代汉学家之所以养成，经师撰述，赖以刊刻流传，实有功于学术，启后人之景仰。然世变日亟，昔日之纯谈考证，已不餍人士之期望，于是治今文之学家起，而谈西学之风兴，此时事所趋，有不得不然者。其能容纳西学，仍尊故训，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厥为张之洞氏。张氏督学各省，所至以提倡学术为宗，所撰《劝学编》、《书目答问》业已家弦户诵，不胫而走。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铭》云：

始公典试提学浙江、湖北、四川，迄任疆帅，所至创立书院，以通经学古，提倡士风。谓求才必由于学。于鄂、于蜀，有经心、尊经，于晋有令德堂，于粤有广雅，比督楚，复创两湖书院。

文襄所办书院，最著者为四川之尊经，广东之广雅。其课士宗旨，已与昔日之纯主考据者，略有不同。四川尊经书院创立于光绪元年，至十一年制府丁宝桢复延聘王闿运为院长。张之洞《尊经书院记》云：

同治十三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春，书院成；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将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议。

文达所撰《尊经阁记》，讨论为学之法，其大旨在于定志向学，非为膏火；读书根柢，在于通经；求学知要，不立党援，反复讨论，意极诚挚。与文襄所撰《劝学编》，同为近代教学法上重

要史材。又王祖源《尊经书院初集序》云：

张孝达学使之创建尊经书院也，其章程，诸生应课佳卷，帖示讲堂，非以明不私，特以蜀士三万，而院额百名，悬鹄国门，使学射者知所观摩耳。戊寅冬督学使者南海谭编修曾跋其所刻《蜀秀集》，粗得包举众艺，表见群英，识者谓与诂经、学海相颉颃，三年灯火，成学斐然；于此叹蜀才之善变也。己卯春制府丁公(宝桢)，考程横经课士，于是礼延湘潭王壬秋先生，学本成天，言能化物，尽发何郑之覆；直升屈宋之堂，岂曰今之学人，实乃古之达士。院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昕不辍，蒸蒸向上；而先生乐其开敏，评改涂乙，不厌详说。每一帖示，等石经之初立，若左赋方成。四方观临，刀简复沓。学者既苦钞写之多劳，又恐鲁鱼之滋误，请付梓人，乃成是集。……

王氏讲学蜀中，响应最深，研经则搜大义而剪支离，制辞则屏晚近而宗阮谢，启迪后学，成材者众。院中高材生若吴之英、宋育仁、岳森皆一时之选。其后若廖平之博综今古，赵熙之擅长词赋，蜀中学风借以蔚成。张之洞之总督两粤，其继学海而起者，则为广雅书院，延朱蓉生一新主讲其中，一新为杭州诂经精舍之高材生，学极博辨。金武祥《朱君传》云：

粤督张香涛尚书，驰书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复延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广雅规模宏大，张公所新建者，储书甚富；山长专课诸生，以经训性理，及史事词章有用之学。两广东西高材生，咸请业焉。其论经学，深抑近时讲西汉公羊之流弊，谓其蔑古荒经。其论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亦未尝不分。迨及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

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少嗜濂洛关闽之书，中年以后涵养益粹。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修业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由博而返约，则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久之皆信向。

广雅书院，其影响粤学，虽未如学海之深，然汇刻古书，尤以史部为繁，实有裨于学人也。

往观昔日，非独书院足以提倡人材，即穷乡僻壤，苟有人提倡之，亦足以焕发人文。今姑举一事：如独山莫与俦犹人官遵义府学教授，讲授实学，从之者众，门人郑珍及其第五子友芝，均能通许郑之学，为黔中人望，中国之大，何地无才，苟有善导，不患无人，是其例也。

乙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之演变

吾曩所述书院，以训诂考订为宗，学子课艺，均为研经籀史之文，其稍具科学知识，仅有天算推步等类。然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开放，外患日亟，又经洪杨战役，国势渐形不支，日俄交涉，发生于东北；英法侵略，继起于西南。光绪甲午之战，一蹶不振，时事蜩螗，尤较昔日为甚。然外人所持者为兵甲之坚，科学之利，此非研经铸史考订词章，所能有为也。于是非变法改制，效法欧西，博闻强识，学有专科，不足以图存，爰有康梁新说之奋兴焉。康氏讲学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继之梁氏讲学于长沙之时务学堂，颇收时效。究其讲学之旨，宗西汉公羊家学，而参西洋哲学宗教家之说，其课程则取颜习斋、李恕谷六府三事之旨，而取昔人六艺，改为礼乐书数图枪。在今日视之，颇觉幼稚，然在昔日，已为创获矣。梁任公先生《康南海传》云：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岁辛卯，于长兴设黉舍焉。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千古，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梁任公先生《长兴学记序》云：

至今大患愈迫，南海先生忧之，讲学长兴里，著为《学记》，昭示来兹，爱同类以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启超幸以爝火之明，得日月之照耀，迩者讲学长沙，仁智兹愧，惧大道之或坠于眇躬，乃敬将此书上石，以馈天下焉。

是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均喜提倡新学。仁铸著有《輶轩今语》，见解极为通达。延梁先生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撰有《学约》，略仿欧西学堂辨督课诸士。著籍者若蔡锷、范源濂、杨树达诸君，于事业学术皆有所建树。惟守旧之士，猝听新说，一时大哗。若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人，乃群起攻讦，视为洪水猛

兽，著《觉迷要录》、《翼教丛编》，深恶而痛绝之。王先谦《自定年谱》云：

时工部主事康有为，以变法自强之说，耸动海内，朝野多为所惑。翁叔平尚书保荐有“胜臣十倍”之语，一时靡然从风。识者心鄙其人，然不悟其有逆谋也。陈右铭中丞宝箴莅任湖南，余素识也；向以志节自负，于地方政务，亦思有所振兴。会嘉应黄遵宪来为监长宝道，与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龄，合谋延有为弟子梁启超，为新设学堂总教习，江标、徐仁铸相继为学政。学会报馆，同时并兴；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学会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听讲者亦多，中丞升座首，举有耻立志四字为言，闻者洒然动容。其后余以事冗不能再往，宣讲登报，愈出愈新，余始骇诧。叶焕彬吏部德辉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斋长宾凤阳等复具禀附批加案，请从严禁遏。余遂邀焕彬诸君，具呈中丞附录斋长禀词，请整顿屏斥，以端教术。中丞批词含胡，但以众绅有门户意见，深自引咎。熊希龄及唐才常、谭嗣同、毕永年诸人，缘此横目相仇，极意图陷。会书院诸生公议，在学宫传集同人商立议约，厘正学术，语皆醇正，并无触犯。徐学政闻之，即饬学官究明倡议主笔之人，将加惩办。余挺身独任，徐遂无言。旋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诬蔑伊等，就宾等元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俞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奉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极委婉，时已八月初旬，康有为事败逃窜，亦自知不保也

(禀呈信函俱载《虚受堂书札》第一卷)。不数日而慈圣帘听,抚学革职之旨至,向使康有为邪谋得遂,国事不可问,余与焕彬且先落机阱矣。门人苏厚康孝廉舆为《翼教丛编》若干卷,于康造谋湖南捍乱备详始末,亦佳书也。

未几戊戌政变,康梁均遭名捕,窜身海外,时务讲席中辍。陈、徐二公亦旋被议去官。光绪辛丑,湖南巡抚由俞廉三继任,俞为守旧之士,乃停办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延湘潭黄舒昺恕轩为山长。黄氏曾主讲河南明道、洛学两书院,承桐城方植之之学,以程朱之教,教诲后学。俞廉三《明道书院约言序》所谓:"将使多士,因委穷源,由仪卫轩以上溯濂溪,所谓寻坠绪之茫茫,挽狂澜于既倒;湘学遂复于正,师儒之力也。"黄氏复以明道书院所讲《约言》,刊刻行世,以教学子。其书凡为卷三,为目十二。上卷四篇,曰学统、圣功、广业、格天;中卷四篇,曰励志、循源、责实、求仁;下卷四篇,曰敬慎、守谦、炼识、坚操。大旨宗主紫阳,取证方氏。复刻有《求实书院学规汇钞》,以矫正士习,于是湘省学风,重瓣香程朱拥护正学矣。俞廉三《设立求实书院折》云:

"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地舆兵法算学等,并经世诸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于此,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仰见皇太后振兴实学造就人才,凡属士林,莫不鼓舞,自当钦遵懿旨,切实奉行。查湖南省城各书院,所设斋房,仅敷各本院肄习生所居,未能归并,惟有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统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

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县考选保送聪颖悔谨生童共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校，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

是俞氏虽主废学校，然于西语算学，亦未停授，时势所趋，不能过抑潮流可知。然自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停止科举，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刘坤一、张之洞《变通政治折》云：

奏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奏陈，仰祈圣鉴事：一、设文武学堂。惟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人称为湖学，并未尝名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堂，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

于是书院废而学校兴，昔日书院制度，仅供学生探讨而已。自光绪之季，仿效欧西，创立学校，垂三四十年，其间学制，迭有变更，卓识之士，渐知学校功课庞杂，且过于机械，一人之智力有限，难以精工，是以学鲜专门，士乏良识，是吾国学界之一大缺点也。乃仿英国大学之制，及昔日书院之设，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爰有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有研究院之设。使学子得有专门之研究，思想有自由之发展，晚近吾国虽忧患频仍，学术则不无进步，是均梁任公、蔡孑民诸先生提倡之功。而研究院之制度，则犹具书院之雏形焉。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及课程大纲云：

本院现时专任教授，为王国维(静安)、梁启超(任公)、赵元任、陈寅恪先生，讲师为李济(济之)先生。

本院制度，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故课程方面，分为普通演讲，及专题研究二项：普通演讲，为本院学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择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次，或二次，范围较广，注重于国学上之基本知识；专题研究，则于各教授所指定之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学科范围(如中国文化史等)报考。取录入校以后，即于所报考学科范围内，与教授商定专修题目，随时至教授处请业，题目不得随意更换，以免有旷时杂鹜之弊。

清华学校研究院，仅举办三年，招生三期。未几，梁、王两大师均相继逝世，研究院旋即停止，后乃改为大学毕业后正式之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学门最近亦改为正式之研究院，肄业期间二年至三年。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爰有中央研究院之设，此为造就专门人材，终身研究学术，以供献于社会而设，与昔日之书院式之研究院，形质不甚相同也。

盖书院之制，吾国设立已久，积习日深，不能一无流弊。山长则虚应故事，生徒则徒事膏火，有终身肄业书院，而略无一长者。昔日讨论书院之弊者，自袁枚、李兆洛，以迄张之洞、刘坤一，已言之綦详，无繁备述。近人盛朗西《中国书院制》一书，举书院之弊，约有数端，兹钞录于后，以见一般：

语其通病；约有数端：一曰山长充数，不问品学；一曰士风浮夸，动滋事端；一曰注意膏奖，志趣卑陋。《清续通考》所称：山长以疲癃充数，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日夕咿唔

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乌乎！朱子有言，“科举不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夫书院非犹是也哉，诚慨乎其言之也！

兹综而论之，书院之设，虽有流弊，然而利弊相权，其可以表现人材提倡学术，约有数事。

一曰人材之蔚起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患无人才之兴起，而患无人提倡。即以吾是章所举清嘉道后，阮氏建设书院情势而论，夫羊城、西泠，在阮氏未设立书院以前，人材本未若是之盛也；然自阮氏倡导以后，则人文蔚起，成为考证之风；老师宿儒，至今不绝。河北学术，前有孙、耿、颜、李，后有河间纪氏，自是以后，则阒乎无闻；然自吴挚甫先生主讲莲池，著籍之士，成学而去者不下百人。昔则沉寂，今则蓬蔚，又何河北之多材也？梁任公先生有《学者与地理之分布》一文，愚则以为人才之蔚起，实由当局之提倡，观于上例可知其略。

二曰学术之提倡也，于斯更有三说：

（甲）宏奖著述，以资策励：昔日书院高材生，所撰论文，刊为文集，如《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文集》、《菊坡精舍文集》，选择课业佳作，刊布成书，亦犹今日之学报也。辑诸生著述卓然可传者，汇为丛书，如《南菁书院丛书》、《学古堂日记》，亦犹今日学校所刊之丛书也。

（乙）流传古籍，辨章学术：吾人近日读书，渐觉其繁，然在昔日书籍多未刊行，古刊秘钞为私家秘藏，学人不易觅读也。不必推至古远，即以明代而言，如《汉魏丛书》、《古今逸史》、《津逮秘书》等书，今日视之为普通之书，然昔日各书，多取诸丰坊、焦竑、毛晋各藏书家，择其罕见之书，汇为一辑，而在今日则转成为普通之本矣。又以经部而言，昔朱彝尊、纪昀锺有《征刻唐宋秘本书启》，其所列各书，大半为谢肇淛、周亮工旧藏；当时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几举经部全刻之，阮氏《刻学海堂经解》、王氏刻《续经解》，有清一代经学著述，庶可略备；钱氏刻《经苑》，以补《通志堂》之不足；而张文襄之刻《广雅丛书》，唐宋以来史部，大半搜辑完备。吾人欲治何业，苟寻其书即可知学术之源流矣。

（丙）集合群才，从事编纂：大抵整理古书，纂辑词典，取便学人，供人探讨，其事体大思深，非一人所能为力，必借公家之资，群策共举。若阮氏之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等书，嘉惠士流，其泽无穷也。综斯三端，则清代之设书院，有益学人，蔚为风气，从可知矣。

三　书院之课业及光绪间新旧学则之条议

夫设立书院，聚徒讲学，学规课业，各有其宗旨。若明代东林顾宪成、高攀龙之讲学梁溪，鉴于时势日非，清议沦亡，其旨在于经济致用者也；孙夏峰之讲学百泉，主静立诚，调和朱陆，其旨在养性敦品者也；吾所述嘉道以来书院建置之沿革，以提倡实学，志在学术为宗，其专为八比课艺者固不具论。然自学海以还，书院之设，亦实繁有徒，其讲学宗旨，亦甚广博，难以备陈。兹举阮氏学海堂课业，张氏《劝学编》，康、梁长兴、时务讲学之粹语，及叶德辉、苏舆对于新学之掊击，可以觇学术思想之流变者，揭要钩玄，各评骘其得失，条陈于后。

（甲）阮氏学海堂之课业。林伯桐《学海堂志》云：

仪征公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论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名家诗笔。仪征相国师，以经史训迪多士，教泽既洽，一纪于

兹。宜令学长，于所课诸生中，举其尤异，教以专门，治经必始笺疏，读史宜录汉魏，各因资性所宜，听择一书专习，或先句读，或加详校，或钞录精要，或著述发明，学长稽其密疏，正其归趣。

又钱仪吉氏曾主讲学海，其讲学之旨，与阮氏多同，钱氏言于总督卢坤，令设立专额课肄业生十名，课以《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每人专习一书，其事四条：曰句读，曰钞录，曰详校，曰著述。尝校阅堂中课业，评吴文起《大戴礼记广笺》等书。钱氏之教，兼宗汉宋，故后起若陈澧诸君，均能博综汉宋，精通经史舆地音律专门之学，为东南硕儒，而书院研治实学之风，则均由阮氏所兴起者也。

（乙）张氏尊经书院条规及《劝学编》之要语。当光绪初元张氏之创立尊经书院，其旨尚与嘉道以来讲求考证之旨无大出入。至著《劝学编》，时当戊戌政变以后，时势日迫，新学勃兴，于是张氏乃不得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其论学之旨，乃渐容纳欧西科学，变更方法，与昔日尊经书院所述者已截然不同，兹节录《劝学编序》于后。《劝学编序》云：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

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柹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

也。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

观南皮之说，诚为宏通之论矣。

(丙)康梁之新说及徐仁铸之《輶轩今语》：《中西学门径书七种》载有《长兴学记》、《輶轩今语》及《时务学堂约三种》。其说独树一帜，一变昔日成规；在当日视之，颇有惊世绝俗之感。

(子)康氏《长兴学记》：康氏之主讲长兴学舍也，其著《学记》折衷孔子，推尊《论语》，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乃以四言为纲，分注条目于下。梁任公先生《康南海传》，案《长兴学记》之纲领旨趣，造一学表如下(见下页)。

实则康氏之说，仍遵孔孟之旨，仅于课程略加扩充而已。

(丑)徐仁铸《輶轩今语》：其条理较为谨严，兹择要节录于下：

一经学

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

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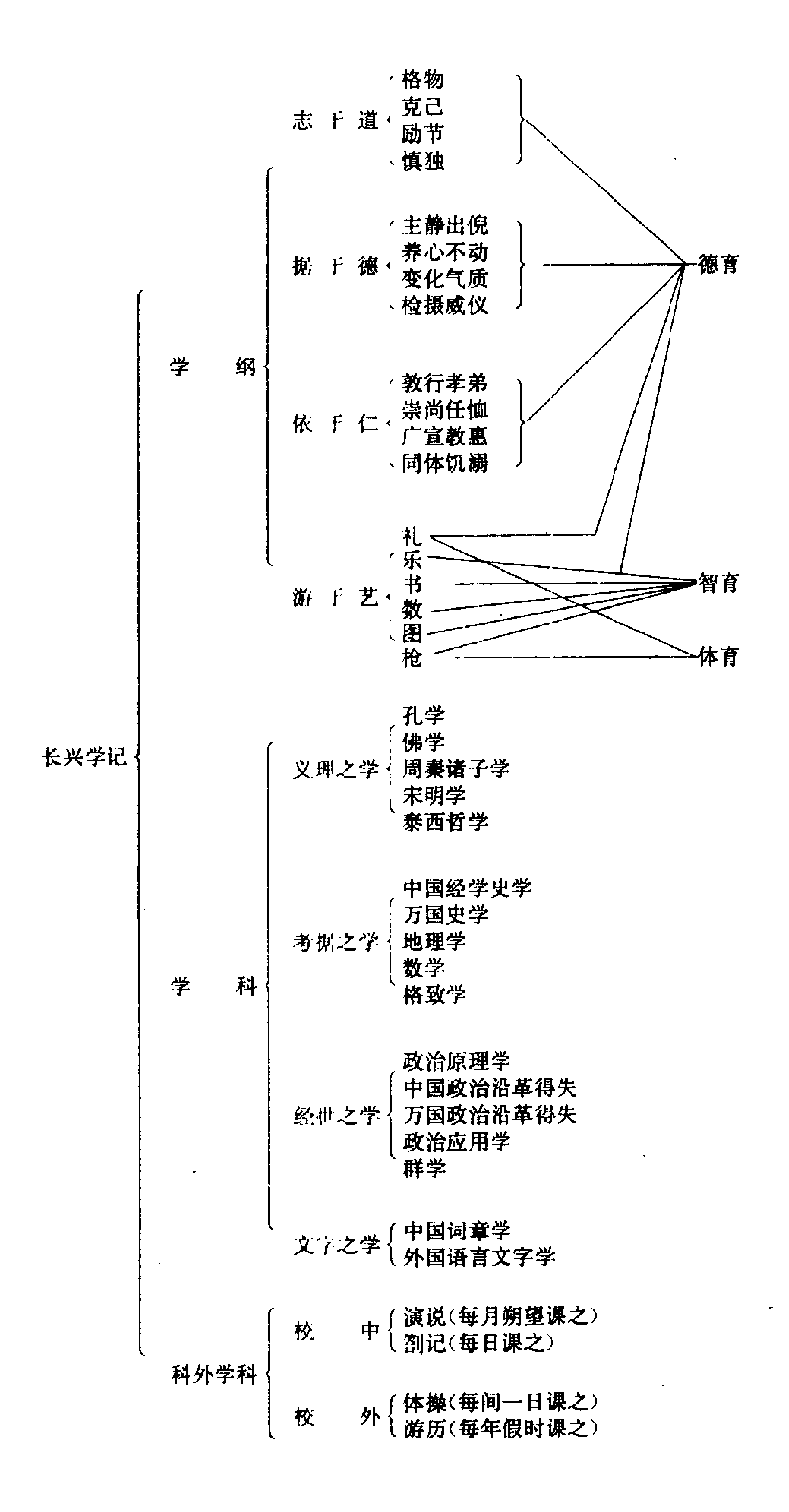
经学当以通今为主义。

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

《左传》宜从史读，不必作经读。

《尔雅》、《说文》等书可以不读。

二史学


长兴学记
学纲
志于道
格物
克己
励节
慎独
据于德
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变化气质
检摄威仪
依于仁
敦行孝弟
崇尚任恤
广宣教惠
同体饥溺
游于艺
礼
乐
书
数
图
枪
德育
智育
体育
学科
义理之学
孔学
佛学
周秦诸子学
宋明学
泰西哲学
考据之学
中国经学史学
万国史学
地理学
数学
格致学
经世之学
政治原理学
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应用学
群学
文字之学
中国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
科外学科
校中
演说(每月朔望课之)
札记(每日课之)
校外
体操(每间一日课之)
游历(每年假时课之)

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衰之迹。

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

史学以民间风俗为要义。

《史记》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读。

史公以后以郑夹漈为史才之最。

《九通》当择读。

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

三子学

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

诸子之中，有著书者，有不著书者，其所著书，有今存者，有今佚者。

诸子之中，可分为两种：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学皆出于孔子，宜先读子学流派各书，以知其大概。

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

四宋学

宋学为立身之本，不可不讲。

宋学宜先读学案。

朱子书宜读语类。

诸儒文集宜择读。

(寅)《时务学堂学约》：其学旨分为十目：一立志，二养心，三治身，四读书，五穷理，六学文，七乐群，八摄生，九经世，十传教。后附功课详细章程，已有近代学校制度之矩矱，兹列于后：

第一节，本学堂所设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普)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

每人各占一门。

第二节，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第三节，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

第四节，凡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

第五节，学生所读书，皆分两类：一曰专精之书，二曰涉猎之书。专精之书，必须终卷，按日分课，不许躐等；涉猎之书，随意翻阅。

第六节，每日读专精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六，读涉猎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四，二者不可偏废。

第七节，凡学生每人设札记册一份，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叶，涉猎某书某篇，共几叶，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若初学之始，心得尚少者，准其钞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以当功课。惟必须注明钞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第八节，凡札记册，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发还。学生人设两册，缴此册时，即领回彼册。

第九节，堂上设一待问匭，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之匭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

第十节，札记册由院长评定后，按日填注，分数共分六等。最高者三分，次者二分半，次者二分，次者分半，平常者一分，劣下者半分。凡每生每日最少必须有札记或问疑，共二条。苟满二条之数，即记半分，不满者不记分，其善问者，于札记册外别记分数。

第十一节，每月通记分数，以三十分为及格，溢分者给以奖赏，统记溢分之数共若干，照溢出分数摊算银数求得。每溢一分应得奖银若干，即依其所溢之数摊给。其不及格在三分以外者，应记出归下月溢分数内扣补。

第十二节，每月设月课一次，每次命两题，以作一艺为完卷，由院长阅定，分列等第，批给奖赏，仍记列分数，备大考时统计之用。

第十三节，每季大考一次，请学堂督办官与绅董公同到堂汇考，将三个月内之札记册、待问格及课卷三项，通同核阅，汇算分数多寡。其有功课精进，能自创新理，或发条例自著新书者，为异常高等，除原有分数外，仍可特加。合一季内功课之高下，列为一表，榜诸学堂大门，并登《湘学报》及《湘报》中，以示鼓励。

第十四节，学生札记问格课卷，皆择其尤者，钞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公诸天下。

第十五节，院长每五日讲学一次，所讲何学，当日榜示。讲学之日，择高才生二人为书记，坐讲席侧，携笔砚，记所讲。讲毕，二人参合所记，写出清本，交钞写人钞两份。一榜堂，一存院长处。

总观以上三说，不过略采西国学制，兼取新说；康氏之说且取释氏、耶教之旨，以附会孔教，然今日视之，已成陈迹，未足为异。然一时震惊，群相诟詈，若叶德辉、苏舆辈，至不惜著《觉迷要录》、《翼教丛编》以呵斥之，视为洪水猛兽无以过也。究之上列各事，以徐仁铸《輶轩今语》，最为严密，《时务学堂章则》，已趋于今日学校课程之途径。徐氏之说，谓：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困于考据，读史当通知历朝掌故得失，官制学派二端为要，及当知民间风俗，最有特识。惟云：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

学相合，不免牵强附会，至谓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尤有语病，固不免有叶氏之讥。要之叶氏为人，虽不免固执，然其说亦有其理在，今约略陈之。其驳《长兴学记》及《辅轩今语》谓："其纰缪无根之语，不一而足，如以训诂为无用，以考古为大谬，以《毛诗》《周礼》为伪经，以《春秋》《公羊》为公法，以《中庸》为孔子行状，以诸子与六经并立，以汉以后无子书，阴排宋儒，以四方各有圣人，推崇异教，创亘古未有之新闻，翻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时横舍之士，相与挢舌屏息，懵然不知其学之所自来。"窥其成因，厥有三事：（一）所以尚微言而摒考据者，以微言大义，可以比傅近事，故借此以行其私。（二）近人多喜牵合比附，谓西人之学，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害，致为无谓。要之陆子静所谓四海各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东西虽辽绝，而政学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艺学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我中土则以《六经》《诸子》之学，而数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积弱，学者不可不自奋也。（三）驳读书不可废训诂，谓《公羊》开宗明义，即以训诂解经。定元年传云："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注云："读谓经，传谓训诂。"《公羊》为微言大义之所托，其重训诂尤有明征。若夫登来为得，辨口授之缓急；主伐客伐，见发声之短长。六经一日不亡，则声音训诂一日不废。桢按中西学术，各有主要之点，本不可混为一谈，南海之说，好大喜功，喜合中西之学并为一谈，不无淆乱；即后任公先生亦不主其说。叶氏之说，不无卓见，至其为人，颇有可议；然其整理旧籍，辑佚补亡，其功实不可没，训诂之学，尤为所长，至所撰《觉迷要录》，则当时见闻之闭塞固陋为之也。

四　吾人对于今日教育之感想

昔日书院，专课古学；今日学校，功课复杂，学有专门，已

与书院不同。然而提倡学风，培植人才，其教育宗旨，不甚相远，抚今思昔，有不能已于言者。

夫培植人材，在于提倡。昔朱竹君、阮芸台诸贤，诱掖后进，不遗馀力，故人材倍起，学日以昌，流风已远，固无论已。语其近者，桢尝侍梁任公先生之门，后进请业，凡有一技之长，辄赞之不容口，瑕瑜之间亦不容相掩。故从学之士，无不自奋。梁师故后，闻蔡孑民先生，亦喜奖励后进，旧都上庠，尽多才士，学术事业，建树甚繁。今者人材缺乏，未见娇出，无千里之马，故世亦无伯乐；然世未尝无材也，虽有一二才智之士，吾未闻有人称道之某才智之士也，某有为之人也。但吾恒尝闻之矣，某也学无根柢，某也舛谬百出，有屑微之疵，未尝不加以齿冷，讥讽而讪笑之；及见其本人之来，而又群相虚奖之曰，某先生人杰也，才士也，即昔日宏奖之辞，吾未之闻，呵责之语，亦未之见也。故虽负有可造之材，澄清之志，亦无人闻问，亦无人为扶掖之也。则有志之士，惟技老荒江，寂寞自赏而已。龚定庵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羁之士，必不能尽中于规矩，吾愿为诸公诵之

钱星湖之主讲学海书院，教士各择经史要籍，按日熟读，撰为札记。曾文正之教子弟，亦举《左氏》、《国语》、《史》、《汉》等八部书，令人诵习。吴挚甫先生之课莲池，亦秉文正之法，熟读基本之书。反观今日之教育，现在科学日益繁重，故不能令人熟读旧书，然亦应顺序择要而读，庶可略知吾国固有习惯。今者初高级小学所授者为国语，初中遽授以古代之文字，及入大学所授者，乃毛公鼎盘盂之文，更益深邃，未趋先步，试问莘莘学子能了解乎？若入理科，不读旧书可矣。乃入文科，由普通语体之文，一跃而研究世间不经见之书，敦煌卷子也，金石文字也，小说戏曲也，史科目录也，基本之书尚未全读，遽尔研究专门之学，此专门之学遍天下，而学日益荒芜矣。

窥今日学风，造成之因，实由经济之压迫，莘莘学子其唯一之目的，希早有以自见。得一罕见之书，中秘之本，纂辑排比，瞑搜夕钞，不数日而成巨帙，一跃而为专门之学者，经济问题，庶乎可以解决矣。

以速成之教授，授未入流之学子，教授者每能服学子之心。其治国学者，尚须参考群书，稍自策励。其研究科学，仅有英文之教本，探学子之识短，即可蒙蔽于一时，而学子亦未识何者为善，何者为良，犹如盲人骑瞎马，教育终未入轨道也。

大学教育有普通之学科，有专门之学科。专门之学科，须专任教授任之；普通之学科，须兼任教授或讲师助教任之，此定例也。今也普遍一般之现象，为补足专任教授钟点关系，即以史地学科而论，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此史地系之普通科学也，反以专任教授任之；而专门之学科，如中西交通史，金石学，边疆史地之类，反倩兼任者任之，本末倒置，有是理耶！

在高中以下，讲业问学须在讲解；中学以上，理科讲解以外在于实习；文科讲解一途，实不甚必要。在于指导学子，应读何书？应习何课？诠释疑难之问题，改正研治之舛误。盖学者研究心得，不过数事，数月之力，可以授毕，而未经心者，未必能知其甘苦所在？逐日讲演者，惟人云亦云之讲说，学子听教授讲书，犹如观众之听剧，某也讲解清楚，某也态度诙谑，此于教学法上或有值得注意之处，而于学术何干？此教育当局所应当注意也。

昔也吾尝闻人格修养之一语，今者已阒乎无闻矣。所讲者知识也，所授者科学也，谈及修养，则群相笑之。盖学术家有学术之修养，事业家有事业之修养。所谓修养者在内心力有安慰之意旨，对外有治事之步骤，此吾人所不可忽者也。今也一谈及修养，则以为迂阔而难通，此又教育家所应注意者也。

国之强弱在于教育，有健全之教育，始有健全之国家。盖立

国之道，必有根本之教育，处平时可以建设事业，处乱时可以捍御国家。民族之精神，即潜伏于平时。吾国立国四五千年，有治平之时，有乱离之日，设有外族来侵，吾人不惜破家抒难，粉身碎骨，以全力赴之：若南宋之节烈，明季之遗民，忠义常存，虽死犹生，此吾人所当馨香祝之。然此等忠义人格之养成，即操于平时，非激发于瞬刻，犹如建筑礼堂剧院之设太平门然，如遇事变，而设太平门，则已无及矣。今日谈教育者，鉴于时变日亟，乃有建设国难教育之说，此犹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意，立意固佳。然吾望不可因国难而教育，所谓国难教育者，即寓于平时之中，平时教育之养成，即可抵御国难于无形，此则教育之本旨矣，吾因述近代书院制度之沿革，不禁连想近日教育之状况，拉杂书之，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夜深一时
写于旧都达子营寓庐之佣书堂

（原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河套民族变迁考

按云朔自古为边塞之区，犬牙相错之地。周有猃狁，晋曰山戎。秦汉以来匈奴勃兴，魏晋而后拓跋崛起。唐代之突厥、回纥盘踞其间，契丹、女真恒奄有其地。元兴大漠，蒙古独强，顺帝后裔至明季而不绝。洎清太宗绥服插汗，驻跸归绥，晋北诸区划为内蒙古。茂明安、鄂尔多斯四子部落，率为元代帝王之后。雍乾而还，满人驻防绥远，回族东徙斯邦。侏离异服之使，椎髻辫发之族，无不习处其间，俨然成聚。人民同化，盖已早融畛域之分矣。《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冒顿氏以北方之强，据有漠南北诸地。自呼韩邪单于款塞以后，通婚聘问历祀不绝，风俗习尚已渐汉化。乃匈奴中衰，而乌桓、突厥突起。檀石槐之族由东西驰，牧马阴山，而漠南之地又鞠为茂草矣。北魏拓跋氏始祖力微斩除茅莱，卜居定襄，建都盛乐。绵延数世至道武帝而始强大，抚有燕、云诸州。孝文帝南徙洛阳，尽去胡姓，笃尚华风。是则燕、云、胡、越本无定局，衣冠、文物不限族类。非其例欤!

夫匈奴诸族处吾国西北，历时最久。在汉曰匈奴，在唐曰突

厥，在元曰蒙古。其兴废靡常，迁徙无定。溯其来源，莫可究诘。有称匈奴即古之玁狁，突厥为匈奴之别族，铁勒为匈奴之苗裔者；有称若回纥，若薛延陀皆土耳其族，与古匈奴相近，西域回国皆其胤也；又有谓突厥族之历史，殆如双峰并峙，一为秦汉间之匈奴，一为隋唐间之突厥。有元之兴，则更自成一系统。有谓出于室韦者，有谓出于突厥者，有谓出于室韦鞑靼者。鞑靼之名仅见于宋、元诸史，而西人之书则多谓亚洲北方民族之总称。凡此诸事，在吾国民族史上皆有研究之价值。北方诸族，其系统来源虽不可寻，而究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固有相同之迹。推究厥绪，则固有其悠久之历史，且不始于汉代矣。征诸载籍有可得言者。《史记·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索隐》云："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近人王静安氏《鬼方昆夷玁狁考》云："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此乃其本名也。"近世之归绥，在晚周时当三晋以北之地。宗周宣王以后，玁狁之势尤强。诗人美宣王中兴云："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当成王时，封唐叔于晋，以怀九宗。九宗者，即指猃狁之部落。赤狄、白狄，杂处于三晋之间。见于经传者，赤狄有东山皋落氏，有廧咎如，有潞氏，有甲氏，有留吁，有铎辰；白狄有鲜虞，有肥，有鼓。此皆积年出没于北徼，总谓之曰狄者。故《春秋左氏传·昭十五年》：晋人自谓在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庄二十八年》云："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自晋文公初立，

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王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晋国渐安。戎、翟与人民久相习处，互通姻娅。左氏所记“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骊戎之骊姬生奚齐，殆无一不为胡姬所生。是塞北之民早已与戎、翟互相习矣。

战国之时，冠带之国并峙为七，而边于匈奴者三。赵武灵王胡服习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秦将蒙恬收河南之地，因河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于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以拒强胡(以上据《史记·匈奴传》)。其匈奴部落已化为诸夏。单于头曼，远徙于塞北。养精蓄锐，伏处漠北者，垂数十年。汉高并一宇内，未遑顾及。单于冒顿氏乃得乘势崛起，恢复往日之盛。南逾大漠，甘肃以东、鄂尔多斯一带均为所有。高帝白登之围，仅乃得免。集合诸部与汉争衡，俨然成一大国矣。以汉武之强，霍去病之勇，远征王庭，从事挞伐，仅乃却之。至宣、成间五单于之变，匈奴内乱，裂为南北。甘露二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遂款塞称臣，自请留居光禄塞下(今鄂尔多斯一带)，有急愿保受降城，以为藩篱。其北匈奴，至后汉永元三年为窦宪所击，越阿尔泰山而北遁。其南匈奴，自呼韩邪入居朔方，与汉人杂处，垂十数世。传至汉末，须卜骨都侯为国人所立。立未一年而薨，南庭遂虚其位。按诸《前、后汉书》，自呼韩邪至须卜，其世系皆历历可明。至呼厨泉立于兴平二年，以兄被逐，不得归国。建安二十一年，遣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匈奴遂微，谱系失纪。然而自呼韩邪单于后，以兄弟父子相传，承嗣继统，皆有可寻。此于漠北民族之世系极有讨论之价值，而言河套民族掌固者亦有足述者也。

自呼韩邪至呼厨泉，其系统可知者，父子相传，其世系凡八代；兄弟相传，或以单于相继，凡三十三世。与后汉相始终，历

时不可谓不久。呼韩邪单于生子繁众，见于《汉书》。其卒也，立雕陶莫皋为单于，约其诸子以次相传。是匈奴继统之制，以呼韩邪生子繁众，欲立王昭君之子，借欲与汉和亲，而兄弟相传乎？抑匈奴承嗣之制，果兄终弟及乎？近人王静安氏《殷周制度论》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曰立子、立嫡之制。""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也。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未尝有嫡庶之别。是当草莱初辟之时，异部民族往往兄弟相承，亦因其风俗习惯而然。亦犹契丹之制，部之长号大人者，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歇，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新五代史》)。元代之制，定例先开总会议(库尔特里之制)于蒙古故地，然后嗣位(《元史》)。辽、元两代既定宇内，然后渐破其旧习，而变为传统之法也。

至于匈奴大姓，亦有可言。《后汉书·匈奴传》云："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又《晋书·四夷·匈奴传》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其国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按匈奴诸族，自魏、晋以后多冠姓

刘氏。其仕于魏、晋，习向华风者甚繁。刘渊倡乱于晋永兴间，石勒继之，遂开五胡乱华之局。然《晋书·刘渊载记》云："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俨然有中国士大夫风，其被濡染也，深矣！

自匈奴南徙，匈奴衰而乌桓、鲜卑诸族兴。乌桓名酋蹋顿雄长一隅。汉建安间，曹操破乌桓于柳城、斩蹋顿。鲜卑檀石槐、轲比能辈远处塞北，亦不能为害。魏、晋以还，东胡部落既盛，与汉人杂处，渐染华风。五胡十六国，若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均为鲜卑名族。而拓跋氏继诸国之后，雄起朔方。《史记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西人常以东胡即通古斯族，据近人考订实非一族。《魏书·序纪》谓：先出于黄帝之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通鉴·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焜氏，分统部众为十族。邻老，以位授其子诘汾，使南迁，遂居匈奴故地。诘汾卒，力微立，复徙居定襄之盛乐，部众浸盛。"盛乐地在近世归绥县之北。《魏书·序纪》所记诘汾以前十二代世系，但凭传闻，疑不甚确实。惟第六代宣帝推寅，与鲜卑檀石槐时之渠帅推寅同名，且时亦与之相当。据《南齐书·魏虏传》云："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曰索头。"当典午之世，胡人杂居塞北。则拓跋氏者，或有匈奴、鲜卑两种之血缘欤？

《通鉴·晋惠帝元康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禄官分其国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统之；一居代郡参合陂之北，使兄

沙漠汗之子猗㐌统之；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使猗㐌之弟猗卢统一。猗卢善用兵，西击匈奴、乌桓诸郡，皆破之。"国势渐定。其后，猗卢合三部为一，助刘琨攻匈奴。琨锡以句注陉北之地。乃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后世以内难尝筑城于东木根山，又以石赵来攻迁于大宁。东木根山在汉五原郡境黄河东岸。大宁在今宣化西北。其后又迁新盛乐，在故城东南十里。又传至什翼犍，为苻秦所灭。刘库仁、刘卫辰分领其地。道武帝珪为什翼犍之孙，初依库仁，后独立，自称魏王。继称帝，迁都平城。南逐后燕，并有其城。太武帝焘复灭北燕、北凉，统一漠南诸地，遂奠魏室之基。至孝文帝宏，迁都洛阳，习向汉化，改姓元氏。元魏一朝，拓跋氏遂为历史上之名族焉。

据《魏书·序纪》所载，成帝"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拓跋一族，其种类繁盛概可想见。《魏书·官氏志》云："魏氏本居朔壤，地远俗殊。赐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长勺、尾氏、终葵之属也。初，安帝（安为成之误）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魏室氏族最繁，兹不详述。近人陈毅撰《魏书官氏志疏证》，考辨至详。及尔朱之乱，道武子孙杀戮殆尽。宇文氏兴，元魏之后改姓拓跋，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此亦拓跋民族之重大变迁也。拓跋氏后，乃有突厥、回纥诸族兴焉。突厥为平凉杂胡。《北史》谓突厥为"匈奴之别种"。《唐书》谓回纥为匈奴之后裔。在汉时为丁零，南北朝之初为魏所击破。迁徙于漠南者，史谓之高车。其居漠北先属柔然，后属突

厥者，则称为铁勒。高车、铁勒实同一种。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称："回纥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是回纥亦突厥之一种耳。"而皆为土耳其之民族。其言云："匈奴之后突厥最盛。突厥既灭，回纥乃兴。今日者，玉关以西，天山南北悉为回部，无所谓突厥也。而突厥之称，乃独流传于西土。曰突而克，亟读之即突厥。曰突克蛮，犹言突厥同类。今法人称土耳其国，音如突而克日(二字合音)，称其人类为突而克。英人称其国曰突而克以(二字合音)。皆为突厥转音。土耳其亦突厥一类人也。"突厥之起源，各史所载语多不经，惟杜佑《通典》所记较为详实。《通典·边防典》云："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焉。"是突厥之先，臣服柔然。柔然亦名蠕蠕。《魏书·蠕蠕传》云："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魏国。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曰蠕蠕。"《北齐书》、《周书》又作茹茹。近大同云岗发现大茹茹国造像，首行题曰大茹茹国碑。漫漶不可读，可识者有可敦、吐谷浑等字。是蠕蠕民族迁徙之迹，亦尝至云中、定襄诸地耳。

及突厥伊利可汗土门氏兴，击破铁勒，后灭柔然。二传至木杆可汗俟斤，国势益强。至他钵可汗，北周、北齐竞与和亲。突厥之在京师者，锦衣肉食，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常曰："但使我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其骄倨可知矣。他钵死，沙钵略时突厥频遭饥馑。后有内乱，不得已乃称臣于隋。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沙钵略二传至都蓝可汗，即雍虞闾也。隋文帝乃拜突厥部落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雍虞闾见其部卒之日畔，乃发兵击之。帝复令启民可汗入塞，居

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隋命杨素等击雍虞闾，破之。突厥之众遂踞有漠南之地。隋炀帝曾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突厥与中国往来，状极融洽。然未几而隋末大乱，群雄竞起。启民之子始毕可汗复叛隋自立，雄长北方。当时群雄恒阴结事之，即唐高祖渊亦尝臣事之者也。时炀帝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突厥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在虏廷者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今归化附近），有众万余。时突厥则有大可汗颉利，小可汗突利，分执国政。唐太宗抚有宇内，乘突厥内政之敝，分二可汗执政之势，一举灭胡虏，降其可汗。纳其众于朔方，建四州、二都督以统之。《新唐书·突厥传》云："颉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弟结社率以郎将宿卫，阴结种人谋反。……于是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氏李，树牙河北，悉徙突厥还故地。"时中书令温彦博则主如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扞蔽。帝亦深然其说也。《新唐书》又云："始置燕然都督府于古单于台，领六都督、七州。"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府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至武后时，默啜自立为可汗，突厥之势复强，尽有漠南之地。景龙二年，朔方总督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之势日益衰微，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诸部相继畔之。至天宝初，唐与回纥攻灭之，其地尽属回纥。兹据

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所列突厥世系简表，移录于下：

伊利(一)——乙息记(二)——沙钵略(六)——都　蓝(八)
　　　　　木　杆(三)　　叶　护(七)——启　民(九)——始毕(十)
　　　　　他　钵(四)　　庵　罗(五)　　　　　　　　处罗(十一)
　　　　　　　　　　　　　　　　　　　　　　　　　颉利(十二)

以上前朝

伊地米施匐——骨咄禄颉斤——骨咄禄(一)——毗　伽(三)——伊　然(四)
　　　　　　　　　　　　　默　啜(二)

以上后朝

回纥之族，出于铁勒，洪钧言与突厥同出一源。初称袁纥，或称乌护、乌纥、韦纥。叛突厥后改称回纥，唐德宗时又改为回鹘。《新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至隋曰韦纥。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大业中，……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子曰菩萨，材勇有谋，与薛延陀合力攻突厥。突厥亡后，复助唐灭薛延陀，并其地。至吐迷度，受唐封爵，仍自号可汗。唐天宝间，骨力裴罗立，国势尤强，唐封为怀仁可汗。《新唐书·回纥传》云：骨力裴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汉高阙塞也，北尽碛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

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后破拔悉蜜、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自是，战常以二客部为先锋。有诏拜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自唐安史之乱，葛勒可汗遣兵助唐收复两京，所掠子女玉帛尤多。至乾元后，回纥杀人横道，都人厌苦。代宗永泰间，唐将仆固怀恩导回纥、吐蕃连兵侵唐。郭子仪单骑往见，并责让之，约与回纥合击吐蕃。时则吐蕃、回纥屡寇振武、丰州。元和七年，置振武天德营田，省费足食，借以备胡。八年以河患故，徙受降城于天德军。未几，回鹘属部畔联吐蕃，同攻回鹘。同时回鹘疾疫渐作，国势内乱，为黠戛斯所败。部族散居天德、振武之间，其酋乌介可汗为唐将所杀，回鹘之众西走甘肃，已成残余部落矣。

按诸《新唐书》所记回纥南尽突厥故地，盖指漠南而言。唐元和以后吐蕃、突厥屡寇振武、丰州，是均在河套等处。突厥、回纥诸传所指碛口、白道川，均在大漠以南诸地。于此可以见突厥、回纥两族盘踞之迹。丁谦《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云:“碛口，据《元和郡县志》:‘西受降城北至碛口三百里。’其地在套外阴山北。《蒙古游牧记》:‘茂明安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接瀚海界。’瀚海之口即碛口也。铁山亦在茂明安旗境，考归化城西北驿路第八站曰特穆尔台。特穆尔，译言铁，即铁山所在。……河南，谓黄河以南，即河套地，今隶鄂尔多斯旗。白道在归化城北、坤都伦岭南。《水经注》有白道川，即克鲁库河上源也。”丁氏所言虽未尽详确，然可以考见突厥、回纥在漠南迁徙之迹。至回纥克服九姓，自视高于九姓，而九姓亦凌辱回纥。当回纥盛时，九姓籍回以自重，杂居京师，货殖暴敛，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及回纥之败，又思残毁之。此惟以利害相结者，故如是也。突厥、回纥族

类，散见于《新、旧唐书》中，然考其世系则散漫无纪，求其系统甚难。故略举其名酋大族，以见其大旨而已。

自突厥分为东、西，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建立西突厥之后，其族类大者有铁勒、延陀、阿史那诸族，其小者有处月、处蜜诸部。唐玄宗御制突厥阙特勤碑已有处月之称，朱邪尽忠者，实处月氏之部类也，朱邪乃处月之异译。所居之地有沙漠，曰沙陀，故曰沙陀突厥，因以朱邪为姓焉。唐德宗时，朱邪尽忠居于北庭之金满洲，为吐蕃赞普所败，尽忠与子执宜东走，尽忠战死，执宜独走归唐。居之盐州，以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执宜死，其子赤心以助唐征讨庞勋于徐州有功，拜振武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以之属籍。黄巢之变，唐室召用之，父子相承，击灭黄巢。因之逐鹿中原，卒建后唐。其时从沙陀入关者，则以从龙之臣，竞冠汉姓。若石敬瑭其四代祖璟，以从沙陀军自灵武入附刘知远氏，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以善射从晋王有功，官至洺州刺史。凡此诸氏，皆由边塞入居汉地，冠姓易服，遂为上客。于五代之乱，李氏、石氏、刘氏各建一朝。沙陀诸族，于是最盛，其功业不可不谓伟矣。

天德、振武固沙陀发祥之地也。自契丹阿保机氏东起辽疆，并有瀚海，蔚为大国。唐天祐间，阿保机氏率十万余骑入塞，攻破朔州，拔之(即怀朔镇地，非今之朔州也)，勒石纪功于青冢之南。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悉为契丹所据。晋高祖石敬瑭父事契丹耶律德光，借兵灭后唐，不惜割幽、蓟、燕、云十六州以与之。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丰州刺史王承美与契丹战，次年追至青冢百余里，于丰州城立孔子庙。后此丰州被围，孤城无援，遂陷于契丹。徽宗时约金灭辽，归燕、云九州，收复天德、云内诸城，置定边军。后金人败盟，约夏侵宋，地为夏据。未几，复为金所夺，乃徙丰州于府州地方，名为宁丰。有宋一代，关外诸州

旋得旋失，终乃沦于金人之手焉。

元兴漠北，入主中原。其盛也，几于凌制欧、亚。金西北诸州、天德、云内诸郡，皆降于蒙古。然未竟百年，霸业甫成，遽行衰歇。明太祖以淮右布衣，扫荡群雄。遣徐达、李文忠分道北伐，元主北遁漠北，克东胜等州。然顺帝之后，世泽绵长，递至明季，其嗣不绝。清代内外蒙古诸都，率为元裔。顺帝遁归沙漠，传至爱猷识里达腊，寻死，子脱古思帖木儿立。明兵出塞，获其子地保奴，居之琉球。脱古思帖木儿为也速迭儿所弑，诸大臣立坤帖木儿为可汗。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族纷扰，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杀，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时有猛哥帖木儿者，为瓦剌王。瓦剌，蒙古西北部落也，猛哥帖木儿据之。旋卒，其众分为三：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鬼力赤立，阿鲁台等佐之。马哈木与阿鲁台相持。久之，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元之后本雅失里为可汗，杀明使臣，倨傲不群。自顺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两世不可考，瞬息之间，未闻一人善终者。时明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贤义王，把秃孛罗安乐王，令伺本雅失里。明兵出塞，本雅失里败走，阿鲁台降，封为和宁王。而马哈木又叛，明兵讨之，败去。马哈木又攻杀本雅失里，屡败阿鲁台，而瓦剌强盛。瓦剌三王中，马哈木又独强。未几，马哈木死，子脱欢立，杀贤义、安乐两王，欲自立为可汗，恐众不附己，乃立元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居沙漠北，自为丞相，仍居瓦剌。宣德九年，阿鲁台死。正统元年，脱欢在沙漠西北，与其部酋朵儿只伯相仇杀。脱欢死，其子也先为太师，骁勇陵脱脱不花，景泰中遂弑之，自立为可汗。未几为所部阿剌知院所杀。天顺初，孛来杀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号小王子，即《蒙古源流》所称之巴延蒙克是也。时麻儿可儿复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众共立马古可儿吉思，亦号小王子，即蒙古勤克埒青吉斯也。自是，鞑靼部长益各专

擅。小王子稀通中国，世次多莫可考。成化间，阿罗出结乩加思兰、孛罗忽结毛里孩出入河套。乩加思兰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满都鲁入居河套。满都鲁为可汗，而乩加思兰为太师，与毛里孩出入塞下、延边、河套，迄无宁岁。而世系益纷，不遑缕举。至孝宗弘治间，达延汗兴，《明史》所谓大元大可汗，《蒙古源流》所谓巴图蒙克者是也，并有诸部，后居河套。《明史·鞑靼传》云："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数十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曰吉囊、曰俺答者，于小王子为从父行，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相率躏诸边。"张穆谓《明史》正统而后所称小王子，即巴图蒙克是也。

明代北边之患，达延汗之后，则为俺答。时叛人赵全、邱富亡入北虏，居古丰州，筑城自卫，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又言屋也。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俺答益信用之，于是寇边益急。据《蒙古源流》云："阿勒坦汗丁卯年生，占据十二土默特，而居衮必里克。阿剌克汗岁次丁未没，长子达赉逊库登台吉，岁次戊申年二十九岁，向汗求赐号。遂与以索多汗之号。年四十六，岁次壬子，行兵四卫喇特，杀奈曼明安辉特之诺延玛尼明阿图，将表兄并甥妇以及二子并所属人众全行收服，占据四卫喇特。至十九年取其城。行兵中国，侵陵骚扰，明人大惧，遣使讲和，给与孙王之号，赐金印。"《明史》俺答，即阿尔坦之合音，孙王即顺义王也。《明史》云："俺答有孙曰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把汉复聘袄儿都司女，即俺答外孙女，貌美，俺答夺之。把汉恚，遂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总督王崇古上言：'把汉来归，非拥众内附者比，宜给官爵，丰馆饩，饬舆马，以示俺答。……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帝终从崇古言，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老，佞佛，复请于海南建寺，诏赐寺额仰华。……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历配三王，主兵

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其子乞庆哈，孙扯力克、卜石兔等，均袭封为顺义王。有清蒙古各部，大抵为达延汗之后。达延汗之季子格埒森札赉尔守漠北，为喀尔喀西部之祖。达延汗嫡孙卜赤居东方，是为插汉部即察哈尔部。王子巴尔斯守套部，传于长子，是为鄂尔多斯部。巴尔斯之次子阿勒坦即俺答，居大同北，是为土默特之祖也。

《明史》于元代之后，为立《鞑靼传》，并于猛哥帖木儿、马哈木等另立《瓦剌传》。实则猛哥帖木儿为元将，以也先有立脱脱不花、土木之难等事，故别为立传，实同一族。《明史》自成化以后，小王子世系语焉不详。记阿罗出、孛鲁乃毛里孩诸族，但凭传闻，记载繁缛，犹如乱丝，极难爬梳。屠寄《蒙兀儿史记》乃据《蒙古源流》诸书，为妥欢帖睦尔诸子系统，兹迻录于后（见第 81 页）。

屠氏以《明史》为主，而以《蒙古源流》补证之，每表之后并为诠释之。其以麻儿可儿为巴延蒙克，巴图蒙克即达延汗，阿勒坦即俺答，已如上述。其他确凿有据者，如云："脱欢子也先即《蒙古源流》托欢太师子额森也。其时嗣蒙古汗统者，为特古思特穆尔第三子哈尔古楚克都古楞特穆尔鸿台吉之孙、阿寨台吉之子，号岱总汗，即此所谓小王子也。……西人《蒙兀泉谱》之蒙兀大汗表，自乌萨哈尔即脱古思帖木儿七传而至阿寨，八传始至岱总。则史所谓本雅失里，似即阿寨。"满都古勒条云："阿罗出诸部，以《蒙古源流》考之：所谓毛里孩者，翁里郭特之摩里海王也；……所谓乩加斯兰者，永谢布之伊巴里台吉也；……满都鲁即满都护，实《源流》之满都古勒汗，非鄂尔多斯之满都赉阿都勒呼也。"土蛮条云："达赉逊，明人谓之打来孙。……所谓土蛮者，图们之讹也。小王子指达延汗。其曾孙达赉逊始驻牧宣塞外，后复徙帐于辽，此徙幕东方之始。子图们嗣汗号，《李成梁传》所谓插汗部长土蛮是也。其所分部落，即敖汉柰曼等九部，明人不得其部落

名，统以土蛮概之，遂混不明矣。寄按衮必里克以嘉靖十年为吉

妥欢帖睦尔可汗诸子世系表

妥欢帖睦尔 号乌哈噶图，庙号惠宗，明谥顺帝。第十五大汗，始北徙。	爱猷识理达腊 号必里克图，庙号昭宗，第十六大汗。						
	脱古思帖木儿 号乌萨哈尔，第十七大汗。	恩克卓哩克图 第十八大汗。					
		额勒别乞 号尼古埒苏克齐，第十九大汗。	坤帖木儿 第二十大汗，无子。				
			鬼力赤帖木儿 第二十一大汗。	德勒别乞 第二十二大汗。			
		哈尔古楚克都古楞帖木儿鸿台吉	阿寨 第二十三大汗。	岱总 第二十四大汗。	摩伦 第二十七大汗。 蒙古勒克埒青吉斯 号乌珂克图，第二十六大汗。		
				阿噶巴尔济 第二十五大汗。	哈尔固楚克	巴延蒙克 号博勒呼，第一吉囊。	巴图蒙克 号达延薛禅，第二十九大汗。

				满都古勒第二十八大汗，无子。			

囊，二十九年卒。阿勒坦于嘉靖二十七年达赉逊嗣汗位时求赐小汗号，称索多汗，卒于万历十年。二人皆巴尔斯博罗特之子，于达赉逊为再从父。故《明史》谓吉囊、俺答于王子为从父行。此所谓王子指达赉逊也。"至吉囊者，济农也，译为郡王。蔑儿干吉囊，《源流》作墨尔根济农，明人不知为号而以为名，殊为误耳。盖《蒙古源流》译名虽与《明史》间有不同，以其为蒙人之书，所记系统实较《明史》为善。经屠氏诠释之后，明代鞑靼系统庶可涣然冰释矣。又尚有萧大亨《北虏风俗》一书。大亨字夏卿，泰安人，万历壬戌进士。总督宣大山西军务，部曲洽其威信，虏亦效款，立功边陲，惜《明史》不为立传。所记北虏世系，虽为明代译名，然较《蒙古源流》尤为详尽。惟与屠氏所撰诸表，相核多有未符。如北虏一世之歹颜哈，即《蒙古源流》巴图蒙克之达延汗。《蒙兀儿史记》世系表记其为十子，此书则记为十一子。北虏世系云：

北虏一世　歹颜哈　十一子——
- 十　五八山只台吉
- 八　称台吉
- 六　纳力不剌台吉
- 四　我折黄台吉
- 次　五路士台吉（不嗣）
- 长　铁力摆户
- 三　赛那剌
- 五　阿森赖台吉
- 七　那力不赖台吉
- 九　克列兔台吉（不嗣）
- 十一　格列山只台吉

《蒙兀儿史记》巴图蒙克世系则为：

巴图蒙克
- 一　图鲁博罗特
- 二　乌鲁斯博罗特
- 三　巴尔斯博罗特
- 四　阿尔苏博罗特
- 五　阿勒楚博罗特
- 六　斡齐尔博罗特
- 七　格埒博罗特
- 八　格埒森札
- 九　鄂卜锡衮青台吉
- 十　格埒图台吉

二表相较，一为十子，一为十一子。其中有不嗣者，因由十一并为十子，亦未可知。但两书译名，五路士与乌鲁斯，九克列兔与蒙表十格埒图译音相似，余多不可晓。或因当时译音，南北语音不同，往往致误也。又如俺答为巴图蒙克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之子，是书则云："小王子之子歹颜哈者，生十一子，吉囊、俺答、老把都其第三子（赛那剌）之子也。"其记世系完全相同，但译音则微异耳。

元之亡也，蒙古部落大分有四：曰漠南内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漠南蒙古即明代所谓插汉诸部。明万历以后，清兵突起建州，明代恃以为藩屏。东曰辽海，西曰插酋。自辽东不守，插酋先降，于是决其藩篱，清兵可以长驱直入，无兼顾之忧。时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天命四年来聘金国，书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斯致书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且恃其虓勍，凭陵诸部。天聪八年六月，清太宗统军尽征各部蒙古兵征察哈尔，时辽河夏涨，昼夜冒潦，

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拒战不胜，遂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至青海之大草滩败死。清军至归化城，收其部落数万而还。明年，其子鄂哲率所部奉传国玺来降，封亲王，位冠四十九贝勒之上，其众编旗，安置义州。又归化城西土默特者，明顺义俺答之后也，中为察哈尔所灭。清太宗征察部，驻跸归化城，降其部众，编为二旗。以其部长为左、右翼都统，并还其所守顺义王印。而遣将军贝勒岳托、副都统吴巴海驻其城守之。土默特酋博硕克图之子使喀尔喀，阴与明通，吴巴海邀斩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汉部叶雷等叛投漠北，吴巴海率兵追之，叶雷被擒，始收其顺义王印。乾隆并裁都统，其旗务则掌之将军、副都统，惟存辅国公世爵而已。有清内蒙古西二盟均在绥远地带。西二盟者，曰乌兰察布，其贡道由张家口，其部有四，曰四子部落，曰喀尔喀右翼，曰茂明安，曰茂喇特，四部为一盟；曰伊克昭，贡道由杀虎口，其部鄂尔多斯。一部七旗为一盟。内蒙每三载为会盟之期，钦命大臣赍敕以往。设正、副盟长各一，以简军实，阅边防，理讼狱，审丁册。每旗事权皆掌于扎萨克一人，此外皆散职也。惟归化城土默特向隶将军、都统及各厅同知，不设扎萨克。故会盟集于本城，不设盟长。此河套蒙古部族变迁之大略也。

清代八旗各直省驻防之制，始于顺治二年携眷来防，永远驻守。自天聪八年太宗亲征察哈尔部，驻跸归化城，其部众悉降。九年，以贝勒岳托驻守归化城。崇德二年，编为二旗，即以其长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并世袭。后以土默特中无可任都统之人，定由京简用都统往驻其地，惟给本部人等世袭职衔，随同办事，后并裁去都统。其部落向列蒙古五十一旗之中，其旗务则掌之将军、副都统，制与内八旗相等。其驻防之制，《清文献通考·兵考》六云："绥远城将军一人，驻扎山西杀虎口外绥远城，统辖：满洲协领四人，佐领十二人，防御十六人，骁骑

校十六人；蒙古协领一人，佐领四人，防御四人，骁骑校四人；八旗满洲、蒙古领催前锋、骁骑共二千名，步军四百名，养育兵三百名，箭匠、铁匠各二十名。兼辖右卫及归化城副都统。右卫城守卫一人，驻扎右玉县，防御四人，骁骑四人，笔帖式一人，八旗满洲、蒙古领催八名，骁骑二百九十二名，养育兵八十名。”雍正季年，以归城处边要特命相视形势，从事屯垦，旋即建置城池，驻兵防守。于是，满洲八旗官兵始由山西右玉，移驻绥远城。乾隆以后驻防人数、统率制度历有变更，然满族习居斯土既久，已渐为土著矣。《兴和志草》云：“自各旗放垦以来，土田日辟，商业岁增，骎有富庶之象焉。”

回部出自天方，萌芽于隋唐。在元代曰畏吾儿，明清两代简称曰回部，或曰回族。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云：“回部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鲁番回部。二部错居西域，以天方为祖国，或城郭处，或逐水草徙，称花门种。相传祖玛哈麻教以事天为本，重杀，不食犬、豕肉。尝以白布蒙头，故称曰缠头回，又称曰白帽回。回人自呼白帽回曰达斯塔尔。别有红帽回、辉和尔哈拉回诸族，然以缠头回为著。”乾隆时，准噶尔部阿睦撤纳叛清，回教主大小和卓木遂乘机率回族抗清，谋独立。然卒败死，回部遂归清统治，时乾隆二十四年也。高宗既平定准部，凯旋返京师，回族随军至绥，计算不及千人，卜居于归化城东南之八拜村。今之所谓回回营者，即昔建寺设村之地。至乾隆五十四年，其族始入居城内，生聚蕃息，人民日众。此绥省之有满、回二族之由来也。

蒙地向例对于汉人贸易、耕种，有携带眷属之禁。外蒙在清时，此例终未消弛，故通商二三百年，其属境荒阔如故。当时内地农人往归绥者。清王建勋《河套碑》记：“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民之越界开垦、私放、私种常启争端。河套地开渠浇田，咸仰黄河之水。农人春至秋归之俗，自明季已然。故在未正式开垦

以前，有客籍之汉族，而无土著之汉族。至清乾隆间斥私垦之禁，秦、晋沿边州县移垦之民遂日益众多。汉种蒙地，蒙取汉租，互相资以为生。渐由客籍而成土著，年久蕃息，汉族生齿日繁，遂非蒙族所可及。《托厅志草》云："二百年来客民日多，近益垦辟，阡陌居庐逐渐增广。蒙、汉同处，类皆勤于稼穑，习于牧养。汉人之初至塞外也，最先为察哈尔、土默特两旗，迨后渐及于伊克昭各旗，而乌兰察布盟则又较后焉。汉族至乾隆时尤繁盛，满、回两族亦于此时先后移来，遂蔚成四族人民集合之区域，屹然为西北边陲之重镇。"则有清乾隆时代，洵为绥地民族萃合繁殖之期矣。夫民族智慧本无高下之分，相处一方，互相往来，濡染既久，观感斯生。生活因之竞进，事业因之盛长，足以相习而日强。横览古今，不禁感慨系之也。

（原载《中和》月刊，署名谢刚主）

从《宛署杂记》等书谈到编印北京文献

（一）

近年来，北京出版社对于比较有用而难得的有关北京地方文献的一些书籍加以编校、标点、出版，已经出版的共有三种：

其第一种就是明朝人沈榜所辑的《宛署杂记》二十卷附《燕说》一卷。沈榜的事迹，据清康熙时修《宛平县志》卷六《艺文·杨允长、沈令尹传》上说："沈榜字子登，岳州临湖人也。由举人历知内乡、东明、上元三县，以治称。万历二十年庚寅（1592）擢知宛平，县故无志，著《宛署杂记》一书，淹洽该详，非史才不办。"这本书汇辑宛平的县始（宛平县建立的开始）、署廨、地亩、赋税、徭役、官庄、奶口、土工、税契、铺行（商店）、经费、民风土俗、寺观等项的资料，分类编排，综合叙述，虽然名做杂记，实在是记载宛平（北京西城以及西部一带）较为完备的一部志书。这本书的特点是身任地方官吏的作者，把官署中的档案文件中所反映的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明朝统治者进行残酷

的压迫和剥削，北京四周围的田地，多为贵族勋戚所兼并，城市中的铺行支应官府，又加上商税累累，迫使农民商贾倾家荡产的种种暴行，如实地记录下来，给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提供了最直接而可靠的资料。又本书民俗卷中所记载的土俗和方言，对于研究中国民俗学，也有参考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在我国早已失传，自清朱彝尊编《日下旧闻》曾经采用过以后，就未见再有人利用过。北京出版社根据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明万历刻本的摄影胶卷，把它编整排印出来，供国人的探讨，是一件好事。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种北京地方文献，是《长安客话》八卷，著者蒋一葵，武进人，是明万历年间长于文学而又兼通吏治的文史学家。他著有《尧山堂外纪》、《唐诗选》等书。《长安客话》是他官北京西城指挥使时，采风问俗，据其耳目见闻而写成的。此书卷目分：皇都、郊坰、畿辅、关镇、边镇等类，杂记北京的风物、掌故、名胜、寺观，并远及居庸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的风俗景物，而附载了一些有关北京的诗篇，间及北京的物产及手工业的制造方法。

这书有万历、天启间原刊本，有传钞本，有清光绪间《常州先哲遗书续编》本，可见它很为当时人所重视。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种北京地方文献是记载北京风俗掌故、岁时节令的书籍，包括清乾隆时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和清光绪时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两种。潘荣陛在其自序中说："陛自辛亥秋从事禁庭，癸丑冬奉值史馆，……丙寅冬，告养归来，凡有所经历者，随意记录成帙"。富察敦崇是一位满族的作家，他这部书也是据其所亲眼目睹的事迹，而记载下来的。北京的名胜古迹，厂甸、隆福寺、花儿市等市场和庙会，民间艺人的技艺，以及北京市民过年过节时欢度节日的情况，都有很生动的记载。《燕京岁时记》曾有过法文和日文翻译本子，可见它为世人

所重视了。虽然，这两部书都是统治阶级士大夫所写的，含有深厚的阶级偏见，还有涉及封建迷信及歌颂清王朝的词句；但是也反映了劳动人民欢度节日及辛勤劳动创造的一面。并由此可以知道从乾隆到光绪一百多年来城市繁荣的情况，以及民间工艺和艺人在艺术上的成就。北京出版社把这两部书编印在一册之内，给读者以很大的便利。但是讲北京风俗掌故的书籍，当然不止这两种，还可以广泛的搜辑。还有描述北京风俗的歌谣，如《都门竹枝词》之类，种类繁多，也可加以选择，汇辑成编，这对于研究北京风俗是很有便利的。

北京是人民的首都，北京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文化遗产上，有其丰富的优良传统，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北京文献的三部书籍，虽然还是些中型的小册子，出版的种类尚不甚多，但是，通过这几本书的出版，把整理首都地方文献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值得引起国人注意的事情。

（二）

历代记载北京地方文献的书籍，有的写成专书，有的散记在文集杂记里面，种类繁多，不仅有像明代谢杰所修的《顺天府志》和清代官修的《畿辅通志》、《顺天府志》等类的志乘，而且有各时代的人士，从各方面，用各种体裁，记述了北京的史迹。在十四世纪的元朝，江西丰城人熊自得曾编纂了《析津志》，著名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事迹，就载于此书。可惜此书久已失传，最近赵万里先生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还了本来的面目。随着明朝建都北京以来，人文蔚起，记载北京掌故的书籍，如春笋丛生，如上面所说的《宛署杂记》、《长安客话》以及《燕史》《长安可游记》等书，都是在这个时代先后产生的。到了崇祯年间，就有于奕正从事于北京的实地调查，由刘侗执笔写成的《帝京景物略》

八卷，用清峭的笔墨，描写了北京的景物。还有汪珂玉著《西山品》，专写西山的风景。由明末到清初，孙承泽编写了《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朱彝尊博采群书，编成了《日下旧闻》，乾隆时又有较此书规模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的《日下旧闻考》；而彭元瑞钞藏了有关北京的诗词，名叫作《人海诗区》。经过元、明、清以来六七百年来的建都，北京根基稳固了，城市经济发达了，四方各地乃至欧、亚各国来到北京的人众多了。在元代，意大利人马哥孛罗到中国来，著有《马哥孛罗游记》，描写了大都(北京)繁盛的情况。到了明末，为了士农工商到北京来游览的便利，书坊店里刻了《士商必要》一类的小丛书，其中有一部书叫做《新刻水陆路程》，记载由北京到各地方的道路。运河是明、清时代交通的枢纽，明末史学家谈迁写了《北游录》，清乾隆时程穆衡著有《燕程日记》，叙述了当时由江南到北京运河两岸及北京城市繁荣的情况。清代嘉庆、道光以后，书坊店里刻了不少像《宸垣识略》以及迭次修订的《都门杂记》之类的作为北京导游的书籍。至于记载北京坊巷胡同、名人住宅的，就有像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戴璐《藤荫杂记》、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等类的专书。尤其是北京向为人文荟萃之地，琉璃厂的书店是搜访我国文化遗产的渊薮，前几年，通学斋书店经理孙殿起先生用了十余年的精力，编写了一部《琉璃厂小志》，详述书肆的变迁和学人爱好图书的逸事。

(三)

以上所说，不是想罗列书目，而是试图概括地举出北京历史文献的一个轮廓。由古可以看到今，由昨天更可以看见今天建设的伟大；同时又可以看出它的因革变迁的史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就很注意搜辑地方文献的资料，他说“州县志书，下为部府征

信，实朝史之要删也。”但是这些零星片断的资料，很容易散失，如上面所述的《西山品》、《长安可游记》等书，现在就很不容易见到，由此可知遗失的书籍，一定不在少数。同时，这些书籍，如《天昊紫凤》，拆开来看，不成片断；如汇辑起来，加以综合的整理，作具体的分析，就可以得到社会发展情况的全面；那末对历来有关北京的地方文献作一番调查和编整，提供研究北京的可靠资料，仍为当前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为了把这项工作进行的更好，以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提出下列的三项建议：

一、编辑北京历史文献资料目录。这项工作前人虽然已经做过，如清缪荃孙在《顺天府志》中编过《记顺天事之书》，近来北京图书馆曾编有《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然仅限于现存的书籍，搜辑尚不完备。我认为应当先搜辑充分的资料，按照原书的体裁和内容的性质，分类编排，分别其存佚，著录其版本卷数，并说明其内容及其使用的价值。此外，有关北京的文集、杂记以及报刊中的资料，也把它的篇章题目摘录出来，另为一卷，以供参考。后面还可以附一篇简明的《北京史迹年表》。

二、编成一套有系统的北京历史文献丛刊。继现已出版的《宛署杂记》等书之后，像元代熊自得的《析津志》、孙承泽的《天府广记》等书，也可以陆续付印，成为比较完备的一套丛书。必要时可以选择善本，精装影印。

三、编制分门别类的有关北京史迹的资料。如北京社会经济史资料，建筑史资料，文学、艺术、工艺、戏剧等类的历史资料，都可以按类编辑。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面所说的这些做法，我认为可以为编著《北京史》提供有利的条件，因为温故可以知新，了解过去的北京，也可以为今后首都建设提供若干借镜与参考。同时这种编整地方文献的计划，如由北京而推行到全国，当有莫大的意义。

当北京出版社编印首都历史文献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之不揣固陋，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否说的妥当，还请指正。

（原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李商隐的《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我曾在报端看到陈友琴同志《诗不必讳言爱情》一文，曾举李商隐的爱情诗为例。我感觉到诗的体裁和风格，应当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人的感情，由于遇合的不同，从诗歌中表达出来，既然不能全是“颂圣之作”，也不能全是“颓唐之语”，而是多种多样的，才能流露其真情，而发抒其怀抱。正如苏东坡所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只要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就算是一首好诗了。因之我想到李商隐所写《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的诗，正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原诗是这样的：

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
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
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
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诗人李商隐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在一年的夏末秋初的时候，由

长安到江南去，路过潼关，住在汉代古迹名胜之区盘豆馆里，作了这一首诗，要是用现代的语言翻译和解释出来，可能体会得更亲切一些，我就姑且把它解释一下吧。

在芦叶萧萧夏末秋初的天气，诗人李商隐从繁华的长安到江南去，路过潼关，住在幽静的旅馆里，心境上自然感觉到潇洒自如，不像在京城里那样忙忙碌碌的了。诗人曾是常到江南去的，到美丽的江南去，心情上不能不说是愉快，可是在唐代，认为长安是“关内”，江南各地就是“关外”了，诗人离开了帝都的长安，心情上自然有寥落之感，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就会发生去长安日远，江南日近，成为落魄江湖作为关外人的心情了。诗人住在旅馆里，并没有到外边去；但是一个人在那里玄想，他想到长安，也想到江南，他又想到夏秋之间，月之初旬傍晚的天气，潼关城外汉武帝时所建筑思子台边的秋风恐怕是很紧急的吧，他又想到玉娘湖上，一片白茫茫的秋水，一钩小月已经沉下去了。他想来想去，更觉得无聊，他听见住在旅馆的客人，整装待发，车尘马迹，行动的声音，走的尚不甚远，但是行人已经去了，诗人因之越感到寂寞，这种寂寞，他感觉到在他一生一世也没有今天晚上这样的寂寞了，寂寞的除了他个人以外，只有这个从古以来就荒凉的荒城和陪伴着游女在夜间洗衣服的砧声了。一世荒城，描写的不免夸大；但是在诗人的笔墨上，不嫌其为夸大。诗人并没有到外边去，玉娘湖上的景物，不免近于玄想；但是不嫌其玄想，而是更觉得她的幽美，这首诗读起来也更觉得有声有色了，我解释的当然很粗浅，我想到我幼年的时候，很喜欢徐增所选的《而庵说唐诗》，他解释唐人的诗，是很入情入理的，读者何妨一读。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署名刚主）

答樊维纲同志谈《而庵说唐诗》

我去年在《文学遗产》上写过一篇谈李商隐《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诗，曾谈到清初徐增所选的《而庵说唐诗》。不久接到长沙樊维纲同志三次来信，他认为这部书是学习和欣赏唐诗的一个良好读本，有意校点出版。为了做好整理工作，他要我提供一些有关这部书的资料。这样我不能不就我所知道的略作说明，写在下面，借供樊同志参考。

我所藏的《而庵说唐诗》是清康熙丙午（一六六六）刻本，书前有康熙元年壬寅自序和康熙五年丙午李图南序。选者徐增字子能，别号而庵，江苏长洲县人，明崇祯间苏州的秀才，能诗善书，是钱谦益的弟子，又和金圣叹、周亮工都有来往，周亮工《结邻集》和金圣叹《圣叹尺牍》上，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的名字。明崇祯末年钱谦益刻他的《牧斋初学集》，程嘉燧的序，就是徐增所手写的，题"吴郡门人徐增敬书"。钱谦益虽然投降清朝，然在明末时却为东南文坛的领袖，负一时盛名，谦益最要好朋友程嘉燧的序文，要叫徐增亲手书写，因之徐增在当时的地位和声望就从而可知了。当明崇祯间，扬州郑超宗素负人望，喜欢接纳豪士，

家有影园，丘壑点缀的尤为优美。有一年春天，园中黄牡丹盛开，就延请当时的名流赋诗品题。参加这次盛会的有南海黎遂球和吴门归庄、徐增等人，他们即席赋诗，以黎遂球诗作的最好，作为压卷，徐增立刻写了一首《赋黄牡丹状元诗》以宠异之。可是时间过的很快，风云变幻无常，不久清兵就南下了，一六四五年的四月清兵攻破了扬州和南京。扬州遭到了十日的大屠杀，繁盛的名都变成了灰烬，郑超宗和黎遂球都以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归庄老死田园，徐增也因老病，半生病痼，在卧榻上回想当年影园的盛会，和了黎美周黄牡丹诗一百余首，诗虽然不传了，但是《牧斋初学集》卷二十有《徐子能黄牡丹诗序》说："子能身当劫后，缘情托物，能使扬州烟月，江左文章，攒花簇锦，涌现尺幅之上，安知劫火起灭，不在文人笔端，一口吹唾耶！"由此可见此老确有倔强的性格，犹当属于明末遗民之列，而且是富有乐观情绪的。

至于这部书解说唐诗的体裁，也是有所取材的。原来金圣叹就有《选批唐才子诗》之作，可是仅选了唐诗的七律六百余首，各体都不完备，徐增费了三十五年的工夫，把各体的诗，选其精华，从事于解说，凡五言古，七言歌行，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七体，选择其解说最恰意的共得三百十九首，卷首列《而庵说唐诗》一卷。编者还选有明末清初时人的诗，每人刻一卷，题作《元气集》。所说邓之诚先生藏有刻本，邓氏故后，所藏之书大半归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正在清理中，这部书还没有发现。

《而庵说唐诗》选集了唐朝诗人代表的作品，不摆起道学家的面孔，不存唐诗"初盛中晚"的偏见，所选的诗，一以人所同喜者为主。为了便于初学的诵读，一诗分为数解，章分句解，辨析入微，把艰深的辞句，说得明白晓畅，使读者很容易了解。这种一诗分为数解的办法，不始于徐增，金圣叹所选唐诗的七律，他把

每首诗分为二解，可是古人作诗的意思，是萦回曲折的，哪能在七言八句中，只能分为两解呢？那就等于时文制艺中的八股，未免于刻舟求剑。徐增对于唐诗中的分解，却运用得十分灵活，所以我认为如果以供读者的诵读和欣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他的说诗，为什么会费了三十多年的工夫？这是由于选者身经患难，千锤百炼，所说诗中的意境，是从阅历中而来。李图南的序上说："而庵先生自少而壮，而老，其间天时变化，地运转旋，人情世态，忧愁逸乐，风波险艰，历历备尝。兼之学道有心，心与物化，说诗时，如身化为蚁，衔线穿九曲珠，盘盘旋旋，转转折折，高高下下，尽力钻研，津关方透，为诸唐人一开生面。"是能道出选者说诗之甘苦的。我读了这部书所选的杜甫《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秋兴》八首等篇，像他解释"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州前芦荻花"等句，把当时杜陵作诗的胸怀和光景，体贴入微，解说的历历如画，真能道出古人心思，好像身临其境，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颇有引人入胜之妙。既不脱离现实，又合乎当时的情景，在明清时的选本，此书要算是为初学较好的一种读本了，因此这部书还是有其重印价值的。

当我尚在幼年，十四岁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就得到了这部书。虽然我当时童痴无知，却由于这部书说诗的浅显，读了之后，使我粗能了解诗中的意味，对于以后读唐诗很有启发。后来年事长大，从事教学工作忙了，不能好好地读书；可是每当佳节良时，风晨月夕，都把它拿来读一读，觉得很有趣味。每读一遍，都题上几个字，封面上题的墨痕斑点，涂抹的不成样子，置在箧中已经四十多年了。今承樊维纲同志的垂询，拉杂地写在这里，虽然是皤发老叟，回想前情，却又引我回到童年中去了。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署名刚主）

关于李贺《协律钩元》

《协律钩元》四卷，唐代杰出的诗人李贺著，清陈本礼笺注，清·嘉庆间裛露轩刻本，为陈本礼著作之一。按：江都陈氏父子著述甚繁，总名为《江都陈氏丛书》，其书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本礼著《屈辞精义》、《汉诗统笺》等四种，此书即为其著述中的一种；另一部分为其子逢衡所著《竹书纪年集证》等四种。本礼字素村，江都人，生于清乾嘉年间，仕履未详。其子逢衡，字穆堂，诸生。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止，辞不就。精于考证，著有《竹书纪年集证》五十卷等书。据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印《清史列传》卷七一称：逢衡的父亲“好藏书，为匏室，积书十余万卷，与马氏玲珑山馆齐名。”又据本礼著《屈辞精义序》自称为“耕心野老识于水南匏室山房”，则其藏书之室，当为匏室山房。逢衡秉其家学，所以能够写出在考古学上精赡的著作。本礼父子所刊刻的书籍都很精美，印刷也很漂亮。余幼年曾得到《协律钩元》毛边纸印单行本，后又得到本礼四种全帙，是书遂以散出，不知流传何所。近得香港《大公报》友人来信，始知流传在香港某藏家手里，可见唐代杰出诗人李贺所写的这样好诗，与本礼所笺注的这样好注，是

人所同好的。

李贺字长吉，河南昌谷人（今河南宜阳县），是唐代的具有法家前进思想的文学家。他出身于没落的宗室郑王之后，从小就受到他父亲晋肃的教育，培养成他写诗的爱好，七岁就能作诗，而且出语惊人，深得到他前辈父执们韩愈、皇甫湜辈的称赞，后来又获得并世诗人杜牧、李商隐、陆龟蒙的担扬，因之他作诗的才华闻名于一时。但是他看到唐代王朝的衰微，君闇臣庸，宦官当政，藩镇割据，朝臣揽权，互相倾轧，把比较正直的人士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排斥于外。他同情八司马，因而写过《官街鼓》这样的诗篇。又痛恨"脑满黄金重"、"生来不读半行书，只把黄金作身贵"的武臣将吏。他又是一位朴素唯物论者，他不信世上有神仙，又曾写过"神君何在？天一何有？"正中了统治者饮药求神仙的忌讳，并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因而他不得不用五色迷离的诗句，沉博绝丽的辞藻，刻心镂肾地用如隐如显的笔墨，把它表达出来。言是人的心声，迅速的就能够得到当时和后世人士的同情和欣赏。同时，也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因为他懂得乐律，所以他作的歌诗，可以被之管弦，悦人心耳。也正因为如此，唐朝政府叫他做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也就是协律郎。在他困苦奋斗的一生中，只活到二十七岁就死去了。陈本礼笺注的意思是李贺曾做协律郎，而韩愈有《提要钩元（玄）》的语句，因名其书为《协律钩元》。昌谷的诗自宋金以来刻本很多，注他的诗则有明、清时代的姚佺、王琦诸家，可是如陈氏所注李贺的诗和屈复所注李商隐诗《玉溪生诗意》（我藏有番禺徐信符先生旧藏乾隆精刻本），如骊龙探珠、深得其中奥妙的还不很多，可谓独树一帜。

李贺赋性倔强，有锐敏的眼光，犀利的笔调，能够见到新生的事物、自然界的美景，及时地把它写下来。因为眼前的景物，瞬息万变，若不用快镜头摄照，一刹那间就会驶去。所以《旧唐

书》本传上说：李贺"每旦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因之他作的诗，即景生情，能作出人所不能想及的惊人的句子。如他写的最著名《雁门太守行》，恐先是作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反映当时真实奇丽的情景的，因而为韩愈所惊奇而推许。

由此可知，著者自抒胸中的怀抱，道出自然界的微妙，敢于与旧势力作斗争，作出石破天惊的词句，这在集中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他反对儒家旧礼教束缚人心的传统思想。他在《李凭箜篌引》所说："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指斥了藩镇的扰攘，表达了振奋纪纲、澄清宇内的愿望。又如"天若有情天亦老"、"几回天上葬神仙"等句，一是含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一是批判统治者迷信神仙的妄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已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他瞻望前程有无限光明的远景。他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也表达了雄伟的愿望。至于他少年爱美的心情和描写目前风物幽美的景象，如"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和"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无异是一幅幽美的、若有人焉呼之欲出的图画。这种雅言隽语，是人所容易见到也容易欣赏的。可是他费尽精神、独具微尚、或讽刺当时黑暗政治的诗篇，如集中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贵公子夜阑曲》、《老夫采玉歌》等篇，指斥当日时事，不敢显露出来，乃托之"寻常咏物写景，不使人易窥其意旨之所在"，就有赖于笺注者陈本礼等人来发潜彰幽，提要钩元了。尤其注者所解释的如《浩歌》、《恼公》、《官街鼓》等篇，指出武人的品污行秽的行径，和权势当政，忠良如八司马被抑的情况，就使人读了恍如发蒙，如见当时的景象，使著者的隐衷昭然若揭了。因之可以说，陈本礼是笺注李贺诗的功臣。陈注中对前人版刻也有所改正，如认为"空白凝碧"应为"空山凝碧"，"兰苔春"应为"兰茗春"等等均是。但解释亦有过于

穿凿附会之处。

总之，昌谷之诗，如同“铁网珊瑚，初离碧海，映日澄鲜”，他的胸襟开朗，光明磊落，长言不足则短吟之，能于隐曲委宛之中，流露出其郁悒不平之气及其志节与怀抱，请看他的《南园十三首》绝句说：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诸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又《马诗》二十三首中的一首说：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足踏清秋。

他不愿意像人所竞羡的马周那样，献策朝廷猎取功名，就是说举进士一第是不屑为的，而是愿意“少年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表达出来他想要平定藩镇，收复关山的志节；而是情甘受人民金铬脑的约束，来实现其“快足踏清秋”的志愿；其志趣又何等宏伟呢！

他吟诗的企图，是酷爱离骚，直欲上接屈宋，志气凌云，而遭遇时艰，就不得不有泽畔行吟的痛苦，不得不以光怪陆离的辞句，风裳水珮的色泽，来抒发其隐曲，述说其胸臆，因之有：“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竹，劳光彩，西泠下，风吹雨”的诗句，以苏小小来形容骚人泽畔行吟幽独凄凉的情况。因之他的诗，有照耀光明的一面，也有揭露黑暗的一面，如“鬼灯如漆点松花”等幽凉悲怨的辞句，就是一例。所以北宋显官宋祁，以他正统派的眼光来评价昌谷，就说他是“鬼才”，其实李贺是杰出的人才，怎么能说是鬼才呢！

昌谷所作的《野歌》，有“男儿屈穷心不穷”的句子，可以道出其胸怀。我们还是以作者的歌诗，来述说其怀抱吧。集中有《昌谷读书示巴童》的诗说：

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
君怜垂翅客，辛苦尚相从。

巴童回答说：

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
非君习乐府，谁识怨秋深？

在唐代诗人中，以彼此问答的诗句来作解嘲的，是常有的。李贺恐也不能例外。这诗中的“垂翅客”就是作者的自谓；那“巴童”可能背古锦囊的小奚奴吧。这种倔强不阿的精神，和“快走踏清秋”的凌云傲霜的气节，可以说是为他自己最好的写照。

（原载香港《大公报》）

谈汉画像及汉砖画

鲁迅先生给姚克的信上说:“汉画像模糊者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行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

我在少年时代，喜欢搜辑汉、魏金石碑刻，虽然当时识力肤浅，未能意识到在碑刻汉画中蕴藏着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资料。也搜辑了一些如“武梁祠石室”等类的汉画。可是后来因为时局动荡不定，奔走南北，为了谋求衣食，把这些东西拿去易米，几乎全部遗失掉了。自一九五〇年以来，得以从事科研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旧事重提，又搜辑了些新出土的汉石画、砖画和陈簠斋、端匋斋、方药雨等人旧藏的砖瓦画像。又承友人陈从周赠送江苏徐州出土的全部汉画像，以及帖友张彦生先生为我选择有关社会生活的汉画像和砖瓦的画像，已经是盈筐累笥，有待逐渐加以整理和说明。

自汉末以来，出土的汉石刻画像，已日渐增多，浩如烟海。要搜求完备，极为不易，我只有挑选有关社会生活、发展生产和

政治史料这方面的汉、魏画像砖石拓本，如山东滕县、沂县及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拓本，其主要的内容，像陈簠斋旧藏南阳舞乐奇形砖画像、君车石刻画像，最近沂县出土的张文思画像，画面上画着舞乐钓鱼、纺织、游戏的故事，以及从各种石刻上选出的耕田图、造车图、冶炼图、伏生授经图等类。这些画像雕镌的比较质实纯朴。不久又得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汉蜀画像砖，皆为四川成都、重庆博物馆选出新出土的精品，种类极为繁多，我得到种芋图、采桑图、盐井图、庭院图、庖厨图、辎车图、散利图(即借贷图)……等十二幅，以及民国初年四川成都萃珍阁所编《蜀砖集》中凤凰砖拓片的一种。还有方药雨旧藏的汉砖画射击、泛舟钓鱼等项拓片八帙，刻画的极为生动。我于一九六三年游成都，承故友冯汉骥先生陪同参观成都博物馆，陈列室中陈列的有新津等地新出土的汉画像砖不下数百块，和新津所发现的汉墓中的石画，在画上刻有：

孝妇赵夫人字义文
南常赵卖字未定
贤儒赵椽字元公

等项题字，画砖则包括纺织、制盐、凿井、庭院、仓储、散利、讲学授经、音乐舞蹈、六博游戏等类的名色，我所得到的拓片，就是从这砖当中选出来的一部分。其中有块“采桑图”题“汉建兴四年五月六日造”。建兴为三国时蜀刘禅年号，四年为公元二二六年。字体已接近于晋代。在汉魏时期，从这些画片中看来，关东山东、河南一带所发现的砖瓦石画，雕刻的极为雄壮古朴，四川蜀中的砖石画法则较为生动流利。可以看出地方文化色彩的风格，而这些蜀画砖，时代已经较晚，后来居上，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

下面从社会生活的状况和这些汉、魏砖石画像生产地点和社会背景，试图作些叙述分析：

自秦、汉以来，长安是全国的首都，所谓关中之地，山东、河南叫做关东，是指着关中而言的。由汉朝政府的建立，在陕南一带，引泾、渭之水疏通了河道，修建了"白渠"，灌溉田地，发展了生产，关中之地号称"陆海"，自汉、唐以来，长安文化之高，和城南韦曲杜曲风景之美，到了春天一来，长安一片姹紫嫣红，莺歌燕舞，游人结伴游春，载诸诗歌，是人所艳称的，久住在长安的市民，享受了生活上良好的待遇，自称是关中人而耻为关外人，像汉朝的楼船将军杨仆原籍华阴，耻为关外人，以他的功劳和资格请朝廷移关三百里。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因为政治上的失意，由长安出了潼关，住宿在盘豆馆时写了"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的诗句，就可以见当时诗人眷恋着关中的情形了。可是在汉代关中为全国首都所在的地方，在那里有庞大的政治、军事机构，还有近于百万的市民，所出产的食粮和衣食应用的物品，为了供给官府和市民的需要，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之必须转运关东各地，以每年四百余万石的粮食供给京师；还要把巴蜀(四川)广汉的丝织品以及其他谷物运到长安，以作京师衣食之用。那时关东是指齐、楚，就是现在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地方。关东富足，则关中自然富足，若是关东饥荒，关东的饥民逃荒到关中，那么关中必然承受不起这种沉重的担负，而呈现着变乱的状态了。

我们可以这样地来谈，从战国时期到秦朝的统一，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不少的名城和大都会以及出产盐铁矿产的地区。可是具体到生产农桑、农业经济繁盛的城市，从汉初到东汉之末，在关东的则有山东的任城(济宁)、河南的河内(南阳、鲁山一带)以及山西太谷出产的黍米。还有四川成都、广汉等地出产的丝绸和锦绣。王充

《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可是在汉代来看，由于气候的关系，手工业工人技巧的不普遍，生产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例如河北渔阳郡一带尚不能产稻，陕北五原一带游牧地区，虽然宜于种麻，还不会纺织。据《后汉书》和《东观汉纪》的记载，张堪做渔阳太守，在现在河北密云、顺义一带，种植了稻田八千余顷，从此北方才种植水稻。五原地带素来不会纺织，到了冬天游牧之民没有御寒的衣裳，就睡在细草堆中而卧，至崔实做五原太守，才"劝民种麻，命工伐木作机纺车，教民纺织"。又如广西桂阳，民间不种桑树，也没有养蚕纺织的风俗，桂阳太守范充"教民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就是素称盛产丝绸的江南，在三国时期只产"越布"，还不能够普遍地纺织丝绸，当时曹丕对东吴孙权的来使说："江东所做的葛布，怎能够比上我们北方所产的罗纨绮縠呢？"（见于明·严衍《资治通鉴补》）从三国以后，江南的蚕丝业才发展起来。其实我国各地生产的发展，改变了自然的面貌，并不能完全归功于长官的倡导，而实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辛勤劳作的关系。

在汉代山东的任城，河南的南阳以及四川成都、广汉等地是汉代社会农桑产品聚会的地点，这些地方的经济既然发达，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美术上也就繁荣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汉代碑刻、冢墓中所发现的石刻和砖瓦的汉画像，以及陶俑和日常生活用品，多在这些地方。同时画像和塑造美术品的风气也颇繁盛而流传于世。正如后汉著名文史学家蔡邕，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说："陈留、南阳，多画其像。"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和政治原因等方面来谈：自从汉高祖刘邦继秦统一中国之后，审量当时情势，由秦朝的严法重刑，繁琐苛察的政策，改变而为"与民休息"的制度和策略，对人

民的约法三章，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同时提倡重农政策，所谓"轻田租十而税一"。被解放的劳动大众能够从事耕种一小块土地。又加上汉朝文、景二帝，外用儒术而内推行黄、老清静无为的政策，农业经济迅速发达起来，到了汉武帝时，经过七十年间就出现了国家富强，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府库余财，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的局面。同时汉朝政府在政治措施上虽然抑制豪强，防止兼并，但只打击了自从战国到秦以来奴隶领主残余所谓关东大豪的势力，而培养了一批新兴地主勋贵的势力，以致田连阡陌，奴隶成群的景象仍未能尽除。到了新莽攘夺汉朝政权以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形成大量兼并，内外交讧的局面，这种情况是绝不能长久的。

接着光武中兴，为了缓和农民的积忿，维护其统治政权，他首先施行的政策就是打击强豪，丈量田地和释放奴婢，这都是针对着当时的政治上的积弊而言的。但是他究竟彻底施行了没有？是成问题的。例如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丈量田地，开垦荒田，以利于发展农业的生产。但是据《后汉书·刘隆传》说："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当时有人就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因为南阳是汉光武帝的故乡，多皇帝的近亲，他们的"田宅逾制，不可为准"。所以不能够彻底地执行丈量的政策。可是尽管如此，因为他兴修水利，提倡种植谷物，以致"野谷不收自获，麦秀三岐"。这就使矛盾得以缓和，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农民得以从事耕种；一定限度地发展了生产。经过章帝及和帝之世，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连续不绝；但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仍不断地发展，到了桓、灵之世，是东汉以来两京和中原地带社会经济最为繁荣、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时期，也是统治者阶级矛盾最激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像张衡、马钧等科学技术家，王充、仲长统、王符等前进的学术思想家。在克服自然、认识天象、防止灾害的科学技术上，张衡创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在改

进农业生产的技术上出现了利用水法拿齿轮来激动水势，制成了水碓和水磨。三国时科学家马钧制成翻车抽水来灌溉田地，并用水激发齿轮的动力，制成了"饥乌"和"渴乌"，来居高临下清洗道路，还制成了精巧的织绫机。（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及《三国志》裴松之注）

东汉初期的特权阶级占主要地位的：一是自光武帝阴、郭两个皇后以后，操纵了大权、所谓"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的外戚勋臣。二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招权纳贿、无恶不作的宦官。三是各郡的太守和持节的将官。四是各地方的中小官吏，如上计吏、书佐，以及持节中郎将幕府下的奏曹吏。不要瞧不起他们的官小职卑，他们是掌握运送财富和出纳政令大权的。他们生前骄奢淫逸厚自奉养，极尽生活上享受之能事，死后还想登上"天堂"，把生前奢侈享受的物品带到坟墓中棺材里去，相沿成习，一直到东汉的时候，遂养成厚葬和建立祠堂的风气。因之在洛阳市上有专门为他们刻碑、在墓壁上刻雕绘画花纹故事人物的工匠。还有为他们制造土俑明器（墓中所用物品）以及日用物品的玩具店，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家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又说：

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除了这些玩具之外，还有铜片制造的摇钱树，用瓦制造刻上“日利”二字的扑满。这种玩具不但活着要玩，死了还装进坟墓中去。这种雕刻着画像、宝藏明器玩物的坟墓，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所著录的：《济水篇》有著名扶沟侯朱鲔墓，获水城东有司徒盛允墓，金乡山有司隶校尉鱼峻墓等。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最近发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墓以外，全国各地发现的汉墓约大小两千多处。在这时间的前后，山西离石县发现有持节中郎将奏曹史左元异墓石画和陶器，在四川芦山县发现有上计吏王晖墓石棺画像，说明了在各地区小官吏的坟墓中，雕刻的也如此精美，墓中陈列的也如此豪华。

这些坟墓中石刻壁画和陈列陶器土俑，种类繁多，其主要内容，在石雕上所刻画的：（一）为未受印度佛教影响，而有深厚天师道迷信色彩的天神地祇以及龙凤等奇形异兽之图像，和本来古代有西王母国而配上东王公的神话人物。（二）为古代帝王将相、圣贤、忠臣列女，富有儒家思想的历史人物故事。（三）为墓中主人一生行事，如武梁祠画像所画的“君为都尉时”、“君为市橼时”的图像。（四）为画墓中人所住的庭院，当地的风光以及所喜爱的日用物品，乃至猥亵之物，无不塞进到坟墓中去。如墓中所陈列的木偶土俑，泥车瓦狗，乃至舞乐游戏的绘画，舞蹈和演唱说书人土偶的景象，有的气势磅礴，有的形象逼真。无论是画的或塑造的，都是生动活泼，栩栩欲生。

从这些画像和塑造中，可以看出古代社会风俗，有些是历时过久，人们已经遗忘，如“丁兰二亲终殁，立木为父”等类的故事。还画有天上的星宿，楚、魏、齐、鲁地形的分布，纺织耕种以及奇形异兽，或古有而今无，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科学技术的一些萌芽，都足为考古研究和历史学习的好的资料。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从秦、汉以来，石刻和砖瓦器物的制造中的书法，绘画和造形就可以显示着：在汉石、汉砖瓦上

所书写篆字、隶字和章草(汉代的草书)是怎样地古朴雄伟和有力，而且美观，是一般文人所写不出来的。至于汉石和砖瓦的雕刻，有浮雕的，有凸雕的，是用阴文，或用阳文，用粗线条式到细线条式刻画实物的形象，非常纯朴，而且精细入微，甚至是惟妙惟肖。汉代在石刻砖瓦上遗留下的图画是写实的图画，因之汉代石画、砖瓦之画，有其特征，也有时代的意义。他们刻画的人物动植物图像，看似呆滞，而细看起来却很有风趣。他们还能于人物之外加以空间室内外坐位陈列的布置。例如最近在辽阳市棒台子发现的第二号壁画墓，在墓的墙壁上画有“宴饮图”：画面上正中画两个方榻，榻上各坐一人，旁有侍者传递食物。侍者头的后面写着大婢常乐等字。两个主人的坐榻均排列在红色帷幕之内，红帷用朱带高结，朱带下垂，内露石绿色的短窗帘。右上方窗帘外面有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陪衬的可以算是美丽极了。由这张图画中，可以看出由汉末到魏初，已由席地而坐而登上了方榻。

河南费县打虎桥发现汉代石刻画像，其中有“地主索租图”，其他石刻中还有“农民向地主交租图”，一口袋、一口袋地倒到地主仓库中去。还有四川画砖中，农民向地主乞贷的“散利图”，一方面表示农民的穷困；一方面描绘地主和狗腿子倨傲狞猛的面貌。这是对于官僚地主的控诉。同时砖瓦工匠又把发展生产，农田的劳作，蚕桑的采集与纺织，以及冶炼、鼓铸，建筑的图案画像雕刻在砖石上，以告诉后人，显示了祖国文化优良的传统。

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着一九三五年同蒲铁路动工时，发现一个朱书的陶罐，上面写着：

> 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中略)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台魄，主死人籍。

眉须(鬓)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待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蛎)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由张叔敬陶罐上所写的辞句看来，五岳的黄神主人的生死簿子，人死了作了鬼还要纳地下税，这是对于统治者深刻的讽刺。这样昏愦神祇，早应该废除。还有汉代民间过年过节常用的吉利话，有“大吉利”和“甲子大吉”等类的文字，刻在砖瓦上。农民军起来以此作为号召，所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就是以张角为首黄巾军起义的时候了。

（原载香港《美术家》杂志一九七八年五期）

江浙访书杂感

我对于江浙艺苑书林的情况，还是不甚陌生的。记得我三十岁的那年，为了纂辑《晚明史籍考》，曾到江浙各地来访求公私各藏书家的藏书，从事搜辑资料工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已经近五十年了。在反动统治时期，民不聊生，百事俱废。如昔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闸北所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就遭“一·二八”之变，图书已化为灰烬，馆址亦无迹可寻。其他私家的藏书也遭破坏，如南浔刘氏嘉业堂、平湖葛氏传朴堂各家的藏书，不是散失，就是荡为冷烟化为茅草了，大有明日黄花之感，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叹惜!

自解放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祖国文化遗产，保护全国的重点文物。为了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于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指示，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下，编辑工作正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趁此机会，我和刘重日，武新立同志能够到江浙和其他各地阅览图书，从事于搜辑和鉴别资料工作，真感觉到荣幸。抚今思昔，触景生情，不禁有如下感想：

一，宁波天一阁，是明朝嘉靖间范钦所建造的藏书楼，也就

是在四百多年前我国最早的私家建立的图书馆，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建立还保存无恙的图书馆了。到了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就效法天一阁建筑的式样，为了保存《四库全书》，就于北京、沈阳、承德、镇江、扬州、杭州等地建造了文渊、文津、文溯、文澜等七阁。尤其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立的文津阁，连园林的外景，九狮一象所叠的假山和天一池水，建造得都和宁波天一阁一模一样，在文津阁的旁边又设立了有蒙古包的"万树园"以及园外所建立的布达拉宫。漠北风光与江南烟景融汇在一起，为团结各民族及接见当日来朝会的外宾，形成为雄伟的民族文化宫。至于天一阁范钦的藏书，是收集当时明代的《实录》、邸报、地方志、登科录，元明时代的诗文集以及明代所拓的汉魏六朝石刻碑版的拓片，为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朝历史必须取材之所在。所以明末清初的学者、文史学家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都以能够登阁阅书为幸。可是历时经久，阁中的藏书已经损失过半；又经过风吹雨打，楼房业已倾圮。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重新修建了天一阁，修饰得辉煌壮丽，焕然一新。还将把后来清代鄞县卢镐收藏书籍的抱经楼，移建在天一阁的后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负责同志还收回了天一阁旧藏的一部分书籍，又把热心恢复天一阁原貌的冯孟颛老先生所藏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遗著和《明史稿》的稿本，全都保管在天一阁里面，就成为保存浙东文献和研究明清史重要图书资料的宝库。

二，当抗战结束后，解放的前夕，大量的文物和善本图书，运到台湾。当时郑振铎先生在报刊上，写了一篇题为《古物何日归来》的文章，也未能阻止古物的散失。可是自从土改以来，各私家的藏书都归到当地的图书馆，其余分散在江南各地的藏书，由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收集起来，移送到南京图书馆。我这次到江浙各地方去看书，看见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元以来的名本佳椠，罕见的书籍都在一千种到两千种以上。扬州图书馆

也藏着苏北名贤遗著难得的书籍。除天一阁外，尤其是在西湖孤山的浙江图书馆，藏的图书和当地文献固然众多；还有名书家和金石学家沈曾植，以及赵之谦、魏稼孙等人所藏的汉魏以迄唐代的碑版，精拓名校之本，已经是汗牛充栋。这些图书馆里蕴藏着珍本和宝贵的资料，为运到台湾的书籍资料所未曾有。因之为编《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向科研进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自十年浩劫以来，林彪、陈伯达一伙和"四人帮"搞所谓"破四旧"的活动，把古代的典籍毁掉，甚至把书籍文物送造纸厂里去造"还魂纸"，真是对于祖国优良传统文化的一大浩劫。但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不致于损坏和散失，苏州文物保管会负责同志把元和顾鹤逸家历代收藏的宋元以来佳本名钞，以及重要的文物，顾(千里)批、黄(丕烈)校、鲍(廷博)钞的珍贵书籍千余种，完整地保存起来。还有苏州图书馆里的旧日书坊店里的老师傅和中年编目员叶瑞宝等同志，到造纸厂把古书一本一本的挑选回来，如清徐达源著《甫里人物考》稿本等书，凑成全书，恢复了原状。又如明末毛氏汲古阁影钞宋本《孝经》等《三经音义》纸白版新，墨重如漆，影写的是笔笔入神，精美绝伦。又加上绛紫色洒金织绢封面，真是非常美观，可以说是一种精美艺术品了。叶瑞宝等同志把所谓"四旧"书从造纸厂里收购回来的行动，被"四人帮"的余党诬为保护"四旧"，并遭到批斗。可是到了今天就成了苏州图书馆镇库的宝书。我到苏州时，苏州图书馆的同志把从废纸堆中搜捡出来的书籍，拿出来给我看。这些同志对于爱护祖国文化的热情使我心中很为感动，我想写一本《江浙访书记》表达保护祖国文物的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闻讯，就约我扼要地先写出《江浙访书小识》来说明图书的内容，提供读者的探讨，将在最近的《中华文史论丛》中发表。还有《文汇报》的同志约我写这篇不成熟的稿子，不过是叙述我到江浙来访书的感触，可以作为我写

《江浙访书记》的缘起，谨先告读者，还请读者指正。

（原载《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学术》版）

宫苑杂谈

煤　山

北京从四西牌楼经团城、金鳌玉蛛桥和故宫到东四牌楼，是一条古雅而又美丽的街道。街的两旁，有一行一行的翠柳、丹枫和塔松。在故宫北面的煤山，又名“万岁山”，据传说是由明代堆积起来备宫中使用的煤炭演变而成，其实是因修宫苑开挖护城河而堆积起来的泥土，后来又在上面建立了亭台和殿宇。到明崇祯年间，因为外患频仍，崇祯帝就用这个地方作为练武功、习射猎的地方。

在古代，护卫皇帝的亲军叫做禁军；但是崇祯帝所亲自操练的军队，却不叫做禁军，而叫做“净军”。因为崇祯帝猜疑成性，信不及“三大营”的队伍，而挑选身边亲信太监中身材高大、年富力强的编成“净军”。每月五日，崇祯帝亲自领带，在万寿亭前操演。他以为是自己的亲信，就有恃而无恐。可是到一六四四年三月，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农民军从阜成门进入北京的时候，这

些守城的“净军”竟全都投降农民军，崇祯帝也在煤山吊死了。

天 堆

明代宫城内，除了“煤山”以外，还有个囤积宫中食粮“紫米玉食”的地方，叫做“天堆”，高、广与煤山相同，而早已无遗迹可寻。

“天堆”这个地方，在紫禁城的东北，贮存的是预备宫中、皇帝御前及供御膳房用的食粮。每年，把从南方进贡来的最好稻米堆在这里，四周用芦席围好，囤积起来，备而不用。日积月累，不断堆积，便增高起来，所以叫做“天堆”。

明朝的旧例，凡是宫廷中皇帝御用的物品，如皇帝所穿的龙袍，赏赐大臣和接待外宾的绸缎，一封一封的叫做“表裹”，都是从苏州、松江织造局承应运进的。羽林亲军所用的军装布疋，叫做“布解”。皇宫用的最好的稻米，叫做“精白”，也都是拉夫承应进贡，从运河运到北京的。凡是轮到承应进贡的解差头人员，由于管事的官吏层层勒索，总是弄得家破人亡，这在当时被称为“大三苦役”（见明顾起元著《客座赘语》）。

关于“天堆”的建立，后来为什么又无遗迹可寻，在清初宋起凤著的《稗史》卷四里有一段话：

> 天堆设禁城东北，乃积上用玉粒之处，其高与煤山等，广亦同。在禁中远望之，隆然如驾梁天半，光与日烁。盖外仓皆储军粮，及期门卫尉、将作诸役月饩，仓廒列数百间，每月各持筹临仓支给。太仓为京官内员勋戚、珰卫诸臣及太学生每月给票颁发，亦设仓廒。独供御食者，谓之天堆，不入仓廒，恐有蒸湿朽变之虞，用重席作包，包计石，下砌石基，高丈许，上广数十丈，横径数丈，举席包层次叠为堆，

高可百丈，上履重席，纴织殆遍，虽大风雨不能透，而地势干燥，经岁色粒不少变。每年六宫动用，不过减堆一尖。明年复增益如初，陈陈相因，亦朝廷积贮备岁之深意。寇变，除散给贼党，与民间乘乱窃取外，亦委于火，今并其遗址无问矣。

崇祯帝是以苛察为明而又悭吝成性的皇帝。皇家御府内库中储藏着大量黄金宝物，“天堆”中储藏着大量食粮。在农民军即将围困北京的时候，他向皇亲国戚劝捐输饷，而自己却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有大量食粮也不肯散发给老百姓。当李自成进入北京，登上宝座，看见崇祯帝有这样多的财宝食粮，却不肯散发军饷时，曾感慨地指出明朝政府的腐朽及其败亡的原因，叹曰：“此明所以败也。”(见明末野史及清李天根《爝火录》等书)

明朝末年宫廷中间的腐朽、奢侈浪费确是惊人的。在明天启、崇祯年间，宫中宫女的胭脂花粉鞋帽费，每月要花费白银四十万两。而清兵入关以后，清康熙初年宫中宫女花的费用则每年不到四十万两。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明代宫廷中的腐化了。

《稗　史》

记载明代宫廷遗闻逸事的《稗史》著者是宋起凤，据徐世昌《清畿辅先哲传》卷十九“文学”说：“宋起凤字来仪，号紫庭，一号觉庵，沧州(沧县)人，明副贡生，清顺治六年，授山西灵丘县知县，擢广东罗定州知州，有政声。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不应。晚好游，足迹遍天下。所著有《诗说》一卷、《北京风俗记》二卷、《两都耆旧志》四卷等书。”我所见到的有宋起凤所著《大茂山人集》，清康熙间刻本，及《稗说》四卷，清康熙间旧钞本，或即为稿本，前有康熙十二年自序及再序，所记皆明清间社会风俗及

名人逸事，如“萧尺木画学”、“陆元见梅隐”之类。其书第四卷皆记明代宫廷掌故，或者即著者所著之《北京风俗记》。这卷中所记载的有金狮子门、太液池、万岁山、内库、兵仗局、天堆、虎豹城、御马监等类。御马监就是现在北京图书馆的旧址。这些地方，或古有而今无，或者如天堆、虎豹城等已经是代远年湮，无迹象可寻了。且所记之事，多为明刘若愚《酌中志》所不载，尤为可贵。

记明代宫廷的书籍，孙承泽著的《天府广记》固然博览群书，集其大成，而我觉得记明代宫廷掌故较质实可靠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刘若愚的《酌中志》，坊间翻刻本，又叫做《明宫史》；第二个是明代崇祯帝的外戚新乐侯刘文炳家传出来的遗闻。明亡后，刘文炳的幼弟刘文炤流落到苏北的高邮，一般明末遗民多从之游，询问明末宫廷间的遗事。后来明末泰州的爱国诗人吴嘉纪（字野人，著有《陋轩诗集》），与刘文炤结成了姻亲。有名的史、地学家刘献廷著有《广阳杂记》，可能他是新乐侯的本家，听到刘文炤所谈明末败亡的痛史独多。宋起凤与明末画家萧尺木为最要好的朋友，与明末遗民交往颇密，又听见御马监太监马云程一些传说，起凤凭着耳闻目验，综合整理，写成了这部《稗史》，这可以说是记明宫廷史事的第二个来源了。这部书是我在北京中国书店得到的，“玄”字和“贮”字皆不避讳，的确是一个旧钞本，也可能就是稿本，流传甚少，而又切于实用，是研究明代宫廷、遗闻、逸事不可缺少的书。

（原载《紫禁城》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读史随笔四则

一 《史记》三家注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为未完成的杰作，其后褚少孙为补其未备，然其中犹有后人羼入的地方。司马迁本卒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可是书内有记载到汉昭帝时代的事迹，甚至有些后人伪托所作的假书，已失去司马迁著书本来的意旨。至于书中包括的内容和名物训诂，更难以理解，只有赖于《史记》的三家注来说明其事实和补证其缺误。

三家注就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这三家注也和《五经》一样，《五经》的注疏本来是分别单行的。尤其是疏，就是“正义”，是发明《五经》的意旨的，是一种长篇大论的文章，到了宋代，为了便于阅览，把注和疏都分别合刻于经文之下，不免有所剪裁和省略，已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所以到了清代乾隆、嘉庆以后，注重于考据之学，由藏书家如汪阆源等得到宋本的

《仪礼正义》和《公羊正义》的单疏本，就认为奇珍了。《史记》三家注在宋代以前的传钞本，都是各自成书的，到了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本，才把三家注合刻于《史记》原书之内。明嘉靖间，姑苏王鏊又照原样翻刻了黄善夫本，可以说是最便于读者的书籍。可是“正义”里边，所保存的资料，删节了不少，这就有待旧钞本为之考订或补足其事实了。

从来研读《史记》的人们，都知道三家注的重要，而很少注意到三家注的重要性的何在和三家注的内容以及性质上的区别。那末首先要读《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提要”，尤其是清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三“史部提要”，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就是由邵晋涵所撰的提要剪裁而成的，而邵氏的原稿记载的尤为详实。其乾隆间原刻四卷本流传尤罕。

第一，我们先谈(刘)宋裴骃所撰的《集解》，裴骃是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儿子，父子都是史学名家。因为《史记》这部书，写于汉武帝时极端专制时代，动辄触犯了忌讳，司马迁胸怀义愤而著《史记》，所以“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至于所用的文辞，合乎当时的情况，把引用“六经”的原文，而改换为汉代的语言(训诂)，他不是闭门独造，而是皆本西汉诸儒的旧说，这就有许多必须考究的地方。裴骃乃取(刘)宋时徐广所著的《音义》，其中“多识古文奇字，复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邵晋涵说它是“扶微学而阐隐义，是迁能述经典之遗文，而骃能存先儒之轶说，考诸经古义者必归焉，不仅史法为后人所遵守也”。

第二，是唐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三十卷，因为裴骃所著的《集解》，代远年湮，颇多散佚，乃仿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惟标明所注之字，盖取古代经传别行的方法，凡成书二十六卷，后二卷乃商酌《史记》编制的体裁，至欲降项羽为世家，陈涉吴广为列传，为了恭维唐代皇帝李世民，特别推崇老子，纯系封建社会吹捧帝王将相的思想，因之，其改编的方法是有当有不当

的。其书本为单行，后乃合刻于《史记》之内。

第三，唐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三十卷，后乃改作为一百三十卷。张守节的《正义》能够通裴骃之训辞，析司马贞之同异，费了三十多年的力量，才能写成是本，确是一部好书。它的特长约有三点：(一)以唐代《括地志》为主，考证《史记》中所记载的地理，如所记载《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有"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把"三楚"注解的何等详明。今本已脱去此十六字。(二)是征明故事，颇为赅博。如《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有"士若大理卿也"六字，后来刻的监本，全都把它删掉了。(三)著者长于六书音韵之学。如黼黻二字，今之(唐)《史记》写本黹字多从耑，其沿习已久，于是可知从六朝以来，文字之用日繁，因之六朝时代别字纷起。又如各地的乡音不同，"字同而音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今之取舍粪除兹弊。"张守节对于文字音韵考订的详审如此。所以张守节的《正义》有考证地理，征明故事，以及纠正六书文字音韵这三种特长。可惜自宋以后把三家注合并正文时，有些是被删节掉了。那末要考订三家注的遗文，和《史记》古本，所保存事迹，除了在唐宋的古本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外，只有赖于地下的发现，如敦煌的卷子本，以及从唐代流传到日本的，如宫内有图书寮，高山寺旧藏的卷子本，还可以见到史记原本的异同和三家注的遗文。一九三四年间日本泷川龟太郎曾根据日本所藏《史记》旧钞卷子本并搜辑三家注以后研究史记的资料编成《史记会注考证》，我国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在清末民国初年四川合川县有一位学者张森楷先生费了一生精力，著有《史记补注》一书，等身著述，未能发表，闻仍藏于四川图书馆中。目前，前四史别的都有集解补注之本，而《史记》尚付阙如，似可以为之印行，供学者探讨。

二 神 君

如上面所说，张守节《正义》叙述《史记》中的地理沿革，对于“郡国城邑”，极为“委曲详明”。而对于《史记》的佚文，搜辑的也极为详尽。如《汉武帝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引《汉武帝故事》说：

> 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生，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事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为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

神君所说的话，大概是用扶乩式记下来的叫做“画法”，见于《西京杂记》。这和自秦汉以迄明清以来巫婆下神，仙女画符治病没有什么区别。（清乾隆间天汉浮槎散人编《秋坪新语》卷二记北京西郊金岩观，尚有此愚妄的传说。）又《晋书·夏统传》说：汉末晋初，浙江会稽有“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装服甚丽，善歌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这可以说是民间的仙女下凡，虽然是属于迷信，迷世惑人不正当的举动；但也可说是在上古时代，文化尚不甚发达的时候，民间的唱歌舞蹈和为人治病画符念咒服些丸散做为医药的起源。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王先生这种说法，盖本于明朝的杨慎。杨慎《丹铅总录》卷

九说："女乐之兴，本于巫觋，在男曰巫，在女曰觋，在上古已有之。"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上古原始公社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只有忙于生产，渔猎和耕种，其他的事情，不能不委之于人，不能不有分工的制度，如审量天气的阴晴，时节的旱涝，有时不慎，疠疫疾病的产生，因之必须祓除不祥，打扫清洁卫生。正如《后汉书·礼仪志》说：三月"上巳，官民皆絜(禊字，祓除不祥的意思)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灾)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因为上古原始社会的人民尚不能克服自然，只有托诸巫觋来进行占卜，并且用音乐舞蹈的形式来敬事鬼神。《诗经》上所说的："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就可以看出巫觋歌舞的形状来了，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舞蹈的起源吧。

三　《汉书》中的名物称谓

吾人读史，不可以不精读班固《汉书》，因为《汉书》实为我国学术的渊薮，各项知识的宝库。凡是我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地理科学技术，名物训诂，无所不包。不但研究上古史要读《汉书》，就是研究近代历史，也不能数典忘祖，废而不读。我们就以新发现的文物和汉晋木简，那些断简零篇以及残字而论，要是离开了《汉书》、《急就章》、《释名》等项著作，就无法解释其文字训诂，也就无法了解历史上新发现的事迹，把历史的研究成果往前进展了。那末，就以阅读汉简和汉魏以来金石碑刻、砖瓦陶片的所写刻的文字来谈，其中颇涉及汉代的文书和名物制度。汉代的文书、公文体例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如汉朝政府颁布的制诰诏书，典章律令，凡急密的文件，就写上"急急如律令"，后来就沿用到画符念咒、避疫和驱邪魔鬼怪上，都写上拖着很长的尾巴"急急如律令"了。至于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吏，令长以下还有乡村

公社"都"、"鄙"、啬夫、伍百等项的名称，对于西域以及各方面的边疆地区，则设有长史、都护、都尉、戊己校尉、候官、燧长等类名称。对于地理上的建置，则有亭、障、驿站，烽、燧、仓廒、邸阁等项的设备。尤其是人身的称谓，也有贵贱尊卑等等名称，在封建社会内，为了统治人民是有其严重的阶级性的。为了缴纳赋税，役使人力，在人身的称谓上，有种种的区别，初生年满四岁的叫做"黄口"小儿，到了这种年龄的小孩，就要出口赋，后来改为七岁，从七岁到五十六岁，就要出算赋（田赋和徭役）。对于农民男人称为男子，女子叫做妇人。当时砍柴析薪的叫做厮，就是后来所称谓的小厮，做饭的叫养，就是炊事员，凡是参加劳动的都加以卑贱的称呼。至于奴隶更不容说了，奴叫做大男，女叫做大婢。若是手工业的工人，凡是被罪充任劳作的有城旦、舂、鬼薪，有一年刑到三年刑的区别，刑满而仍充劳作的叫做"无任住"，凡是受过刑罚的都要剃去眉毛和胡子，所谓髡钳（戴上刑具）之称；凡是普通的工人参加劳役的，不剃去须眉，因之叫做胥靡。撑船户叫做黄头郎，因为是戴黄帽子的属于卑贱的一类。汉末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叫做黄巾军，黄巾军起义所使用的口号"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当时人民建筑房屋的砖瓦上多刻着的吉祥语句，现在流传下来的"甲子大吉"砖，和最近安徽亳县曹氏墓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砖刻，黄巾军就用来做为号召人民群众起义的口号，从这些事实里面，就此可以寻思出来了。王国维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对于汉代简牍上书写公文阅件的用具和颁布的形式，著有《简牍检署考》。对于新疆、甘肃新发现的汉晋木简，帮助罗振玉编著《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的考释，除了考释文字制度以外，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论据，对于推动历史科学的进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劳干诸位先生都是继承王先生说法，把这门科学发展起来的。

在王国维先生所著的书中，我将举出一两个例子。第一，我

国人民所穿的衣冠，是由劳动人民的劳动，创造了生产而革新起来的。战国秦汉以来，不劳而获的士大夫们，穿的衣冠所谓"博衣宽带"，走起路来"羽扇纶巾"飒飒有致；但做起事来很不方便，就是武士穿的衣服也颇为庞驳隆重。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防御外患，在北方的赵武灵王就效法我们的兄弟民族匈奴(蒙古)风俗"胡服骑射"，对于战争上方便敏捷的多了。从战国一直到西汉，一般士大夫穿着的衮冕宽衣博带，但是老百姓还是穿上下连起来的长袄，叫做"襜褕"，可是比穿"衮冕"、"深衣"要为舒适便利，因之士大夫在家中燕居的时候，也穿"襜褕"了。大约在胡服骑射以后，劳动农民的服装，也逐渐改变起来，把"襜褕"长袍，分为两截；上身是穿着短袄，起个名字叫做褶，下身是穿着裤子，工作起来，自然是便当。在汉代的风俗，凡穿裤的人，头上必须戴进贤冠，就是把(方山冠)纱帽翅子改成软巾，也叫做帻。后来干脆不戴方山冠而用帛包头的帻了。但是脚下履除了穿靴子而用草履。这种形式，下自农民、手工业者、战士都是穿这种衣冠，就是统治阶级士大夫们也习尚穿这种衣服，不过把进贤冠做的漂亮一点。帻式的软巾加长有"罗带当风"之致，这可以说在我国服装上一大进步。因之，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考释》中，写了一篇《裤褶考》是极有发明的。

第二，自从张骞通西域后，汉朝政府在通西域的道路，建立了河西走廊，西出玉门阳关经过金城，就是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东西交通的道路，烽燧相望，屯戍(屯田和戍卫)林立，来往的行人只要取得入境的许可证(符和繻，唐代叫过所)就可以畅行无阻。祖国的人民与匈奴和回部兄弟民族，熙熙攘攘携手并进，发展了生产，无论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起来，凉州、甘州以及张掖本来是很荒凉的地方，到汉武帝以后市面就繁荣起来了。在汉代乡村的集市，交换和买卖物资，本是每天早晨，或者隔一天赶一次集，到了西汉后期，凉州、张掖一带五谷丰登，牛

羊满野，为了市民的需要，却“一日四合”。在西域屯戍的士卒，也可以赶集交换物品，处理都护府里所颁发的旧战袍，也可以买民用物品，如《流沙坠简考释》卷二杂事类，有这样一条记载，抄录如下：

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县滱□□里男子□宽德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用贾钱千三百□□□□□□□□至□□□□□□(简面)□书荷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券)约□沽□二什(升)(简背)。

这里看出一个问题，就是汉代西域商业经济情况，所谓知券人就是中人，当中人的，原物主还要给他们沽酒二升以作酬劳，二升数目并不算少，其原因是汉人好饮，汉代的醴酒(甜酒)酒味较薄，而升斗的容量是比较现在约小三分之一的。若不是经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怎样能知道汉代社会风俗状况呢？因之研究汉代简牍砖瓦古器这就端赖于要了解汉代的名物制度了。

四　清议与乡评

前四史中的作者，司马迁、班固皆以被罪而死，而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遭遇为尤惨。他因为生在南北朝刘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篡夺政权的时期，他依附了彭城王刘义康，因而有叛国之罪而遭到极刑。沈约《宋书》的本传上，极力加以丑诋，而没有得到好评。到了清同光间陈澧《东塾集》中有“申范”一篇，才为之昭雪，真相大白。范晔《后汉书》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他在“狱中与甥侄书”说：对于《前汉书》的作品，“非但不愧，而且过之”。他所著的“杂传”分类尤为广博，有党锢、独行、方术、逸民等凡十一类，为学术科技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尤其同

情于群众和地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被压迫者。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其识力之还不能冲出樊篱，对于后汉时农民不断的起义，尤其黄巾的起义，仅散见于《皇甫嵩》等传之中，甚至有诬蔑的辞句。但是他看不惯后汉桓灵时代政治的腐朽，对于宦官外戚的专权，大量逮捕当时负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横加以罪名，叫做“党锢”的则深为之痛恨。在他书中特别编写了“党锢传”。他认为东汉垂危的局面，所以“倾而未颠，决而不溃”者，皆由于“仁人君子心力为之也”。他认为挽救政治败坏的局势，全依着群众的舆论，所以他表扬当时“党锢”人士所提的“清议”和“乡评”，也就是当时所称道的“月旦评”。乡里中所造成的舆论(他仅指当时士大夫而言的)，“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悟，盖前哲之遗塵，有足多者。”这种思想从东汉到宋明一直支持了有气节的人士所谓士大夫的思想，而扶持了正义。所以到南宋浙东学者王应麟和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黄宗羲诸人还是一脉相承的。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说：“东都之季，清议扶之而有余；强秦之末，壮士守之而不足”。又卷二十说：“夫尚志谓之士，行已有耻谓之士，否则何以异乎工商”。王应麟为宋末的爱国志士，他对卖国的秦桧极为愤恨，在同书卷十九引周南仲追贬秦桧代拟的制书上有“首弛边疆之禁，忍忘君父之仇；……一日从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如果是没有“清议”，那末就可以说，投降派张邦昌为忠臣，抗战派张浚为多事了？王应麟与胡三省同为宋末的遗民，爱国的志士，他们著的书，同有他们的微言大义，启示后人。近代史学家陈垣同志著有《通鉴胡注表微》，我认为王应麟的著述，也应当阐述和研究。举例来说吧，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就是继承了《困学纪闻》的义例而著成其书的。《日知录》卷十三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又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耻之于人大矣，故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

耻。”这不是显明地继承王应麟的学说思想吗?

我所以不惮烦地说明这一件事情，主要的目的是：知识分子虽然是依附于人的一个阶级，然在学术思想上起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因之在《后汉书》上所说的“清议”和“乡评”是在历史上不可没灭的一件事实。我们要研究历史上某件事实，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掌握全面的资料，作内部前后纵横的联系和足够地对于这件事情的分析，才能做出来比较具体的成为专门课题的研究。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重要的事件，可是从东汉以来到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革命志士，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近来所写的中国通史和农民战争史，往往只写农民起义而很少谈到东汉的清议和月旦评。这好比两条腿走路而失去了一条腿，这就不能相辅而行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我们是历史唯物者，就不能像“四人帮”似的为了他们图谋不轨，随心所欲地随便阉割历史和歪曲历史。我们学习历史，首先要掌握足够的历史事实和大量有系统比较全面的资料，并且要端正学习历史的态度。这是我学习历史的一点体会，不知对不对？还求读者同志们的评正。

（原载《史学月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记黄易与庄缙度之藏汉魏碑刻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黄易与庄缙度在乾隆到道光年间先后同官山东济宁河厅同知。庄缙度继承了黄易的衣钵，收藏和寻访石刻，亲自椎拓，加以装订，并且装订的式样也与之相同。黄易所收藏的汉魏碑刻拓本，与黄丕烈所收藏的宋元版书籍同为海内外收藏家所珍重；庄缙度收藏的碑版也极为丰富，后来多为渑阳端方所有。流传下来的有旧拓本《汉武梁祠画像题榜字》，有正书局有影印本；还有上虞罗氏旧藏《汉封龙山碑》，这块汉碑就是庄缙度所发现的了。可是黄易秋景庵所藏的碑帖名气很大，而庄缙度裴斋石室的收藏知道的人却很少。如今先谈一下庄缙度的为人，随后再谈我见到黄氏秋景庵所收藏的拓本。

一九七二年春我从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偶游厂肆，遇到庄缙度手自粘贴的汉魏碑刻拓本，计为

秦琅邪台石刻

秦汉遗石莱子侯，石廧村，两城山，朱君长等题字

汉嵩山三阙碑

旧拓孔褒碑

汉食堂碑三种

汉鲁王墓二石人刻字滕县颜氏白华山房初拓未剜本

嘉祥刘村洪福院汉画题字，朱鲔石室画像题字陈泉与庄缙度访得的手拓本

裴斋《千金一帚》十册残存四册，内为山东所发现之魏齐造像，云峰大基山摩崖石刻等品。

凡计十一册。那时我还不知道庄缙度的事迹，但看见这些碑刻多为道光以前拓本，庄氏考订的极为精详，书法写的也很详稳，每种多钤有“小松所得金石”白文方印，和“小蓬莱阁”朱文印，因之知道庄氏收藏的一定很多，这不过是残存的几种而已。后来读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卷上说：

庄缙度字眉叔，号裴斋，江苏阳湖人，诸生。官山东运河同知；藏碑帖甚富，黄小松、李东桥所藏汉碑旧拓本，皆归之。著有《裴斋碑目》。

李葆恂《三邕翠墨簃题跋》说：

小蓬莱阁印，黄小松司马自刻，屡见于碑版书画者，道光中眉叔得之任城常栥家，必黄小松官运河同知时所偶遗者。眉叔收藏汉魏碑甚富，遇铭心绝品，即以此印加之。铁塔寺复初上人年八十余矣，尝与眉叔善，向予道之如此。

又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书籍类说：

常州庄缙度《眉叔诗集》，在慧成东桥处，欲刊行而未果。洪孟慈饴孙《青埵山人诗集》，在麟庆见亭处，亦欲刊行而未果。后孟慈孙用懃得手稿，重写清本，曾孙熙重刊之，

谢枚如章铤序。耕渔重刊《北江全集》，又子龄遗集、幼怀遗文，荃刊入丛书，亦耕渔所藏手稿。洪氏父子数人著作均未全佚，胜于庄眉叔多矣。

后来又见到金武祥著《粟香五笔》卷二，才知道庄缙度不但是金石学家，而且是善于韵语的诗词家，为清嘉道间"毘陵后七子"之一。他说：

眉叔名缙度，道光十六年进士(褚德彝说是诸生，靠不住的)，由户部主事，出为河工同知，浮沉薄宦，未竟其用，余得其《伽林集诗》十七卷，观其自序，为二十五岁以前所作，凡三千余首，删存四百三十二首，可以知其陶炼之深，盖得金荃之韵、玉溪之艳者。《懊侬曲》云：

"郎情似明月，昨日团圞今已缺；妾心比明镜，昨日红颜今白鬓。月果似郎情，缺时犹望圆时明；镜果比妾心，白发安得红颜生？月不有缺时，谁知月圆好；发不有白时？谁惜红颜老！"断句七言云："㩦声似雁呼残梦，帆影如潮饱夕阳"，皆有韵致。

他又说：

眉叔尤工长短句，有《黄雁山人词稿》四卷。顾蒹塘赞曰："洞箫飘扬，碧笙幽咽，莺脰秋波，蛾眉古月，芳草入性，奇花初胎，玉人无际，灵光徘徊"。可以想见其词境。如《生查子》云："玉骨赋梅花，诗稿无人见，喜伺阿娘眠，夜洗琉璃砚。密意倩谁传？十幅焚黄绢，心里葬春多，和酒同灰咽"。是能以乐府作词者，古隽处一扫艳冶之气。

粟香老人对于眉叔的诗词可谓推崇备至，要不是把这些事迹钩稽出来，就没法知道庄缙度是一位通才了。像这样的才人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真可为之增叹。

庄缙度之所以能得到黄小松收藏的印章，我看还是由黄小松的至友李东桥家中得来的，因为小松的女儿润芳与李家的儿子结了婚，黄易故去之后不久李氏中落，润芳手中所存小松的遗物散失，就由常买家之手卖给庄缙度了。缙度收藏碑帖也和小松一样，不是寻访旧藏善本就是发现了古碑石刻亲手椎拓。例如济宁城内铁塔寺的准提阁上有北齐武平六年薛匡生造佛像一躯，佛座下有题字，亦经残缺了。在道光己酉(二十九年)二月，缙度偕同他的好友陈漫士梦江登上准提阁把佛像捧到僧房，时间已经是夜晚了，“燃烛观之，梦翁亲自椎拓数纸”。缙度分到了一纸，粘贴到他收辑的《千金一帚》之中，并把拓此造像记的缘由，写在拓本的后面，也和他作的诗词一样，做的是很有风趣的。

这几本残存粘贴的碑帖，想不到在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又归到许霖厚手里，册中有许氏题记说：

> 此为常州庄裴斋旧藏。庄公官山左济宁司马，收藏极富，身后萧条。先祖时官兖州，购存所藏数百种，皆系旧拓。此亦道光年间所拓之本，近年不易求矣。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上巳日，计道光庚戌粘贴之岁已四十八年矣。

按许氏得此碑帖的时候为光绪丁酉，到一九七二年我获到此册时，相距七十五年，若是上溯到道光庚戌庄氏搜辑粘贴此册之时，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四年了。由于我得到庄氏的藏碑，他收藏的方式与黄小松相同，粘贴装订成册的格式也和小蓬莱阁形象一样，因之我就想访求收集些小蓬莱阁的藏碑和他访碑的图画。

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黄易的事迹，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概括

地叙说："黄易字小松，号秋庵，仁和人(举人)，官济宁同知，工诗文，所画黑梅饶有逸致，兼工分隶篆刻。讨论金石极有根据。有《小蓬莱阁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乾、嘉间刊本。卒年五十有九。"因为记述的比较详赅，所以把他钞在这里。小松的藏碑，是访求人间难得的旧本，和游历山东河南名山古寺里访求遗迹，亲手为之椎拓，并把当时在泰岱、嵩洛访碑的情况，亲手画为图记，最近文物出版社编有《黄易访碑图册》计为嵩洛访碑图册》、《岱麓访碑图册》、《丁巳随录手稿》(记游泰安济南访碑经过)，珂罗版精印本。为了访求古代文物，亲自勘察，画为图像，这样辛勤的劳动，对于考古学的认真负责研究，是值得钦佩的。他所发现的宋拓《汉熹平石经残石拓本》和唐拓《武梁祠石室画像拓本》现在都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自应归国家保护，不应该归私人所有；同时有影印本可以供读者来研究。我想到如果能得到一些零圭断羽，能够看见秋庵收藏遗留下来的片影，作为参考之资，也是好的。

事有凑巧，踏破芒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友何楚侯先生让给我黄小松亲手拓的济宁《汉郑季宣碑》，是济宁五种之一。这块碑半截埋在土中，碑阳面墙，碑阴向外，碑已剥落过甚，字迹模糊，存不了几个字。自从乾隆中期，黄易发现了这块碑，从土中掘出来以后，洗刷精拓，碑阳碑阴两面多出来八十多字，而且碑阳"鸲沙"等字的笔画秀润，椎拓出了字神，小松曾画了《秋庵得碑图》以纪念这件事情。这本图，系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不在文物出版社编《黄易访碑图册》三种之内。还有吴重憙旧藏被火烧救出来的烬余，"雍"字初泐本的《魏刁遵墓志》，黄氏的手跋说：

昔桐城方恪敏公(观承)得此碑于南皮，极为欣赏，与汪韩门先生考辨精博，当日不知有碑阴。尝记汪跋云："刁遵之

子弟称某等，不知官已四品。”今乃知备书于碑阴也。客岁见罗两峰有拓本，知碑石久在乐陵，乃托友人王敬斋从乐陵求得此纸，惜方汪诸公不及见也。

此本虽然损坏，仍然保留字迹不少。后来帖友张彦生君又为我找到了黄小松精拓有他的手题“《汉郎中郑君(固)碑》乾隆庚戌(五十五年，西历一七九〇)秋庵拓本”、“《汉开母庙石阙铭》乾隆甲寅三月(五十九年，西历一七九四)精拓全本”。《开母庙》首页多出“川郡阳”等字。《郑固碑》典籍之“籍”字尚存其半，拓的字口清晰，字字有神。这两本都有“汪喜荀印”白文印，“孟慈父”朱文印，同为文学家汪中之子孟慈藏本，不知何时分散出来？这就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获得有木公松识语的宋版唐许浑《丁卯集》，又得有同样识语的宋本《鱼玄机诗集》，好像“延津之剑”不知多少年后又失而复合，我得到汪喜荀所藏黄拓的碑帖，情况也是如此。我还有黄小松济宁普照寺大殿西阶下石砌上汉车马人画像残石拓本，此拓见于《小蓬莱阁金石目》。他嗜好拓碑的风趣，也和庄裴斋一样，都可以作为古人爱好祖国文物的佳话。

在我国的收藏家和鉴别家，审定书籍辨别宋元版本方面的首推吴门黄丕烈；网罗散佚考定金石方面当推武林黄易。“黄校鲍(廷博)钞”虽然负有盛名，可是黄荛圃藏书多以目验为凭；而黄小松则是亲身去就地勘察，亲自动手椎拓，还把亲身的经历亲自动笔制成访碑、得碑的图画，这种认真负责，具有科学研究的精神，启发了后来考古学的风气，似乎是要超出荛圃以上，是难能而可贵的。我欣喜的是从黄小松到庄裴斋六七十年来继续收藏的拓本；辑存的虽然是种类数目不多，就好比“五鼎之食，仅尝一脔”，也可以供学人的参考，而足以自怡的，因之兴之所致作了绝句两首，写在后面，作为这篇文字的结尾。

小蓬莱阁著声闻，裴斋踪迹继前勋；
贤哉任城两司马，苔痕时见老龙鳞。
前尘梦影渐消沉，坐守青毡我似君；
琅玕翠竹周千亩，和烟滴露长风云。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重改定于北京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〇年十月）

“有神无迹”话玉溪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和思想

李商隐字义山，别号玉溪生，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河南怀州河内人（今河南河内县）。他出身于没落的旧贵族家庭（他的诗有“我系旧王孙”之句）之中，从小就很有才名。可是他生于唐代的晚期，外患频仍，内部党派分歧，互相专权当政。朝政又有时操纵于宦官之手，当时的皇帝如文宗、敬宗、宣宗等，不是酷好神仙，炼丹服药，祈求长生；就是骄奢淫逸，驰情声色，都是些短命的皇帝。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期间，不是牛党（牛僧儒）上台了，就是李党（李德裕）下台了，中间又穿插了宦官仇士良、鱼弘恩擅权玩弄皇帝于掌股之上，性命操纵于宦官之手，人民涂炭，苦不堪言，人情汹汹，即将敲起农民起义的警钟。至于处于中间的文人学士（知识分子）如同燕巢幕上，无论事秦事楚，都是朝不保夕，游移不定，李商隐就是处于这个时代。

商隐以入洛之年和二陆的才华，就为牛党令狐楚所赏识，商隐本来是学习古文的（散文），令狐楚就教给他书写章奏学作骈体

文的诀窍，可以作为登上高官的进身之阶，所以他就有“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宝刀”的诗句。不久令狐楚失败了，商隐飘泊无依，就依靠了李党河阳节度使后来做到平章事的王茂元。茂元虽然没有令狐楚的才学，可是他已经身到宰相的地位，气象豪华，又有几个女儿，都有姿色，长女嫁给韩畏之，生儿名叫冬郎，就是韩偓，商隐是他的姨父，后来同为开晚唐西昆诗派的创始者。当韩畏之结婚之时，商隐在王氏幕府之中，初登进士第尚未结婚，所以他戏赠韩畏之同年的诗说：“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的诗句。后来虽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却“心有灵犀一点通”，终于与王家女儿结了婚，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衮师，他曾写有《骄儿诗》，与晋代左思所写的《娇女诗》刻画儿童天真烂漫、娇痴顽皮的情况，活跃纸上，同为千古的杰作。可是好景不长，茂元不久故去，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登上了政治舞台，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专典帝室的制诰，盛极一时，炙手可热，他怀恨商隐，说他忘记了他父亲的提拔，就是“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从此以后，“郎君官贵施行马（行马是官宦人家，门前禁人出入的门槛），东阁无由再得窥”了。商隐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作了多少感恩怀念的诗，也没法挽救过来。于是商隐走上了浪迹江湖游幕的生活，因之跟着给事中郑亚到过广西桂林，又为京兆尹卢洪正所推荐到过徐州，最后依从柳仲郢游幕于四川梓中，做些掌书记、管度判官等项的职务。尤其是他到四川之后，就遭到丧偶之凄，骄儿衮师流落长安，寄人篱下，无人照管，更触动了他的悲思。又兼着镇东节度使柳仲郢因罪罢官，商隐没有了依靠，只得回到郑州，举目无亲，不久就死去了，年仅四十六岁，真是一生潦倒，坎壈终身。当时的诗人陆龟蒙说他，抉摘刻削，暴露了天物（就是揭露了社会上的秘密），必然要受到天的责罚。所以，“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这就是说，杰出的诗人李商隐等揭露了唐代封建王朝

的黑暗和罪恶，因之遭到统治者的摈斥，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到了清代为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御用学者纪昀，曾评注李义山的诗，虽然有推崇他的一面；但主要的是为统治者所辩护，说他是轻薄文人，把他作的诗，有时批驳的体无完肤，这就不足为奇了。

底下我想用现在新的观点，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第一，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如同浮萍断梗，必须依靠有权势的人，才能够出头露面、平步青云。所以在唐宋以来，最注重"座主"、"门生"，有了这种关系，文人寒士才有进身之阶。我们还是以李商隐而论，商隐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温庭筠，当时号称"温李"。商隐最佩服三国时代的陈琳，他的诗有"固惭非贾谊，惟恐后陈琳"的句子。庭筠有《过陈琳墓》的诗说："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因为陈琳飘泊无主，遇到了曹操，深识他的才学，终身作了曹操的幕客，所以说："霸才有主"，温李等人坎坷终身，因之就是霸才无主了。商隐和庭筠都有这种感慨。商隐的诗上说："画楼多有主，鸾凤各双双。"陈琳之外，他佩服的是宋玉，他的《席上作》说："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宋玉而后，他也同情于庾信。他吊宋玉诗中说："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而对本人的"霸才无主"又何等慷慨系之。

第二，是自魏晋以来，最重门第，在唐代崔、卢、王、谢都是高门，因之通婚，也必须门当户对。因为宗法和门第的关系，一个寒士攀附上了高门，就得一生供他们驱使，叫做"恩门"。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说："杜晦为赵公稳从事，后北门李相国在淮海，辟为判官，晦以'恩门'休戚，辞不受职。"那时不但做官入幕，就是个人的婚姻也不得自由，妄攀他家。商隐正中了统治者这种忌讳。所以令狐绹可以说他是"背恩无行"，"忘家恩，放利

偷合”，因之商隐既不能为令狐家所齿，也就是为风化所关，不能为封建社会的大官僚们所重用了。

第三，在封建社会做官有做官的诀窍，替统治阶级为皇帝写御用的制诰和来往文书也有诀窍。平生学的学业是另一回事情。惟有学会了维护统治阶级应用的制诰奏议，才是寒士作为进身之阶的敲门砖。商隐对于制诰的文字是由令狐楚亲授的，而他作的，再巧妙不过了；但是作者虽然是习古文而是开创今体诗歌的，不满意于这些事情，而且生厌恶之心。他作的“漫成五章”上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又说：“军书虽倚马，又未当能文。”同时作为一个旧式的文人，他的本愿是要本其所学，做一个校书郎；或者能够置身翰林院，做一个清贵的人物，而不愿做典狱的判官和为人作嫁的幕客，这就与本愿大相径庭。又加上对于封建社会上的恶习，怀着种种不满的情绪，要发抒其情思，这只有用扑朔迷离的词句，读之就令人如入五里雾中了。

总之作者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从绮罗丛中生长大的，而且是总角时就有才华，为大人先生们所称赏，以英年时代，就能够亲窥钤阁，得接玉筵，出入于闺闼之中，豪华富丽的情况都是阅历过来的，所以他的无题诗说：“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因之他看出了当时富豪之家腐朽的生活和贪婪无厌的情况；当他一旦失意后，就于迷恋而转为愤恨，想把它委曲婉转的暴露出来。他本来是过来人，所以描写的更为亲切和淋漓尽致，所谓：“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这与清代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他酒阑梦醒，穷途失意之时，又借佛教禅宗来陶醉自己，情愿做知玄和尚的弟子，这和封建社会的地主文人找不到出路，只有逃禅，是千古同出一辙的。

但是作者少年时代的意旨，并不是这样，他英勇有为，有进步的思想。在他《骄儿》诗中，有“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

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的诗句，来教育他的儿子。他对于歌梁甫吟的诸葛亮颇有同情，他歌诵诸葛亮《筹笔驿》的诗，“猿鸟有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说明了他对诸葛武侯行军时纪律森严的钦佩。他对于孔夫子并不那样满意，他说：“宁同鲁司寇，惟铸一颜回。”因为在晋唐以前的文人，对于孔丘，并不是那样的尊敬，到了宋代，统治者统治的更形严酷，才把孔子定于一尊的，儒家的地位提的更高了。

他目睹时艰，有澄清政治的怀抱，尤其感觉到旧礼教和旧秩序的束缚人心和男女的不平等。他作诗的企图，显然有他的意志，无非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和“讽方士之不经，警色荒之祸国。”他尊重女性，看的最强。他对于唐明皇与杨贵妃《长恨歌》的故事，与白居易的看法根本不同，他写的“马嵬二首”，大意是说：海外的九州中，哪会有仙山楼阁，根本没有的事情。谈到诗中的“虎旅传宵柝”，写夜间行军的情况，如同身历其境。至于说到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七夕的密誓，根本是欺骗女子的谎话；及至祸到临头，连一个弱女子的性命都保不住，做了四十年天子的唐明皇，还不及民间卢家能保住莫愁了！因之，他愤恨地说道：“妇女若果能倾国，皇帝的玉辇，怎样能够通过马嵬达到成都呢？”这是当时文弱书生所不敢言，而作者谈的何等痛快；可是不经笺注家的诠释，那就几乎不可解了。原诗是已经家弦户诵，故不赘录了。

这是说他的进步思想，我们再结合他诗的体裁来说，他的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就是说组织严密，很难理解。但他起初作诗的本意，并不这样，而是秀润天成，风格皎洁，有其优美独到的特点。他的诗是初学老杜（杜甫），有时也学李长吉体。他是综合各家之所长而有独创的风格。他效老杜诗，如：“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独树三更月，空庭一树花”，和“渠浊村春急，旗高社酒香”等句，写的何等漂亮，表现出他独立不依的思

想。又如学长吉体诗："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九重关，轻身何官望，粉蛾帖死屏风上。"写的又何等幽怨。及至到了中年以后，哀乐中人，到处碰壁，又牵连到党派斗争的关系，不知如何栖枝，他真是独立苍茫，迷失了方向，正如他诗中所说到的："南浦无穷树，西楼不住烟。"又说他好比是"惊禽"到了日暮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投林，正是："飞来曲渚烟方合，过去南塘树更深。"可是他不是惊慌失措，醉生梦死；不是因为环境的恶劣，就颓唐潦倒贬损其意旨。而是"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他是敢于提起笔写出诗篇来表达其隐衷而作为哀歌。他就即景生情，因事名篇，"晓用云添句，寒将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岂徒然。"就是说："楚雨含情俱有托。"又说："夫君自有意，聊借此中传。"于是他不得不迷离其词，以香草美人粉饰其词句，拿西楼烟树寄托其情思，"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使读者好像猜谜一样，难以窥见其真旨。

同时他作的诗，在其格调上和遣词琢句上虽然用尽了苦心，如同獭祭饾饤摭拾典故，可是融会了古人的词旨；而是出语自然，天衣无缝，看不见一点钞撮的痕迹。他作诗技术的巧妙，如吊宋玉诗："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上句全用仄声字，读起来如同绕口令。他深明诗格规律，而能够打破规律，不为声韵所束缚。还有他一时拿作诗来当游戏，如"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怀)流"，这是一句谐音的隐语，就是说：眼泪长短流到怀里去了。这种谐音的诗，如刘禹锡，"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语意双关，妙语惊人，他作诗的功夫已达纯熟的境界。他承继了古风，开创了今体，新的体裁，尤其是七绝，到了义山，才是运用自如，成为感时咏物，发抒人的幽情意志，是不可少的一种作品。本来是温李并称，李的今体律诗七绝，和温的由诗而演变为词，开后人的风气，为晚唐诗坛上的大家。

由于义山的诗才华突出，词旨奥邃，耐人寻味，就引起后来读者的爱好。自宋元以来刻本传钞，非常繁富，而笺注义山诗的人又日见其多，到了明代就有释道林的笺注本，惜未得流传。清初朱鹤龄笺注义山的诗，专考究义山的时代背景，和探索义山作诗的旨趣，然仅是发轫之始，不过有斩除草莱之功。继承他的有程梦星、姚培谦、徐逢源诸家，都各有所长。及至清乾隆间桐乡冯浩所著的《玉溪生诗笺注》三卷专研义山时代的历史，和义山与当时社会上接触的情况，记述的非常详实，的确是研究义山诗的一部好书。可是他注的事实过多，每首诗都要找出他的时代背景，和不忘忠愤的思想，难道说深于感情的诗人就没有风烟月露私人的生活了吗？这就有一点刻舟求剑了。清末民初杭州张采田曾著《玉溪生年谱会笺》和《李义山诗辨正》，有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他著的年谱征引赅博，考订义山的事迹也颇精确。但是著的《辨正》专批清代纪昀评义山诗的错处，于义山诗的本旨，并无所发明，也不过拾冯浩的意旨而已。

我这里要提到的就是屈复著《玉溪生诗意》八卷。屈复字见心，陕西蒲州人，年十九试童子试，考取庠生第一，忽弃去，能文学，诗名噪甚，一时学者多从之游。清乾隆初举博士鸿词科不就。除《玉溪生诗意》外，他还有《楚辞新证》、《弱水集》等著。《诗意》有清乾隆间艺古堂精刻本。他笺注李商隐诗的意旨，是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企图得到诗人作诗的本意，发扬作者的苦心孤诣，以便于读者的诵读。这部书不是像冯浩笺注本的编年，而是以诗体分类，他是在笺注李义山诗当中独树一帜，存有别尚，所以冯浩笺注义山诗的凡例中都没有提到他，可是颇风行一时，乾隆原刻本之外，还有道光时的翻刻本。他以为笺注李义山诗，虽然应当注明其身世，以说明诗的主题和其寄托之所在；但须了解其诗的意旨，“以意逆志”，通其所可知，而阙所不知，绝不要牵强附会，是为得之。又历来学义山诗的人，寻章摘

句，捡拾芳草，弄得义山的诗破碎不堪。至笺注义山诗的人，主要是堆积资料，穿凿附会，失去了义山诗的本来面目。就如贵人用千金买来斗牛图一样，悬挂在客厅中，宾客无不称赞；可是遇见了一个深知牛性的牧童，他说："虎斗是竖着尾巴，牛斗是垂着尾巴，这张斗牛图，牛却是竖着尾巴"，就不禁为识者所笑了。今之繁琐考证义山诗的人们，皆是不知牛性画斗牛图之类。

复翁笺注义山的诗，不是不主张注解，还是考察他当时设身处地的情况，原情合理阐述出来，是以意逆志为主，而删节不必要的注解。把每首诗分为几段，逐句逐层说明作者的意旨，明白晓畅，是读义山诗所必要的，而且是入门的书。他笺注义山诗的特点，是因为义山的诗寄托深远，理解事物，见解比较深刻；尤其是伤离怨别，感受独多，而词旨幽渺，有人见解不到的地方；那末必须以意逆志，从其本质上看问题，就可以揣摩出他涉身处世比较合情合理的真实现象。譬如说良辰美景，花好月圆的时候是好的；而他偏说："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月圆呢，则："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复翁的注解说："月缺而人愁，月圆而人未必不愁也。"伤离怨别也有感受的不同，"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阳是别离。"流泪也有深浅的区别，"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这就是说，穷愁潦倒落第的举子，到长安灞桥上送出京的达官贵人，又何等悲哀呀！良辰美景是好的，可是"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他看见回中（地名）牡丹为雨所败，他就写诗说："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这是说正在开花的时候，被不幸的大雨所摧折，有何等悲哀呀！这就如新生的事物，遽被砍掉，好比春天初生的竹笋，正在仰望它长成凌云撑天的竹林当中，却被京都食客大量的用作充膳，他就慷慨地说："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一年一度的七夕，雀桥相会，人会感到离多会少；可是比生离死别要好一些，他就说："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总之他见

落花而流泪，闻“惊禽”而伤心，可以说是有许多不健全的情绪，流入于俳偶恻艳一流。但是要看到他所处的身世，不是颓唐丧志，无病呻吟；而是他怀着满腹的悲愤和激昂的意志，为被压迫者说几句话，要与恶势力作斗争；与一般吟风弄月的无聊文人根本不同。他怀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励精图治的进步思想。在他《漫成五章》中的诗句说：“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这就是说，不要学王右军作袒腹东床的佳婿，而想效法鼎足三分的孙权。这也暗寓了他为王茂元的佳婿，初非其本意，而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倔强的志愿。义山的诗是“有神无迹”，任人领会，有许多是似可解而不可解的地方，不是神秘，而是其佳处，要是指定某诗某句指定某项事物，那就会穿凿附会了。所以复翁主张“以意逆志”，这样就可以领会诗人的神髓，要比刻舟求剑强的多了。但是复翁的注也有他的短处，他把每首诗强分作几解，逐句的诠释，有时强不知以为知，流入明末金圣叹的圈套。这仅是小疵，不足以当大累。

以上都是我对于读李商隐诗的初步的认识。我所以有这样的一知半解，就是由于读屈复《玉溪生诗意》和冯浩的《笺注》以及同学刘盼遂先生的启发。我认为读义山诗，《锦瑟》、《碧城》、《无题》等词藻华丽的篇章，倒不如读义山的五七言古诗，如《安平公诗》、《行次西郊》、《井泥》、《骄儿诗》、《听雨梦后作》等篇，可以看见他的志愿和当时社会上忧患交迫、兵荒马乱的情况。他叙述胸怀和自然的景物，也非常亲切。还有他的今体诗七律、七绝，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马嵬》、《流莺》、《宋玉》、《宿晋昌亭闻惊禽》等篇描绘了怨离伤别，愤世嫉俗与恶势力作斗争的心情，表达了他深刻尖锐的思想。盼遂先生曾讲授于北京师范大学，并逐篇解释，披露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夏末秋初的早晨，盼遂同我从陶然亭闲步走到北京城的西南角上。那天是天朗气清，远望着一缕的西山；近看护城河从西山流来的潺潺流水，一清见底。我们就站在石桥上，看见旁边池塘中的荷叶已渐就凋零。盼遂就给我吟义山《暮秋游曲江》七言绝句说：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这首诗，复翁笺注说："古之伤心，与之同意。"我独认为鲁迅先生有这样的话，大意是："人是要死的，而地球是不会死的。"义山不是悲观绝望，而是有挽狂澜，愤世嫉俗，始终不屈的奋斗精神。我的老学长刘盼遂先生学问渊博，考据精核，我的学识，远不及他，凡有疑问请教，有问必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期间，被林、陈、"四人帮"一伙所逼害，遭到惨死。自"四人帮"粉碎之后，在党和政府英明领导之下，盼遂先生的冤屈得以昭雪了。他的一生所藏的善本书籍，得以保存于北京图书馆，他的终身著述，由北京师范大学为之整理陆续出版。我就把这一篇旧文字，来纪念我的好同学刘盼遂先生。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写于上海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重改定于北京

（原载《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一辑）

爱国诗人柳亚子与南明史乘

南社创办于一九一〇年，是爱国诗人柳亚子和陈去病诸君在江苏吴江县所组织成立的，他的宗旨是号召志同道合的人士，以文会友，举行诗社的形式，诗歌唱和，成为提倡文艺的团体，并办有刊物，借以宣传旧民主主义革命，对于推翻满洲贵族所建立满清王朝腐朽的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在太湖三角洲的吴江，自明代以来就是人文会萃之地。在明末，遗民叶继武、吴宗潜等人创办过“警隐诗社”，来图谋抗清，恢复明朝的政权，社中同志以吴日生(昜)、孙兆奎为首领导群众发起了抗清运动，给清兵南侵以沉重的打击；事虽不成，然爱国主义的精神，名垂史册，为后来抗清运动作了榜样。柳亚子、陈去病诸位先生所创办的南社，可以说是继警隐诗社而兴起的，终于形成了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吴江是江南的水乡，风景优美的地方，在吴江的城外大运河上建立了一座垂虹桥，远看着茫茫的太湖秋波，古木垂柳，夕阳晚照，宛然像一条垂虹，诗情画意，真足以叫人留恋。当清初诗人吴汉槎(兆骞)和他的好友词人顾贞观，曾在垂虹桥的亭子上，

诗酒论文，每当酒酣耳热之时，吴汉槎和顾贞观衡量当时的人才，大有“江东无我，卿当独步”之概。我是久闻盛名，每次访书江南，乘船经过吴江，都未能登岸，只有临流远眺，可望而不可及。听说垂虹桥早已倾圮，修复无日，只可以形诸梦想了。因之我想到我在幼年时候，爱读明末清初的历史，搜辑明末清初的野史资料，后来编著《晚明史籍考》，曾引用过《国粹学报》所登载陈去病所著的《五石脂》，其中记载明末遗民陈洪绶、屈大均的事迹和明末的社会风俗，对我很有启发。不久我到南京去教书，同事的前辈先生们如汪旭初（东）胡小石（光辉）诸君，颇多是陈去病的朋友，可惜我未能询问陈去病的逸事，真是交臂失之。到了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才认识柳亚子先生，曾谒见先生于上海的寓庐。亚子先生貌不逾中人，说话微带口吃，所以自号为亚子，为人极为热情，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很喜欢提拔后进，我由亚子先生的介绍，又认识了钱阿英同志。再读了鲁迅先生的书，指导我治学问的方向，启示我后半生的治学的基础是很有关系的。

柳亚子先生是爱国诗人，颇具有前进的思想。他认为我国的诗词一道，陈陈相因，已到了穷途末路，非革新不可，可是在改革的道路上，白话诗尚未能纯熟、登峰造极的时候，但他对于旧诗，如饮茶吸烟一样，已经成瘾，不能割爱。写旧诗必须明了音韵，四声和平仄，才能合乎格调。他作的旧诗，声调铿锵，风趣盎然，别具一格，叫人读起来，有深入浅出的感想。他还有“历史癖”，尤其是喜欢研究南明的历史，还是着眼于民族革命，恢复故国河山，爱国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的时期，一般有识之士，都喜欢传播宋季、南明不畏强敌，抗命志士的著作，以唤醒国人，已成了一种风气。当时章炳麟领导他的学生黄侃、鲁迅诸位先生，在日本东京一边教授古典文献、声音训诂之学；一边鼓吹革命，刊印了久已散佚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张煌言《张苍水

集》，同时云南李根源先生在东京编刊了《滇粹》等书，对于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柳亚子先生对此也有爱好，为了革命，他就最喜爱读明末遗民的著作，尤其是在清朝禁网之下，经有心人士复壁深藏的南明野史。他对于读史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掌握先进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明了当前的形势，然后搜辑大量足够的史料，作出论文和专作来，理论才有依据，事实才不致于落空。他还自认为缺乏理论水平的修养，只有先从搜辑资料着手，才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后备军。在他所著的《怀旧集》中，载有他写的还忆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及《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等篇。抗战期间，他避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由海道乘轮船回到桂林。他藏在九龙的书籍全部沦为劫灰，他并不因此而后悔。经过钱阿英同志的馈赠，和四九年解放以后，来到北京仍然搜辑这类的南明野史和他随手所写的读书札记，全部捐赠与北京图书馆。他为研究南明史，曾著有《南明史纲》和《南明后妃宗藩传》两书，可惜仅有长编草稿，都未能成书。他著书的目的，是为着排满运动，民族的革命，他特别要宣传和保存南明三朝在江南云贵建立小朝廷的统续。如弘光谥为安宗简皇帝、隆武谥为昭宗襄皇帝、永历谥为昭宗匡皇帝。又如他著《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津津乐道吴日生在太湖长白荡的大败清军，而未有道及当时在太湖一带的农民、渔户群众作为抗清的主要力量，渔民赤脚张三所领导的白头军，这是有其局限性的。

但是也有他的特点，还是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们尚未注意到的。第一是他在桂林时协助阿英同志所编的南明史剧，共有四种，一为《碧血花》，二为《海国英雄》，三为《杨娥传》，四为《悬嶴神猿》好像没有写完。可是《海国英雄》描绘《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英雄事迹，到现在还应当把它搬上舞台，以作"大陆台湾共一家"的纪念。把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事迹编成剧本，使古人的形

象，和社会生活的发展，重表现于今日，使人民大众可以看到祖国文化的光辉，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是历史的传记文学，柳亚子先生是长于文学的，他写的语体文字，绘影形声，文笔活泼流利，极为动人，如他写的《明季吴江民族英雄传》和《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好像身临其地，看见了明末民族抗清斗争的伟迹。在世界上欧美各国的史学家本来有用漂亮的文章写成传记，写出了英雄人物才士名媛可歌可泣的事迹，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叫人读起来越读越爱读。同时他们所写的本事，确有依据，不像"四人帮"那样的以历史作为儿戏，也不像专作为理论阐述的史学家，读起来干干巴巴的，贴标签的新式八股文章，当然篇章也有发挥理论，时代性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可是这样有兴趣的历史传记的文章，也应当表扬，发挥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的意识，不致于数典而忘祖，柳亚子先生这种优美的传记文学是值得推荐的。

我自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和亚子先生分手之后，四九年春北京解放，毛主席迎接亚子先生到北京来居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不久我也回到北京来，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又在北京得以重相会晤，旧雨相逢，其喜可知。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火纷飞，敌人铁蹄围剿蹂躏的残酷，损坏了公私家藏的书籍和文物。钱阿英同志在淮海战役时期，于苏北沿海一带，搜辑了一批残破而有用的书籍和文物。常任侠同志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口，于打鼓收买破烂的担上买到一部清华夏生编《白雪遗言》的道光间刻本，是罕见通俗文学鼓儿词的珍本。亚子先生酷爱图书字画，对此是颇感兴趣的。眼看着北京市上书籍用斤称卖，把碑帖黑墨拓本不能作废纸应用的，就拿它卷裹作成爆仗，亚子先生感觉到这样下去，祖国的文化就要大受损坏了。在这年秋天，由亚子先生的号召，召集了抢救图书的大会。到会者约有千人，在当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不久文化部在北京团城成立了文物管理

局，郑振铎同志担任了文物局长。柳亚子先生对于保护祖国文物起了推动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我与亚子先生在北京重逢，后来我去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每逢节假期间，常来北京与先生会面。他同我谈起明末清初甲乙之际的掌故仍是滔滔不休。大约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我到颐和园的乐寿堂去访他，书案上置有毛泽东同志派人送来的诗作，说是要他嘱和。饭后我们乘船同游昆明湖，大有“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之感。

亚子先生对于研究南明史是极感兴趣的，他认为我写的《晚明史籍考》所记录的晚明史乘上起于万历，下迄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形成了清朝政府统一的局面，虽然不是全记南明王朝和鲁监国的史事，可是介绍研究南明的史料，“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谬承奖励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我感觉到以我这样粗制滥造的书籍，错误的地方非常的多。如顾炎武《亭林诗集》中习咏“东武四先历”的诗句，本来是“唐隆武四年历”的隐语，我误认为忠孝伯郑成功奉淮王常清监国于南澳的年号，则就大错而特错了，其他错误的地方还不在少处，真是见讥于通人，贻笑于方家。柳先生郑重地劝我加以增补和修改，我非常的感激。在五〇年寒假期间，我由天津南开回到北京，这时王重民先生还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他为我开辟了研究室，并组织了“明季史料讨论会”，承柳先生的厚意，出资为我寻觅写官，请福州郑女士为我当助手，从此修改拙著的事情就开动起来。当时柳亚子先生很轻松地赠我一首七言律，词句是：

君修谢客千秋业，我登元龙百尺楼；肯为帝王延统绪，要从夷夏辨阳秋。廿年青史功初竣，午夜丹铅瘁未休；郑女王郎都绝代，名山大业冠群流。

上下款题的是“刚主我兄教正，一九五一年二月亚子”，柳先生的书法挥洒自然，墨迹如新，我每一展览，如见故人。一九六二年春承郭影秋同志的盛意，在我旧游之地南京大学的小桃源中安排了我的住宿之处，又承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同志们给我提意见，遍阅南京图书馆的藏书，才初步写定了《增订晚明史籍考》，于一九五四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问世。

最近各方同志认为拙著对于近古史乘，还有点用处，叫我再加修订，又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好意，今年三版即将发行。遗憾的是，柳亚子先生早归道山，墓木已拱，不及见矣！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鲁迅与中国版画

——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已是鲁迅先生的百年诞辰了。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旗手，鲁迅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景慕和怀念的。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在先生诞辰之际，我要谈一下他作为中国版画的倡导者和中国现代版画奠基人的业绩，特别要通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画选》等书的出版，来谈谈他的文化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版画画坛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百花斗艳的局面。

《中国版画选》上下两册，搜辑我国古代木刻版画代表作品凡一百六十七幅，一九五八年北京荣宝斋木刻精镌本，书前有郑振铎序。我是素来喜欢搜集零篇断简的人，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休会期间于杭州古籍书店丛书堆中，偶然得到了这部木刻版画选。杭州的风景是诱人的，年会的住所是在岳坟后面山岭上一个招待所的楼上，可以目送飞鸿，远眺湖光山色；尤其是夜阑人静，一觉醒来，一钩明月照在

床头，大有“四更山吐月，残月水明楼”之感。在性情怡悦之中，这部印数极少、在十年动乱中幸存下来的《中国版画选》(也包括新搜集到的清光绪元年刊印的《胡庆余堂雪记卖药目录》等“不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对研究我国近代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颇有一点用处的小玩艺儿书)的购得，更给我增添了无比的喜悦!

我国版画雕刻精美，流传有自，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始于唐朝五代，盛于宋元，到了明代，尤其是明末万历、崇祯年间，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经济繁荣，为供应大城市市民和工商业者的阅读需要，出现了通俗读物、传奇、小说、戏曲、历史、地理、交通路程等书籍，多镌刻穿插了优美的图画，刊刻版画蔚然成风，我国木刻版画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盛时期。

到了现代，爱好古代木刻版画者不乏其人，而把明清以来的优秀版画提到祖国文化日程上来的，则是始于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早在民国初年，河北通县王孝慈、浙江宁波马隅卿诸君就爱好明清时代的孤本小说和明末清初绣像小说中所镌刻的精美图画，继之福建长乐郑振铎和浙江海宁赵万里也都喜爱罕见的词曲小说和版画艺术。在三十年代初，郑振铎、赵万里和马隅卿到宁波访书，同登海内有名的天一阁，又访书于寄蜗廔薛氏，访得天一阁的旧藏、元钟嗣成著、记载元代戏曲史的《录鬼簿》孤本，他们三人亲手分抄，一个晚上就把原书抄录完毕，目前犹有影印本流传。不久，郑振铎到北京燕京大学担任教授，鲁迅先生住在上海，两人都爱好版画，互相书信往还磋商，决定在北京摹刻《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可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南纸店，像清秘阁、淳清阁之流，都是惯走衙门口的，哪瞧得起这般穷教书匠所做的生活，跑来跑去都不肯承担，只有荣宝斋承接并完成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镌刻出版任务。这正如鲁迅先生致郑振铎的信中说的：“清秘阁一向专走官

场，官派十足的，既不愿，去之可也，于《笺谱》并无碍。”（《鲁迅书信集》上卷）“去之可也，于《笺谱》并无碍”，这句话是说得多么富有哲理而发人深思啊，经过时代的变迁，那些清秘阁之流，早已风流云散了，而流传到今天的却是驰名中外的荣宝斋。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荣宝斋能够有今天，也是和鲁迅、郑振铎两位先生当年的信赖、支持分不开的。关于《笺谱》一事，郑振铎曾写有《访笺小记》一文，记述在京、沪等地访求精雕细刻具有美术价值信笺的逸事，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和《书信集》也记载了此事，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鲁迅和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并不是说中国版画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头。这部《中国版画选》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木刻版画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具有优良的传统的。这部分为上下两册，收有一百六十七幅的《中国版画选》，经荣宝斋的努力，遴选精品，按其年代和性质，分类排比，选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和各地雕刻名手的作品，如南京的富春堂、世德堂，福建建昌的慎独斋，徽州虬村黄氏以及项南洲、汪忠信等各家的作品，举出较好的例子作为榜样，真可称为名符其实的版画的历史。西谛先生在序中说：

> 一九三三年鲁迅和我编辑的《北平笺谱》，并不是中国版画的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荣宝斋这几年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这部相当浩瀚的版画集，也便是出于荣宝斋的工人们之手，有许多幅不仅逼肖原本，甚至超过了他们，它简要地集中了这一百六十七幅的古代版画的代表作品，一方面说明中国版画的长期的历程；另一方面便介绍了中国版画的优良传统，作为新的版画作者们的观摩之资。

西谛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不为过当。他是有其根据的。

我翻阅《鲁迅书信集》，鲁迅与西谛商讨雕刻《北平笺谱》的来往书信，以及其他的书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鲁迅一九三四年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 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京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

又说：

> 明版插图，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优介绍，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

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致郑振铎的信还说：

> ……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

这说明西谛支持荣宝斋选刻的《中国版画选》就是听从了鲁迅的劝告而进行的。这部画选虽然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也有易见之品，为了省事，也有重复之处，然是小疵不足当大累。同时我们从西谛的序文中还可以看出，西谛除了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外，还想写《中国版画史》一书。可惜的是，西谛写此序文不久，由于到苏联出席会议，回国途中飞机失事，就以身殉国了。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文化界不可弥补的一大损失。

从鲁迅先生所写杂文和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所以喜好明代的版画可能有下面三个原因：

第一，明代版画镌刻的工艺精，所用的印刷颜料质量优，足

资借鉴。鲁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致西谛的信上说：

> 《十竹斋笺谱》的山水，复制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原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但我辈之力，亦未能彻底师古，止得从俗。抑或者北平印笺，亦尚有仍用矿物颜料者乎。

鲁迅先生所说古代版画颜料的优点，确实如此。我收藏的清代刻本《西湖佳话》一书的"西湖十景图"，就是用彩色矿物性颜料套印的。还有清乾隆年间仿澄心堂的淡绿地泥金画大张笺纸，也是使用矿物性颜料，我把她压在我的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经过多年日光照晒，经久不变颜色，仍然光彩夺目，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第二，明代版画，所用彩画的底本和雕刻技术，到了明代晚期，达到高峰。如《颜氏画谱》，摹仿雕刻历代各家名画，维妙维肖，既有摹仿又有创造，师于古而不囿于古。再如，陈老莲、萧尺木所画人物形象和衣冠服饰，其摹仿李龙眠所画人物线条之美，真是把周秦钟鼎铭文及秦篆汉隶的古拙隽美的姿势隐藏行笔于画法之中。再如，当时徽州虬村黄氏及项南洲诸家雕刻手法的巧妙、精美，亦足以称之。而由绣像雕刻到印刷方法，明崇祯年间所精雕的版画，用水法点染，能够使画面色泽浸润、浓淡渗淳，其风景人物、山光峦影，给人以顿然豁亮悠然之感。这就是所谓水印法和着色套印、拱花饾版的技术。如金陵胡曰从"十竹斋"所镌刻的《十竹斋笺谱》、画册和书籍，在雕刻的技术上，便达到了这种境界，李克恭所写的《十竹斋笺谱》序文，就阐述过这件事情，他说：

夫绘之与诗，相为表里，论诗有初终盛晚，而笺绘亦由之。昭代(明)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天启)、崇(崇祯)而愈盛矣。十竹诸笺，汇古今之名绩，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毋乃太盛乎？

这篇在版画雕刻史上颇著名的序文，盛传于世，可供参考。

第三，明代版画作家的作风和艺术风格，有其特点。像明万历年间徐文长(渭)所谱的《四声猿传奇》，他那种愤世嫉俗的大无畏精神真是要打开地狱之门，起曹操、祢衡等人于地下而问之。稍后，到了明末清初，陈老莲所画的《水浒叶子》，表现了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英雄形象；萧尺木所画的《离骚图》，表现了屈大夫行吟泽畔，搔首问天，悲世嫉俗，抑郁不平的气象。鲁迅先生之所以喜欢明代版画，我认为其用意就在这里。我们要景慕先生一生与恶势力作斗争的崇高品德和“硬骨头”精神，但他又是个平凡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著名诗句，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的为人，就如他写的散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那样，平易近人，对于学生如同朋友一样，谆谆的教诲，热情的谈话。鲁迅先生既然是个平凡的人，有自己的爱好，他喜爱版画，当然有其欣赏的意思在内。如他在《木刻创作法》序文中所说：“……就如平时抄书写字太久了，谁也要息息眼，看看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岂不更好。”同时，我们看到他写的《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回忆往事，描写人物风景，那该是多么有感情。当然他也喜欢和朋友一块儿饮酒、吃饭、喝茶，彼此之间亲切的谈话。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景仰鲁迅而去研究鲁迅，只着眼于这一方面，只谈他的个人爱好和生活逸事，如在某一地方吃饭，在广和居或老半斋一些不关紧要的笑话和故事，那就似乎是有点失去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了。

鲁迅喜爱中国古代版画，也喜欢学习中国版画画法的外国近代版画，是为了开辟新路，发展中国现代版画。就在他和西谛编辑出版《北平笺谱》期间，他同一八艺社的青年木刻家在一起商讨木刻版画的创作，取法于欧洲麦绥莱勒四种木刻的连环画作品，又采取明清版画的体裁，写有《木刻纪程》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兴版画集。他在青年木刻家所著的《〈木刻创作法〉序》上说：

至今尚没有一本讲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但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途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火焰，这书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他在《〈无名木刻集〉序》上又说：

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鲁迅为复兴现代版画浇灌了心血，为发展现代版画指明了方向，他寄希望于青年木刻家，并且充满了信心。遗憾的是，我对于现代木刻家的创作很不熟悉，缺乏研究，但是我感觉到，从三

十年代反围剿，到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来，为了保卫祖国，揭露敌人歌颂人民，实现四化，这似乎微不足道的木刻宣传画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鲁迅先生当年所精心培植的充满新的生命的现代木刻画幼芽，已成长为茂林佳卉，已成为祖国百花坛中一枝闪放异彩的鲜花，并且会有更多的佳作出现在我们面前。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发表的聂昌硕同志木刻画《我们这一代》，雕刻的是何等的勇猛前进！又如一九八一年第二十期香港《美术家》杂志登载的蒋北耿先生撰文介绍的董达荣的木刻版画《睡吧！宝贝》，其人物线条和气氛又是何等的和谐、清新、自然！现代木刻画，有派别的不同和风格的异趣，两者的区别，读者智珠在握，一定能够默契于心，鉴别而欣赏之吧。

我是受了西谛的影响而喜爱版画的，但是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我喜欢历史题材，多年来在版画方面也收集到一些零篇断简。我收藏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歌颂社会主义的伟大，以求在鲁迅先生发掘祖国优秀版画遗产的感召下，对我国的四化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举世哲人鲁迅先生诞辰转瞬已是百年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我这粗笨的笔墨，实不能形容其万一。西谛先生在《中国版画选》的序文中说：“……《北平笺谱》，并不是中国版画的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来纪念鲁迅先生。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原载《文献》第九辑，一九八一年）

评介北京最早的一部志书《析津志》

最早记述北京历史的地方志书，要数元代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析津志》原本早已散佚。现在仅存的，乃是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领导，由善本室同志集体合作，从明代《永乐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中，费尽心力辑录出来的。

北京在明初叫做北平，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令改名北京，并于永乐十九年建都于此。元朝叫做大都，在辽开泰以后至金海陵王元贞元年（一一五三年）叫做析津府。据明彭时等编《寰宇通志》卷一"京师"说："五代时刘仁恭父子据燕，后唐平之。石晋（时）割幽燕十六州赂辽，辽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又改析津府，号燕京。金割燕云旧地遗宋，宋改名燕山府，寻复归金，改号中都，以析津府为大兴府。元克金改中都为大都，大兴府为大都路总管府。国朝（明）洪武元年改大都路总管府为北平府。永乐初改北平府为顺天府，领州四、县二十三。"在顺天府治下设有两县，东为大兴，西为宛平。据《寰宇通志》说：大兴"本秦之蓟县，属上谷郡。自汉至唐仍旧名，辽改为析津县，金改为大兴县，元及国朝（明）皆因之。"宛平县"秦汉至隋皆蓟县地，唐析西界置幽都县，

属幽州，辽改为宛平县，取《释名》云：‘燕，宛也。宛宛然以平之义’。宋元及国朝（明）皆因之。”这就是“析津”这个名辞的起源和析津府之下领有大兴、宛平两县的来历。

至于北京之有地方志，据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序录》说：“顾自建都以来，元则《燕京志》、《析津志》，明则有《北平图经》、《北平志书》，皆不传，存于今者，只万历间沈应文所撰《顺天府志》耳，书仅六卷，草创荒略。”当清光绪间缪荃孙纂修《顺天府志》时，曾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了《顺天府部》，此本中多采用了《析津志》的佚文，因之保存了《析津志》一部分的内容，当时称为缪氏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后来江安傅增湘先生有其藏园传抄本三册，现仍藏于其嫡孙傅熹年同志之手。这是《析津志》部分流传的第一种。

其第二种是据宿白同志《居庸关过街塔考稿》（见《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四期）所载北京某氏所藏《析津志》的抄本。此书系山阴李宏信小李山房旧藏，后归会稽徐维则铸学斋的旧抄本。原书末有题名，书内有“臣梦祥曰”，并经辑录者查对，均自《永乐大典》引《析津志》佚文中抄出。较缪氏传抄《顺天府志》佚文为多。然此两书均辑录自《永乐大典》卷四六四四至卷四六六三天字韵之中，可谓同出一源，而徐氏铸学斋本抄辑得较为完备。

解放前，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同志集体合作（赵万里先生参与并主持这一工作），从事辑录凡元明以来与《析津志》有关的典章制度方志之书，如《元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明《寰宇通志》、清《日下旧闻考》等书，互相参考勾稽，精心鉴别，去伪存真，补以前两种辑佚本之未备，使久佚的《析津志》得以部分恢复旧观。寻流溯源，这部书为研究首都北京的史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编纂的苦心和做出来的贡献，是不可埋没掉的。文化革命前，北京出版社要为之印行，而未能实现即逢十年动乱，此事遂以中辍。最近，北京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正在积极筹划，决定

整理出版这部《析津志》的辑佚本。

为了明了《析津志》的内容，如今先谈著者熊梦祥的事迹。清顾奎《元诗选·名氏爵里考》(系据顾嗣立《元诗选》所载)说："熊梦祥，字自得(名字颠倒，实误)，进贤人，仕至崇文监丞，所著有《松云道人稿》。"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补》载有熊自得《析津志典》，所记颇为简略。惟宿白同志所著《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中记述熊梦祥的事迹，极为详尽。他据乾隆《南昌府志》卷六一，说："熊自得，字梦祥，丰城人……著有《析津志》。"又据《顺天府志》引用的《析津志》，知著者"尚著有《松云见闻录》，或系《析津志》的别编。"他还据元顾阿英《草堂雅集》附小传说："熊梦祥字自得，江西人，博读群书，旁通音律，能作数体书，乘兴写山水尤清古，无庸工俗状。以茂才举教官，不乐拘制，辄弃去，以诗酒放浪淮浙间，卜居娄江上，扁得月楼。与余为忘年交，旷达之士也，号松云道人。"又据清康熙《丰城县志》说："梦祥博学强记，尤工翰墨。元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卒。"《草堂雅集》还载有郑元祐题熊自得丛竹便面诗，和姚文奂题熊松云画《茆山秋色图》，一时唱和者甚众。这说明熊梦祥不但是一位史学家，而且是能诗善画的艺术家。可叹的是，自古以来像熊梦祥这样的人才，湮没而不彰者不知有多少！如明蒋之翘《尧山堂外纪》记载从古到元明以来文学家的历史，就没有列入熊梦祥的传记。宿白同志苦心勾稽，把一代文人的事迹表彰出来是值得称赞的。希望他能进而撰为《松云道人行年录》或《著述考》。

下面我将谈《析津志》编纂的体例，和书中的内容。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集体编辑的《析津志》和徐氏铸学斋抄本的《析津志》，可惜我都未能看到，所幸的是傅熹年同志把他令祖傅增湘手校缪氏艺风堂传抄《永乐大典》本的《顺天府志》残存卷七至卷十四，共三册借给我看，这几卷书中，每条中多半引用了《析津志》的佚文。

这样，我就可以于此书内略见《析津志》的一般。如今先说《析津志》编辑的体例。明《顺天府志》的体例，可能是从《析津志》沿袭而来的。从《顺天府志》的残卷各门类中引用《析津志》的佚文，可以见到《析津志》记载所涉及的范围，析津府下设有宛平、大兴二县，其他尚有永清、固安、顺义、良乡、昌平、东安(今安次)等县，是否如明代顺天府领州四，县二十三，因未见原书，已不得而知。其编辑的门类和体例则有：户口、田粮、额外钱粮、军屯、乡社、坛场、廨宇、寺观、风俗、土产、山川、关隘、文庙、学校、人物、孝行、仙释、艺文等项。宛平、大兴各县下，则有各县建置沿革、县境、至到、民屯、闸河等项，罗列条目，颇为完备。

著者长于勾稽史事，能诗善画，泛览群书，兴趣广博。因之，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与顾瑛等为友，想亦系元末的遗民。因之，属辞比事，不禁有故国山河之感。我们从《顺天府志》所引用的佚文，就可以略见其志趣。如记顺天(北京)土产条说：

金、银、铜、铁、锡、画眉石，同出斋堂。其石烧锅、铫、盘，虽百年，亦不损坏，(因以)得名。拳桃、葡萄、御桃、(贡)御黄子、频婆、御茄、密黄、黄精、威蕤、杏油、蜡、纸、麻鞋、石灰、乳饼、香狸、野猪、獐、麂、獾、章鸡、角鸡、雉、石鸡。

诸菜叙：无菜则曰馑，岁荒则曰饥。饥、馑相仍。古人云："咬得菜根断，何事不可为!"又曰："平生事，百瓮齑。"又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而菜果可少欤？盖昔人欲深知此味者，戒口腹便嗜，从心于饕餮尔。是故丹鼐铏镬，咸铸以饕餮兽面，以口吞啮牛、羊、猪蹄足者，深有意焉。特人以学而不察，味而玩之，宁不自愧。夫涧芹、沼沚、溪毛可荐于祖庙，可羞于王公。凡耕田、凿井、灌园、沃蔬，大

夫士人又何尝废哉！山骰、野蔌、苜蓿之类，食之寄诸珍味，从可知(食)无择焉。然种莳则又各随其地土之宜，风气之不同乎？幽燕朔漠，冰霜固其宜也；而其所种，或采于山涧，或种于田园，初无定止，亦各有时令主之。今采其目见口尝者，与闻而知者，作菜志。

从上面这节话里所举的动、植物和果物菜蔬来看，由于时代的变迁，气候的关系，或古有而今无。但他所举矿产发现的地点，有此记载，到今天还可以利用于从事于实地的考察。这种著书立说，注意调查研究的情况，一直沿袭到明万历间，张懋修所著《墨卿谈乘》所记述明代北方的物产，由热带的植物移植到北方来扎根著土和果物嫁接的方法，同《析津志》所说矿藏发现的地点，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作者对于地理沿革，民情风俗，也极感兴趣。在这书里，记述昌平县的山川险要，民情风俗，如记元代建筑居庸关过街塔的经过。他说：

居庸关在大都城(北京)之北，中断而为关，南北三十里，古今夷夏之所共由定，天所以限南北也。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到笼烛夹驰道而趋。南龙虎台，北棒槌店，皆有次舍，国言谓之纳钵。关置卫领之，以司出入。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木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关之南北有三十里。两京扈从大驾，春秋往复，多所题咏。今古名流，并载于是。

又按《图册》说：

先入南口，过关入北口，关中有峡曰弹琴，道傍有石曰仙枕。两崖峭壁，刻石为佛像，皆作亭以覆之，前后设隆镇卫于此，把截总治诸小隘口。

这个地方，在由南口到居庸关的涧沟中，叫做弹琴峡，熊梦祥曾记载咏弹琴峡的诗说：

幌岫深扃围宿雾，云屏环列嶂斜风；
枝峰蔓壑堆蓝重，转觉无声自有功。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居庸关山势的雄伟，风景的幽美。这种描绘居庸关的地望，风景幽美的记载，可以上溯到魏郦道元《水经注》。清全祖望《全校水经注》卷十四，漯水条说：

漯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古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址(戴校《水经注》作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又说：

其水历山南，径军都县界，又谓之军都关。《续汉书》曰："尚书卢植隐上谷军都山"，是也。其水南流出关，谓之下口，水流潜伏十余里也。

在这里，《水经注》所叙述的居庸关和现在巍然独存的居庸关，石壁上雕刻着兄弟民族的六种不同的文字，本来建筑在陆地

上，是一个旱关，在关的四周围看不见水。但是解放以后，最近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的《汉墓壁画》所载《使君从繁阳迁度关时》的彩色图画，却画的是建筑在桥梁上的一座水关。那末，《水经注》上"其水南流出关，谓之下口，水流潜伏十余里也"的话，在汉代桓灵年间，涧水还是流在地面上的河流当中的，因之居庸关在汉代就成为水关了。由《析津志》所载，上溯到《水经注》，又证之以新发现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就成为一条直线的形状，居庸关的沿革变迁就可以略见了。再由《析津志》所记下述到明清来有关居庸关的志书和记载，居庸关建置的沿革，就可以了若指掌了，在今天看起来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大抵元末明初人士所编著的地方志书，记事务欲求得其详，如明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志书，都是记载不厌其详的，保存了颇多的历史资料。但是明代有些文人学士颇厌官私各家所修地方志过于繁琐，因之有名的文学家康海所修《武功志》仅有三卷，韩邦靖《朝邑县志》也不过三卷，不免过于简略了。其实，编修方志之学，本有注重史法的，有注重史实的。注重史法若康海、韩邦靖之流，此文家之言也；注重史实者，此质家之言也。到了清代谢启昆修《广西通志》之后，制订了编修通志的条例，于是章学诚一派专门讲究史法，订立修志三书。李兆洛、汪曰桢、董沛等浙东学者一派，就专门讲究史实，叙述详尽，务求审慎谨严了。

但是在元末明初有闲情逸致像顾阿英、熊梦祥之流的文学家，放情山水，饮酒赋诗，悠游田园过其旷达的生活，所谓"富蛮子"，他们亲眼看见红巾军的兴起，元朝蒙古贵族的倾覆，也带着悲欢离合、思想矛盾重重的情绪，于顾瑛《玉山雅集》、陶宗仪《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等书中就可以见之。陶宗仪还编有《说郛》一百卷（顺治陶珽刻本作一百二十卷，实非原著），搜辑了自唐宋以来的野史稗乘约近千种，当时流传的抄本颇多，在明代传说，南京秦淮河房上寇四娘家就有《说郛》旧抄本四大书橱。近

人张宗祥已有辑本印行。同时在元代大都（北京）宫廷中有辽金流传下的内府藏书。明永乐帝建都北京以后，又把南京国子监一部分藏书运送到北京，有这些民间流传的野史稗乘和官府中所藏的书籍，遂为永乐帝编《永乐大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永乐帝即位之初，就想编一部无所不包的大类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这部大类书，编制和检查内容事实的方法，就想沿袭使用元代民间流传、阴氏兄弟所编的《韵府群玉》，拿音韵的平、上、去、入不同的字眼来编成号码以便于检查，就命侍读学士解缙等着手编辑。并告谕解缙等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书成赐名为《文献大成》。永乐帝看了颇不满意。到永乐乙酉就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监修，征求全国隐逸之士从事于编纂，于是访得布衣陈济和王恭（一作王洪），分任总纂，召集太学儒生三千多人，从事于纂修事业，费了十多年的力量，全书修成，定名为《永乐大典》。计全书为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用黄绸子作为封面，包背装钉，装订得极为精美，蓄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中。永乐帝在开国之初，为什么要做此伟举？这是永乐帝为了红巾军军兴之后，虽然被明朝政府渐为消灭下去；但是他要拉拢在野的人士和元末的遗民，并且他在靖难之役中杀戮了无数的功臣，如何来善后？于是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借此以息民愤。明末文学家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说："《永乐大典》（之编纂），号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逊国诸儒不平之气。"这种说法，是有其见地的。后来《永乐大典》曾几乎被焚。大学士徐阶请从事重录，从嘉靖四十二年起到隆庆初止，第二次钞

缮的《永乐大典》全部告成，藏诸内库，成为集祖国文献之大成的宝库。清康熙间命阁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难得罕见珍秘的书籍，编刻成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到乾隆间就继《永乐大典》之后，编纂《四库全书》，与修《四库全书》的翰苑名臣，如邵晋涵、戴震、赵一清以及全祖望等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不少的书籍。不幸的是《永乐大典》在雍正时移藏于翰林院。经翰苑人士的盗窃，又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即英法联军入侵之役，圆明园被焚，《永乐大典》被联军所掠夺，流传到海外蓄存英法俄国各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也不过六十多册。自解放以后，苏联博物馆所藏的《永乐大典》有十余册之多，首先归还我国。经馆中同志的征访和传抄，现在馆藏的已不下六百余册了。以上事实见于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五以及阮葵生《茶余客话》、东涪山民《一瀓研斋笔记》等书，原书俱在，可以参考。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永乐帝朱棣不是说"天文地志、医卜技艺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吗？所以元熊梦祥《析津志》、明《顺天府志》经过有心人士，把这几部地方志书都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了，使久沉霾于书库中之书，得以重见天日与读者见面，并且提供了研究首都北京历史的沿革宏伟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着莫大的功绩。关于阐述《永乐大典》的内容和纂修的经过，故友王重民先生撰有《〈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考证其事，见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第五期，我不过是略抒我个人戋戋之见而已。

这里，我要说的，从古以来历史就是专门的科学，除了志表纪传各体具备的正史和纪事本末、人物传记各种体裁以外，还有与历史相辅而行彼此有牵连关系记载地理风土的书籍，这种书籍也非常繁富，所谓"旁宗之子，蔚为大国"，于是就有"方志学"。可是古来的书籍，经过兵荒马乱，所谓书有"七厄"，散失得很多，因之就有后人假造的一些书籍。要使已经散佚的书籍，能够

恢复原状，或者能够使读者看到原书的一点面貌，那就要有辨伪和辑佚、考证史事的各项功夫。因为历史既然是门科学，就要有指导研究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唯物论，辩证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艰苦钻研的历程，那末搜辑资料，去伪存真，反映客观的事实，辨伪辑佚等项考据之学，就是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套工序。辨伪和辑佚也就成了专门的学问。讲究辨伪的在有清一代，就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适《崔东璧遗书》。从事于辑佚，具体到搜辑古代地理的则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张澍《二酉堂丛书》是专门搜辑西北地理甘州、凉州、高昌、河西走廊古代地理已经散佚的一些书籍。还有姚振宗就以辑汉晋以来史部目录学、经籍志和艺文志，作为终身事业，著有《快阁师石山房辑佚书》。辨伪和辑佚这两门学问，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也不容易，主要是“不虚美，不溢恶”，既要去伪存真，不失原来的面貌，又须指出书中的特点，是一种极为细致而又逻辑性很强的一个学科。一九一四年鲁迅先生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藤花书屋的时候，曾搜辑绍兴地方文献遗著，辑有汉谢承《会稽先贤传》、晋虞预《会稽典录》、朱育《会稽土地记》等八种，题名为《会稽郡故书杂集》，有木刻本。据其自序说：“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这篇文章，若不是写上鲁迅的名字，人们就会认为是一位道貌岸然老学究写的，而意料不到的却是斩将搴旗、异军鹊起的前进革命战士鲁迅先生的手笔。说明了鲁迅先生热爱祖国、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精神思想。

《析津志》是北京最早的一部志书，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听说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负责同志亟将为之编辑整理印行。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有旧雨之谊；近来又是《文献》期刊上撰稿人之一，为了要明了《析津志》纂辑的原委，承傅熹年同志，假我藏园老人所收藏缪荃荪艺风堂《顺天府志》残卷抄本。又读了宿白同志

著《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对我很有启发，就写了这篇粗糙的文字，请读者批评指正。我特别感觉到傅熹年同志校理笺注藏园老人的藏书和遗著，可谓能继其祖业。宿白同志文章考订居庸关过街塔的建筑极为详尽有体，对于《析津志》的著者熊梦祥，能考证出其生平历史的根源。我与宿白同志夙有同学之雅，四十年来时光虚过，由壮至老，而皓首无成。读了宿白同志的文章，看到傅熹年同志不畏强御治学的精神，年老颓唐自愧不如，欣后起之有人，不胜有青出于蓝之感也。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四日写于北京

（原载《燕京春秋》，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

序跋

《东北史稿》跋

金静庵先生治东北边疆之学，明华夷之辨，于舆地沿革，史迹源流，搜讨尤详。邴原居辽，原非本心；遗山修史，是所夙志。前编有《辽海丛书》，已出十集。去夏由辽沈潜服来京，讲学上庠。冬间，寄来《东北史讲稿》两册，已积稿盈帙。桢尽二日之力读之，服其钩稽群籍，不因袭东人窠臼，用力甚勤；而于东北三省为吾国之旧都，东北土著已早服汉化，言之极为详尽。并引梁任公先生之言："一民族可分为三国以上之国民，而一国民亦可含两族以上之民族"。金君又云："如东北民族之在古代则有汉族，肃慎，夫余，东胡诸族之分，在近代则有汉，满，蒙古族之分，然其同为构成中华民族之一份子，则任何人不能有异议者。以一国民可含两族以上之民族"，其言盖有深致焉。

其书于东北史事分六期：(一)汉族开发时代，上古讫汉魏，约起西元前三千至西元二七九年，约三千余年。(二)东胡、扶余(亦作夫余)二族互竞时代，晋讫隋初，起西元二八〇年至五八八年，凡三百九年。(三)汉族复兴时代，隋讫唐高宗，起西元五八九年至六九二年，凡一百四年。(四)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

相争长时代，唐武后讫元末，起西元六九九年至一三七〇年，凡六百七十二年。(五)汉族与女真、蒙古争衡时代，明初讫明亡，起西元一三七一年至一六四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六)东北诸族化合时代，清初讫现在，起西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凡二百九十三年。是稿甫写至第三期汉族复兴时代隋唐之征高丽，然已不下十余万言矣。

窥此数卷之书，其独到之处，若辨汉代玄菟、乐浪四郡之部位，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行军之途径，所统七节门之解说，由高句骊《好大王碑》证明《宋书·夷蛮传》高句骊略有辽东，百济亦略有辽西之误，皆足以匡前人之旧说，补正史之未备。至于慕容氏之兴，其同族与之角逐于辽西者，有宇文氏、段氏二族，宇文氏自始祖葛乌菟至侯豆归历传十一世；段氏自段陆眷至段龛凡传十世，后均为慕容氏所侵并。《北史》、《周书》纪载均甚简略。金君乃据《通鉴》记载三氏角逐之事，有年月可寻者，撰为大事表。自魏晋以来，玄菟诸郡沦于高句骊，晋之昌黎郡遂为军事之重镇。昌黎本为前汉辽西郡之东部，又为后汉辽东属国，汉时置有柳城，慕容氏改于柳城之北别建龙城，汉柳城遂废。然此后龙城，亦名柳城。唐仍置柳城郡，自此乃有两柳城。后来考柳城者，其说不一，《辽史·地理志》谓柳城在今卢龙昌黎，其说已误。金君乃谓汉之柳城，应在今朝阳之南，方当辽、热二省交界之处；唐之柳城应在朝阳之西。又考昌黎郡应以龙城居首，而不治于昌黎。考稽地理，极为入微。又记夫余、勿吉、库莫奚、室韦、豆莫娄、乌洛侯诸民族之沿革，条例详明，非深于史学者不能如此也。

抑余更有进而言者，研治边疆史地，于地理沿革史迹变迁以外，尤当于边疆间，感触中华之文化及民族之英雄，流寓之人物，作特殊之介绍。窃意辑边疆史事，应用文化史之眼光而撰为一书。是书于朝鲜乐浪之发掘，遗留之文物，及公孙氏、慕容氏

流寓，邴原、管宁、孔纂、胡毋翼诸贤，已行述及。但汉代文化之在朝鲜，煊赫灿烂，尚不止此；高句骊氏，习向华风，好大王墓遗留石刻，墓碑，尚有迹可寻；辽、金两代文物，日渐发现，典籍簿录，亦间有流传，如不及时整理，则将取裁于他人之手！若夫亮节高怀，驰骋疆场之士，固足以昭民族之辉光；即如附逆逐臭之辈，上而若刘豫、张邦昌，次而若孔彦舟、张中孚、张中彦之流，反复无常，忽而降宋，忽而投金，当时固振振有辞，人称其善，设无《金史》表暴其恶，则是非何以明于后世？若此辈者，亦宜大声疾呼，深恶而痛绝之，使似是而非之学说，争逐腥膻之流辈，足以惊其魄而丧其胆，慑于正义，而不敢逾乎樊篱。此亦为史之责也。

适《禹贡》出版三年，顾颉刚先生索稿于余，余乃取金静庵先生所撰是书，择其中《慕容氏与高句骊》一篇，登诸《禹贡》，爰述其颠末于此。而桢也颇欲治辽、金、明、清之史，徒以撄于人事，鞅掌簿书，一书未习，光阴虚驰。今读静庵之书，及冯家昇诸先生之作，精深湛博，极感钦佩！书此掷笔，有不胜汗愧者矣！

（原载《禹贡》第七卷（第一二三期），一九三七年

雪堂所编丛书解题

余少读罗雪堂先生《群书叙录》，喜其见闻博洽，足以启迪后学。比毕业清华，得识先生于沽上，以治学相期。及服务旧京，与先生不见者数年。予以纂辑史乘，观书辽海，时先生已移居辽东，爰迂道旅顺，谒先生寓庐。背山面海地极幽僻，于时朔风萧瑟，海色侵人，先生策杖相迎，坐谈移晷。至云：不意在辽海之间，得遇足下。谈及沧桑，辄生感慨。旅顺为昔毛文龙驻节之所，设有海东稗乘，幸以相告。回首昔游，犹如昨日。犹忆前岁，曾以长函问教，驿传初发，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先生学术之博，见闻之广，高出群伦，非陋儒可及，而综其生平撰述，辑为丛书，为类尤繁。恒以丛书始于宋、元，至清而集其成，爰有《丛书考》之辑，而以先生所编丛书，蔚为一集。惟孤陋寡闻，遗漏实多，凭诸目验，不假传闻，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楚雨楼丛书初集》八种十八卷玻璃版印本

收《秦金石刻辞》三卷。按秦代刻石，留传天壤间者仅泰山十字与琅邪残石。今琅邪残刻，又毁于火，相斯之迹，几绝于世，

惟赖权量文字，稍见端倪。海内收藏之富，周、秦遗物，聚于一堂，当推陈簠斋、吴恒轩二家，后则浭阳端陶斋氏，力之所聚，庋藏亦繁。罗氏所编，秦金石刻辞，以端氏所藏为主，间取端氏以后所出之物，厘订为三卷。一曰金，虎符、权量之类是也。二曰石，泰山刻石之类是也。三曰匋，瓦量之类是也。晚近东莞容氏所编《古刻零拾》，即其续也。《殷文存》二卷，罗氏既辑有《殷墟书契》前、后编，复取殷代彝器拓本中殷人文字汇为二卷。近人孙海波有《续殷文存》之作，堪为是书之继。若《蒿里遗珍》，以辑古代买地券等类，可借此研究古代之经济，惟收集尚不甚广耳。是编所辑各书，多见于《艺术丛编》，罗氏复取而汇为斯书。

《雪堂砖录》四种四卷影印本

按辑录砖文，始于洪景伯适之《隶续》，降及清代，则有陆刚父《千甓亭古砖录》、冯柳东《浙江砖录》、吕尧仙《百砖录》、宋经畬《砖文考略》。是书辑录砖文凡四种：《楚州城砖录》为清河王锡祺所辑，刻入《小方壶斋丛书》中。原书流传甚罕，罗氏重为搜辑，以广其传。《恒农砖录》，为端匋斋故物。端氏所撰《匋斋藏砖记》颇有讹失，罗氏重为校正，纠其缪失。《地券征存》，搜辑甚广，惟铜山张氏小来禽馆所藏刘宋砖券，尚未列入。至《砖志征存》，则罗氏所辑之砖文也。自序云："古无志墓之文，葬时烧砖造圹，故砖上记姓氏年月而已。其文皆在砖侧；或但施吉语，无刻字砖面者。刻字砖面，殆为志铭之滥觞。最先出者，为许州魏陈礼等砖，今已亡佚，逮光宣间，近畿多出平面刻字墓砖，中州之彰德，亦有之，或朱墨书不镌勒，关中唐以下诸志，亦有刻砖上者，予颇收集之，丁巳仲冬乃出其所藏，手自编写，得八十有一通，成书一卷，颜之曰《砖志征存》。"按近人黄文弼仲良氏有《高昌专录》之刻，亦均效法罗氏而竞起者也。

《唐风楼碑录》十一种二十一卷附录二卷上虞罗氏自刊本

是书汇辑《西陲石刻录》一卷、《吴中冢墓遗文》一卷、《芒洛冢墓遗文》三卷、《广陵冢墓遗文》一卷、《昭陵碑录》三卷、《襄阳冢墓遗文》一卷、《邺下冢墓遗文》二卷、《中州冢墓遗文》一卷等，凡十一种。罗氏嗜金石之学，收藏至富，清季服官京师，居冷曹，出其所藏，或取友朋所得，凡近时中州、吴中、淮阳、关中所出金石文字，裒辑成书。复钩稽诸史，详加考订，如于西陲遗文，取《唐写李氏再修功德记》及《索勋碑》，辑补《张义潮传》，以补唐书之缺；取芒洛《古冢遗文》魏元氏诸志，为补《魏书·宗室传》；关中唐昭陵诸碑，诸家著录者八十有八，今存者若温彦博等碑仅二十有八，实只二十有六，罗氏乃参所见旧本，互校群书，补辑《崔敦礼碑》及姜遐、斐艺两碑遗文，其他增补文字尤伙。寒冬围炉，炙砚写定，为《昭陵碑录》三卷，足征其用力之勤。至吴中、淮阳吉金乐石，流传尤鲜，罗氏为之搜辑征采，有补亡之功。晚近芒洛之间，古冢遗文，日出不穷，后之所出，当必有罗氏所未见者，补辑汇编，此正其时。罗氏之书，可谓其嚆矢也。

《雪堂丛刻》五十二种一百一七卷上虞罗氏铅印本

罗氏编有《国学丛刻》，后略加增删，易名为《雪堂丛刻》。雪堂者，罗氏书斋名也。是书收辑散佚敦煌卷子、清人稿本及罗、王所撰著述为多。唐人卷子本，如《二十五等人图》，《杰上秘要》之类是也。《二十五等人图》，乃唐代乡曲陋儒，取《文子微明篇》之说，敷衍成书，其讹至人为志人，虞人为庶人，殆至人、虞人之义，亦不能解，以其为千年遗迹，过而存之，以资嗢噱。清人稿本，如陈玉澍《卜子年谱》、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桂馥《国朝隶品》、《襄理军务纪略》之类是也。中多要籍，颇资省览。至罗、王著述，如王国维《洛诰笺》、《明堂庙寝通考》、《释币》、

《古礼器略说》，罗振玉《高昌麴氏年表》等类，后多刻于《观堂集林》、《永丰乡人稿》，及《杂著》中。又《熬波图咏》，重为影印于《吉石庵丛书》中。惟其他各书，未见他种刻本者尚伙，则是书洵有别存之价值也。

《云窗丛刻》十种十四卷影印本

是书为罗氏侨居东瀛时，汇辑所获唐人卷帙、魏齐石刻、宋元人集部、近人稿本及与王静安先生撰辑之书，仿古香斋袖珍本，题曰《云窗丛刻》。所辑如元刘佶《北巡私记》，为独山莫友芝手钞，记顺帝北狩之事甚详。顺帝北奔以后，旧史无征，赖有此书，略见当日梗概。胶县柯绍忞撰《新元史》，顺帝北奔之事，即取材是书。潍县陈介祺，收藏古今石刻最富，不轻于著述。此书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卷，存《金文考释》八篇，《汉石记》一篇，《诗》二篇，考证汉代灯制，极为详审。若静安先生之《简牍检署考》，考证古代方策之制甚详，昔尚无人为此文者，惟近豫中发现笔削等物，可补是篇之缺。至西陲石刻、芒洛冢墓遗文，近日所出日繁，如不整理，将归磨灭，此正可依罗氏之法，从而增辑之也。

《宸翰楼丛书》八种三十卷影宋本

是书汇刊谦牧堂影宋本《周易举正》、元勤有堂本《三辅黄图》等书，以影印佳椠名钞为宗旨。自记云：往在京师，取藏书中宋元椠本之难得者，影写付鄂中雕版，拟为一丛书，乃甫成五种，而国变遽作，版存鄂渚，幸未入劫灰，而是时举家避地，殆无生全之望，意不能续有增益，爰写目印数十部以了宿愿，乃卷施不死，结习未忘，两年以来，又稍稍刊刻，先后共得八种，因改订目录，并志语于卷端，以告世之得此书者，俾知予是书之成，此身盖在艰难百苦中也。按是书所辑，以《东汉刊误》、《宋季三朝

政要》最裨史学，宋季皇室流离海隅，以山崖为宗庙，舟楫为朝堂，颠沛之苦，不亚明季唐鲁两藩，而史阙有间，殆或过之，此宋季史乘，于民族兴复之际，尤宜注意者也。是书小识云：理宗国史载之过北，无复可考，今将理度两朝圣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书，以备他日史官之采择，卷五、卷六为幼主及广王、益王本末，为考《宋史》者，所足征也。

《眘古丛编》十种十一卷影印本

按治金石之学，始于宋代欧、赵、洪、黄诸家，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阳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是编所收者，为刘铁云所藏之甲骨：历代遗留之古兵符，齐鲁之封泥，秦汉之古印玺，汉晋石刻墨影，而为昔人所撰者，为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残稿》、吴大澂《续百家姓印谱》。辑录齐鲁封泥，前有陈寿卿、吴子宓，已撰述谱录印行。兵符图录，前有瞿木夫《集古虎符鱼符考》，甲骨文字刘氏曾有《铁云藏龟》，今罗氏更为辑其余录。昔人纂辑金石文字，各举一体，惟罗氏所搜辑者，其范围较广，而芒洛关陇，齐鲁秦岱之间，古物日出不穷，后来居上，罗氏搜辑尤勤，故所得独丰，此罗氏之书，所以可尚也。

《鸣沙石室佚书》十八种十八卷影印本

按敦煌所出唐人卷帙，以释道经卷为多，吾国旧籍，间有传本，但均流传英、法诸国，存诸国内者实罕。上虞罗氏汇辑英、法诸国所寄汉唐古籍影本，及燕京书坊所得丛残，都为一集，凡十八种。关于经学者，则有《隶古定尚书》、《春秋谷梁传解释》。

关于史学者，则有《春秋后国语》、《晋纪》、《张延绶别传》、《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沙州图经》。关于子部者，则有《星占》、《阴阳书》。关于集部者，则有《唐人选唐诗》。若《隶古定尚书》、糜信《谷梁传解释》，原书久佚；孔衍《春秋后国语》、《宋史·艺文志》仅有著录，原书未见。《晋纪》疑为《邓粲传》，此卷虽仅百余行，然较《晋书》为详，可补正其缺。若《张延绶别传》记张义潮之守瓜沙，《唐书》不详其事，尤裨于西陲史乘。至《水部式》，则修于唐神龙、开元间，为治河渠水利之书。《沙州、西州图经》，尤于西北史地有关。凡此诸书，皆为天壤间久佚之品，今一旦复显于世，不可不谓人间之瑰宝。罗氏于书前撰有提要，考证其源委甚详，影印亦精，后又有石印本，较玻璃版本为逊。书中所云卷帙运京，复盗窃者，疑指李盛铎氏，盛铎藏唐人卷帙甚繁，多为中土古籍，惜秘不示人，故人罕知其为何书，闻今已售于东邦矣。晚近吾国赴欧西访求西陲简轴者，颇不乏人，将来整理爬梳，当更胜于前，然罗氏实有启发之功也。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四卷影印本

罗氏既编印《鸣沙石室佚书》，复选释、道、摩尼、景教卷子四种，汇为斯辑。若姚秦写本《大云无想经残卷》，实当晋世，为吾国写经最早之本。日人松本文三移录其文，考为竺法念初译，梵汉西藏均亡之秘籍印入彼土《续大藏经》中。罗氏以世无单行之本，重为影印。若摩尼经典《教规残卷》云，初辩“二宗”求出家者，须知明暗，各宗性情悬隔，若不辨识，何以修为。次明“三际”，一初际，二中际，三后际，初际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痴，诸所动静，无不相背。中际者，暗既侵明，恣情驰逐，明来入暗，委质推移。大患厌离于形体，火宅愿求于出离，劳身救性，圣教固然，即妄为真，孰敢闻命，事须辨析求解脱缘。后际者，教化事毕，真妄归根，明既归于大明，暗

亦归于积暗，二宗各复，两者交归。按明暗之际，二宗三际之辨，实为摩尼教旨，原书极少流传，借此可窥其趣。罗氏于释、道、摩尼、景教之书，各选一帙，用意甚善。但《老子化胡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石室秘宝》亦已早为印行矣。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十八种三十卷影印本

是书汇印晋唐写本经史旧籍。凡分《群经丛残》、《群书丛残》，都十五卷。《群经丛残》中有唐写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谷梁》、《郑注论语》。《群书丛残》中有唐写本《汉书·王莽传》、残本《道德经义疏》、《庄子》、《略出籯金》、《类书》、《文选》、《玉台新咏》等书，均吾国古书中之要籍也。按经书写本，各经俱备，惟《毛诗》卷帙留存最繁，陆德明《经典释文》，援据旧本，可证群经文字之失。然传刻过久，已失其真。庐抱经曾有《经典释文》校本，最为精湛。今敦煌所出唐人写本经书，多为庐氏未睹。上虞罗氏曾据唐人写本撰为《群书点勘》，然未见其书。晚近唐人卷帙钞诸欧西，突过于前，整辑校雠，诚有功于经术也。《老子道德经义疏》，载于《隋书经籍志》者，凡四家，曰顾欢一卷，曰孟智周五卷，曰韦虚玄四卷，曰戴铣九卷，是编所收《道德经义疏》：起《治大国章》，讫《信言不美章》，是卷五，乃末篇，与孟智周卷帙同，确为孟智周本。石室写本《文选》四卷，内有张平子《西京赋》、东方曼倩《答客难》，为李善注。其他残卷，《王文宪文集序》及《恩幸传记》、《光武传赞》为无注本。按《旧唐书·李邕传》，父善显庆中为《文选注》，表上之。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妄意，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为不可夺，故两书并行。今以此二卷与今本相校，凡今本释意之处，此皆从略，知此为崇贤初次表上之本，而今本则北海补益之本也。善注《文选》，世无善本，而善注以旧本人间绝无，此书无注本者，当在善注以前，

更为难得。惟晚近发现唐写本《文选》，较此尤繁。《汉书·王莽传》，仅存三十余行，然与今本相较，胜于今本者，不下十余处，此校书所以贵旧本也。近唐写本《文选》及《汉书·扬雄传》残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已为影印于丛书中，均可与此书相辅而行也。

《敦煌石室遗书》十三种十三卷铅印本

是书汇辑敦煌石室所出中土已佚古籍，及摩尼释氏经卷。如《沙州志》残卷，为唐开元间所写，始于水渠，竟于歌谣，叙述详赡，文字尔雅。其所记水渠泊泽池堰，皆可考证西北地域。《西州志》所记地理，于两《唐书》多合。西州本高昌故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大中十五年，沙州首领张义潮逐虏守此，以十一州地图献，中有西州。后分三部，曰和州回鹘，曰阿萨兰回鹘，曰高昌，均属服于辽，此唐至五代西州之沿革也。此志撰于乾元以后，尚未沦于吐蕃之时，且其叙丁谷、宁戎两窟风景，文字尔雅，非唐中叶以后所能为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姓氏，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是书，取其相证，文字吻合，乃定为是本。后日人藤田丰八为之作注，考据尤为详赡。《景教三威蒙度赞》，后附《景教经目》二十种，足资彼教之考证，后附《流沙访古记》一卷，为王静安先生辑，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日人白鸟库吉氏《游满州纪事》及法人刺古斯德氏《游蒙古演说》，题为斯名，附于遗书之后。每书之后，间有札记，至蒋斧辑《沙州文录》，亦极详赡。斧字伯斧，官学部，喜金石文字之学，罗氏尝与商榷者。是书在罗氏辑《鸣沙石室佚书》之前，搜辑各书，均为石室要籍，堪称瓌宝矣。是书后尚附有《唐写本金刚经》，坊间流传者多未列入。

《敦煌零拾七种》七卷铅印本

是书搜辑敦煌所出零卷残帙，关于诗词小说者，都凡七种。按韦庄《秦妇吟》，《浣花集》所不载。《北梦琐言》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后公卿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是今集不载，乃庄之戒，故世无传本。近巴黎、伦敦图书馆均藏敦煌卷子本，法国伯希和以影本相寄用付椠印，韦相长歌始再传中土。王静安先生云，唐末长篇，只有郑嵎《津阳门》诗。然咏开天旧事，了无生气。遣词传色，亦甚粗拙，不足为元白舆台，惟此足继武长庆耳。佛曲三种，皆中唐以后写本，其第二种为《维摩诘经》，他二种不知何经。《古杭梦游录》载说话有四家：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恋态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佛参禅。说史，谓说前代兴废战争之事。今观此卷，是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元明以后，始不复见。《云谣集杂曲》，朱祖谋曾刻于《彊村丛书》中，与此本小异。凡此诸书，静安先生曾取他本校其异同，较原书校出异同约数十条，可知吾国文学源流，无以小言詹詹，而忽之也。

《敦煌石室碎金》十七种十七卷铅印本

此书所辑者多敦煌石室所出残帙，然亦时可补今所传诸书之缺者，如唐写本《毛诗·豳风·七月》残卷，英伦所藏与今本异同颇多。"七月烹葵及菽"，菽作叔；"六月莎鸡振羽"，《传》："莎鸡羽成振讯之"，讯作迅，均与释文本同。其他若"九月授衣"，《笺》："故言将罢"，今本作故言将寒。"馌彼南亩"，《笺》："俱以馕馈来"，今本无馈字。皆以此卷之义为长。又如《唐历》残卷，以汪曰桢《长术辑要》考之，知此历当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惟日干稍有出入。盖当日西垂行用之历，非颁自中土者，边人疏于学术，故推数多误。惟每七日辄末书一"密"字，乃记日曜日。巴黎所藏《同光四年历》，与此同。巴黎又藏《七曜律》，七曜之名，曰

密，曰莫空，曰云漠，曰滴，曰温没斯，曰那溢，曰鸡缕了，殆即番语日月火水木金土，但不知为何国语耳，亦足裨异闻也。

《吉石庵丛书》四集二十七种影印本

是书罗氏侨寓东瀛时所辑，多为日本诸家藏书，或欧西巴黎、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卷子本诸书。其为卷子本者，则有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道书》残卷，日本写本《史记·殷本纪》残卷。其为宋刻元椠者，则有北宋本《齐民要术》卷五、卷八残本。宋椠《三藏法师取经记》残卷、蜀大字本《孟子音义》、宋椠本《庐山记》。其为旧钞本，则有影元《说文字原》、《渚宫旧事》、《负暄野录》、《秘府略》残卷等书。按《齐民要术》为农家要籍，久无善本，明以来诸刻讹脱不可读，浙中袁昶曾以宋本校前七卷，刻于中江官舍，号称佳椠。此为日本高山寺所藏，取校此本尚多舛误。盖吾国旧传宋本每半叶十行，此则八行，非出一刻。十行本殆南宋所刻，此则刻于北宋。卷中通字阙笔，避真宗讳，较南宋刻本为尤古矣。唐三藏《取经记》，中土久佚，此为宋刊，尤足珍贵。有元一代著书言小学者三家，曰戴侗，曰杨桓，曰周伯琦。三家之学，以伯琦为胜。伯琦著有《说文字原》、《六书正讹》，当时有合椠本。《字原》流传较少，此为孔荭谷微波射榭旧藏，用付影印。日本古写本《史记·殷本纪》，为内藤湖南旧藏，每帝皆跳行，又卷中所载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太字皆作大，与殷虚卜辞合，其他可以校正刻本者甚繁。东京岩崎氏尚藏有《夏本纪》及《秦本纪》各一卷，亦高山寺所藏，与此为一帙而纷失者。近尚有卷子本《汉书·扬雄传》残卷，发现在此影印之后。惟《叶石林模(宋克补)急就章》，石尚在松江。罗氏得此拓本，惊为奇观，谓二十年访求仅乃得之，不知原物尚在人间，此则千虑之一失耳。

《殷礼在斯堂丛书》二十种五十九卷铅印本

罗氏所编印诸书，意在传古，以金石碑版卷策之书为繁。是编所收，惟王念孙《广雅疏证补正》、《尔雅郝注刊误》，取王氏手稿付印，为研经之书，馀均为宋元以后文史著述。如潘柽章、吴炎《今乐府》，自遭史狱，原书久佚。顾苓《金陵野钞》、《南都死难纪略》，记南明史事，为清乾隆间禁书。苓字云美，吴郡人，为钱谦益弟子，著有《塔影园集》。仅有稿本，已收入是编。内有《东涧遗老钱公别传》，记受之一生行事甚详，于其出处难言之隐，颇寓于字里行间。日本旧抄本《善邻国宝记》，记日本与震旦相通；始于日本垂仁天皇，至文正丙戌，释氏商舶往来书移，为研治中日交通必备之书。《庐山记》，日本元禄本，与《吉石庵丛书》所刊南宋本不同。《冷斋夜话》、《续墨客挥犀》，罗、王二君用数本相校，最为完足。《遗山新乐府》，较张石舟刻本多第五卷。《虞山人诗》，为宋虞堪道园之叔祖也，虽著录四库，然流传甚罕，此据长唐鲍氏藏钞本校刊。当静安先生效止水之节，罗氏为整理其遗集，出其余暇，印成是书，然均为研治掌故之书，未可以其时近而忽之也。

《玉简斋丛书》初集十种二十九卷附录一卷二集八种二十四卷
刻本

是书初不分集，以目录学之书为多，后以刊刻日繁乃更为二集，述边疆史乘者为初集，目录学为二集。初印者各本子目，互有不同，若彭孙贻之《山中见闻录》等书，则均为后增者也。是书所辑讲边疆史地者，有高拱《边略》、清佚名《湟中杂记》等书，均有关史乘。古书日佚，宋元佳椠，秘籍名刻，赖有历来流传书目，庶可稍见其崖略，有明一代，周藩朱睦㮮万卷堂藏书最盛，崇祯壬午，决河开封，书堂付之巨浸，徒有目存。明季清初天一阁范氏、汲古阁毛氏以外，当推钱氏绛云楼、也是园、徐氏传是楼、培林堂，藏书最繁，中多秘本。是书于上述各家书目，大半

入录，堪与叶氏《观古堂汇刻书目》同观。《也是园书目后序》云，赵玄度初得李诫《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鲜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眼如针孔，沟浍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后《营造法式》传钞本，以钱氏为宗，而爱日精庐张氏所藏者为最著，近营造学社之绘图精刊本，亦由钱本所出者也。

《国学丛刊》三期十二种二十卷铅印本

是书刊于宣统辛亥，为期刊性质，每两月一册，惟仅出至三册而止，汇辑朋从旧著，及新发现书籍古物。区分八目，曰经，曰史，曰小学，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学，曰目录，曰杂识，包容至广，实为罗氏刻书之椎轮。静安先生序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阐论至详，尤于卓识。是书虽为罗氏编而实王君为之主，罗氏所编《殷墟书契前编》、《隋唐兵符图录》，后均有精印本。罗、王之学为涂甚广，而抉择亦精，静安先生甲骨金石文字之学，固其所长，以及戏曲小说之学亦有其独到之处，如是编所载《古脚色考》、《周清真先生遗事》，虽排比旧籍，亦别具心裁，其学实不可及。

《东方学会丛刊》初集十二种二十九卷铅印本

是书为罗氏旅居津门时所刊。以《古写本贞观政要》残卷、日本宽文刻本《帝范》、《臣轨》，明人钞本《四夷馆考》，稿本《话雨楼碑目》，及所编订《纪元编》、《蒿里遗文目录》、《雪堂藏古器物目》等书，汇为一集，题曰《东方学会丛刊》。按李兆洛所辑《纪元编》，本已完备，罗氏于是书用力垂三十年，为校证其舛误，辑补其不足，始克成书，颇便学人。近日关右洛中，碑碣墓志，出

土甚繁，罗氏辑其所得，编为遗文，目录为类凡八，曰《墓碑征存》，曰《墓志征存》，曰《元魏宗室妃主志存》，曰《海东冢墓文存》，曰《甄志征存》，曰《地券征存》，曰《蒿里余录》，统得二千四百九十余品。然近日所出碑志，尚未列入，可以补证者不少。至《话雨楼碑目》，为吴江王楠任堂所藏，楠别号勺山，耽欧阳集古之学，从何义门、张尔田两先生之门。擅精考辨，藏书籍碑帖至为丰富，又居吴会，故家藏弆，捆载过门，迨无虚日，一时名流，若沈凡民、张文渔皆尝扁舟过访，详论古刻，其有当意者，各署书而去，故所在金石家，咸以不登王氏话雨楼为憾。碑目为其子鲲所编，中多宋拓秘本，可供学人探讨，罗氏乃为刊印行世。是书凡分四集，此其第一集也。

《四时嘉至轩丛书》三种三卷玻璃版印本

按寺壁饰画，其来甚久，《图画见闻志》载会昌废佛教，李卫公时镇江浙，润州甘露寺独奏存，因尽取管内贤画壁，置之甘露寺。又载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画壁，福圣寺有展子虔画壁。有胡氏者募壮夫操斤，力劖于颓垣之际，归陷于室壁中，号为宝墨亭。是壁画亦有时转移，但不能如缣素之久远。江浙卑湿之地，唐宋旧迹，已荡然无存。秦晋诸省，地势高亢，时有存者。上虞罗氏游历东瀛，见大谷氏兵库别邸所藏西陲壁画，择其尤者二十帧付诸影印。楮币之作，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子，盛于宋而紊乱于金元。明清两代，钱钞并用，然利不胜于弊。罗氏乃辑有金以来钞币及钞版之传世者，为之图录。《两浙佚金佚石集存》，则集浙省久佚石刻，若唐聚庆、包公夫人、周文遂三专志，及杨绍《买地莂》等逸文也。

《百爵斋丛刊》十四种二十八卷石印本

是书汇辑洪武本《应用碎金》、敦煌石室写本《神龙删定散颁

格》残卷等书。所收各书以内阁大库所藏秘本及敦煌卷子本为主。万季野《石园文集》原书久佚，是书收有《万季野遗稿》一卷，尤可珍已。

雪堂所编丛书，尚有《愿学斋丛刊》、《待时轩丛刊》、《明季辽事丛刊》，或为其孙继祖所编，或手端无书，故未列入。匆匆编此，定有待于增补者耳。

（原载《中德学志》第五卷第十二期，一九四三年五月出版，署名谢刚主）

《一士类稿》序

有一天下午，一士给我打电话，因为好久不见了，约我在一个地方谈话。一士住在宣南，我又住在西城，就约会个适中的地方，在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见面。

那天天气非常热，我在来薰阁等了许久，一士穿着白色短裤褂，也未着长衫，打着一柄洋伞，到来薰阁来找我。他说，新近《古今》社替他出一本集子，教我作一篇序。并且要我如果到上海去的时候，顺便问候一下《古今》社的朋友。一士衣著极为质朴，言语极为木讷，老是含着纸烟，谈起话来却极为有趣，不知道他的人一定会认为是乡曲老儒，其实是一位博学的君子。那天来薰阁的伙友，就偷偷地问我，这位先生是谁？我说这是鼎鼎有名的徐一士先生。

我和一士神交虽久，但过从最密却在事变后那一年。那时我刚从香港回来，家居极为无聊，就常和瞿兑之、徐一士诸兄在一起谈天，事变的初起，生活尚不甚贵，就约会每星期三在一块聚餐，那时在一处聚会的朋友，除了兑之、一士和我以外，还有柯燕舲、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诸兄，共总有七个人，聚会的地

点，不是在兑之家，便是在燕舲和我家。我们谈话，上下古今，没有一定范围，总是在寂寞之中，得到一点朋友晤谈的快慰。一士和我都是原籍江南而家居在历下，谈话的资料，老是由西山的斜照，谈到明湖的秋光；尤其是谈到济南吃的小点心，便津津有味，所以我们二人尤为谈得起劲。不久的时光就由兑之发起了国学补修社，是每星期的朝晨，约会莘莘的学子，一起讲学，很有不少同学得了益处。后来兑之又约一士主编《中和杂志》，一士所编共出到五卷，经常写稿的人，便是海波和我，在北方刊物中，总算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杂志。

民国三十一年的秋天，一士又应约在上海《古今》杂志上撰稿，在北方为《古今》撰稿的朋友，便有兑之、一士、五知，和我这几个人，无形中又得到谈话的一个机会。我是最喜欢跑路的一个人，三十二年的夏天和三十三年的秋天，我两次到上海去，认识了朱朴之、周黎庵、文载道诸君，承他们恳切的招待，得瞻朴之的精庐，诚所谓爱好自天然，非是一般俗子所可跂及。而我所深幸的，便是南北的学人，都可以接近；朋友之乐，在这个时光，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可是一士每天要到中南海去办公，我也是一天有一定的工作，所以见面的机会，非先约不可，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央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可是不买他们的书，而且讨扰他们的夜饭，心中总感觉要招店伙的讨厌。

一士兄这部集子，是选近年来所撰有关掌故的文字，仿俞正燮《癸巳类稿》的体裁名为《一士类稿》，我本意是先要拜读一过，得以先睹为快，可惜我到上海，书已付印，不能全读，深引为憾事，但是一士的学问，我是深感莫及的。

一士长于掌故之学，尤其是对于科举的制度，和清季的遗闻，这是任何人没有他那样的熟悉，须知他的从兄徐仁铸先生就是光绪戊戌变政时革新的新党，家学既厚，所以濡染自深。我尝以为有清的历史考证家，多偏重在古代，考证不急时务的名物，看历史成了死板板的东西，纵然把六府三事，考证的明明白白，但于历史的动态，与现代时事的关系又有何补？要有史学眼光的，我不能不推重全祖望、劳格这两个人。全氏《鲒埼亭集》真是把南宋和明季遗民，活活的写出，叫我们读了得到不少历史上的兴趣。劳氏《读书杂识》，虽然未成完作，但是他能把治考据的方法，移到治唐宋以后的历史。

复次，清代一般的考据家喜欢考证琐碎无聊的问题，便自以为赅博，例如明季死难的义士，本是极可敬重的一件事，但治考据的史学家，必定考据某人死在某处，而某人又以为死在某处为非，考来考去，真是不关痛痒。杨秋室的《南疆逸史》跋，虽然引证博辩，仍不免犯了琐碎的毛病，倒不如近人孟心史先生所撰《心史丛刊》，他所撰《顺治丁酉科场案》、《董小宛》、《丁香花》诸篇，这样的引人娓娓动听，但是到他老年所撰的《明元清系通纪》，反倒有江郎才尽之感，所以我对于史学的见解是：治古代史不如治近代史，而治近代史或以往有趣味的问题，感觉着更为重要。我很想就这一方面，做一点工作，人们的批评，我们姑且不去管他，但恐怕未必能做好，一士知我者，必当不以我言为谬也。

（原载《一士类稿》，署名谢刚主）

晋谢鲲墓碣跋

一、缘　起

桢少受业于新会梁任公先生之门，旋获接援庵先生几席，得聆謦欬，不以葑菲，谬承提携。

先生学问渊博，精湛绝伦，于蒙古金元史迹，典章制度，考订尤详，竹汀之后，无出其右者。桢猥以谫陋，莫能窥其樊篱，然读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书而好之。以其钩稽之勤与鉴别之精，有卓绝之见，亘百世而不磨者，桢窃亦欲私淑其意，草《明季惊隐诗社考》、《跋宣南诗会图卷》等篇，间为友人索去刊载。虽愚昧之性，嗜缀零拾，风雨晦明，颠踬无阻。偶有所记，辄置之椟中，未敢轻以示人，与并世人文、学术讨论之会，显赫时艺之作，自惭形秽，未敢参与其间，是以如爝火萤光，踽踽潜居，黯然而无闻也。今值援老百年诞辰，北京师范大学将编辑出版纪念专刊。刘乃和同志知桢与援老，有忝在私淑之谊，嘱桢有所表示，桢不揣固陋，乃出此编摩之稿，于右军

兰亭真伪颇持有敝帚之见，若援老健在，必能审量桢之治学勤惰与否？惜哲人往矣！乃存此戋戋之作，庶足以志桢向往之忱与怀旧之感，并请同志挚友为之指疵云尔。

二、原　跋

丙辰（一九七六）春，余旅居沪上，吾乡李鉴昭先生自江宁贻余南京博物馆藏、晋王丹虎墓砖及晋豫章内史谢鲲墓碣拓本。谢鲲为晋代清流人士，负有重名，兹迻录其文如下：

> 晋故豫章内史陈世（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假葬建康县石子罡在阳大家墓东北□文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按：《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谢传，与阮籍、嵇康“竹林七贤”并列，当时有“八达”之称。惟“鲲”作“鲲”，“鲲”或魏晋之别字。本传作豫章太守，此作内史。妻中山刘氏，子尚，弟、广等，足以补史传之缺。

自魏晋以来，清谈之说兴，所谓“礼教非为吾辈而设”。彼秉持礼教者，本不欲实行，亦不准备实行之（鲁迅先生语，大意如此），而实以禅让为名，夺取政权，维护其封建统治，作为杀人之工具。故乐广善于名理，王衍善于属文，嵇康、阮籍辈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深为统治者所痛恨，多无幸免者。是以清谈未必误国，而误国殃民者实维持名教之统治者。故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等之“竹林七贤”与董昶、王澄、谢鲲、胡母辅辈之号称“八达”者，既载于《晋书》列传十九本传，复见于晋陶潜之《集圣贤群辅录》，世多高之。若此数人者，非佯狂垢污，隐于酒人，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则难于苟免。然

阮嗣宗之善于用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闻之，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俗之士疾之若雠"，乃能全于晋武帝之世者，则以劝晋武帝加九锡之故。至谢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赋性任达远畅，而恬于荣辱。"虽为王敦长史，敦以除君侧为名，将以颠覆晋室。"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时敦擅权当政，出为豫章太守，得保全首领以殁，卒年四十有三。"敦死后，赠太常，谥曰康，子尚嗣。"鲲在"八达"之中，与世委蛇，未为上品，而渊明犹推崇之者，则以其尚有一节可取也。

至是墓碣为八分书，书法遒隽，尚存钟元常之遗制，不失"受禅表"、"上尊号"等碑书法之矩矱，仍有洛下鸿都之风格，尚不似典午渡江而后，北则元魏龙门石刻，南则萧梁遗迹，以方整为工，竟类刻画，与钟元常、王右军法书迥不相侔者也。桢尝以为古代法书本有应用及美术二体，征诸古籍，亦有可言：一为官府文书，自秦李斯以来，秦代小篆金石刻辞，无不隽秀遒劲，至于汉代西京由小篆变为八分及隶书，如解放后新出土之帛书竹简、《孙子兵法》、《老子》之类，以及历代流传孔宙、史晨、礼器等碑均极雄伟浑厚，气象森严，自魏代汉，"受禅表"、"上尊号"以及"范式"等碑则由庄严静穆而流于方整呆板。沿袭至于晋朝南渡，镌石流传，等于本刻，黯然而无生气矣。二则民间习用文书，自汉程邈等为书写之便利，因繁就简，由秦小篆演变而为八分及隶书，其始也专为供官府徒隶便给之缮写，其后乃为民间工役日常生活普遍大量之应用。由于劳动人民创造之智慧，用之于简牍，用之于亲手制造金石砖瓦之器具，书法绘画，张皇幽渺，矫健奇丽，各体具备，无美不臻，所谓"道在瓦砾"，其最近发现

者，原物俱在，般般可考，本非夸大之辞。因之自西汉以来，迅速为文人学士所利用，用之于书函简牍，乃由民间工艺，一跃形成而为书法美术专家之业，因之在书法上有应用及美术二体，其来有自。并非始自晋唐，如《前汉书》列传六十二《游侠传·陈遵传》："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之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在后。"洎是以后，若西域居延发现之竹简，有奉答"琅玕"等题字，极为挺拔隽秀，又北凉李苞之书札书法，亦极秀丽流畅，与钟、王相近，此自然发展之趋势，何得以二王书法之隽逸超迈、秀丽天成而遽忽之。自二王倡导之后，由章草之板滞而运笔墨，日趋于流畅而变化百出，若唐代张旭等人之狂草如神龙挥舞，气象万千，颜、柳、欧、虞各得右军之神似，迄乎宋代书法苏、黄、米、蔡诸家，乃能表现个人之特性，发抒"计白当黑"之意趣，挥洒自如，各成意趣，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千百年来往哲之謦欬，如现于目前。吾国在艺术上，绘画而外，复有书法，遂成为祖国文化上优良之传统。

然二王法书，本非其原迹，甚至已失去其庐山本来面貌，而成为虎贲中郎者，亦自有说，且即以时代而论，二王法书虽挥洒自如，然亦不应妩媚如斯。盖二王法书经历代之传抚临摹，无不加上时代之烙印，已失其真。一则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之酷爱，兰亭茧纸早入昭陵，经欧、虞、褚、薛诸家之抚摹流传硬黄之本，全为唐人之书，即怀仁集二王法书圣教之序，亦为怀仁结撰之体，徒存其似，更无论矣。二则经宋代淳化阁等帖之传刻，当时赵希鹄即斥为王著之伪作，以椎拓既精，翻本亦广，辨识先后真赝乃在点画之间，然均为宋人米、蔡书格之风味也。三则经明代文征明之描润，文氏停云馆之刻，无不为云间吴门之风也。经此数变，二王法书，仅有抚本流传，名存而实亡矣，转不如阅读魏晋新发现金石砖瓦刻辞之为愈；然不能谓钟、王法书之俱伪也。桢年来嗜汉魏以来金石文字颇有所获，昔年张伯英先生惠予晋左

芬墓石拓本，今李鉴昭先生又锡余是碣，同为晋代俊逸之士，有关史事，不朽之作，用辑而存之。复以昔年所得用方笔写刻之《晋郁林太守赵府君墓道碑额》、《晋荀岳墓石》以及用书家圆笔书《司马炎墓砖》等拓本，蔚为一集，以明魏晋书法变迁之迹，题曰《典午遗风》云尔。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端居不出，草成是文，以就正于读者。

（原载《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

汉刘平国治路颂旧拓本跋

解放之初，余在北京琉璃厂庆云堂碑帖店见有是碑旧拓裱成立轴本，题跋殆遍，并另附散页，考证其事甚详，不知何人所撰。或《神州国光集》第六期所载王仁俊及田北湖等人之考证，以未及细捡，而交臂失之。未几得此旧拓本，第二行秦人之“秦”字未损，赵当卑之“当”字犹见。惟边远之区，拓工草率，字迹模糊；但保存原文之字尚全，当为初出土发现后所拓之本。原文云：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
□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高□
　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至皆
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仇披

继又得上虞罗氏旧藏，有罗振玉书“汉刘平国治路颂旁题字”一行，白纸精拓本。原碑拓本流传较多，而此碑旁题字三行多失拓，流传尤罕，原文云：

京兆长安
淳于伯隗
作此诵

此拓本，纸墨精工，字体隽永秀润，尤为可喜。按：此碑于清光绪五年（一八六六）之夏，吴兴施补华随军新疆，发现于阿克苏东四百五十里拜城东北赛里木山之摩崖。阿克苏为通南疆之要道。碑作于汉桓帝时，发现较晚，各家著述多不及，惟王仁俊、田北湖考证刻石立碑之经过较详。然意亦有未尽者。据王国维先生著《观堂集林》卷二十，是碑题跋谓：西域人多“慕汉俗”冠以汉姓，故龟兹之王姓白氏，刘平国龟兹人也亦用汉姓。然在汉初西域人目汉族为秦人，如《史记·大宛列传》言：“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又《汉书·匈奴传》言：“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故是碑称“从秦人孟伯山等六人共来”。其言甚有卓见。至“狄虎贲”，虎贲为汉代用作人名习见之辞。然以桢读碑之余，更有进而为之补证者，由王国维先生之言，足以说明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声名远被，故西域等地称汉人为秦人；然何时由秦而改称为汉乎？桢恒以为亦有其说，当汉高祖刘邦西击嬴秦，彼时项羽刘邦共约守楚怀王孙心之诺言“先入关者王之”之语，未几刘邦竟先入关，项羽不得已封之为汉中王，曰“汉中亦三秦之地也”。刘邦心中极为不怡，经萧何之劝导，谓“天汉其称甚善，君不闻黄河之水自天汉来乎”？（见于《前汉书·萧何传》）刘邦乃安居汉中，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出其不意，引军东向突

破关东，鸿沟之战以后，楚汉相争，刘邦以智取，既败项羽，建都长安，大建宫室，今所遗留之瓦当，有文曰“汉并天下”，又有文曰“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凡有钟鼎器物铭刻无不题汉字，于是汉遂取秦而代之矣，此华夏之民遂有汉族之称也。然在当时，北方中原一带文化尚不及楚，故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虽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亦喜楚歌楚舞，即歌大风之刘邦亦不能不嗜楚邦之轻歌与妙舞，此我国文化民族之风尚各有所长也，当另文言之。

再从汉代之通西域及刘平国之建置东乌累关城言之。自汉武帝元狩间，张骞之通西域，至于宣帝地节间郑吉始建都护之号，迄于王莽之世凡十有八人，皆以勇略称，班固著《西域传·赞》，引为美谈。新莽攘权专政期间，不能团结各兄弟民族，刻虐为政，西域道路，遂以中断。自东汉光武中兴，西域之路复通。据《后汉书·西域传》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班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已西遂绝。……永兴元年（一五三）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是东汉一代通西域之道路终未能越过葱岭也。此碑建于汉桓帝时，已在汉室武力衰微之际，其实力已远不能及于西域。永寿四年（一五八）即改元延熹，此仍称四年者，固由于道路之阻隔，且汉之政令已难行于阃外矣。然绝塞边陲，犹奉汉廷正朔，当地民族仍与汉民携手合作，共同修治道路，建筑关城，得以从东乌累城，逾过葱岭，使西域至中亚细亚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此吾国人民，齐心合力，斩茅除荆，辟山治路，互相友爱团结之精神，可以上溯于秦汉，此尤足发扬而彰大之也。

至刘平国任龟兹左将军之职，据《前汉书·西域传》谓：“龟兹国置有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后汉书·班超传》称置有“左将军”，是刘平国左将军之职名所由出也。龟兹民族喜治

炼，产铁铅，尤喜音乐，爱慕华风，在唐代有“龟兹乐”之称，为我国唐代人民所爱好。又阿克苏为古温宿国之地，在龟兹之东北，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温宿之名，已不见于《后汉书》，或为龟兹所并，亦未可知。当后汉桓灵之时，政治松弛，对于西域已名存而实亡，而西域人民犹奉汉正朔，辐辏相亲，多有以西域名族袭汉职者，如莎车王贤仍佩西域都护印绶；因之刘平国之为汉人或当地民族虽未敢定，且其名亦不见于史传，然袭龟兹左将军之职，而摄有古温宿国之地，且与回汉民族共同开通道路，通过葱岭以西中亚交通之要道，厥功甚伟，留此丰碑，有迹可寻，其事迹有足称者。至《后汉书》所载：“莎车王贤分龟兹之地为乌累国”。此碑所称：由“□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开通道路，复建“此东乌累关城”，所云□谷关，或系“骆谷关”城，然骆谷关在盩厔县西南二十里，距龟兹之地过远，未敢遽以为定；然建□谷以东之乌累关城，则与史传所述相合，而“断山作孔”，疏通往西域“丝绸之路”及建乌累关城之事，足以补史传之缺，故不揣固陋，揭而出之，以备读史者之参考云尔。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三期）

跋汉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

解放前出土的文物，散见于报刊记载的种类颇繁。但是其中许多文物为古玩商人盗卖偷运到海外，或者被帝国主义者劫掠而去。他们为了防备后人的追查，甚至把出土文物的现场，铲除殆尽，使人们无法知道出土的地点，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我所见到的汉左元异墓石拓本，就是一个例子。

原石为柱形，共有两个，均刻有文字。其一刻的是：

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

其二是：

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

这两件墓石出土于公元一九一九年，为北京古玩商人尊古斋黄百川卖给英国。据夏鼐同志对我说："现藏于加拿大博物馆。"原石四周雕刻的花纹十分精美。字体为八分书，极为遒隽。碑面上

敷着朱粉彩画，不易传拓，听说仅拓了几份。此墓石出土以后，盛传于一时，见于罗振玉、柯昌泗、黄立猷各家的著录，但用的是勾摹本，都把刻石的年代和当时出土的情况记载错了。罗振玉替刘承幹编《希古楼金石粹编》首列此墓石铭文，但搞错了刻石的年代。罗振玉《石交录》卷一说："近年出土汉石不少，其有西汉纪年者，惟山西出土左元异墓石二。书迹完好精劲，因两石均有彩画，运京后贾人不肯拓墨，仅拓一本即为西人购去。予购求墨本不得，仅借得手自钩勒，今尚存行箧中。"罗振玉把左元异墓石定为西汉，正是误东汉和平元年为西汉河平元年。我据罗继祖先生来信说："此碑先祖曾钩摹一本存之，后竟佚去，致徐森老（森玉）欲见而不可得。"说明当时原石拓片已难见到了。

有关左元异墓石的情况，《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载有梁宗和《山西离石县汉代画像石》一文说：汉左元异墓中画像石尚存十二块，现存于该县立之小学校。据贺昌中学校校长刘菊初先生谈：墓中文物已于一九一九年被帝国主义者勾结恶霸及奸商盗走。在掘出之墓柱石上镌有"大汉中郎将骠骑将军左表之墓"及"侄左元义奉敕监修"等字样。按一九一九年为民国八年，正是北洋军阀割据时期，阎锡山窃据山西，当时有不少祖国文物被帝国主义者肆行劫掠运至外国。也正是罗氏在北京见到拓本之时，罗氏与梁文所述情况基本一致。而刘君未见原拓本，致将左表字元异一人误为二人；且所述官爵称谓与汉代不伦，纯属传闻之辞。以上事实也可说明原石拓本流传之少了。

前几年，我偶去北京文物商店，购得左墓原石拓本和《汉甘陵相□博碑》拓本，张彦生先生谓同为汉代石刻难得之品。不久，我又在中国书店和文物商店，先后购得孙伯恒所藏汉代陶片拓本（钤有"埙室藏陶""伯恒得来"等印记）和孙氏影印的原石拓本及照片，影印本和照片均钤有"孙伯恒收藏金石墨本"等印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陶片镌有："西乡仲"；另一陶片镌有："左作"、"左氏"

等印文。陶片花纹极为精美。按孙伯恒名壮，曾任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酷好金石，与尊古斋黄百川为爱古玩的好友。左氏墓石原是黄百川盗卖国外的，则孙氏所藏拓片，很可能就是黄百川送给他的。这些拓本既同为孙氏所藏，而陶片印文又有“左氏”字样，其纹饰、书法风格都与左氏墓石以及现存山西省博物馆的左氏墓画像石相类。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陶片显系左氏墓中出土。这对左氏墓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收获。左元异墓的发现与破坏距今已六十年，从仅存的这些墓石、陶片拓本尚可略窥其规模，可以想见当时随葬品必颇为丰富，但已大部散佚。惜楚人之弓未为楚得，主要墓石竟早流出海外。从左氏墓之厄运，也可见旧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横遭破坏之一斑，恰与解放后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

左元异墓石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也颇有价值。据墓石拓本，该墓建于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一五〇年），仅建元一年，即改为元嘉。墓主左元异的官职为“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幕）府奏曹史”，查刘昭补《后汉书·百官志》无“持节中郎将幕府奏曹史”的名称，而有“使匈奴中郎将”的职衔。左氏居于西河中阳光里，据《后汉书·郡国志》，西河郡下属有离石、中阳。自汉光武以来，匈奴南单于南徙，居于西河、五原之地，汉代为防卫及辑睦胡汉民族，置有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椽随事为员。”则墓石文中之“持节中郎将”，当即“使匈奴中郎将”。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后汉志》卷二十八，大旨谓：“中郎将拥节。建武二十六年（公元五〇年）遣中郎将段彬授南单于玺书，设官府，令入居云中，将兵屯西河美稷，以卫护之。而中郎将设官府置椽史随事增之无定员。”那末左元异所任之“幕府奏曹史”似为中郎将幕府中随事增置之椽史，其官职虽卑，而所任事权则颇为重要。应劭《汉官》说：“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椽吏，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

赂弓马毡罽他物百余万，谒者事讫，还具表，付帑藏。诏书敕自受。”由此可知幕府奏曹史，出纳诏令文书，典司毡罽货物，口衔号令，操纵事权，实出椽史之手，是一个美差肥缺。从墓石题“和平元年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可以知道左元异生前已经营死后的墓穴，像东汉赵岐所自营的寿藏。唐李贤《后汉书注》说：“寿藏为冢圹，称寿者取其久远之意也。”所以这块墓石就题为万年庐舍了。可知左元异死期当晚于和平元年。在这期间，汉桓帝派遣的任使匈奴中郎将者有皇甫规、张奂、郭太等人。据《后汉书》记载，张奂任中郎将时在桓帝初年，左元异既非死于和平元年，他任奏曹史当在皇甫规、张奂时期。皇甫规及张奂在汉桓帝时“以廉隅自持”，有名将之称。而其手下左元异系区区小吏竟能如此厚葬，可见《后汉书》所载：“羌性贪，而贵吏清，（张奂）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是可信的。桓灵之际，为宦官左悺、具瑗等人当政时期，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所谓“左回天，具独坐”。他们的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因之像左元异、王晖之流，虽然做的是“下职末吏”，可是能滥用职权，从事聚敛，攫取了民脂民膏，活着厚自奉养，死后还要修建高大的坟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说明不久即爆发的黄巾农民起义绝非偶然的了。

（原载《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潘景郑《寄沤填词图》序

桢幼读王观堂师之书，谓金石文字盘盂之学，肇于宋代而盛于有清。在昔学者，只不过为骋奇爱博鉴赏之资，其精者若武亿、钱大昕诸家，乃能考辨其真伪，订正其文字而已。迨清季陈簠斋、吴清卿、潘伯寅诸家出，始能于传古以外，鉴古以知今，形成为考古之学。学问一道，后来居上，往往然也。时当清末，国势日危，学者讲求西北史地之学，清议未泯，皆由潘、吴诸家启之。潘景郑先生为伯寅尚书之裔孙，能继其家声，裒藏其余绪。景郑伯兄博山君，喜藏明清书画家赤牍，印有专书，不幸早世。而景郑先生则长于鉴别、训诂、考证之学。于是刘燕庭、叶缘督诸家之藏，兼收并蓄，于吉金乐石之学，乃能发挥而光大之，可谓能继其祖业者也。桢与赵斐云、顾起潜诸兄相处，得知吴中之旧事，停云佳趣之逸风。惜博山往矣，不能亲聆謦欬，而得识景郑先生于沪上。先生恂恂儒雅，和易近人，谦抑之甚，讷讷若不能出诸口者，有长者之风。盖家世簪缨而行同寒素，早已忘其为仕宦之裔矣。辛酉之春，余息影西泠，道出沪壖。先生以阿房宫瓦相贻，并效顾梁汾赠吴季子《金缕曲》相勖。乃知先生室

名寄沤，长于倚声之趣。桢素不谙声韵之旨，然喜咏晓风残月与大江东去之句，既嗜惊涛拍岸，亦爱新词娇韵。桢虽老矣，而情爱之业障未除。亦不喜禅宗之谈，盖欺人之语耳。吾尝师黎洲之学，黎洲先生之言曰："文由情生，凡情之至，文未有不工者也。"又吴瞿安前辈先生之言曰："余尝谓古今文字，独传奇最为真率，作者就心蕴结，发为词华，称心而出，遂为千古至文，若规橅前人，虽人尽石帚，又安足观乎。"当明嘉靖间，弇州山人独霸当时，睥睨一切。昆山归熙甫，唯亭一寒士耳，伏处于荒江老屋之中，寒风烟烈之际，坐斗室项脊轩中，方扬眉瞬目，为有奇景，又所撰《沧浪亭记》、《思子亭记》，虽在数百年之后，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萦回于胸中而不能去，遂夺南都之坛坫，建赤帜于吴中，开顾、黄之先河，蔚为明末清初之学风。今子与吾，一则藏身歇浦，一则匿迹首都，虽书疏往还，未足慰其劳结，然蒹葭秋水怀思之情，识之者又谁欤？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新雨初霁，炎热顿消。安阳谢国桢谨识于北京寓庐。时年八十有一。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一辑）

《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自序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所存留下来的文物品类繁多，有着精美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上，雕刻、绘画和书法同为美术品之一。单从书法而言，就有真草隶篆的体例形式的分别。本编所搜辑的是西汉用隶书、小篆和草隶（章草起始的书法）以及朴素简单的绘画形式，所雕刻的碑刻砖瓦的拓本。

寻流溯源，我们就从秦末、汉初谈起。在战国时期，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已经初步繁荣，各地方的文字虽大同小异，但因为路途辽远，交通尚不甚便利，各地方语言不尽相同，文字形式也就颇不一样，用起来颇不便利。秦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乃形势所趋，势所必然。秦朝丞相李斯对于书“同文”有一定贡献，他集中各地方的钵印不同形式的文字，即所谓大篆，爬梳整理改写成为小篆。李斯是荀况的学生，明于政治和法律，又写的一笔好字，当时秦政府所颁布用于市面的律、度、权、衡上的铭刻，都是李斯亲笔书写并用模子塑造出来的。根据清末金石学家

潍县陈介祺收藏的秦瓦当拓本，得知秦代还有用李斯亲笔写的字雕刻到瓦当上去的。小篆产生后，随着文字简化的趋势又出现了隶书。下杜人程邈曾因得罪秦朝中的官吏而被下到云阳县狱中，他覃思十年，改革旧体，写成了三千字，把繁缛的篆书改变为简易的隶书。秦始皇善之，把他释放了，任命他为御史。结果秦朝文件用隶字写，取其便利，就通行于全国，所以班固说："此徒隶之书也。"这种书法虽然通行于一时，可是独于使隶人（胥吏）佐用之，因为易于书写，叫做隶书。吏的权力是很大的，秦代所谓"以吏为师"就始于此。但是书法之中有隶书并不始于程邈，如战国时期齐国临淄发现齐太公世孙胡公的棺椁上，刻有形同隶书的篆字，这就说明齐国的印鉢文字已经有日趋简易的趋势了。

至于西汉隶书的体裁和格式，与程邈同代人有王次冲，他把秦朝小篆增广成为隶书，亦称"八分"，就是取材二分小篆增加八分当时徒隶通俗所写的字迹。班固称他是"苟趋简易，而无点画之势"。元吾丘衍说："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隶则易识，比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隶，则得之矣"。又说："隶书人谓易匾，殊不知妙在不匾。（即东汉人所书）有拨平硬，如折刀头者，方是汉隶书体。"概括的说："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上均见元陶宗仪《书史会要》）这说明了西汉隶书与东汉隶书的区别，凡是汉隶有挑拨钩勒，写的曲折秀丽有姿态者，则多是东汉的碑刻，到了汉魏如《上尊号》、《受禅表》之类的书法又趋于方整，这就可以说是汉魏以来隶书趋势大概变迁的情况。我认为西汉碑刻的书法，由小篆而渐变为隶书，字体由曲折圆润渐变为疏润方整，以朴拙整洁而见其优美雄伟的气象，本有其原因所在。西汉隶体的书法结构，废除了矫揉造作曲折圆润的姿态而演变成横平竖直的隶书，这就好像积木造屋搭桥一样取得自然优美的形态。如西汉《五凤二年刻石》和《始建国天凤二年莱子侯刻石》，信笔而书，挥洒自然，真有天马行空、孤鹜与落霞齐飞之妙。这正如邓

石如所说的那样:“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西汉书法的妙处就在空间的布局。她虽然如长江大河，狂流奔放，一望无际，然而夔府落照、巫峡神女峰时出没于其间，真是尽人间的妙景，艺术家的能事。但是西汉碑石砖瓦遗物，或者为当时人所不注意，如《汉五凤刻石》始发现于金明昌年间。而在明清时期极为罕见，清初学者朱彝尊还不能辨认它是石刻还是砖刻。扬州汉广陵中殿刻石是在清嘉庆年间为伊秉绶所发现，还被认为是人间的瑰宝。以我的愚妄之见，如明清时代赵宧光、赵崡等书法家所写的汉隶多是以意为之，就是清初郑簠的隶书又何尝不多臆造，自邓石如出，乃能渐得汉隶之妙。伊秉绶墨卿生于诸人之后，当嘉道之时，秦砖汉瓦碑刻发现日多，使他寝馈其中，耳濡目染，乃能升堂入室独得西京文物之妙，濡笔染物，效法西汉隶书，渐得其神髓，为他人所不及。墨卿能独步于一时，启清道咸以后研究西汉书法的门径，开考古学之风气，这种说法非我阿其所好的私论也。

解放后，秦朝宫殿、西汉时的陵阙其中珍贵文物被发现的日多，如居延张掖等地的汉简、湖北云梦的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山东银雀山的汉简等等文物，记载了秦朝律令、汉代契约，还有《孙子兵法》、《老子》和古代地图、药方等等已佚古籍。又如山西侯马盟书出土，也为研究先秦史和先秦书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总之，这三十年来可以说是晋太康二年汲冢《周书》出土以来最大的一次发现，给祖国文化增加了灿烂的光彩。用西汉隶书所写的文献，为数众多，屡见不鲜。这比起解放前特别是清末民初时西汉的文书碑刻很难得见，偶遇一点断羽零圭就被认为是奇珍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吴兴徐森玉先生长于金石书画考古之学，尤精于鉴别古物和书籍版本刊刻的真伪，北京、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保存不少奇珍异宝，莫不经徐森玉先生鉴定。徐先生抱此绝学，曾

著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刊载于《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五期),例举如《汉群臣上刻石》等十种,绍述其渊源,辨别其真伪,考订极为精确。惟所述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百五十年)《左元异墓石》误为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二十八年)(此石被奸商盗卖于英国,现藏于加拿大博物馆。原石拓本流传甚罕,余仅藏其一本,即雪堂老人罗振玉亦未见过),此种小疵不足以当大累。

我二十多岁时服务于北平图书馆,追随于徐森玉先生之后,亲聆其謦欬,偶识其余绪,也养成了喜爱书籍碑刻的癖好。偶尔阅肆,见有书籍碑帖,心之所嗜,虽残编零帙,亦收购以进。帖友张彦生先生精于鉴别,博雅笃实人也。余本外行,凡有所得必请教于张君,彦生君为余收得伊秉绶墨卿手题汉广陵中殿刻石初出未断之本、黄易小松、庄缙度眉叔亲自装订手题汉魏碑刻十余册、盛昱伯羲旧藏汉君子砖十种、日华宫砖一种,皆为难得之品。周叔弢先生复以其介弟季木先生所藏《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全部拓石相遗。罗继祖先生知余嗜碑帖,乃以令祖雪堂老人所藏《西汉杨量买地卷》旧拓相馈。故友朱鼎荣先生复以旧拓本《汉赵王上醻刻石》,为余八十贱辰之赠,于是西汉碑刻俨然略备。年来寻书访碑游历江浙四川等地,南京博物院、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四川成都博物馆已故冯汉骥教授、西安博物馆、山西太原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开封地开区文物保管会和辽宁博物馆负责同志均以新出土汉魏碑刻砖瓦拓本相赠,嘉惠学人之心,实为可感。桢以年老体弱,息影春明,襞绩丛残,整理旧业,编辑成册,间加以注释,考订其出处渊源,其拓本多有出于徐森玉先生所著《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以外者。如不编辑成书,久后恐将遗失,同时也为了纪念徐森玉先生生前治学的不朽业绩,又承人民美术出版社大力支持,影印行世。本编是以桢之所见的拓本略加整理,注明其出处,考订其源流事实,凡有关于古为今用之事,及书法之优良精美和在艺术上的价值,都略作说明于后。

桢猥以谫陋，少不努力，以至于垂老而无成，亦得附骥尾于其后，既感惭恧，尤觉厚幸，并感谢各单位及友好同志之将伯之助。此国家之公器，较为罕见之珍本，故辑录成编，以飨海内外书法和金石碑刻之爱好者，至于编辑不当和考订校正错误之处，亦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教正。

安阳谢国桢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识于北京，时年八十有一。

（原载《晋阳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鲁迅与北京风土》序

我在沪上，于王西野先生座间，得识邓云骧（云乡）同志，读到他写的散文，文笔极为雅隽，吐属不凡，因之很谈得来，才知道他与我在北京时有同学之谊，异地相逢，备感情亲。未几，我回到北京，云骧同志也来春明，相见甚欢。我说有什么新的作品，他出示了《鲁迅与琉璃厂》一文。我爱书成癖，对于逛琉璃厂还是不陌生的，我看他写的，征引事实，言之极有风趣，我就介绍给《人民日报》文艺编辑部姜德明同志，不久就在《大地》上发表了。他就连着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写鲁迅在北京的事迹，斐然成章。刊登出来，颇受读者的喜爱阅读。因之把这些丛残的文章，积累起来，编成了《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交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表明爱人及屋的深情，更足以启发人民群众仰慕鲁迅先生精神的感情。我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个人，也还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也好饮酒、吸香烟、吃小馆子；但是他有“硬骨头”那种劲儿，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畏强暴、与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要是专看到他一点有风趣的生活，那就失去鲁迅先生一生战斗的意义了。所以云骧兄叫我作的一篇序言，虽然不耻下问，愧我无才，就不敢下笔了。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看

见他写的读鲁迅先生所写《记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中涉及到清代西太后那拉氏杖杀沈荩的事迹，说明了那拉氏擅政，蔑视清朝的祖训和《大清律》，无辜杖杀志士，以及沈荩烈士英勇牺牲的情况。我看了这篇文章，不觉油然起敬，我后悔我固执的心情，连忙提起笔来写了这篇“序文”，以志吾过。想云骧兄也能够见谅的。

遗憾的是，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奖，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也因为学问浅薄，品节不立，碌碌过日，少不努力，以至于垂老无成，实在难以愧对。到了十年浩劫的时代，把我隔离开来，悔罪省过的期间，有了闲的功夫，我才开始读鲁迅先生的著述，指明了我治学作人的方向。我初步感觉到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不是正统派史官所写的，不像那样歪曲事实，因而多少反映了历史的事迹和社会上的真相。又以汉魏以来石刻画像包含了当时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在鲁迅先生的散文、书信、日记中是屡次提到的。他老人家因为在四海腾沸、国无宁日的日子里，在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忙于与敌人作战，来不及做这些事情；但是鲁迅先生还说过：“如有功夫的时候，还想做一做。”因之我不揣固陋，在这悠闲的岁月里，初步搜辑这两项资料，加以排比和整理，试图学习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草成了论著。所幸的是，这些粗糙的东西，都已经出版问世了。虽然想就方家请教，自然是要见讥于通人，贻笑大方的，不过我逐渐地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遗教，自己解剖自己，想起来我拙囊的行动好像是“阿Q”。我引阿Q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作为一面镜子，引镜自照，可以看见我不识时务、呆头呆脑的样子，当然不会有赵太爷这样的人，叫我不准革命吧！云骧是知我者，故敢与之商榷，当为之掀髯一笑也。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记于北京寓庐之瓜蒂庵

（原载《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

《中国善本书提要》序

我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最早认识的就是王重民（字有三）先生。我们很谈得来，是最知己的朋友。有三兄是一位笃实诚恳，言而有信的人。他一生行事，坚决有为，凡是认识他的同志好友都知道，不必我来细谈。我认为他在解放前夕，代长北平图书馆时，为国家保管大量的图书文物，能忠于其事，更是值得钦佩的。

我们两人在学问上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是一个浮浅粗糙的人，有三兄很能规劝我。我虽然略为知道明末清初甲申、乙酉以来的事迹，但是对于版本目录之学知道的很少，他教给我颇多的知识，可以说他是我发蒙振聩的益友。解放以前，我与他茗椀谈心，交谊情深，在这里不详谈了。解放初期，柳亚子先生出资增辑拙著《晚明史籍考》，他为我在北京图书馆中辟研究专室，并组织"明季史料讨论会"，帮助我修改。他编辑《徐光启集》的时候，我也借给他《庖言》等书。其时，我每到北京大学米万钟氏勺园风烟里的旧址，必首先访问他及向觉明（达）兄于未名湖畔，谈起话来是很起劲的。自两君故后，我就很少到北大去了。有三兄的夫

人刘脩业同志，也是与我同服务于北平图书馆的老同事。脩业同志著籍福州，是闽中的世家，与有三兄共操金石目录之学，亦是学界的佳话。想不到在十年浩劫期间，觉明和有三诸兄，蒙不白之冤，相继而逝，想起来令人愤愤。虽然有三兄的撰述长留于天地之间，而往者已矣，百年莫赎。我以垂暮之年，怀念旧友，真有山阳闻笛之感，所以不管文字的拙劣，义不容辞地写了这篇叙言，先说我们两人的交情，底下再说有三兄一生学问的造诣。

有三兄是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兼史学家。他的治学有卓越独到的地方，就我肤浅之见，有三个特点，略述如下：

一，版本目录这一专门学科，照宋代郑樵说来，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志略》)。这就是说，考证学术传刻版本的异同，辨明学术发展的源流，是研究各项学术必要的途径，它的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拿现代的语言来说，叫做“版本目录学”，也可以叫做“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学者专家们，要是光谈理论而不谈实际，这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合乎科学研究的方法的。那末，怎么样才能明了书籍的收辑荟萃和学术发展的源流呢？这就要研究版本目录之学。在古代，一切有关朝章典故的文件(后来的档案)和图书的记载都是由官府掌握的。战国初期，老子(聃)就为周室(东周政府)的柱下史，掌管过官府的图籍资料。汉兴以来，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尤好学术，设立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其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编辑上古以来的历史，写成《太史公书》，通称《史记》；其中论六家要旨，就是对战国秦汉间的学术源流进行整理、分析、评价。刘向担任兰台令史，进一步整理古代典籍，将它们分为七类，并于每部书著文一篇，解释其内容，上之皇帝。《隋书·艺文志》载刘向有《七略别录》二十卷，现存仅有《战国策》、《国语》的后序等四五篇。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著有《七略》。到了东汉时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就把刘歆的《七略》全收进去；他将当时学术的派别，分为

九流，“三坟五典”等古代的遗书，差不多也包括在内，因之，目录学也可以叫做流略之学。从汉魏以来，中经两晋、五胡十六国之变，南北朝的对立，到了隋代又归于统一。唐朝建立，唐太宗李世民命魏征等编纂《隋书》，其中有《经籍志》，把近千年来的名贤著述，都网罗进去，使后人得以寻找图书存亡的痕迹，对于访求文献有莫大的便利。

自两汉以来，宫廷中莫不建立有藏书之阁，清闷之地。如西汉有兰台，东汉有仁寿阁，隋有嘉则殿，唐贞观时建弘文馆，北宋有三馆、崇文院、秘阁；及至南宋，则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到明代有文渊阁、皇史宬，迄于清代，有文澜、文津等七阁、四库全书馆。历代藏书皆编有书目，如果整理起来，就可以看见我国人才蔚出，学术发展的历史。但是馆阁庋藏的书籍，中经变乱，多已散佚，而馆阁书目也多不存在了。宋代《崇文书目》，浙江宁波天一阁仅存残目五卷；明杨荣所编《文渊阁书目》所存则卷帙零乱，如同断烂朝报；清代自《四库全书》编成以后，近二百年来没有续编，真是一件憾事。总的说来，祖国文化优良的传统，对于历代宫廷官藏的书目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叙述和记载，还不如佛教《大藏经》，有其历代收藏和刊刻源流之较完整的记录，像《阅藏知津》等书，进行介绍。历来的有心人士，早已有鉴及此，梁启超师所编《簿录学》(草稿)已加注意，然未能成书。有三兄能绍述其志，对于记述书籍存亡的簿录之学，能够详其渊源，如数家珍，为研究史学史作了奠基的工作，为学术界开辟了新的途径，功绩实在不小，可是这项工作只可与知者道，而不可与不知者言也。

二，研究版本目录之学，尤其是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读一部书，不能光看序目，见首而不见尾，顾前而不顾后，草草了事，不负责任，否则可以说是自欺欺人，贻误读者。我就犯了这个大毛病，悔之已深。同时读一部书，要能够知人论世，与明了

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情况不能分开。有三兄读书、做事皆极为认真，所以他著的提要，对于书籍的内容，主要的篇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情况，与所交往的人物，所谈的都是确凿有据，言之成理。尤其是有三兄湛深精思，考订事物版本具有真知灼见。如我藏有一本缪荃孙批校宋朱彧著《萍洲可谈》，经他和觉明兄审阅认定是一个伪本，但确是宋人所著的另一部笔记。这样，既纠正了前人之失，又在宋人笔记中多发现了一部新的著述，实在是一件发潜彰幽的益事。

三，研究版本目录之学，所以要明了书籍的页数、行款、尺度的大小、刻书人的姓名、装订的形式，为的是给后人留下原书的本来面貌。在还没有摄影术的时代，书籍本貌的留存只有靠影钞或模刻，古人叫做留真。留真这两个字，见于《前汉书·景十三王传》，其由来已久，清末杨守敬所镌刻的书影，叫做《留真谱》，其来是有自的。有三兄所撰的提要，对于每书的行款，每页每行的字数，以及刊刻书籍的逸事，记载得极为详细，这种做法，不要看它是一桩细事；有人甚至讽刺为“书皮之学”，这是不对的。故友赵万里先生尝对我说：顾(广圻)批、黄(丕烈)校、鲍(廷博)钞的书籍和他们所著的题识之所以可贵，因为书籍既经他们考定版刻的年代，评定真伪，和当时获得此书的情况，则此书的源流全都表现出来，给后人读书或校刻书籍以不少的便利。有三兄不但能绘画出书籍的本来面貌，而且能提要钩玄，详述书中的内容，不是浮皮潦草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工作，这是极为可贵的。

有三兄所写的《提要》稿子，在二十年前我曾见过一部分，那就是他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书录》；印刷得极为精美，所著的提要，引经据典，叙述很有分量。书中也提及贱名，纠正我所写《晚明史籍考》中的错误，实在为之感愧。

近见刘脩业同志编录有三兄所撰的《提要》，收辑尤为繁富，就给我的首卷来看，订正文字，整理得一笔不苟，多有我所未见

到的书籍，增益了我的见闻。如明末闽中学者何乔远，是个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所著《名山藏》有《方技纪》、《货殖纪》，记载了历代正史多所忽略的科学家和对外贸易商人的事迹。桢《晚明史籍考》对之曾有叙述，诚有一得之愚，然对《名山藏》版刻情况稍略，有三兄则考订了《名山藏》各种刻本卷帙先后的不同和书中的篇目，适足以补我之阙略。至《提要》中所涉及的明万元吉《墨山草堂集》及《弃草》等，皆是我没有见过的书，足征桢学识的谫陋。虽然仅见吉光片羽，粗读一过，可是获益不少。

今脩业同志把有三兄的遗著《北京图书馆善本书提要》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录》及其题记蔚成一编，标点校勘，整理得井井有条，其嘉惠学林，实非浅鲜。可以与漱玉词人帮助明诚学士校订《金石录》媲美，可惜鸿案齐眉，而不能同登白首，前后如同一辙，实是人生的憾事。多年挚友，为之写此赘语，真是百感交集，尽一日之力，草草写成，掷笔而起，为之太息。

一九八二年二月三日谨识于上海复旦大学寄庐

（原载《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

王国维先生书孙益庵《〈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手稿跋

壬戌初春，桢游吴门，于苏州博物馆郑万煜同志处，见有王静安师为孙德谦（益庵）所撰《〈汉书·艺文志〉举例跋》手迹，此文已见于《观堂别集》卷四，惟《王静安先生遗书》印本，“跋”作“后序”，“均未讼言及此”，“讼”作“颂”，足以补印本之疏漏。孙君著是书之意，在于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之《七略》而纠正其未备，乃举出“出入，称省”两例，以明了“刘略”、“班志”之异同。静安师乃就二义而发生疑问，举其要者约有三点。一为“刘略”多据汉代官廷中所藏之“中秘书”，然“班志”《六艺略》中，于各家经学传授多有漏落，是否刘歆《七略》原文如此，其可疑者一。次则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七略》者乃是《别录》略出之书，故谓之略，“录”与“略”著录之书，不应有异，乃“班志”著录此书之卷数与《别录》颇有不同。刘向《别录》本著录《楚辞》十六卷，而“班志”不但无《楚辞》，亦无景差、东方朔《十七谏》之文，此其可疑者二。终则班氏所见《七略》未著录之书，班氏修《艺文志》本有新入之例，然如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则未入录。班氏有入录有不入录，其取舍之义，究竟若何，不得而知，此其可

疑者三。若此三事，皆昔人所未述及，静安师深思极虑，能想出问题，又能解决问题，发前人之覆，而能有所创见发明，此所谓“读书得间独出新裁”，为前人所不可及者也。

桢尝以为版本目录之学，究其本源，盖出于“史志”。据静安师《释史》(见《观堂集林》卷六)一文，谓：“《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然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江氏永乃谓史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其说颇为允当。以桢管见，当原始氏族社会，以狩牧渔猎为生，所得禽兽物品，有人专司其事，将记其所获数目于簿录之中，以备后日之检查，此史事之所由出，故史学出于王官，其来有自。及乎商周战国时期，经济繁盛，政治文化日益发展，于是老聃为守藏吏。所谓柱下史，即现在之图书馆长，得见百二十国之宝书，总结其精华，记录其实践之经验，写成为《老子五千言》。迄乎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皆有记载，孔子曰：“齐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义一也。”战国之时，如《世本》、《国语》、《战国策》等书，已各有其史实之记载。至西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史记》则集其大成。其史册典籍，西汉武帝时则藏于兰台令史，东汉光武以来则藏于东观及仁寿阙。于是班固因之得以写成《汉书·艺文志》，则专记九流七略目录之学。自魏晋以后，中经十六国之乱，朝分南北，胡马渡江，文物虽盛，中经兵燹，书有七厄，时有散佚。至隋代统一中国，隋文帝杨坚整武修文，搜集典籍图书尤为繁富。唐代魏征领衔所撰《隋书》，其中《经籍书》实集五代之大成。唐兴，以唐太宗李世民之文治武略，称雄一时，凌烟阁中所征集之书籍，种类之繁仍超不出隋代，然经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魏征等之惨淡经营，文化之盛实成光辉灿烂之局面。自唐以后，虽中经战乱，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主初兴之际，必定提倡文化，网罗散佚，如宋代之编《崇文总目》，元代之编《经世大典》，明代之编《永乐大典》，清代之编《古今图书集

成》、《四库全书》，虽然均系官书，然可以窥见学术之盛衰，文化之升降，遂成为“史志之学”，可云为“目录学史”，换言之亦可谓“史学史”。昔东汉以来，释教东传，历代所刻藏经，释家编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阅藏知津》等书，近人叶恭绰著有《历代藏经考略》。解放以来，发现历代所刻之藏经版片尤繁，现均藏于苏州西园，保存尤为谨慎。释家官刻藏经，有综合之纂述。据我国版本目录学中史志流传之记载，自宋郑樵《通志略》倡导以后，继起者尚乏其人。昔梁任公师曾著有目录学《簿录编》一书，其第一类为《史志及补志》一章，因年老多病，未能竟其业而遽归道山，桢曾藏有其残稿，犹存箧中。故友王重民先生毕其一生精力，曾欲撰目录学中之史志学史，曾以语余，亦未见其成书。盖研究目录学史，或史学史，窃尝以为必须知其当时社会之背景，学术之渊源，犹如研究马列主义必须知其三个来源及其思想变迁之经过，与当时革命实践之经过相结合，然后能学有根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始能取得成绩和效果。如明代史学家胡应麟、思想家李贽、清代考据兼思想家戴震以及龚自珍之学术思想，徒提出其个人之思想，独立孤行，以个人唯心所欲而评骘之，则望风捕影，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虽可喧赫于一时，恐不能征信于来者也。语云："无征不信"。来日方长，发扬光大，是在诸公。桢少不努力，骛于外务，空受业于观堂师、饮冰师之门，时光虚度，遂至于皓首而无成，谨瞻遗牍，曷胜汗愧。惟守魏武公之戒，尚不敢懒惰，“嗟贫伤老”，以此自限而已。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午夜，受业谢国桢谨识于
春明团结湖畔之瓜蒂庵。

（原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

这是谢刚主(国桢)先生为北京图书馆所编先父叔弢先生捐献的善本书目所写的序文。"自庄严"语出佛经。"庄严"译自梵语，意为装饰。"自庄严"谓积累功德以装点自己。"堪"同"龛"字。"至德"是旧日县名，今与东流县合并为东至县。先父与刚主、斐云两先生论交近五十年。晚年每来京开会，必访刚主先生畅谈，亦必往探视卧床多年仅存一息的斐云先生。赵谢两先生先后谢世，先父亦于今春弃养。老辈道义风流，追怀无尽。书目早已交付出版社，出书之日尚未可期。《史学月刊》将刊布刚主先生此文，编者嘱识数语。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周一良　谨记

昔班孟坚有言，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抄写与之留真，得书多与汉朝等。至德周叔弢先生家世簪缨，而行同寒素，编摩典籍，沈博绝丽，为当世所称许。尝抒其长才，经营实业，佐理市政，经济为之繁荣；处理事务，秩然有序。休沐之暇，仍不废占佯，手不释卷，嗜书成性，

有真知灼见之明。凡遇宋元佳椠名钞，不惜斥其财力而购之，夤夜校雠，专精宁一，而赋性恬淡，守约安常，此所以得享长年，即“自庄严堪”之谓也。

先生尝出其积年所得善本书目，举以示桢。凡其庋藏之书，宋本二十二种，元刻五种，明初家刻之书四种，明活字本四种，明代名贤钞本四种，毛氏汲古阁钞本二种。手自校勘，丹黄殆遍，所以考辨其是非，订征传本之谬误，以继黄、顾版本考勘之学为宗，而本古为今用之旨，传古信今，以津逮学林，用意至笃。桢以末学，曾追随前辈长者之后，旋得聆公之教益，间亦嗜乙部杂家之书，喜闻月泉沙社之事，恒欲结撰成编，而订补有待。见公目录之中，若《东林十八高贤传》、《残明事迹备采》以及《西洋番国志》诸书，皆桢所未睹者，以是知桢之谫陋，而公之沾惠后学多已。

间尝以为版本之学即为古籍留真之谱。清代学者洪稚存有言，以为版本之学有校雠、鉴别、赏鉴三家。公之于学兼通目录，于校雠赏鉴之事，兼而有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当亦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地址、时间、年代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著，如《文心雕龙》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辨赜金源平水宋蜀浙建昌版刻之区分，而辨析元明以来名家，如菉竹堂、脉望馆名宿钞本为尤难。公于鉴定佳椠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兄曾语余云，公为真懂书者。此非桢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

夫版本之学首当能获其祖本，然后加以校雠。一字之别，即有重于兼金；毫厘之差有谬于千里者。然宋本亦有监本、家刻、书棚本之分，间有帝虎亥豕之误。如南宋蜀刻本《杜荀鹤集》有“大家怕手高声唱”，一望而知为“拍手”之误，不能因其微眚而遽没其大节也。先生之于收书，衡量最严，多取其上驷，如目中所

载之《周礼注》十二卷，即为宋婺州家刻之善本，为聊城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书之所以重祖本者，若经部之书，宋本注与疏分刻；自南宋以来，注与疏乃合刻。疏分隶于各章节之下，颇有删节，而弥失其真。此单注与单疏所谓正义本之可贵也。桢素昧于读经，就史部言之，《史记》一书在宋黄善夫本以前，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本自单行；自合刻本以后，《正义》颇多删节。如《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有《正义》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注明三楚之意义。今本脱去此十六字。《史记正义》中如此例者不胜枚举，见于邵晋涵《南江文钞》，此证明考据校勘之学为可尚也。由此进而言之，张菊生丈之校勘百衲本廿四史，至为矜慎，虽片语单辞，形音易舛者，亦必究心。如《南齐书》本纪中有“口中出血”辗转误为“舌言”；又《辽史》中“钩鱼”为辽主游畋之礼，今本作“钓鱼”，大失其真，获此孤证，幸存典章。此版本之学有裨益于治史不可不明者也。昔赵斐云兄及桢为公进《埤雅》，黄荛圃已为之精校，又请高邮王念孙为之作长跋；又如荛翁获得旧钞本金刘祁《归潜志》，乃邀南浔施国祁至吴门为之校订，改“铜壶”为“铜壶”，校雠之勤，细如毫发，后刻于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中，遂成千古佳话。斐云兄谓余，书经顾、黄诸君校定之后，如操左券，足以信今而启后。于是当时缙绅士夫笃于传古者，若石研斋秦氏为刻黄校《骆宾王集》；平津馆孙氏为刻顾校《续古文苑》；阳城张氏延顾涧蘋为校刻涂刊《盐铁论》，于是清代考据之风大行于世，皆顾、黄诸家倡导之力也。

自明季以来，西学东渐，洎夫清雍乾间，严于野史之禁，有心之士，栗栗自危，乃于哲知之学，一变而为考证之法，取释氏因明之论，西哲形而上学之旨，用归纳演绎推论之法，使古代典籍散佚之书，为之爬梳整理，匡缪正讹，因之明白晓畅，可以卒读。然为时既久，渐流于支离破碎之辞，戋戋识小之录。于是龚

魏之学，出于旧学之中，而敷之以新义，发潜而彰幽，于清末内忧外患狎集，生民涂炭之时，足以唤醒国人奋发有为以为佐治之资，其功不可没也。

自顾、黄诸家校理典籍网罗散佚之后，至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军兴之际，时已相隔约数十年。中经清兵镇压，烧杀掳掠之后，时局不靖，书籍日就沦散。于是独山莫友芝游幕于江淮之间，搜辑散佚，俨然成聚，编成《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颇有罕秘之本，惜不能守，后归于吴门顾紫大氏，藏诸怡园，秘不示人，今所盛传其孙顾鹤逸所藏之书是也。今先生距莫郘亭藏书之时，已近百年，时局动荡，逾于往昔。中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割据，依托外力，操戈相阋，时局极为混乱。如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册、典籍沦为废纸，论斤斥卖；至于历代文物，佳椠名钞，则为奸商劫掠，鬻诸外国。如吴兴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三菱洋行所得，建静嘉堂文库以蓄之；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亦朝夕不保，公乃竭其财力，凡有精刊名钞，无不以善价得之，积腋成裘，蔚成巨制，晨钞露纂，精缮校雠，编成此目，举以献诸国家，其功不其伟欤！

桢生也晚，亦曾设砚于太液池旁，得读文津阁藏书，从徐森玉、赵斐云诸君学，旋又得识公及郑西谛先生。桢道出津门、沪渎，辄与公及西谛相过从。西谛耽书如命，每遇异书，不惜典衣购之，势必得之而后快。旋于沪壖书肆上，获荛圃旧藏孤本《元明杂剧》，脉望馆故物也。解放之夕，蒋帮政府岌岌不保，将古物书籍南迁，运至台湾。西谛在报端发表《古物何日归来》一文，蒋政府得稍敛迹。自解放以来，党及政府重视爱护祖国文化书籍，西谛实司其责，乃与徐森玉、赵斐云诸先生筹策擘划，充实北京图书馆善本书藏，多方采访，私家供献，库中藏书得以无缺，然尚未能得千元皕宋惊心动魄之善本也。公乃以毕生精力所聚宋元佳椠，明贤钞藏之书，编成目录，举以献诸北京图书馆善

本之室。于是金匮石室之藏，琳琅满目，焕然生辉，实为镇库之宝，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之奠基石也。其来日正长，如春华秋实，方兴未艾。森玉、斐云诸公固好事者，闻祁阳陈澄中所藏善本散在港澳，乃不惜輂重金以购得之。其中所藏如钱牧斋绛云楼旧藏《前汉书》宋刻佳本，山阳丁氏旧藏北宋石经拓本，南宋蜀刻本之《张承吉集》为海内外孤本，《张承吉集》近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之影印，以行于世。当时北京图书馆开展览会，邀余参观。时桢已脱离北京图书馆工作，调任科研之事，乃欣然应邀，得以阅读各书，古色盎然，至徘徊于展览桌前，而不忍去。今西谛为国捐躯，森老、斐云相继而逝，为之腹痛。自十年浩劫以来，北京图书馆收进善本之书，阒然无闻，遂使宋元佳椠流落肆上，为之慨然。当此歼除四凶，建设四化，拨乱反正，百废俱举之时，北京图书馆为学林渊薮，众望所归之地，踵事增华，收进宝藏，固意中事，无待桢之喋喋，然不胜企予望之。

所可庆幸者，公年登九秩，彭寿可期，而桢贱齿已逾耄耋，童颜白发，时相过从，不吝一瓻之借，并举其所编善本书目嘱为之序。公以为朋友往还，老成多已凋谢，山阳闻笛之感，黄垆怀旧之思，忆往开来，无逾于桢者。余乃沾笔吮毫，回溯往事，感知己之情深，忘老骥之伏枥，乃不辞下询，然感慨已深，因思公硕德耆年，而桢亦嗜书成癖。公以卓绝之识，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而桢拾其爨余，野史谀闻不登大雅之书，而引以自喜，实则公摘其硕果，而桢拾其瓜蒂而已。因编成《瓜蒂庵野史笔记目》，将作芥献，以供学人之探讨，此则与公有同感者也。爰不忝而为之序。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即辛酉中秋节世晚
安阳谢国桢谨识于春明寓庐之瓜蒂庵。

（原载《史学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李君实杂著》跋

是书汇辑李君实著述，计为《六研斋笔记初、二、三笔》、《紫桃轩杂缀》、《又缀》、《墨君题语》、《游白岳记》、《篷栊夜话》、《玺召录》、《蓟旋录》凡七种，缺《竹嬾画賸》、《续画賸》一种。明李日华撰，明崇祯间刻本。君实尚有《味水轩日记》，有嘉业堂刘氏刻本。日华字君实，号竹嬾，秀水人，以书画著名。余幼时曾得先祖仲琴公所藏君实绘花卉册绢本，以负笈春明，为衣食计，不克自守。比服务于北京图书馆，课业之暇，始稍稍喜收书，乃得是书于邃雅斋，为宿迁王氏池北书库旧藏，软布裱装，订六厚册，一望而知为百余年前装订之物也。自是余更嗜收辑明清稗乘，间有所获。此书遂为余藏秘籍之一，置之行箧，垂三十余年。近又得亦有生斋刻本《韩诗外传》，白纸初印，外有软裱，亦池北书库之物。王起隆序《紫桃轩杂缀》云："君实先生人品文章，书法绘事，谭谐禅悦，种种擅当世之尤，大类坡公。"其同里谭贞默则称其所吐余滓亦悉为珠玉，未免有标榜夸大之辞。余于书画实所未解，然君实是书为后来谈书画者所宗，间记当日时事，亦有可取。至其为文颇涉情趣，洁而不芜，偶一读之，亦是一适，其所

著《蓬栊夜话》，则记其游白岳时，风雨一舟，依槛间眺严滩景物，听贾客雄谈自恣，乐而忘疲。摭其可喜可愕之事，辄削椟投囊中，因汇而成帙。今读其文，绘影闻声，仿佛如置身于富春江上也。

《中隐堂杂著》跋

《中隐堂杂著》计为《磨盾集》二卷、《说梦录》一卷、《骖鸾小记》一卷。清方炳奎撰，光绪间刻本。炳奎字月樵，桐城人，咸丰二年进士，官至广西平乐府知府，中隐堂者，炳奎官平乐时所建之堂也。《说梦录》为记皖江风物，以及其车尘马迹，官游南北，登山临水，所见名胜之作。《骖鸾小记》则仿张祥河《续骖鸾录》，为其服官粤西时，迹遍全省，叙述桂林阳朔山水之胜，并及少数民族风俗遗事。然所记者为海内风光，世所艳称，且散见于他书，多属习见习闻之事。惟所著《磨盾集》记其亲手镇压广西莲塘农民及徭民起义之事迹，为研究清代末期农民起义较为直接之资料，有足为考史之资者。炳奎自清咸丰三年筮仕入京，时当太平革命军奠都南京，即命李开芳等率师北伐，挺师北进，势如破竹，直抵天津近郊之杨柳青。曩年余在天津时，曾游杨柳青，见一小学壁上尚嵌有清代人士记载太平军进占杨柳青之石刻遗迹，未始不回溯思及当年太平军声势之雄伟也。然卒以孤军深入，军储不继，虽有静海、唐官屯等地人民之支援，与清军相持达经年之久，终见败于官军。炳奎甘为清廷爪牙鹰犬，以办团防

丑功，积保至广西平乐知府。是时太平天国全师东下，直驱金陵，后方空虚，广西发祥之区遂为清军所占有。然农民群众无时不在亟谋恢复中，因之继太平军而兴起者，在平乐之莲塘则有张高友等率领农民军之起义；在龙围则有傜民周永年等之起兵与之相呼应。其势汹涌，殆不可遏。莲塘在永明、修仁、荔浦三县边区，万山之间，中敞平田，外耸危峭，形势完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农民云集，内从耕种，外事战守，抗拒官军达六七年之久。至同治元年炳奎官平乐时，阴谋策划，其地渐蹙，张高友等以矢尽力穷，而犹抵抗顽战，以至英勇不屈，最后牺牲而告结束。集中有《平莲塘记》、《平龙围记》、《平洴田记》及《谕永修荔三属善后条约》，不啻为炳奎上清廷之情报，且可为炳奎屠杀人民之招供也。余故表而出之。至炳奎不但记其丑功也，而且将其荼毒残害人民两手之血渍，换取夤缘奔走所得之官职，形诸于为其母征寿诗《述略》，虽清代士夫稍知廉隅者犹不忍为，而炳奎以此夸耀于众，则可谓恬不知耻之尤者也。

袁克文《寒云日记》

袁克文《寒云日记》手稿本，起于民国四年乙卯正月，讫于民国十三年甲子正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五——二四），其中间有间断，又《洹上词》一卷，共四册朱丝栏及乌丝栏写本，字极秀丽整饬。记所得宋元佳椠名钞，古钅泉布以及遨游南北，征歌逐酒，串戏冶游之事，胸述所怀，不为掩饰之语。是记之所长，在于叙述所得古刊秘笈，皆吾国之珍宝；若辑而出之，足以知数十年来古籍之存亡，及流传之有自。其最短者，在叙述当日时事，戊戌政变，袁氏窃国之事，颠倒是非，最为纰缪。至其为诗才华毕露，卓有风韵，虽不能上匹陈思，但不愧浊世之佳公子，然婀娜无力，率性颓唐，仍跳不出衰世文人之窠臼，不能称为作家焉。其中间有名句，可为艺苑掌故之资者，略钞存一二，以见一般。

克文所藏古籍，宋元佳椠外以汲古阁影宋元钞本，最为有名，亦为世所艳称。其《乙卯日记》卷首，有咏影写宋本绝句十首，谓："集影宋本诗词十种，以西法影印，俾留真相，而广流传，命曰《三琴趣斋丛书》，因各纪以诗云：无注分明九卷初，平津旧刻复何如？毛钞似此尤精绝，木箧还标士礼居。《古文苑》书

棚旧椠出临安，百种诗篇已尽残；《丁卯》钱钞留款识，明缁席覆莫同看。《丁卯集》诗似唐经写硬黄，三篇五卷贾平章；影钞还有《九僧集》，剑合何时共一囊。《圣宋高僧诗选》醉翁琴趣绝流传，一卷惟存《六一篇》，晁氏闲斋同版式，谁将合刻考当年？《醉翁琴趣》曾拂桐徽阁上尘，得三琴趣亦前因；闲斋未入词家选，孤本流传更可珍。《闲斋琴趣》三琴趣独补之传，列宋名家有外篇；毛刻毛钞差太甚，字行谁似旧时镌。《晁氏琴趣》抚摹钩勒付刘眉，影出于湖四卷词，更喜全刊归秘笈，他年谁是写文诗？《于湖乐府》搓粉揉脂别样妍，却从里底见便娟，晴窗最是销魂处，不在眉边在酒边。《酒边词》李氏文章此一斑，家藏三稿渺人间，词前漫读曾翁序，省识当年手自删。《可斋词》石林改署叶先生，《津逮》《百川》都异名，三卷单行原宋本，茶陵儒刻最分明。《叶先生诗话》雨来暑去，捉笔录此。寒云。”诗中所记三琴趣篇，即吴昌绶印臣所刻《双照楼影宋元明词》所由出也。

寒云诗无雄豪者，惟《黄河篇》，尚有气概，其诗云：“黄河远上接星河，高掀银浪下苍波，天风吹尘塞四极，鬼母一笑驱千魔。壮士呜咽拔剑起，战场夜哭闻新鬼，风雨腥寒雪未昏，射狼噬逐狐狸死。君不见锦帐红烛照美人，帝城歌舞春色新，列筵长侍君王笑，燕姬越女争娇颦。又不见野殍纵横余断骨，将军未老征夫殁，琼楼只乞梦温柔，那知苍生涕泪竭。于戏！独来徬徨叩九阍，四海八荒我断魂，何年一泻龙门水，涤荡中原万千里！”此诗作于癸亥正月，正北洋军阀混战之时，写出当时情况，尚可一诵。

《日记》附载《赋西苑杂咏》四律，词旨尚为婉切。《卍字廊》云：“绮殿轻尘落玉梁，入帘燕子偶相将，金檐直射双环榭，碧砌斜依卍字廊。曲沿鬓丝空照影，重栏衣带尽留香。旧时杨柳今时月，掩映微生复道凉。”《瀛台》云：“百尺台边辇路迷，悬桥旧事岂无稽？王孙空感前畦草，燕子犹衔上苑泥。楹有残书摹魏晋，碑

留断句赋梁齐，不磨谁似精忠柏？片石英灵照海隄。"《福昌殿》云："日月余辉亘九州，怀戎摄政孰能侔；安刘人竞思依汉，代李朝空说易周，自有史迁写本纪，可无仁杰砥中流？丹墀犹剩遗民泪，玉佛庄严拜未休。"《新华门》云："红叶书曾出玉沟，乘羊拂竹想风流，天临北极初开辟，梦绕西陲旧倚楼。故殿犹回恋巢燕，空阶翻度入宫骍；谁怜鸩饮千秋恨，四子营边月一钩。"袁氏祸国称帝之时，克文寓中南海之流水音，穷奢极欲，以皇二子自居，与当时嗜书者李木斋、傅沅叔、徐森玉诸君搜奇访胜，寻求旧本，宋元珍本，增价连城，即由此始；然佳本秘籍，一经品题，后人郑重，亦赖之以传。且克文习于西苑风光，春燕巢梁，故于诗中三题燕子，于当时情事，尤可想见。惟其诗格调不高，虽仿玉溪而已落入鸳鸯蝴蝶派俗调。然于顽艳之中，如安刘依汉，代李易周之句，犹存胜衰兴亡之感，尚不似乃兄克定，窃拟曹丕、全无心肝者，故此四律仍可作清廷之宫史，春明之掌故读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气严寒，书以遣兴。

题陆荛乡《曝书图》

程庭鹭为陆荛乡作《曝书图》小立轴，绘老屋两楹，屋后青松翠竹，篱间芭蕉弱柳成行，著色雅澹，天和日暖，主人罗列几案曝书其间，颇有悠然自得之趣，画亦飒飒有致。张廷济题云："匏尊陆太翁自吴江徙秀水，藏书多善本，归道山后，渐渐零散，令侄荛乡三兄获若干卷，尚是先生健在时所遗者，因作是图，书其册首。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二十五日。"余初不知匏尊为何人，及读钱泰吉《曝书杂记》，乃知匏尊名筠，本贯吴江，后寄居秀水，并云："匏尊所藏书皆校勘精审，得一善本，丹黄不倦。晚年犹从余假何义门兄弟《后汉书》校本过录；余亦从先生得录《三国志》评点本。未几先生下世，所藏尽散，而荛乡能守叔父之所授，表而章之。"是知陆匏尊叔侄均为清嘉道时秀水之藏书家也。余酷喜藏书，而苦无善本，年来捃集零拾，残碑断碣，零篇散帙稗官杂家文史之书，专为籀史之用，亦非在于蕴椟而藏，然间有稿本或昔人手校笔迹，墨色斑驳，丹铅灿然，偶一展玩，情趣盎溢，足以醒疲而起惰，昔故友黄公渚先生曾为吾绘《湖楼校书图》，今得此本，更可备余藏书掌故之资。即余写此跋时，正值傍晚散值归

来，大雨滂沱，衣履尽湿，易衣濯足，沃以温酒，饭后信笔书之，不觉其倦，甚矣余癖好之笃也。

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夜十时记

题《故交遗翰节存》后

桢以而立之年，膺北平图书馆之命，访书江浙，尝观书于金陵盋山精舍、沪上涵芬楼、南浔刘氏嘉业堂、平湖葛氏传朴堂；虽耳硖石蒋氏别下斋藏书之盛，而以未能登衎芬草堂为憾。丙辰仲冬旅食沪渎，陈从周社兄出示寅昉先生曾孙鹏骞所辑《故交遗翰节存》。余既受而读之，知其所来往者皆清道咸间海内名宿硕彦，书札有砥砺名节者，有切磋书史者，有商订庋藏校勘者，而寅昉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于此见其敦厚之风及传古之德，可谓盛已。因忆梁茝林氏有《师友记》之录，余颇叹其赅博，可以窥见并世人文之盛；而寅昉先生是录，殆尤过之。至是编所录，其接触者多名流时彦，其鸿篇巨制，俨然俱在，为世俗所传者，固无论已。其中即以嘉兴钱氏昆仲而言：当清禁网严密之时，人惮言有清一代史事，而衎石老人独能编碑传之集，遗诸后人；警石翁则株守教职，闭户潜修，著述满家，即《曝书杂记》虽戋戋之作，亦足以鸣诸百世；而其及门之士，流风所被，如汪谢城之善于长术，管芷湘之精于钞藏，劳季言兄弟之工于校勘，其稽古之功与迪新之绩，有当时所谓名流硕彦未足与之抗衡者，不可不谓中流

之砥柱也。自晚近蒋氏窃政以来，日寇蹂躏东南，江浙藏书之家，散亡殆尽，如平湖葛氏传朴堂已化为焦土，余后泛游苕水，登高望远，寻问其遗迹，惟余荒烟蔓草，已无人能道其事者矣。然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当此社会主义社会昌明之世，主席遗志必将光辉而扩大之，学术事业，如旭日朝辉，方兴未艾，雨田先生珍袭此遗编，传之祀世，足以为继往开来之资，尚亦有明夷待访之意欤！顿不揣固陋而为之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岁将除矣，游松江醉白园，浓阴绿翠，亭榭俨然，犹如深秋，归后饮酒薄醉，重缮旧稿于此。

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

一九二七年旧历五月初三日晨，王国维先生由清华学校校园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忽然自沉，卒年五十一岁（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在先生未逝世之前数日为国桢及为友人所托书写扇面两页，其一已送给友人，桢存留其一。当先生写扇面时，将桢名后，误写为"兄"。这天先生赴颐和园后，又返校园办公室用墨笔涂改"兄"为"弟"字，然后又进颐和园鱼藻轩前效止水之节自沉。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

这个扇面上所写的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七言律诗二首，头一首题目是"即目"，亦作"即日"，第二首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先生当日写此诗时是据《玉山樵人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旧钞本。同时先生为赵万里学长写的扇面，就径题为玉山樵人诗。并说："樵人诗出于义山，神味相似，而风骨转遒。"又从先生写玉山樵人"回避红尘是所长"的诗句，就可以知道先生自沉之志，早已决矣。

先生博学多闻，长于考核之学，做的是精湛绝伦。尤其是对

于商周甲骨，盘盂金石文字，流沙汉简，蒙古历史，宋元戏曲，明清史迹档册，成为专著足以“发前人之覆”，作前人未做过的学术事业，展开科学研究的风气，有继往开来的功绩，是一位划时代的学术思想家。可是他少年时代思想上曾受过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叔本华、尼采等的洗礼，又为我国汉代班固《白虎通德论》中，所说“三纲六纪”的思想所束缚。新旧思想上的矛盾，交织来往于胸怀之中，而不能解决，终于效法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汨罗自沉。其时也恰当于榴花盛开，五月端午的时节，就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东升的时候，而投昆明湖自杀了，遂成为旧时代的牺牲者。这实在是先生的不幸，也是学术界的不幸和极大的损失。国桢忝列门墙，不能薪传，学业荒废，垂老无成。大有“忆昔程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之慨。临颖书此，不胜感慨系之矣。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学生谢国桢谨识于首都寓庐

书趣文丛……③ 瓜蒂庵文集

散文

从广和居谈到同和居

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先生由杭州来京，居住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老槐书屋中，除应蔡元培先生之约，在教育部任职外，还从事于校订抄写汉魏金石碑版的工作。他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就到广和居去吃饭。后来与许季茀、钱玄同等人常聚饮于此，成为他们讨论学问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地点。

说起广和居，在北京的饭馆里数得上是老字号了，建店将近二百年。它坐落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原本是山东馆子。可是，他们做的菜全是南味，烹调极为精美。铺店是一座四合院，设有雅座。清朝的文人学士，都喜欢在广和居这类饭馆吃饭，以文会友，吟诗论文，服务员招待得很周到，想吃什么样的菜，厨师就做给他们吃，因而成为文人雅集的地方。道光年间有名的书法家何绍基，一直到他的裔孙名画家何维朴到北京来，与广和居有六七十年的老交情。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是一位名书画家，每次逛琉璃厂书肆也在那里吃饭。同时有些名人的诗文，不少是在那里写的。

广和居是在山东菜的基础上，仿南方人的烹调，精工细作，

有它独特的风味。著名的佳肴有潘鱼、江豆腐、韩肘、清蒸白菜、江瑶柱肚块等，其中干蒸山药，如玉柱一般的洁白，而没有水蒸气，尤具特色。清末诗人夏孙桐有诗句说："不将珍错竟肥甘，春韭秋菘味自醇，肉号东城鱼宋嫂，食单典故补宣南。"可谓一时佳话。民国以后，军阀割据，广和居离闹市较远，营业日渐凋落，由宣南迁到西长安街，不久也就歇业。继之而起的是西四牌楼路西的同和居。

同和居也是一家自清同治、光绪以来开设的老饭馆。在北京，山东帮营业的饭馆，多为福山县、蓬莱县、海阳县和烟台市人，三四十年前，去同和居、东兴楼等山东饭馆吃饭，门口站着穿长袍的服务员，说着山东烟台一带的话，向前来的客人问好，殷勤接待，凡吃饭的，无不满意而归。同和居的东家牟姓，是读书人的世家。民国以来，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宴请宾客或三五小聚，都喜欢在那里吃饭。他们烹调的潘鱼、江豆腐等，与广和居一模一样，而又添上了新菜三不沾（不沾口、不沾牙齿、不沾筷子的甜食品）、菊花锅之类，超广和居而上之。尤其是他家做的大馒头、银丝卷，松软可口，最为驰名。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活到九十多岁，就喜欢吃同和居的大馒头，他请客也喜欢用同和居的菜肴。我也常到同和居去吃饭，最难忘的共有两三次：一次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章太炎和黄季刚（侃）两位先生同来北京，我和我的老同学刘盼遂诸先生同宴之于同和居，主人特为我们在楼上辟了一个雅洁的房间，预备了好菜。章太炎先生是说一口绍兴话的，叫人听不懂，我们求教请益，彼此问答，就由黄季刚先生用饭馆中的纸条写下来，谈了一下午，直到斜阳西下快要上晚座的时候，我们才散去。这些纸条子都是论学问的札记，是名人的墨迹，珍贵的文物，可惜我奔走南北遗失掉了，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一次是名书法家冯公度（恕）先生请我在同和居吃午饭。冯先生以书匾额著名，许多店

铺都请他题匾，当时北京有“无匾不书恕”之称。他住在羊肉胡同，离同和居很近。上过菜后，末了还是冯老先生从他家里端来一小沙锅清煨鱼翅，肥而不腻，清腴有味，连同和居的老板都赞不绝口。

听说头十来年，同和居的烹调技术，每况愈下，已有大非昔比之感。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和朋友们去那里吃过几次饭，点了几样菜，什么酱炮鸡丁呀，醋糟鱼呀，都津津有味，不改旧观，想是经过整饬有了起色。我盼望同和居的师傅们把昔年的风味菜，什么潘鱼、江豆腐呀，恢复起来，还要推陈出新，增加品种，体现首都山东饭馆的特色。

（原载《旅游》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署名刚主）

北京书市琉璃厂

琉璃厂是北京的书市。在这条街道上，古书店、字画店、古玩店、文房用具南纸店，一个接一个。历来的文人学士都喜欢逛琉璃厂书店，既可以采访心爱的图书资料，又可以舒畅性情，享受到“人生一乐”。到北京观光游览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同胞，也常常来这里选购些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纪念品。

清代乾隆以前，北京的书市并不在琉璃厂。辽金时代，为时过远，不必详谈了。明代是在正阳门内外。明代弘治年间，正阳门外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重刊印行的《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不只是版画雕镌得精致，书后还附刻有广告和该店刊刻的书籍目录，这说明那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已有了萌芽。到了明末，书市发展到前门外打磨厂、西河沿一带。写《西湖二话》的作者周清源，曾由杭州来到打磨厂，向书店推销他写的小说。到了清初，书店由打磨厂搬到广安门里“报国慈仁寺”内。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又是一位达官，访问他的朋友，很难见到他。他是最喜欢逛书店的，当时有“只向慈仁寺里寻”的诗句。寺内大雄宝殿前有两棵踢地夭矫的大松树，很为苍

翠茂盛，也是全城有名的松树。解放以前，词人南海谭篆卿先生，善于烹调，做出了负有盛名的“谭家菜”，以文会友，我曾到他家里雅集过，除了吃美菜佳肴以外，还参观了他所藏的名人字画。曾获得他藏的《报国寺单松图》，那两棵古松，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失去其一了。

乾隆时，书市由报国寺迁到琉璃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繁盛，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书店营业者的勤奋经营。嘉道年间，来北京开书店的多半是江西人，北方书友称他们为“江西老表”。“老表”是江西地方上人们彼此之间习惯的称呼，意思是表兄弟。后来，河北南宫冀州的一些贫苦农民，走投无路，来北京投亲靠友，学做书商生意。他们从琉璃厂而发展到东四隆福寺、宣内头发胡同的小市，形成不小的势力。他们开的许多是小书铺。不要看他们的门面小，其中也有好书，如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历史的、敦诚著的《四松堂集》，便是从头发胡同小市中卖出的。“江西老表”看北方书商蒸蒸日上，在文昌馆内组织书业行会，建立了碑记。不久，南冀书商也在火神庙内另建了书业行会，也建立了碑记。他们相互竞争促进了琉璃厂书业的繁荣。他们的碑记是研究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个原因，是会馆的建立。“进京赶考”，在科举时代是个大事。可是，各地来京的试子中，穷秀才还是不少的。各邑在京居官的乡绅们，为了本乡试子来京解决住宿问题，便纷纷建立会馆。这会馆又正好集中在宣南一带，临近琉璃厂。这些试子们和在京做官的士大夫们，都爱到琉璃厂去买书籍字画。有了这种社会需要，对书业的发展自然是很大的刺激。乾隆以后，有些人金榜得中，成了显赫的官僚，或者成了著名的学者，其中有的就是在琉璃厂借地读书成名而去的。

说起琉璃厂，不可以不连带着说一下厂甸。厂甸在琉璃厂海

王村公园，就是现在中国书店的地址。过去每逢春节，这一带便临时搭起棚子，卖字画书籍、地方风味小吃，还有各式各样的民间儿童玩具。到时候，男女老少从全城的各个角落拥了来，很是热闹。由于厂甸有这个活动，许多对古籍文物并无多大兴趣的人，也知道有琉璃厂这个地方。

我是喜欢逛琉璃厂的，差不多逛了五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厂魔”了。我听老书铺翰文斋的老板韩自园老先生说，在清末研究西北史地学很有成就的广东学者李文田，每当下朝以后就到琉璃厂来，采访书籍；版本学家缪荃荪也是如此。琉璃厂书市上有趣的故事，实在很多。民国年间，著名的藏书家江安傅增湘先生，下午有了工夫，必定到琉璃厂去，他先到信远斋买了精制的冰糖葫芦，然后到文友堂书店的魏经腴老先生家去，一边吃着葫芦，一边为他们鉴别善本书籍。稍后，就有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先生，他们要印制明代精刻套印的《十竹斋笺谱》和《北平笺谱》，来琉璃厂访问承担印刷的店家，走来走去，那些如淳青阁等家的南纸店是“惯走官场”(鲁迅语)的，哪瞧得起这些穷教书匠，都吃了闭门羹，只有善于水印印刷和雕镌五色斑斓堆积起来饾饤版的荣宝斋承担下来，想不到由此荣宝斋自解放后驰名中外，成了琉璃厂的首号。解放以后，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不少材料是琉璃厂书业的朋友们供给的。琉璃厂这条街上也培育了不少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材，可谓“藏龙卧虎”，像负有盛名鉴别碑帖的张彦生，善于审定字画的李孟东，讲究金石铜器的傅大卣，都是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的专家。

琉璃厂历史悠久，记琉璃厂沿革的书籍也非常繁多，其中有清代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王冶秋写的《琉璃厂史话》、通学斋主人孙殿起编的《琉璃厂小志》等。琉璃厂是条文化街，为了保存它的优良传统，邓拓、郑振铎等同志都是出力很多的。

现在，琉璃厂正在大兴土木，经过有计划的改建扩建，一条

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新街道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想起前些年"四人帮"摧残文化时，琉璃厂暗淡无光的年月，真是昔日不堪回首，今朝喜得新生。

（原载《旅游》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署名刚主）

“教我如何不想他”

——怀念赵元任先生

看到今年六月十九日报载美国旧金山清华大学同学会上，我师赵元任先生即席歌唱了他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杰作，新华社记者有“丰富的感情，悠扬悦耳”赞赏字句，我不禁回想到五十多年以前，我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大约是一个中秋的夜晚，皓月当空，同学们在我院四面荷花古色古香的工字厅里举行师生联欢晚会，梁启超先生首唱《桃花扇》哀江南曲的末折，王国维先生诵读了一段八股文章，赵元任先生便高唱自己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那时这些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有为的青年，几经风霜和时局的变幻，自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一直到解放，顿改旧貌又换了新的人间。昔之少年，多已白首，有的已经凋谢，现在国学研究院同学中，仅存者尚有徐中舒、王力、高亨、蒋廷枢、王静如诸君和我几个人了。想不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又听到赵元任老师以硕德耋年，逸兴遄发，唱出情感丰富，悠扬嘹亮的歌声，如同“仙乐今再闻”了，使我非常的高兴和激动，也不胜感慨系之。

苏东坡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之，我国文学，在词曲诗歌里有悲壮激昂，像宋辛稼轩“更能消几翻风雨”和刘改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的词句，也有如唐李义山“锦瑟哀弦”和“深知人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凄凉的诗歌。我认为在文学中不可少激昂慷慨的诗词来唤起人民群众向前迈进的豪壮气概，也不可无凄凉哀怨，如唐李义山、清黄仲则的缠绵悱恻的诗词，更足以发泄被压迫人民的心声。这在人们的精神食粮上都是不可少的。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有悲即有欢，有离也有合，有正面就有背面，是缺一不可的。事情又是发展的，不可执一而论，割断历史。同时我看见新华社记者的标题《大陆台湾是一家》，富有诗意，非常的好。因之我联想在六二年春天参加郑成功讨论会，那时正是郑成功纪念馆建成的时候，叫我在纪念册上题几个字，我就不揣孤陋，冒然题了一首绝句:

金厦鸡笼共一家，水操台上(纪念馆为郑成功水操台遗址)逞才华；何当光复河山日，此馆当生万丈霞!

今天又听到赵元任老师“悠扬悦耳”的歌声，从云雾中传来，我情不自已，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又诌了一首绝句:

昔领词坛增岁华，于今桃李遍天涯；感旧凄凉成白首，教我如何不想他。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三日)

陶然亭与鹦鹉冢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也是著名的风景之区和文物之乡，有自辽金元明清以来的建都悠久历史。既有西山的揽翠，又有太液和昆明湖水的秋波。可是，在封建时代，许多名胜地点都成为皇家的宫苑。除了大官僚得以陪从帝王游览赐宴以外，一般小官僚和市民就没有驻足的地方了。那末到了春秋佳日，只有城北的什刹海、城东的二闸和城南的陶然亭可以作为游览的胜地了。

如今先谈陶然亭。陶然亭的地点在右安门内南下洼子，古老的城墙之下，一片芦塘和弥漫的池水。在清康熙年间，有位御史名叫江藻，就选择水边林下较高的土台上，建了几间房屋，取晋陶渊明“一醉一陶然”的意思，叫做陶然亭，也叫做江亭。亭台旁边种了几行杨柳，当春天快要降临的时候，杨柳垂丝，扶摇水面；到了秋天枫老丹黄的时候，一片白茫茫的芦苇，遥望无际。在北京游宦和赶考的试子，多半是江南山北的人士，这时到南下洼子去散步，看见了秋水蒹葭顿起了江乡之思。所以江藻建立的陶然亭就成了文人雅士，当春秋佳日聚会在一起，饮酒赋诗，彼此唱和谈心的最好地方。陶然亭的客堂之中，有清代文学家嵇璜

所书“旷观自得”的匾额，还有“阶前绿树分花槛，城外青山到酒樽”的对联。后来还把许多唱和的诗文，刻石嵌在墙壁之上。清光绪戊戌政变的志士、前进思想家谭嗣同曾写过《城南思旧铭》，怀念思昔可以略见一斑。去陶然亭不远还有一个土台子叫做窑台，是自清末以来，梨园歌唱家练嗓子的地方，像京剧名演员马连良等都在那里练过嗓子。从陶然亭到窑台崎岖的路旁上，树立着一个小石碑，叫鹦鹉冢。碑上刻有一首诗歌，是：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阙。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此碑无姓名题署。或传为悼妓女蒨云而作。据邓之诚《骨董琐记》说：“为清光绪间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张丹阳人，光绪初官浙江温州知府。”我认为这件事，无论是属于“狭邪”还是迷信，它的胜迹留在名园之中，亦不无不可。可惜的是，解放以后修建陶然亭公园的时候，把它铲除掉了。吴晗同志曾建议把紫光阁移建在陶然亭的水滨。游人可以在那里饮茶休息，也可以租一间房子，供给纸墨，在那里写文章，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事情。我曾在陶然亭的茶馆里饮茶，远望着西山，写过文章，回想起来，记忆犹新。在十年动乱之时，陶然亭的茶馆关闭掉了，在陶然亭的南边建筑了巍峨的华屋，挂着招待外宾、游人止步的牌子，我一看见，心中非常的不舒服，我想大家同有此感。这情形，现在恐怕已经不存在了。以我不成熟的建议，何妨把陶然亭的茶馆开起来呢！我企予望之。

（原载《旅游》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署名刚主）

天坛·泰戈尔·松竹梅

举世闻名、雄伟隽丽的天坛，与北京的都城、园囿和宫殿，都是明永乐初年迁都北京时，由朝廷召集苏州洞庭东山的哲匠蒯祥等并动员众多工匠营造的。苏州是专门出工匠和建筑人才的地方，蒯祥在当时有“活鲁班”之称。他以工匠的身份，做到了工部尚书，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三个朝代。凡是年久失修，将要倒塌的朝堂，他能够整旧如新；将要欹侧的宫殿，他成竹在胸，精于测量，审定建筑重心的所在，设法把它端正过来，真是有妙手回春之功。他这些精巧的技术流传于后世。世间流传的明隆庆、万历以来的《鲁班经》，就记述了他的精巧技术和工作程式，并附绘图、绣像、镌刻得非常精美，成为老师傅教徒弟的教材。后来《鲁班经》的翻刻本极多，一直到清末同治、光绪时还作范本，加以运用。我每次游逛青翠郁茂、绿草如毡、翠柏成行的天坛，就感叹祖国建筑的优美，想到这是名师哲匠的创作，承先启后，来之有自，是有其悠久历史的。

我年事已高，但每年仍要到天坛去逛逛。坐在茶桌上，吸着香烟，品着清茶，吊古以思今，每每想起很多往事，使人感念

不已。

我记起来，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正在北京上学，一天，我一个人独游天坛。那时，天坛处处破败不堪，我正在那残破的断垣瓦砾中间漫游，无意中遇到了当时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他和蔼可亲，白发苍苍，穿着褐色长袍，由婷婷玉立的林徽音女诗人在身旁搀扶，缓缓行进。陪行的还有一位清劲体瘦的青年，也缓缓而行，一起在那里欣赏苍凉寂寞的景色。这青年是谁，当时我就不知道了。这三个人，一个苍老，一个瘦长，一个艳丽，相偕而行，大有松竹梅同时竞秀的姿态，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我由亲友陪同，曾从上海去苏州光福镇香雪海观赏过一次梅花。那天清晨，我们从苏州南门外乘公共汽车出发。正值初春，树木尚未发芽，只有柳条渐吐嫩黄的颜色，而田中的麦苗和蚕豆已叶绿如油。车窗外，一片江南锦绣河山的景色。转眼之间，车过光福镇，到了香雪海。下车后，我们先到公路南边去看著名的司徒庙里“青奇古怪”的四棵老柏树。这几棵有名的千年古柏，有的显出冲霄凌汉的鼎力；有的俯体贴地，如同偃仰；有的臃肿如驼背；有的矫劲如卧龙。细雨濛濛，沾润了苍翠的古柏，针叶格外苍绿。傍着古柏，有一株梅花，花枝招展，花色娇红欲滴，和葱绿的古柏互相掩映。旁边另有几棵翠竹，迎风飒飒有声，共同构成一种形容不出的美妙景色，一时，我不禁又一次想起在天坛公园看到泰戈尔、林徽音和一位青年偕行的往事来。

为了看梅，我们随后缓步登上山坡上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洞庭东山名匠姚永祖先生所修建的长方形的香雪亭。那时正在动工修缮，尚未完毕。我登到亭上，凭栏而望，只见云雾缥缈之中，满山满谷，弥弥茫茫地到处全是梅花。有的淡白，有的深红，微风吹来，清香扑鼻，真是名副其实的“香雪海”。下得山坡，为了

探梅，我们一直走到太湖之滨的潭东(地名)，又经过了湖滨青翠一抹的渔洋山，饱看了太湖的水色风光。

从苏州赏梅回到上海之后，我访问了知友陈从周先生，说起我在苏州的见闻，同时说起我曾见泰戈尔与林徽音等五十多年前同游天坛的事。他说："确有其事"，并向我详细谈了这件事的经过。后来我曾经记在小册子上。事情过去，也就不再想它了。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从周从上海寄来他新印的旧著《徐志摩年谱》。展开来一看，其中就记载有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游览天坛的逸事。

看了《徐志摩年谱》有关记载，我才清楚，原来那是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印度诗哲泰戈尔由上海来到北京，游览北国风光，并应各大学之邀作学术演讲，所有演讲均由徐志摩担任翻译。还曾在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泰氏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从周引述吴咏《天坛史话》说：

> 林小姐(徽音)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泰戈尔)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地名)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年)是印度歌咏和平的大诗人。印度在十八世纪为英帝国主义者所倾覆，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但是泰戈尔不为侵略者所吓倒，而唱出了为保卫被压迫民族的和平歌声，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人。

从我五十多年前偶遇泰戈尔老诗人，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每次去天坛，看到古松、红梅与翠竹，仍不免想起如云烟的往事，老诗人泰戈尔、女诗人林徽音和诗人徐志摩相偕而

行的倩影，仍会重新勾引到我的眼前来。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记于北京团结湖畔
之瓜蒂庵，时年八十有一

（原载《紫禁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来居上”，后者必定胜于前者，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其发展是有过程的，不能割断历史。若只看美好的今天和未来，而不去回顾昨天和前天，那就是要数典忘祖了，这不是研究科学的态度。在自然界和社会上要研究的事物很广，真是“其大莫能载焉，其小莫能破焉”；我们要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大而至于天际，小而至于电子、分子和粒子，都不能不去研究。别看小到如粒子尘埃的事物，研究起来，却还有极大的用处。这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历史、文学与政治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依赖的关系，就像庄子所说的“若大匏然，何不置诸于何用之乡。”可见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先哲庄子，对这点已先于我们的认识而言之矣。赵万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可是他偏重于鉴别宋元版本之学，他尝戏为我说他“研究的是书皮之学，没有什么用处。”照他的自谦之说，那么像我多年来积累的一知半解的肤浅知识，不但不能说是“博学”，甚而连“横通”也谈不上了。但是不要小看我的老友赵万里先生的这点“书皮之学”，他积毕生的精力于我国的善本书籍，宋

椠名钞，反复的学习和实践，经他的鉴别，就如同打了一张“保票”一样，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便了如指掌。这就给后来的读者研究学问，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便条件。他还和郑振铎、徐森玉诸位先生，惨淡经营，采访搜辑海内外藏书家所得的善本和孤本，以及寰宇的碑刻拓片，汇藏于北京图书馆，使之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书林和学海，供人民群众阅览，为祖国四化，开辟了途径，其功绩是不可以泯灭的。

赵万里先生字斐云，浙江海宁县人，曾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为王国维先生的高足弟子。一九二五年我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那时斐云先生已任助教，我当学生。当我于清华结业之后，任职于北平图书馆，与斐云同事差不多有十年之久。后来我奔走南北及解放后任教天津南开大学，与君书信来往，曾无间断。一九五八年我从南开调到北京科研机关从事研究工作，与君和向达（觉明）先生来往尤密。我是喜欢收藏书籍的人，但识书的眼力，比赵、向两兄要差得多，凡是遇到罕见的书籍，必向他们两人请教。他们说好，我就欣然以喜；他们说不好，我就嗒然若丧。偶然遇到两三种善本，如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以及南宋袖珍刻本《宋名臣言行录》，斐云兄说：“这些书非归北京图书馆不可。”我只得把它们献给公家了。又如我藏的日本刻本《大唐西域记》和知服斋刻本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觉明兄说：“这是研究我国西北地理和中西交通史之书，君不需此。”我连忙送给他了。这说明识书水平的寒俭如此。自向、赵二公相继逝世，我的耽书之癖，依然如故，可是两目若盲，虽然再遇到难以决疑的书，已无人为我印证。缅怀故人，不胜有山阳闻笛，黄垆之感。

赵斐云先生精于版本之学，编有《中国版刻图录》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凡要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人都要取材于此。不像我这样粗制滥造。他对我遇事必相规劝，可以说是我的畏友。他

不但长于考据之学，而填一两首小词，也洒洒有致，翩翩然有江左徐庾风流的才华，而谨严过之。他到中年以后，由研治版本而涉及到校雠辨伪、辑佚等项学问，斐然有著述之才。他曾著有《王国维先生年谱》，编定《王静安先生遗书》。又辑宋元人已佚的词集，编有《校辑宋金元人词》。他能够继承王静安师的绪馀，于考古之学，甲骨金文以外，对魏晋以来的史乘，多能网罗其未备，如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述拓跋氏建立北魏，自魏文帝由大同迁都洛阳之后，渐习华风，把印度犍陀罗式的艺术和祖国文化优良的传统，融会贯通而一之，如释惠生西渡流沙，求经天竺（印度）带来了西方的造型艺术，现在流传下来的尚有大同和洛阳石窟的雕塑，何等的幽美。自拓跋氏贯姓元氏之后，人才倍出，以元著姓的如东平王元略、广平王元怀，以及元显儁等人指不胜屈，魏收所著《魏书》尚多遗漏。近百年来，地不爱宝，发现了不少北魏和北齐北周的墓志，君据以编《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洛阳伽蓝记》描绘了洛阳的景物秀丽，文物遗迹繁多，如洛阳十三个城门，犹存东汉旧日城阙的形象。洛阳是到关中的交通要道，尤其是西头的大夏门，东头的开阳门商贾云集，来往行人熙熙攘攘。开阳门内旧有太学遗址，汉熹平的《石经》和曹魏正始三字《石经》就建立于此。清代徐松是精于史地和西北方域之学的，曾编有《洛阳图》，君视为珍品，加以整理，成为巨制。斐云兄从中年以来专门喜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散佚的书籍，君藏有《永乐大典》美字韵一厚册，精美异常，曾举以示余，我叹为观止，现归北京图书馆。君在北京图书馆看见《永乐大典》残本众多，曾由《大典》中辑出《大元一统志》的佚文。又由于北京是从辽金以来建国的首都，北京这个地方，在辽代叫做析津，君领导善本部同志，从《永乐大典》和其他书中辑出了《析津志》佚文。自君没后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同志们能够继承他的遗业，将《析津志》辑稿加以校勘整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说明了北京是自辽金以

来的旧都会，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建国的首都，其昭示人民嘉惠学林多矣！我曾记得赵斐云先生担任过第三届人代会的人民代表，曾与周叔弢、郑西谛先生为毛泽东主席所接见，毛主席勉励他们说："行行出状元。"那么赵万里先生就是版本学家的状元了。今先生往矣！我马齿徒增，质疑问难，只有请教于馆中新进的同志了。一方面庆有传人，一方面又感慨系之。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记于北京寓庐之瓜蒂庵

（原载《文献》第十二辑，一九八二年六月出版）

瓜蒂庵忆旧题记

江安傅沅叔先生七十寿序

岁在辛未，读傅沅叔太世丈《六十自述》，既以钦其鸿文，景其卓识，足征沅丈庋藏之富，声望日隆。越十稔而又得拜读其《七十自述》，则谛吾丈已遍游五岳，手校《文苑英华》，丹铅所及不下万卷，读人间未见之书，召学人以立身之则，春华秋实，方兴未艾。昔王仲任七十有养性之书，郭延卿八十有京西之聚，稽古纯儒，必获长年。吾丈禀松乔之姿，负凌云之概，方将由大耋而登期颐上寿。《自述》之作，行将迭见于世，资人籀读。譬如行万里者起于跬步，盖天启哲人，必锡以纯嘏，考诸往史，固可历数而不穷者也。

忆当清光绪之季，太世丈提学直隶，又与先祖仲琴公同客袁氏戎幕，连室而居，诗酒酬唱，过从尤密。时桢方髫龄，未得亲接几席，然先祖逸事皆由丈为吾述之。比长，馆于新会梁任公师饮冰室中，时海源阁杨氏藏书散出津市，任公师约丈鉴定。一夕

风雪拥门，吾丈由京来津，策杖剥啄叩扃而至，乃遍观杨氏所藏善本，此为桢得识吾丈之始。未几，桢佣书于北京图书馆，设砚于北海琼岛春阴、太液秋波之旁，襞积编摩于簿录之事，间治史乘。桢以后生末学挟书进谒，吾丈不以葑菲，辄指示攸归；出其藏书资诸探讨。及吾丈总纂《绥远通志》，并以志役相属。时来藏园，邺架秘籍，得资窥览，园林胜迹，悉供欣赏。随诸二三子之后，得备聆吾丈之謦欬，因得亲聆吾丈之微尚，见闻得以较广。

昔王仲任氏生于东汉之际，谶纬之学，青领之书，风靡一时。仲任独能力破众议，提倡古学，非命之说，所著《论衡》一书，遂为世俗所骇异；然未及百年，即见重学人，为世所推重。吾丈当戊戌变政以后，首倡新学，瀹灌新知，创办女学，厘定学则，办理图书馆供众阅览；所以瀹灌学人，启迪后进，为人于所不敢为之时，风气大开之后，声闻日隆，衮衮诸公，冠盖充满京华。时五四运动发生，公适长教育，以忤东海徐氏之旨，辞官拂袖而去，漫游维扬。归后遂退藏于人海之中，筑室城西，小有园林，吟哦其间，不与世风相接。饱观二三十年政局之变迁而潜居于一室，校理群书，部列甲乙，核定去取，手披目验，丹铅未尝一日去手。暇则登山临水，如登泰岱而游华岳，时作五湖三泖之游，以寄其遐思；归则秉笔吮毫，撰为游记。总记其平生所著之撰述，积稿累牍，而手校之书尚不在斯，世人遂以藏书考据家目之，而岂能尽吾丈之学哉！

夫流略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今古文之分，施、孟、梁丘之别，皆能评定甲乙，审其得失。自书经七厄，典籍散亡，非独古籍沦亡，即晋唐诸集，已多经宋人搜集改定，因之后代刊刻之书，或鲁鱼而帝虎，伪托之作，踵事增繁，或以臆定古代典籍，则吾人何以能董理而卒读乎？于是有清考据校勘之家兴焉，或以意逆志，以考定古人之书，若王引之、段茂堂诸君

是也；或博览古籍，取宋元旧刊与今本对勘，以存古书之真伪，若黄荛圃、顾千里诸君是也。然古之去今，相去千载，古人撰集之旨何由得见？惟所见既广，流览既多，称灼见之明，熟于鉴别之法，一经审核，则真伪自明，毫厘之辨，使读者不致有歧途之误。其衣被学人，曷可胜量，此顾、黄之说有不可厚非者也。晚近虽羯鼓频惊，世变日亟，而古籍间出，若经部：南宋监本《周易正义》、《公羊正义》；史部：黄善夫本《史记集解》、宋本《三国志》、元大德本《后汉书》以及宋蜀大字本《庄子》之类，昔人百求而不可得者，今皆可置诸案席之上。吾丈以烛照之明，卓越过人之资，用段、王之法，治考勘之学，其校勘古籍，视诸顾、黄殆尤过之。至所见宋元佳镌、唐抄秘籍，有非顾、黄所能衡量者矣。当吾丈七十揽揆之辰，爰谨述而为之序。

张菊生先生鸳湖课作跋

丙辰丁巳之交，桢旅食沪渎。读书于上海图书馆，与顾起潜先生时相过从，偶诣其籀史之轩，出示所藏张菊生表伯幼年所作鸳湖书院课卷。桢既谨受而读之，知为课艺之作，然已文采秀发，具有经世之志矣。

忆桢髫龄侍梁任公师饮冰室讲席，宴居之暇，任公师常与桢语：戊戌变法之际，师与菊老同居京师，时相聚会于宣南嵩云草堂，在座者有谭嗣同诸君共商国是。时任公师欲流传当时邸报，撰为政论以启瀹民智；而菊老则用泥范字，为之广播刊行，以之自任，是则菊老为发扬学术，整饬风纪，广事传播之志，已肇于此矣。比桢簪笔佣书于文津之馆，访书江浙，傅沅叔太世丈令谒菊老，并召桢而训之曰："菊生先生为我前辈，汝尤当敬而侍之。"比至沪渎，得接謦欬，始知桢忝为其母家子孙之列，因之趋前侍教，遂得耳提面命。桢之所以稍有寸进，侪于学术之林者，皆三

君有以启之也。

今读是卷作于丙戌，即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当为菊老而立之年以前所作。鸳湖书院起于何时，桢手间无书可稽，然当时书院山长为吴牧驺，及嘉兴太守宗姓。书院山长激赏菊老文章之排奡，有"斩关夺隘之势"，期以其必成大业。至于书院学制故事，桢闻之故旧云：各地书院入院考课，以本籍员生为主。每月有膏火，课业有奖金花红，所以沾润寒畯之士，以资课业之向进。应课者领卷而出，按时缴卷，一人可同时代应各人之作，亦不追究。至于通都大邑，虽属客籍，亦可入院肄业应考。如吴挚甫先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时，傅沅叔先生以客籍而得入莲池书院肄业。严几道复远在天津译《天演论》时，人未之重，向挚老请教，挚甫先生亟为之序，以为周秦诸子之作，有百家争鸣之旨，鸿奖而称道之，西学得以东渐，遂大显于世。曩读沅叔先生莲池课艺，气象光昌，英勇奋发，不似桢在藏园时以校书自遣之藏园老人。后乃知沅老长教育时，兴办女学，创立图书馆，以延揽人才为务。直至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沅老直斥当局，投牒拂袖而去，南游维扬，毅然高蹈。至其晚年优游园林，由炉火纯青而归于平淡，卒以藏书名家，乃其馀事耳。

菊生表伯以翰苑英才廾于商隐，创办商务印书馆。印刷之业，为时人所不为之事，当时名公巨卿且讪笑之。殊不知菊老乃民族资本创办工商业之前驱，培育学人，广开风气，足以衣被裸世乎！桢尝以为书院山长之职，为众望所归，必须得人，所以发扬学风，主持笔政，循循善诱，因才而教，所膺之任务甚重，未可以坐享园林，卧游名山之闲职视之。余尤可异者，挚甫、曲园同为曾氏幕客，同掌书院，然挚甫先生能揄扬严几道于稠人广众之中，而曲园老人不能容章太炎。虽出于兴趣爱憎之不同，然亦主持风雅操选政者之责也。

今读菊老是编，虽为少年应试之作，而可以奠其终身之大

业，垂训于后世，弥可尚已。爰不揣固陋而为之跋。一九七七年四月姻愚侄谢国桢谨识于沪渎。

（原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寒斋记

余年甫逾而立，即服务于北平图书馆。时则簪笔佣书，奉亲栖居于城西小水车胡同寓庐。僻在陋巷，面城而居。室为雷氏故居，所谓“样子雷”者，以建筑营造缮写图样名闻于时。历时既久，家已中落，图样售于公家，所居之室，渐就倾圮，急于求售。余以鬻稿之资得之，乃为之斩除榛莽，芟刈芜秽，屋之渗漏者为之修葺之，于是庭宇焕然，有可以容膝苟完之乐矣。屋凡三进，后为堂，中为厅，前为家人闲居之室，堂为先母居之，厅则为余读书偃息之所。庭宇辽阔，空寂无物，余乃于厅后杂植海棠鸾枝之属，前者补种紫藤梧桐，夏则植荷，秋则种菊，杂花盈阶，绿荫满窗；屋中图书盈床叠架，时可取阅，于是怡然有田园之乐，洒然有出尘之想矣。余性椎鲁，木讷无文，饥来驱我奔走衣食，浮沉人海。钩心斗角，素所不习；酬酌世务，每为所困。而嗜书成癖，坐守青毡，纂辑丛残，咀嚼书史；凡平日遇不惬意之事，或见侮于人，动辄得咎，苟能退返吾室，手持一卷，吟哦其中，心与神会，启所未闻，或饮苦茗，佐以烟草，清烟徐上，文思澄澈，左顾右盼，兴味盎然，自以为其中自有奇迹，难与不

知者解也。室中故无长物，一几一榻，书案之外，四壁环堵，皆为断简残篇，人弃我取之物，不为雅人所乐道而敝帚自珍者，诵读摩娑，油然而喜，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若是室者，吾无以名之，而名之曰寒斋，非自谦也，盖纪其实也。时余方治乙部兼整理目录丛残之学，所谓《丛书考》者以及籀史之文，皆于寒斋中成之。时光荏苒，春草再生，时鸟变鸣，节候不同，寒燠忽异，吾领略之况，亦与之俱进，而读书之兴未尝稍辍也。若至春日，海棠花发，粉红骇白，好鸟时鸣，莺声巧啭，爽心悦目，至足怡人。至夫秋夜，天朗气清，明月窥窗，梧桐照影，四壁虫声唧唧，伴我读书，未尝不欣然而忘寝。吾妻庆芬促余者再，夜阑更深，斗柄横移而犹不欲归也。未几而先母见背，返哺无时，踽踽独行，遂为无母之儿矣。又未几日寇肆虐，故都不守；大盗窃国，燕市为墟，余溷迹市廛，形同梅福，持筹之暇，仍行籀史，徒以忧谗畏讥，乃不免于踉跄出走，远居沪渎，室遂租赁于他人，旋见毁于犹子，室中长物，荡然一空，师友遗泽，化为乌有。飘泊东南，倏经三载，余当淮海战役之后，北平解放之时，由滇南转沪，遄返春明，抵我里门，则令威归来，室宇如故，而庭草不除，榛莽盈阶，昔日之海棠鸾枝，已鞠为茅草矣。墙屋颓败，荆棘满目，昔日之庭院，已变为废墟矣。时余方肄业于华大，承党培育之恩，得以讲学天津南开，返我初服，方将献身于社会，致力于学术，此身外之物，早已恝然置之。比于五二年暑假，余偕吾妻，重返都城，小住是室，因无力修缮，乃将此老屋，转售张君，以其屋资，分赠诸母、馀仍购书，以偿夙好。惟张君亦乐道之士，熟于春明掌故，恒谓余曰："此屋可颜为紫藤碧梧之馆。"若张君者，定能起而修之，胜余之荒芜不治者多矣。当余来京之时，应友人之约，出余昔日所写《汉代绘画考》，仍于此室中，重为改定，室犹如是，面目全非，伏案疾书，凉风习至，不异昔时，而梧桐弄影，婆娑窗隙，余乃掷笔出户，徘徊庭隅，

月明皎洁，露滴我裳，而梧桐种时，仅为柔条，今则粗可盈掬，枝叶扶疏已高出墙垣矣。

此文作于廿年前，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即农历中秋前二日重改定之，时正读通鉴两汉书，补余未完成之业。改此文时，仍未恰意，始知虽耄而好学，然恨垂老无成也。

记清华四同学

余读程易畴《通艺录》，钦其治学之勤，用力之笃，辨析名物，乃能极于一粟。乙卯之春，余籀读汉魏典籍，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于粟米斗斛之积，而为律度量衡，以及于勾股割圆，应用于工艺音乐之事，实由是书启之。然以学殖业荒；识力绵薄，仍未能窥其樊篱也。惟其所著《五友传》，记皖南学侣，师友过从之迹，而于戴东原震反对理学，提倡朴素唯物考证之风及其生平事迹，记之尤详，则深意之。因思余于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得亲炙于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之门。其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济济一堂。而与吾投契者，则有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诸君，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专长。而身强力健，锲而不舍，亦胜于余。余则为室家所累，骛于外务；虽思编摩，然一曝十寒，如同爝火萤光，徒自悲愤，而垂老无成。方期时过而学，有所请益，不期时光变幻，风云不测，学胜于余，体健于余，而朝露易晞，芝兰易摧，吴、王、冯、刘诸兄，先后溘逝，痛可言也。余虽拙于文辞，昧于析理，但夙志未衰，拟以炳烛之年，稍自策励，以攻吾短；籀史之暇，仍不废吟

咏，作业之馀，尚从事于临池，昔非所长，今始为之，年老力衰，知无所当，方期请教于同砚之知友，而诸君皆先我而逝，已无可以与之印证者矣，能不增腹痛之悲与黄垆之感乎！爰效瑶田翁之《五友传》，而记清华四同学。

吴其昌字子馨，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考取清华研究院，高于余一班。毕业后，同馆于梁任公师天津饮冰室寓庐，又同教学于南开，君教大学预科，余教高中。君少聪颖，治盘盂古文字学，著有《春秋谱》等书。又承唐文治之风，喜治宋学，兼喜词章，博学强记，背诵典籍如流水，口述宋人词集之名，问无不应，余则仅能举《清真》、《漱玉》之名一二而已。君赋性自高，不肯后人，激昂之忱，出于自然。当时同在饮冰室侍席者，尚有梁廷灿、姚名达诸君，同学少年，不时来往，如姚君名达。亦有不欢而散者，吾与君则同共几砚，处之怡然，始终无间。犹记在南开时，一夕君自八里台访余于南中宿舍，月终囊罄，因质衣沽酒，痛饮狂歌于村酒香，乃至夜阑灯灺，南中校门已闭。时津沽郊区尚未大辟，由南中至八里台，长河直流，榛莽丛生，缺月在天，狗吠于丛林矮屋中，有狺狺然逼人之势，余乃与子馨互相拥抱，蹑步而行，至君住之南大宿舍，已夜尽更深，晓鸡欲唱矣。未几君讲授于武汉大学，余服务于北平图书馆，旋自春明南下，道出鲁东，中途停车，欲览泰岱之胜，时已夜半，宿于泰山宾馆，沐后就卧，见室外月明皎洁，松影窥窗，远望泰岱，蜿蜒不断，与长天一色，乃亟披衣而起，捻开惨绿色之电灯，而修书与子馨曰："君处东湖之畔，亦知桢在岱麓松荫丛中之夜景乎？"颇以为白居易之与元稹，无是遇也。自是风云变幻，日寇窥边，卢沟桥事变军兴，君自南北上请缨抗倭，大有终军之概。旋随校西迁蜀中，痛心国事，著述与教学不辍，积劳以卒，年仅四十。自是以后，余以庸庸碌碌，浮沉人海。与君之往

还遂绝，君之消息均自远道闻之。解放之初，余再至津沽，讲学南大，缅怀旧游，因有句云"小仁桥头人不识，八里台畔月如霜"也。六三年，余游汉皋。访同学方欣安兄于东湖之畔，河山变色，焕然一新，而哲人云亡，未能见九州同乐之盛，不禁有人琴之感已。

君弟世昌字子臧，肄业于燕京大学，聪颖亦如其兄。治《红楼梦》之学，能文章，擅长英语，其艺尤且过之。当其髫年占毕上庠，以犀利之笔，隽峭之辞，墙报校刊，自署燕京布衣，已崭然露头角，旋教授上庠，后讲学于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公元五十年代曾出席莫斯科汉学家会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自许，不屑与反动派为伍，党及政府念其爱国之忱，迓之返国，任职文学研究所。开会学习，桢与之相同，亦时相过从，晤其弟不禁而想念其兄也。

王庸字以中，无锡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考取清华研究院，高于余一级。君治历史沿革地理，著有《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洎后研究历史地理遂成专科，君始启之。君为人外圆而内方，与人浑浑然不见圭角，而赋性耿介，愤世嫉俗，持之以正，廉洁自守，敢与恶势力作斗争。未尝面责人过，微言温穆，而使人自觉改正。余之鲁莽逾矩，在无形中匡余不逮，受益实多，盖南方之强者也。在校时仅为泛泛之交，自服务社会而后，乃过从益密，至有身相终始。一九三二、三三年间，余就食于北平图书馆，为纂辑《晚明史籍考》访书江浙。遂至吴门，谒君于苏州中学，君迓余曰："你到天堂来了"。同饮于松鹤楼，余之识南味者自此始。未几君北来，同馆于文津之街，君并执教于北京大学。是时同馆供职者，有赵万里、向达、贺昌群、刘节、王重民诸君，朝夕共处，以编纂之名义，而能各治其所学，在当时或以为旷职，而后各有所成，殆所谓百年树人者欤。自日寇肆

虐，旧京沦陷，君在南京图书馆任职，而避地上海，居于玉佛寺中，余偶来沪上，时大雨滂沱，君衣履不整，访余于旅社，纵谈欢饮而去。四六年夏，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之后，余旅居沪渎，君主讲暨南大学，后与王伯祥先生同编《文汇报》史学、图书副刊，约余撰稿，恒与王伯祥、郑西谛、周予同诸君同饮肆楼，臧否时事，慷慨悲歌，与君过从尤密，而获益愈多。时局动荡，生活极不稳定，米珠薪桂，一日数变，民不堪命。君与同学因反饥饿运动游行街市，为恶徒暨南校长李寿雍用铁刺木棍所击中伤臂，因而被解职。旋讲授于无锡江南大学，又以带领群从索薪为当局所迫而离职。余时亦在锡山，同游梅园，君并介余至昆明云南大学讲学。四九年春余由滇北返，旋就业于天津南开大学，闻君仍返南京图书馆，司编校之事。时为解放初期，举国欢腾，爱国民主人士皆有以自见，君则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者。郑西谛先生愍然忧之曰："以中愤世嫉俗，忧心如捣，乃光复之世反暗然无闻者，是余之责也"。因与竺藕舫先生同荐之于当局，出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之职。君驰函与余曰："余离春明十八年今始返首都，亦犹王宝钏居寒窑十八年始离武家坡也。"京津相距伊迩，余因事至京，阅书于北京图书馆，时与君晤聚。又小女莹，君看其成长者，时至其家，与其姑同为锡山人，杯酒联欢，乡谈甚殷。倘余调京，即可以常痛饮黄垆，长相晤对。乃桢回津无几时，闻君夜饮后，与邻人口角，暴疾一夕而殁，年五十有八。君体健于余，饮食过人，犹记一九四五年间，时当春暮，傅沅叔、徐森玉先生约君及桢等同登华山，余以乏济胜之具，未果同游。旋又同出席于广西召开之地理学会，由广州三水涉江而上，畅览阳朔山水之胜。比返广州，又约同游罗浮，而余适因足疾未果。方期君可登期颐，孰意其先我而逝哉!

由君而识者，为向觉明兄。君名达，湖南人，与以中同学于

南高师及东南大学，同出于柳诒徵先生之门。为人耿介，方正不阿，遇不平则鸣，不知者以为狂，而西谛独识其为人。君治唐史，著有《唐代长安及西域文明》等书，研究中西交通史迹，无出其上者。君自视甚高，又不谐俗，偶以微眚，人多避而远之，而余与过从颇密。自此余游勺园访邓文如先生，辄至君处；君进城，亦必诣余。析疑问难，获益良多。君尝欲撰《大唐西域传注》，不远千里，访陈寅恪师于羊城，其好学之笃若此。惟其嗜于业务，耽书若癖，见有异书，无不欲得之。每至寒斋，余偶得逸品，必出以视君。遇君所喜者，如耶律铸之《双溪醉隐集》等，君辄曰："此吾研究应用之书，君不需此。"乃挟之而归。自君殁后，遂使余沉酣典籍，驰骋书林，断简残编，敝帚自珍而无与争者矣，岂不悲哉！

陇东人才不世出，出必有达者；前人吾钦张澍介侯，今则吾喜同学冯国瑞是已。国瑞字仲翔，甘肃天水人，与余同岁生，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考取清华与余同班，钦君风采，亦时相过从。君夙有才情，能文章，善书法，能诗，长于简牍，有翩翩书记之风，盖历代作家有陈琳、阮瑀，不尽洨长，小同也。君结业后，即返陇上，闻任青海省秘书长，颇足以抒其长才。旋以马麟，马步芳叔侄之争，攘权夺利，诬君携款潜逃，通电逮捕。君则匿迹至春明，如张俭无家，翻然来依。余既怜范叔之寒，愧乏绨袍之赠，乃为之觅保，出于缧绁之中，同居共处，生活得以粗安。君乃卜居于西山之麓，早对清晖，暮观落日，窗明几净，摒除繁华重理旧业，著有《张介侯年谱》二卷，余谬为之序；《诗集》若干卷，余为题赙。后又著《麦积山志略》，此其著作之大略也。当先母六十生日，君闻之举觞登堂，撰文称祝，杯酒酬唱，茗椀谈心。未几其弟耻斋及其子继至，两家往来无间，友于之情，喜可知也。一九三五年以后，君已先回陕右。三七年秋余于役洛

阳，观鸿都石经，随游陕西，与君遇于长安旅邸。观汉唐之遗踪，访曲江之胜景，欢聚者累日，从此事变日亟，遂不通消息。抗战期间，闻君讲学兰州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解放之初，君仍执教陇右，兼为诸侯老宾客。五五年间，君观光首都，闻余在南开亟来津相晤。余举故藏叶昌炽旧印章文曰牛翁以赠，盖余与君同属牛也。因与之同泛舟水上公园，纵谈往昔，横櫂中流，信宿盘旋，投诗于余几上而去，至今犹存于箧中。余固不能书，而君颇喜余书；余不善收藏，而君颇嗜余所庋藏之碑碣，其实当时余尚未如今日蓄藏之多也。五八年初，余调京任职住东四三条，君邃书于余，述其近况，状甚憔悴。惜余当时囊空如洗，无以应之。未二年接其弟耻斋来函，谓其兄因患高血压症而殁，年六十。余素喜读杜陵《秦州杂诗》，耳麦积山风物之胜，所谓"无风云出岫，不夜月临关"者，每欲往游而未果。今君往矣，未知俟诸何日。顷闻友人言：君家于天水城中，室颇宽敞，兄弟三人，君居长，仲弟业贾，能鉴别古物，其季即耻斋也。余闻之而叹曰：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刘盼遂，河南息县人。少治文字训诂之学，亦辨声韵，宗许氏《说文》之旨，能为魏晋之文，慕章太炎先生之学风，而以未能亲炙其门为平生之憾。自其髫年毕业河南大学之后，主讲于曲阜中学，用应刘之笔，效代答古人之书，已传诵于一时。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竟冠其军，以其记闻淹雅，考证精湛，为梁、王、陈诸先生所赏识。自其结业，旋讲授于燕京、河南、辅仁、北京师范诸大学，以终其身。及门之士，多有成材而去者。余与君忝属同乡，又同学，君年长五岁，余以兄侍之。君好静，而余喜动；君恬于荣利，而余嗜躁进，至屡踬而不悔，凡有取咎之事，辄请教于君，君尝诲之不倦，曾以梁鸿"不因人热"之语教余，如服一剂"清凉散"也。余好出游奔走四方，而君潜处春明，诵读不

辍，吾二人性格不同，而情好弥笃。方之于昔，则可与万季野与刘献庭相匹，余半生流徙。萍踪莫定，凡回首都，未尝不与君聚，三日不见，则惘惘然。惜未能至褒信之里，登堂拜母。七零年秋余于役君乡郊居半岁，询问君之里居，尚有知者，而君已卒矣。

君性质朴，不事华藻，所谓北方之强者。面团身短矍然而瘦，两目炯炯有神，衣布履素，生活简单，而待人以和，即之温温，凡来问询，无不罄其所有，坐谈盈晷，使人惬恰无不欣然而去者。每鸡鸣即兴，饮香茗一瓯，即从事籀读，凡讽诵之书，贯通其旨，订其谬误，丹黄殆遍于书眉行间，而惜墨如金，不轻事著述，为人索去而即行者有《文字学论丛》、《论衡集释》。平生所致力者，尚有《世说新语笺注》未能问世，其稿存在与否，亦未可知。而守约安常，罕接人事。在燕大居勺园时，顾颉刚、郑西谛诸公，师友盈门，高谈惊座，西谛每喜陈列明镌版画，余尚承其接待，而君则蓬门昼扃，占毕自安，惟生徒中有王岂安者臂架鹰，携猎犬过之。解放后，君声闻日隆，而退藏愈闷，甘于恬退，惮于聚会，党及政府以其年老照护者备至，饷以肉，出以车，文学之事，每相咨询，坐谈之宴，延为上客，此则闻之于白寿彝同志。浮躁如桢者方将以此自诩，而君默然。余问之于君，惟微笑而已。余又闻之于其子立三，昔之门人，今亦有问业者，辄有高轩之过，君从不请其援手，虽桢为与之晤聚最勤者，亦未尝道及此事也。惟桢时至其斋，但见师大师生向其请业，解释传记训诂，及逐章讲析玉溪生诗意而已。余之略识李义山作诗之旨者，实由君启之。余每有疑义辄请析于君，君无不一一解答。有一日余读苏曼殊《燕子龛》，小说有“坐视观化人也”之句。以之相询，且视其年登耆龄，阅世之多者，君嗒然曰：“又何必坐世观化也。”然君喜为余咏苏子瞻“陌上花开可缓归”之诗及李义山“亦知身在情长在”之句，其情趣固自不恶。然犹谓余：“何必著书，徒

劳人力，亦为书店中学徒所苦耳。”君性极俭朴，虽居城市，而仍过乡村生活，每食葱汤麦饭，每人一器，分坐在门旁而食，然亦为家人所苦。而其夫人针黹自任，犹坐灶下生活，罕与邻里相接，学校虽有宿舍，喜株守家园而不居也。君之生活以自苦为极，然喜购书，所有积蓄，均寓之于书，上虞罗氏所印金石丛书，日本佛教文化史迹，收藏颇备。尤多明刊秘本，如《大明会典》，明清《实录》，明代佳趣堂，寒山堂、奇字斋家刻善本《世说新语》，《王右丞集》等书。至其所藏南宋刻本《十三经》，最为人所羡称。乃君纵横置于秘室之中，虽深自珍藏，亦不甚爱惜。余虽嗜书，而所得者多人舍我取，断简零篇，明清稗乘以及汉魏砖石残刻，但喜装潢列诸架上，以为美观。每有所得，必举以视君，互相鉴赏，君以余嗜书，亦时相馈，并以同学蒋秉南兄所赠石章，举以相贻，今尚藏诸椟中。君以年老，嘉书难得，生活乃稍自从丰，辄喜吃肉，每向过从，则同饮于四川饭店及镇杨食堂中，炙鱼蒸豕，甘之如饴。亦喜植花木，庭中苔岑不除而盎然成趣。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开始，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访君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晨露如珠，挂花及叶上，红艳欲滴；而余家中陈翔鹤君所赠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

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

孰知竟成谶语。八月二十三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日下西舂，余潜赴西城，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

凡此诸君，皆余总角之交，一旦先后溘逝，如同薤露；又兼老来有丧偶之凄，低首徘徊，梦寐依依。然远观前程，无限美景，逝者往矣！作为殷鉴，此余所以记清华四同学也。

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

新岁赠同学秉南蒋子

同学秉南蒋子与至友刘盼遂、吴其昌、刘节君及桢等同肄业于清华研究院，同受业于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先生之门。当时同学以秉南年最少，而暗然潜修，力学最劬，固已钦之。自风云变幻，时节如流，由阴霾昼晦而至旭日初晴，长路迢迢，昔之少年由壮而老，同学诸子已零落殆尽。而秉南如鲁殿灵光，巍然长存；桢虽老矣，犹得追随于其间。桢每道出沪上，辄与君往还，茗椀谈心，过从颇密，亦为之深幸。丙辰仲冬，桢重来申江，下车之始，即往访之，排闼而入，则见君方据案危坐，执笔凝视，正点校古籍，严肃谨慎，丹黄殆遍。闻其一生致力校勘之学，校正《尚书》、《尔雅》等书，不下数十种；而以陈寿《三国志》校注，用力尤勤；凡此数者皆为人所不为之事。余因起而问曰："世方驰于论证，而子则笃于实践，又何穷年矻矻不厌其勤耶！"秉南喟然而叹曰："当余方髫龄，即性嗜于此，方其负笈春明，应试清华之时，旅舍灯残，伏枕倦极而卧，即梦见王静安先生教余习训诂校雠之学，乃荒鸡叫晓，惊余梦觉，复入睡乡而继续入梦者再，至今思之，恍如昨日事。此余所以酷好于斯，如同面墙锲

而不舍也。”桢因夫思之，梦由情生，情由梦见，莫不以环境为之，志之笃于中，而形于外矣。以余所知，昔之善梦者，无如宋之陆务观及清之平景荪。务观生于南宋叔季之世，尝夜梦出大散关，从征甘凉“尽复汉唐故地”，此其忠勇雄豪之气志在恢复者也。景荪生于清咸同之间，山明水秀之乡，而守正不阿，夜梦山阴栋山之盛，因自号栋山樵隐，著有《樵隐昔寱》等书，淡泊名志勤于撰述者也。秉南以精诚所积，发之于梦，而终身行之于学术事业，颇类于栋山樵隐之梦，实梦而非梦也。桢怛伏处斗室之中，纵观往古，潜视来者，昔萧尺木，生当明清甲乙际，身丁百六之厄，毅然高蹈，居于荒江老屋之中，闭户潜修，浊酒盈樽，罕与世接，当其酒酣耳热之时，脱帽露顶，点染山河，绘为《太平山水之图》，百世之下多悯其苦心孤诣，犹馨香而乐道之。至于所谓名儒硕彦，撰为经世卫道之编，虽驰骋于一世，然不终朝已荡为冷烟矣。而乡曲之士，肥遁田园，琴书自乐，占毕于簿录之中，不感其苦。自清季以来，若塘栖劳氏昆仲，校读甲乙之书，精湛绝伦。海宁管庭芬，退居江乡，钞书万卷，多传罕秘之本。仁和魏稼孙校录汉唐碑碣撰为《积语堂碑录》，辨析毫厘，一字不苟，凡此诸君其传古之功，为淑世之资，津逮后学之绩，有不可没者；不为是学则已，苟有所取材，当不能舍此而取彼也。秉南蒋子生于当今唐虞盛世，而恬澹自守，为人所不为之学，在此发潜彰幽之际，正所以明夷以俟用，其校雠之精，较诸劳、管诸君犹且过之，堪为吾党增色者也。惜盼遂往矣，医余矜躁之气，不学之苦者，非子而谁欤？爰于献岁开春之候，濡笔而赠之以言。

一九七七年元月三日记于沪渎

游记

书趣文丛……③

瓜蒂庵文集

两粤纪游

小　　引

桂林佳事我能言，四座停杯且勿喧，
人物豪华真乐国，江山清绝胜中原；
亲尝荔子薰风浦，静对梅花小雪村，
边镇无虞应少讼，不妨仙释问真源。

——宋·曾几《送李似举尚书帅桂林》

连日刮了几次西北风，把美丽的中秋节，顿变成阴霾的天气，树叶摇落，野草枯黄，好像深秋的景象。我新自粤回，不幸病脚，而且小极，大好的中秋节，只好不出门，坐在书斋里度过。适书友殷君送来几本新出版的书和讲粤西风土的笔记，我就拿来东翻西阅，倒还感觉有趣。回想桂林之游，回旋于脑海中，如在目前，但是这些清丽的印象，如果不写出来，慢慢的就要暗

淡下来了。这是一桩怎样可惜的事情！因此，我就把它随笔记录，作我这次旅行的回忆。此外我还要声明，我这次赴粤西，并非是专为考察粤西的建设，我也不懂得自然科学，更不会演讲。我不过把耳目所见的两粤的风景，和我共同往粤的几个朋友途中的趣事记下来；我是一个素来喜欢趣味的人，不过说几句有趣的话而已。我这次旅行，是王以中兄（庸）劝我加入地理学会，今年七月六个学术团体在南宁开会，地理学会为六个学术团体之一，我就毅然加入了。那时我的弟弟新自南京回来，不久就到苏俄去，兄弟二人天南海北，更足扰我情思。因为时间和船期的关系，我和以中兄定于七月二十四日乘平浦车南行。同行者尚有徐森玉先生，后来又加入虞自畏先生，动身稍后，约在上海聚齐同行。这是我们旅行发轫之始。

平沪道中

残酷的炎暑，被急雨洗刷，天气顿觉清爽。是日下午五时到东车站，每人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我们找一间有茶役的火车，将行李搬上去，徐徐坐定。徐森玉、向觉明、侯芸圻、谭季龙诸先生都来送行，稍谭即去。不久这辆列车即从阴雨中冉冉发动，野外的树木经过了细雨，更觉着浓翠。这是一辆破旧的三等客车，因为落雨的缘故，所以客人不甚拥挤，我们每人占了一个长凳，可以屈膝。邻座有三位放暑假回家的学生，其他还有几位商人和老者。车中充满了纸烟的云雾和小贩的叫卖声。车过天津，夜已九时，窗外的雨越发下得大了，行客还是寥寥。我和以中兄用过晚餐，取火柴吸了一棵纸烟，看着它的烟雾，玄想着阳朔的烟景。经受着火车的震动，如在摇篮中，昏昏睡去；比及醒来已到济南，天已放晴，气候已觉比昨天热得多了。我们因为要看泰山的山色，所以就想到泰安后再用早饭；及至到了泰安，已过十二

时了，我们就下车在站台饭摊上吃饭。几位北平的学生也跟着下来，看着我们在饭摊上吃饭，非常的可口，也就与我们同吃。及至我上车后，看见他们本来预备着很好的罐头食物，只为要模仿我们平民化的关系，竟误了一顿美餐，为之一笑。火车经过徐州后，天气更觉炎热。二十六日早抵浦口，旋即渡江，因为天气过于炎热，改乘京沪二等车。经过途中两天的闷热，耳鼻中充满了煤灰，衣冠已污秽不堪。可巧车到苏州，对座来了几位摩登小姐，我们更觉自惭形秽。黄昏时，车抵上海，我们叫一部汽车到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去，想不到刘崇熙先生出去了，门口号房说，刘先生家住在亚尔培坊，离此不远，他领我们到刘先生家中，但刘先生并未回来。承刘夫人招待，候了多时。你想，我们已经两三天没有更换衣服，在华氏表百度左右的客厅中还穿着大衫，其苦何如。毕竟刘先生回来了，同我们回到科学社，给找了一间有浴室的客房。我们旋即脱去污秽衣服，打水洗澡，一清积垢。洗完澡，我们再到霞飞路随便吃点东西，就安寝了。

到了上海，才知道我们要乘的招商的海元船票业已被人购去，不得已只好改乘八月一号的爪哇船。在这四五天中，无所事事。二十七日早，以中兄就赴角直镇看他的夫人殷女士。徐森玉先生、袁守和先生，均二十七八两日先后到沪上，住在八仙桥青年会。我于这两三天中访沪上旧友姚名达、朱右白诸兄，并赴开明书店商订印刷《丛书子目类编》的事情。在沪上无意中遇到姜亮夫、陈漱石、周予同诸兄，那时暨大正在改组，所听到的无非学海升沉的故事，教我们感到有南北相同之慨。在沪上共住四天。三十一日以中兄由角直返沪，第二天早晨，我们便和徐森玉、虞和寅先生乘船一同离沪了。

由沪至香港

八月一日晨，我们乘车到青年会约徐森玉先生，一同到新关码头，乘轮渡到芝沙丹尼船。这是一只荷兰邮船，由上海开爪哇的。我们虽然坐的是三等舱位，地方倒还干净。船上遇见到广西开会的人很多，因为天气很热，我们都跑到舢板上去乘凉。到了傍晚的时候，风平浪静，一颗红日慢慢的落到海面下去，万顷的波涛拥着这只轮船一直往前走，好风吹来，拂我襟袖。我们随便谈话，一直看着渺茫无际的大海，四围沉寂像黑漆一团，惟听见机器的响声，才回到舱里睡觉。时间过得很快，到初三日上午船泊厦门，我们赶快下船，雇了人力车，到厦门中山公园。那里布置得很清洁，路旁植着幽秀的花木，又挥发着山兰的香味，使人感到许多北方所没有的美。我们出了公园门，就到南普陀去。南普陀里面设有佛学院，森玉先生找院中住持未遇。我们穿过庙中，到山顶上，山石皆作铁色，极为雄壮，与北平盘山相仿。我们坐磐石上休息，山半腰中全长着松树，前面是一望无边的海洋，看山脚怒涛汹涌的过去，气概极为伟大；无锡太湖的鼋头渚，虽然仿佛这样，但气概比这里小得多了。下山以后，在街市上一个小饭馆吃了饭，就回船去。第二天上午十一时，船就到了香港。船泊在海中间，有许多旅店的小船在海中迎接，我们就上了大东酒店的汽船；比及到旅店里，已下午两点了。我们换了衣服洗了脸，就到街市游玩，可惜我们四位一句粤语也不会说，只好毫无宗旨地东游西逛。看见前面来了有轨电车，我们就乘上去，还坐原路车回来。那时天色已晚，我们到一家饭馆去吃饭，似乎这饭铺名为大三元，布置还算华丽。我们登到第二层楼，迎面有一位油头粉面的大姐来招呼我们，森玉先生一看见她，回头就跑，我们三位自然也跟在后面跑出去了。结果，找了一家最小

的粥店吃了一顿晚饭，回到旅店就睡觉了。

初五日早晨，承广西银行招待，派了一位行员雇辆汽车引导我们游览全市。他开的路径为香港仔，深水湾，赤柱水塘，七姊妹，浅水湾，一直到山顶。坐汽车有两三点钟工夫，大约有六七十里，全是柏油马路，极为曲折，这才见了英人在香港的建设。蓄水塘可以供给全市的饮料，工程浩大，闻建筑费在千万元以上。我们乘车到山顶，复由山顶回到旅舍。是日下午，乘江苏轮船到梧州去。

梧　州

一只不满七八百吨的陈旧轮船，充满舱中的座客大半都是到广西开会去的，我们好容易挤到船后面的舱位坐下，卖食物的小贩和送客的人们，嘈杂之声不绝于耳。经过许多时间，送客的人去了，贩卖的声音也平息了，那只船才渐渐地蠕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只好跑到舱外，凭栏远眺，看沿岸的风景；到了夜深实在困得无法，才回舱安寝。第二天早晨，船泊三水，为要候从广州来的火车，所以停泊很久。那时江面上浮了不少只小船，撑船的船娘都是赤足蓬头，穿着烤绸衣服，群来招手呼渡，群雌粥粥，我们如何敢应。最后看见一位小朋友在那里撑船，我们就上了他的船，渡到城里去。原来三水这个地方，街市不甚繁华，我们在中山公园内稍为盘旋，即废然思返。忽然后面来了许多同船的朋友，大声疾呼说：“我们到西南吃饭去！”那时我们也不知西南是甚么地方，就拉着这位小朋友，随着群众一同登由三水开往广州的火车。不及十分钟工夫，就到了西南，原来这是距离三水约有二三十里的极大的市镇。那时江水泛滥，街市都成泽国，前面引路的人经过了几个曲折小巷，我们的鞋袜皆被水浸透，水花飞得满身，太阳又晒的汗流浃背，我们只好随着大众前行。在小巷

的尽头，忽走进一家茶馆，茶馆的规模很大，座客大约有好几百人，满堂摆着楠木家具。我们择了座位坐下，茶房打水洗了脸，一人要了一杯红茶喝着。那些卖肉包子的罗，卖糕点的罗，卖馄饨的罗，络绎而过。院子里面还有不少的花木和假山石。想不到在一个镇市里面竟有这样精美的茶馆，而且在这里饮茶的人大半都是劳动阶级，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人民生计的宽裕。我们在骄阳里奔走之后，不意遇到了这样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坐着自然清爽。吃完饭后就由茶馆起身来到车站，乘两点钟车，回到三水，复乘小朋友的船渡到轮船上。到下午五时，船即开行，慢慢的看见山势雄奇起来。两岸的山，势如削壁，江水拥着这只船，如箭地往前行进，前面的路开了，而后面又被群山包围起来。据船上的人说，这个去处名作羚羊峡。过了羚羊峡，山势稍为平衍。在夜九时光景，到肇庆。那时夜色已深，看见肇庆街市照耀如同白昼，从岸上来了许多接客的小船，拨得水声刺刺作响，已睡的野鸥被艒声惊起了。在黑暗中，隐约地看见一点山色，一日的暑热就慢慢消失。不久，船即起碇，我们也入睡乡。初七日十时，船将到梧州，船上的茶役来叫我们填写入口证，我们遵命填好。不久船即停泊，那时上来许多穿白衣服的巡警，说是广西省政府来招待我们的，教我们一一登他们所预备的小船，行李却不要擅动，由他们汇集起来送到各人的宿舍；可是因为没有号数，所以不免弄乱。我们坐了他们预备的小船，渡江到广西大学的校门。从校门到学校还有一里多路，正是十二点钟骄阳最肆虐的时候，我们由大船搬到小船已觉疲倦，不觉又走了一里多路，才把所谓“大学之道”走到山足。可是会中派我们住的第三宿舍还在山顶上，于是我们鼓勇由山足再跑到山顶。刚洗过面，就摇铃用膳，哪知所谓饭厅还在山上二三百步之外，我们只得再上去，那样才用了一顿午饭。

广西大学校长是马君武先生，建设不过四年，办的全是理工

诸科。自从开办一直到现在，用款约三百万元，而一大半是用在建设上面，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这天晚上就由马君武先生招集同人在礼堂开会，我们正一致的要认识这位科学家。当他缓步登台，笑容可掬，对大众讲话时，原来是一位四五十岁极诚实和蔼的人，衣服俭朴，说话微带口吃。他说话的大旨，对于广西的建设约有二端，一为办理民团，二为强迫教育。讲毕由杨允中先生作答，比及散会已夜深十时。

初八日早晨，我与森玉先生一同到梧州中山公园游览，以中兄到地理学会开预备会。公园位在山顶，其最高处为中山纪念堂，全城的风景都可看到。我们由公园出来，重游街市，因为江水泛滥，满市都成了小河，有时须用渡船，渡过去才到前面的街，而我和森玉先生不识路径，跑来跑去，忽然前面被水所阻而不得前进。那时就有二位船娘招手呼渡，我们只得上了这只小船。不想我们二人身体太肥胖，到了船上，船已搁浅不能行动，两位船娘只好跳在水中，用手来拖这只船。但哪里拖得动，累得她们出了满身的汗，还是毫无办法；道旁的人看不过去，群策群力，才算拖到彼岸。这可说是一出陆地行舟的喜剧呵。

这次到梧州赴会的共有二百余人，因为船只不敷分配，一次不能同往；我们幸排在一百二十号以内，可即在今晚去南宁，其余排到一百五十号以外的，须待明日了。这天晚上，马先生邀我们在酒店里用晚膳，可惜酒席虽丰富，只因天气太热，终于未能下咽，真失掉贤主人的一番盛意。膳毕即乘招待所预备的“电船”赴南宁。我们所乘的船为新业安，而派定的舱位为西餐间，比往梧州的轮船舱位好得多了，并且行李上皆编有号数，有条不紊，比以前的办理方法也有进步。

南宁建设

我们在“电船”上的生活，共总过了三天三夜，除了在桂平的江筏楼看雨，其余便是吃饭睡觉，已很感觉疲倦。到了十一日早晨，远远看见南宁的无线电台，大家都争从舱内出来说：“南宁到了！”“南宁到了！”不久船就靠近南宁码头，望见江岸上的街市，和新建筑的省政府，气魄很壮丽。不久船停泊，岸上来了许多公务人员照应行李，我们单身登岸，乘上汽车，看见满街贴着标语，大概是“欢迎六学术团体批评广西建设”。他们派定我们住在第三招待所，是省政府新建筑的建设研究院。

说起南宁这地方，在清季时代，只是一个府治，到民国初年才改为省会。以地势而论，极为卑湿而且酷热，是一个气候最不好的地方。民国以来的军阀也没有把它整理。自李宗仁、白崇禧当政之后，才将这湿热卑下的地方建设起来。我们从江岸上就可以望到省政府各机关及中山公园的建筑，再往里去便是街市；街市前面是一条长河，河堤很高，下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岸上有许多卖食物的摊子，到了晚上灯火辉煌，如同白昼，谁想到昔日的江村会发达到这步田地！

六学术团体开会的日程，从十一日到十五日共有五天，十六日便出发到桂林游览。这几日当中，还有广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马君武诸君的讲演。李的演讲大致讲述其办理民团的精神，并对于国内政治和时局的意见。他说：“办理民团这件事，有人说：‘人民都有了枪炮，他们如果反抗起来，你怎么样办？’我就毅然决然回答，‘如果人民真是有知识的反抗，我们应该赶快退让，这岂不很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白演讲的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三自”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马君武先生演讲，谓吾

国的衰微，吾国的科学家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这都很有见地。

据我的意见，广西的政治，其好处约有数点：第一，他们日用物品及一切建筑，完全用国货；第二，广西本来是一个盗贼出没之区，自从训练民团，肃清盗贼，大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势；第三，强迫教育，从事军训，使得广西的人民和公务人员全都有朝气，这是很该钦佩的。再说广西地方虽然瘦瘠，但是他们的设备样样俱全，如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建设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农林试验场，家畜保育所，气象研究所，硫酸场等等的设备，在华北极丰腴的地方，还没有他们这样齐全；纵然有一点名未能符实之处，但他们这样的苦干的精神是不可埋没的。我们再看他们行政官吏的待遇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很可佩。听说他们对于技术人材特别奖励，不惜薪金；但省府主席每月支薪不过三百元，平常的办事员至多每月支一百二十元。军政学各界，皆穿制服：军事机关人员穿深灰布的衣服，行政教育人员穿浅灰布衣服，上下一律，没有差别；仅马老博士君武穿了一件夏布长衫，算是例外。听说他们的制服，七元钱可以做两身；无聊的应酬，皆从俭省，所以他们收入虽少，而生活费也就够了。他们虽然这样的节省，但也不过于不近人情，他们不禁止吸烟，有时大家伙在一块玩。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开会日程，每晚皆有游戏，游戏目内有集团军的军乐，有政训处扮演的桂剧和舞蹈唱歌，并且于最末一日专为欢娱一般民众和行政人员。我们曾经看见一位军乐队的大鼓手，在那里奏演军乐；第二天白副司令演讲的时候，他来作侍卫；到第三天他又到武鸣去布置讲台了。

开会的日程，本来是到十五日闭会；十六日便赴柳州，但是因为会员太多的关系，分作两批。我和森玉、以中诸公被分在第二批里。十六日这天，由当局陪我们去参观武鸣的民团。那时来宁的会员太多，据说有一位会员提议，在路上的午餐不要过于费事，只稍预备点面包、牛肉、鸡子，就很好了。果然到武鸣的时

候，所进的午餐就是牛肉、鸡子。谁知道这些食物都不是广西乡间出产，乃是由南宁寄运来的。后来我们到柳江各处游览，皆是照样预备。会员中随便说了一句似乎是客气的话，反致当局费了许多事，这真够使人不安。吃完午餐，一同游起凤山，这是明黄锡衮读书之所，前临巨流，四面绿树环绕，山势秀丽，极有幽趣。下午四时，同返南宁。

柳　州

十七日早晨，乘汽车离开南宁，山势一路高峻起来。约在上午十一时，汽车已达到山顶，我们一齐下来玩赏山中风景。前面有一条羊肠小道，顺道前进，便有一个城堡式的建筑，在城门的顶上刻昆仑关三字，原来这关是宋朝狄青破侬智高的地方。《宋史·狄青传》云：

>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侬智高反，陷邕州，师久无功，青请行。时智高还据邕州，青合孙沔、余靖兵次宾州。先是蒋偕、张忠皆轻敌败死，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所为。钤辖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兵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按以败亡状斩之，诸将股栗。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贼悉出逆战，青麾骑兵从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

到了南明永历帝起兵肇庆，据守桂林，这昆仑关又成了险要的地方。我们看昆仑关的刻石，是永历二年所书的，上有严起恒等题名。这关直到清代还是重要的所在。自从修了汽车道，才化险为夷了。现在关上面已住居民，关门口的小径已全生了茅草。

我们披榛寻径，才由关门的左面回到汽车的原路。抚今思昔，不胜感慨。过了昆仑关，又渡了两次河，到深夜八时才到柳州。从灯火昏黄之中渡过柳江，住宿柳州图书馆。

在南宁的时光，我们差不多过了五天最炎热的日子，每天所穿的衣服全都被汗湿透了。到了柳州，已成清秋，与南宁大不相同，尤其是夜里可以听到秋虫的叫声，和秋风刮着树梢的萧瑟响声。从窗户外刮进来的秋风把已经沾在身上的衣服全都干爽起来，觉得非常的舒适。第二天拂晓，我就醒来，一个人出去散步，走一条草丛中的小路，过了某氏的小园，便看见一个牌坊，上面刻着“柳侯公园”，无疑的是柳侯祠了。我进了柳侯坊，一直往北行，一条幽径，两旁碧翠的丛林，尚未被骄阳曝晒，满含着露珠，地上的青草也未被游人践踏，一阵一阵的清香扑着我的鼻端。走过了纪念堂，左边紧带着一池秋水，面积约数十步大，满植荷花和菱苹之类的水草，便是最负盛名的罗池。再往北行，有楼阁三楹，有匾书曰“柑香亭”，上面楹联很多。在亭的前面，种着十亩桑麻，亭侧种着数十丛芭蕉，间有几株深绿色的荔树，可以想见“荔子丹兮蕉黄”的景象。在柑香亭的南面，罗池的中间，有水榭三楹，远望缥缈，好像仙家楼阁。过柑香亭往西行，为思柳轩，现在已成公共游谯之所。若在夕阳欲下之时约了五六个朋友在这里宴会，佐以丝竹，真是置身于天上了。由思柳轩往南，过一条石桥，桥栏外的隙地种着三五株芭蕉，还有几棵桂树；过去竹篱，便有一个船厅，船厅的右面就是水榭蓉镜亭。船厅前面摆着几张石几可以休息，水榭前面可以钓鱼，真有点像苏州文氏拙政园的风景，决不像在蛮荒之境了。回想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大词人柳宗元先生“城上高楼，海天愁思”，当他退食之暇，来到罗池隙地小座，也许是他唯一的慰藉。我坐在石几上，在那里玄想千五百年前前后后的事情，把我已混在大自然界中，不知不觉的忘形了。晨露沾满我的衣襟，清风吹动我的衣袖，初出的太阳

已照着水榭前竹林；远远听见鸡叫和行人足声，才惊醒了我的残梦。就从船厅出来，回转石桥，展拜柳侯的衣冠墓，墓前是柳侯祠，祠有柳侯的题名，和元代柳侯石刻画像。我从祠堂中出来回到寓所，已把徐、王二公等得急了。我说我到了最幽雅的地方，可惜诸公未能领略！

进晨餐后，渡河一同游立鱼峰，山不甚高，但盘道曲折，极为难登；可是我竟登到绝顶。看见柳江直贯中流，江南北的街市全都在望。下立鱼峰后，同游农林试验场和航空试验场。下午五时，赴思柳轩公讌。

阳朔山水

十九日晨乘汽车由柳州北行，渡过五六次小河。车过荔浦，山势更觉雄奇，一个一个的山头，好像从平地直拔起来。山的形象千奇百怪，有若象的，有若熊的，有若笔架的，在眼帘经过，实在迎接不暇。我们便知道快到阳朔了。邝露《赤雅》云：

> 阳朔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疑，析城天柱者，如楼通天，如阙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马啮，如阵将合，如战将溃，漓江荔水捆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态。

我看阳朔山水分开来看固好，但合起来看，气象尤为奇特。距荔浦不多时刻，即到阳朔。山城街市很小，城外便见千山回抱，万壑竞流。对城的诸峰已辟为公园，每个山峰上皆建立小亭。我们登小亭上，诸峰罗列目前，实为奇景。宋李纲诗云：

> 溪山此地擅佳名，雨洗烟岚分外青。却恨征鞍太匆遽，

无因一上万云亭。

由城市后面靠着山城有一条曲折山径，下临漓江，前对诸峰，水流激湍，一泻直下。山城离水有三四丈高，岸上建有水阁，我们倚阁俯视，来往的风帆皆由此经过，形势极为雄伟。并且隔岸的山色，苍翠的树木，和采樵的牧童，聚在一望之中，真是一幅画境。游阳朔有水旱两路，水路可以看其幽秀，旱路可以看其雄奇。在黄昏时候，烟峦含翠，树色蓊薆，被暮色慢慢的浸润下去，与大自然界合而为一，尤饶奇趣。所以柳子厚说："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愿归"。真是非到桂林的人不能道其语也。

我们从阳朔行后，因为天时尚早，又在夕阳欲下之际匆匆游了西林公园。内有清流潺湲，山洞烟峦，且有长廊曲榭，点缀其中，略仿故都颐和园的建筑。昔为灌阳唐子实的花园，后赠与岑春煊氏，今改为师范专科学校矣。

出岑氏园复前行，马路的旁边种着亘数十里的苍松翠柏，道路平坦，山色幽媚。路上不绝行人，路旁有两三个茶棚，供人在那里安歇。此为两广最罕见的景象，似乎兼有江南水乡的秀美和塞北风光的雄壮，悬想四川风景可以相比，其他则非其伦也。

车抵桂林，已入黄昏，我们在第一高级中学安歇。这是明代的桂王府，房屋虽改西式，然而石栏龙壁，遗迹犹存。

桂林景物(上)

二十日晨，由桂林当局招待作一日之游，预定的行程：早晨游叠彩山、虞山，下午游月牙山、龙隐岩、普陀山、七星岩。兹把游踪分述于下：

叠彩山

是日上午九时，一同出发，由中山公园，仓卒经过独秀峰下出北门，走过一条羊肠小道，就到了叠彩山。叠彩山，又名风洞山，因为当盛暑时，清风徐来，尘襟涤荡，故名风洞。拾级登山，不到百步之遥，有一个石坊，经过石坊，山脚下建立一个极大的石碑，题曰："江陵张忠烈、常熟瞿忠宣二公成仁处"。碑为梁章钜所建，张为张同敞，瞿为瞿式耜，同为明末殉国忠臣。清兵下桂林，二公保守危城，不屈死节，最可以见到民族的精神。展拜遗碑，令人肃然起敬。由此向东行，高不过数十丈，便是景风阁，凭窗远眺可以看见如带的荒城，雉堞上生了许多茅草，城外则冈峦起伏，湖光掩映。要是在阴雨天气则烟雨迷濛，云生四座；在夕阳欲下时，则斜阳照着城墙上衰草，墙脚下映着翠苔，两三牧童唱着山歌从山下经过，归林的晚鸦在天空倦飞，又是一番佳景。倘有两三个知己之友，宽衣博带，到阁中谈心，吃着没有渣滓的荸荠(桂林名产)，在那里盘桓竟日，就是十足的六朝人的风味了。景风阁前后有亭台数座，前后错列，曰福庭，曰一拳亭，曰所憩亭，曰文昌阁，曰佛殿，曰僧寮，曰洞天福地。由景风阁再往上走，便是风洞。在洞前伫立，则山峦环抱，漓水萦洄，眼界为之一开。入洞后转而深幽，壁间刻有卧佛，长可四五尺许。由石佛卧隅佝偻穴行，中有石室，凉飔袭人，虽在盛暑，犹若深秋。壁间满长着石钟乳，皆呈白色，细腻如脂。再往上去便到了后洞，豁然开朗，别是一番世界。山后诸峰，冈岭起伏，山旁边有一条羊肠细道，左右修竹千株，再望下看便是桑麻万顷，野水人家，真诗情画境也。我们由原道下山，沿着漓水前行，不过两三里路便是虞山广

虞　山

原来虞山之名，由舜而得。史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二妃殉节。其实桂林置郡始于秦代，舜根本不会到此。不过南荒先民崇尚虞德，特立舜庙，因号其山曰虞山而已。山左侧临漓水处，枕山之麓，有亭曰南薰，倚槛东眺，可以远看尧山和江村的烟景。山上有洞，名曰韶音：山高洞深，前植松柏，清风徐至，时闻碎玉之声，波涛之响，故立此名。

月牙山

出了虞山，乘汽车到东门，渡过漓水，前面有一道长桥，那便是最有名的“花桥”。说起花桥来还有一段故事。据称在数百年前，有一次漓水泛滥，人民无法堵御，城内外的交通业已断绝，这时恰有一位宦家小姐临佳期出阁，她毅然把奁资统统捐了出来，建筑一座石桥，以利交通，所以后人名作花桥。这桥两旁全安着石栏，当中又有宽广的长廊，堪供游人休息。长廊的上面嵌石，署“芙蓉万仞”四字。当时文人称花桥为“市声匝地，绿云倚天”，定为桂林名胜之一。过了花桥往右转，拾级登山，山势峻峭，有若剑拔弩张。盘旋上山，盘道如半月形，因此名为月牙山，我们在盘道上望见万绿丛中，一座白石的长桥，漓江水势奔放，激着水花怒溅，直从桥洞中穿过去，叹为奇观。登到山顶，便是琼楼玉宇，和些嶙峋的怪石，参差其间。山上凡有阁三，一曰倚虹楼，二曰襟江楼，三曰丛桂楼。登临俯瞩，令人神远。我们在阁上略用午餐；听说庙中和尚做的豆腐最好，可惜时间局促，没有福分享受了。

龙隐岩，七星岩

我在月牙山午餐后，就沿山前进，到龙隐岩。山岩之上，有狄武襄公(青)平蛮碑俨然树立。从山脚下穿过去，有大洞门，高可百丈，跋涉而入，仰观洞顶，石缝裂处，龙迹夭矫，其长竟洞，故名龙隐。洞里面宋人的题名，环壁几无隙地，自宋治平、熙宁、元丰、绍圣、崇宁、大观、建炎、淳熙、嘉定以来，余靖、李师中、张觐、苗时中、曾布、刘宗杰、卢约、胡宗回、谭棪、王祖道、方信儒、孙师圣等，难以缕指。不过全在苍苔石壁之间，非细心摩娑，破履寻碑，不能窥其全豹。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元祐党籍碑。张祥河《粤西笔述》云：

> 按此碑在临桂龙隐岩者，乃党籍碑内故相梁焘曾孙律重勒；在融县真仙岩者，乃党籍碑内馀官沈千曾孙時重勒。

其次便是陆游的诗札。但是这些宋人题名，半没荒草，为牛羊所践踏，骄阳所曝晒，恐怕积年累月，终要化归乌有了。看见桂林的拓工仅仅拓得眼面前几个题名，且又用洋纸椎拓，字迹模糊，庐山的真面目已失却一半，实为可惜。闻说南宁省立博物馆曾搜觅残碑约千余种，响拓保存，保存粤西文献不少。

我们从此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七星岩，这因七峰骈列，形如北斗，故名。山左为栖霞寺，我们由此经过山半腰中，有一亭名听月亭，崖间镌唐宋以来题名甚多。亭后有石洞，极为空敞。由洞中拾级以登，地势平坦，可坐百余人。再往后去便是七星岩，冷气迫人，不可久居。那时我们集中在一起，约有六七十人，请了六七位引道的，大家拿着火把，前呼后拥，一直往洞里去。其初俯身而行，后来忽然开广，几十个火把照耀着，看见洞中无数钟乳，倒悬空中，有作狮形的，象形的，蛇形的，童子拜

观音形的，千奇百怪的状态。引导的人一一为我们指点，他们所说也有像的，也有不像的。正在说话之间，前面的人说“小心呵”，洞内面积忽然窄小，好容易爬过仅能置足的小径，拿电筒来照下面，便见无底的深渊，我们鼠行蛇走，沿着壁行。过了这危险的所在，再往前走有百余步，洞中忽然又开朗起来，高可擎天，阔无边际，内有无数巨石，势极嵯峨。山中泉水潺潺，如闻弦歌之声，怪石嶙峋，竞作天魔之舞，或为渔人张网之形。不意洞中山水比洞外的还要奇绝，真令人喝一声“叹观止矣”！再往前行，约有半小时光景，隐约见一线曙光，其艳若桃李，其清若冰玉，虽石火电光也不能比其明洁。再向前，曲折宛转行，忽然大放光明，已到洞口了。因为好奇的关系，我到洞口就请引导的人，把他所说的名物一一的记了下来，兹写在下面：

1. 鲤鱼跳龙门
2. 老君台
3. 七星拜月
4. 第一洞天
5. 笔架山
6. 罗汉守洞口
7. 雪盆石
8. 白兔守头城门
9. 二龙戏珠
10. 赖子潭
11. 五龙戏水
12. 二城门
13. 三城门
14. 马怪
15. 五篷山
16. 挂挂山

17. 猴子偷桃
18. 八仙飘海
19. 摩天岭
20. 飞龙潭
21. 太白星君香炉
22. 打球台
23. 葵扇
24. 天平架
25. 仙人房　仙人血
26. 石莲花
27. 狮子戏老龙
28. 马怪跳鱼塘
29. 鱼网定塔山
30. 蓝蛇石洞千舍金石
31. 须弥山
32. 狮子抢黄枣
33. 金瓶插柳
34. 金沙井

桂林刚下了几天雨，路极泥泞，洞中道路甚滑，我不过走了一部分而已。据《广西通志》所载，洞中飞龙潭，摩天岭，赖子潭，皆为险地。《桂海续志》亦记洞中形态云:“此为象，此为狮，此为骆驼，此为湘山佛，半为石乳，万古滴沥自成，巧于雕刻。”由此看来，引导者的话不为全虚。我们出了洞口便到庆林观，此观范石湖《桂海虞衡志》中记之甚详。

桂林景物(下)

在桂林的游程本定为一日。你想，这许多的名胜古迹哪能一

日游览过来？而且桂林不仅有壮丽的山川，即其风土人情也很值得注意。倘若走马观花，如何领略这些奇趣，因此决定再作竟日之游。兹把次日行程述后：

金石书画展览会

初来桂林的晚上，就看见对面的图书馆开金石书画展览会。今天早晨八时以前，我就到会参观。天时尚早，待了一会，管理的人来了，收藏家也来了，在广西制服统一化的当中，很少见这彬彬然的斯文君子。我看见许多陈列的书画，不见高明，惟有悬于壁间的桂林石刻，陆放翁诗札等类，倒还值得收藏。那时我找着一位先生，问他在何处可以购买，他答说："依仁路贺广文碑帖店出售"。我看他举止极为文雅，就继续问他："贵处的学者文人知名的有哪几位？"承他的厚意，开了一单，写在下面：

王梦生寿龄书、画梅；

王鹤笙景福书、画；

李叔文文学；

李季卿画梅、山水；

刘名誉嘉树，翰林，淮安知府；

阳翰卿骈文，进士；

谢启发画山水；

谢启中诗、古文、书。

我再问："先生贵姓？"他老是不肯说。后来又来了一位老先生，代他写了一个名字是"黄楚客"，并且说黄先生是当地的文学家。

独秀峰　风洞山　伏波山

我由金石展览会回到高中，就同徐、王二公重寻胜迹，作竟日的畅游。我们先由中山公园游独秀峰。原来桂林这个地方四山环合，城中仅有独秀一峰。山不甚高，葱茂蓬蔚。山上有楼阁五

六处，供人游憩；但因年久失修，盘路已坏，现在封锁，不能上去了。山麓有刘宋时郡守颜延之读书岩。其后通池，小桥临水，池中遍植荷花，池旁杂以花木，有江南园林境象。我们站在小桥上，可以看见山峰上的摩崖，刻有“紫袍金带”，“介然独立”，“南天一柱”等字，大可丈许，甚为奇观。在独秀峰下小坐片时，便沿山径，出城重游风洞山。我看桂林山水以七星岩最为奇特，以风洞山最为幽雅，所以我又在景风阁上小憩半日。远接天光，近窥山色，非身历其境者不能想像其风景的美丽。

我在阁中遇着一位卖米粉的，我问他“买卖如何?”他说:“自从六学团来到桂林，我们的买卖就糟了；因为各处皆布满了警位，游人绝迹，谁还有吃我们的米粉的。”不图我们一群人来了，反而妨碍了卖米粉的小生意，真正抱歉得很。我赶快给他两毛钱，他欣欣然去了。

我们从风洞出来，路经伏波山，山下有一个道观，我们叩环请入。大殿后面，有径可登，然荒芜过甚；余等披榛寻径，始登绝顶，全城风景在望。山下有洞，名曰环珠，内可容榻二十，穿凿通透，户牖旁出。惟非乘舟不可至洞；且山半在城内半在城外，洞在城的外边，故终未能游也。

花神祠

我们从伏波山回来，已下午五时，徐、王诸公径回高中。我久闻花神庙之名，闻说在军部里面，因即前往，投刺请入，恰遇见招待我们的胡参谋在里面办公，他引我到招待所休息片刻，就穿过几进院落，到军部的后园。园中有亭曰八桂亭，桂树参天。穿过桂丛，便见一带破井颓垣，野草漭漫，墙脚上生了无数芭蕉，高与人齐，叶绿如漆，蔚茂成林。我披开野草，在芭蕉树的左侧发现了一座荒坟，坟旁有一个小庙，上题着花神祠。

原来军部旧址是前清的臬台衙门，在嘉道的时候，有一位臬

台修理亭园，便发现了一躯枯骨。后来有降紫姑神的，说明了她是殉难的女子，臬台当下大发慈悲，把她的玉骨重为安葬，建祠立碑，以垂永久。后来每到阴天夜雨的时候，常听见如泣如诉的鬼哭之声，小胆的人都不敢到后园里去。

可怜那花神祠只比鸡窝稍微大一点，我屈着腰走进去，里面砖石累累，鸡粪丛丛，哪有花神的牌位。忽然在壁间看见嵌着的一块小碑，乃系一篇绝妙的文字。我真喜出望外，马上向胡参谋借一管笔，录了下来。文如下：

余辟园于署之东，凿池于亭之侧，工得骨一具，以告。埋香无主，瘗玉有方，命别为掩之，不知何代，亦不知何人也。已而有登紫姑坛来致谢者，曰：妾姓阮氏，字风篁，本女校书也。生长秦，流寓粤，有滇藩吴三桂之变，睢阳城小，人肉无多；魏博兵危，鬼雄有几。妾与此间寒士王玉峰定情有约，王既血刃，妾亦投缳，时则康熙初年也。赵氏一块肉，昔属民家；滕玉三尺坟，今记官舍。余闻而悲之，因为传之曰：昔小玉之于君虞，双文之于微之，女之致情，古诚有之，兹殆过矣。呜呼，太白高歌，独怜飞燕；小青饮泣，尚感孤鸾。惟其能以情死，故能以魄生。拾碎玉于池中，筑钱塘苏小之墓；仿乞文于地下，作同州清娱之铭。篁生于顺治初年，殁于康熙初年，生年十九，殁将二百秩矣。生也不辰，烟花寥落；死而不朽，残骨缤纷。不敢冒掩骼之任，又不能作葬花之记，故书其事，且肖其像，使于园中为司花使云。

名园珍重出情枝，小传曾刊依壁碑；
葬玉埋香多韵事，旨人亲志郭公姬。

碑中所说的肖像已不知到哪里去了。就以本文中所说的“作同州

清娱之铭”而论，作者也不敢信这件事；不过其情其景，置在《聊斋志异》中，就又是一篇《林四娘》了。

傜人遗迹

广西的傜人，多居于桂平、柳州一带；他们住的地方，总名为傜山。由南宁到柳州，可以经过傜山的脚下；要是深入，还有一二百里路，可惜未能去。但我在南宁时候，曾参观省立博物院，其中陈设傜人用品很多，有傜人所用的雌雄鼓，有傜人所刺的绣货。最可注意的是傜人所着的木屐，与日本人所穿的形式很相同。并且我还听到最近关于傜人的一段传说。

在二三十年以前，傜人是不与汉人往来的，一来是怕汉人的横征暴敛，二来怕汉人的武力欺凌。那时的傜人都潜伏在山谷里或深山上，动也不敢动。最近广西土匪绝迹，广西的老百姓乃至深山的苗、傜都受了平等待遇，于是傜人慢慢的敢出来与人民交接。这些傜人，如同小鸟出笼，获见了不少的新奇境物。有一日上午，一架飞机从傜山经过，一群傜人大惊小怪，当作天使来了，全都顶礼膜拜。不多几天，他们又发现了一件奇迹。有一位集团军的同志，他带了一个电筒到傜山去调查傜民的生活，正是三十日的乌黑夜里，满天星斗，四围漆黑，想不到那最尖锐的亮光，射到傜人酋长的眼前。那时他们四处搜访，毕竟在芭蕉树旁边寻得了一位极漂亮的少年。酋长见了，以为一定是仙人到了，马上把这位少年招为驸马。这位仙人驸马就给他述说现在广西当局的德政，因此在这四五年中傜人与汉人同化起来，广西当局就在傜山上设立了三处学校。我在荔浦休息的时候，还看见一张傜小姐的像片。

阳朔归程

假若在九十月的天气，树叶未落，橘柚初黄，有两三个知己朋友，乘着一只小船，带着几瓶老酒，从桂林到阳朔去，两岸有极曲折的高山，江水一清见底，坐在船边上，看着山，吃着酒。要是嫌口中乏味的时候，马上唤前面的渔舟，买一条鱼，在十几分钟内可以烹熟下酒。如果看见前边的山色好，又可以马上下船，上山游览：红叶满山，桂树成林，时有幽兰的香味吹到鼻端，极清爽的空气吹着襟袖，这是怎样有趣的事呀！我虽没有在秋天游山，但是暮春的天气是游过的。我记得去年，同朱逷先先生在四月初旬，一同溯富春江直上，游严子陵钓台，在严州乘船看见两岸布满了嫩黄的菜花，菜花的深处，露出弥漫的山色。船到七里泷，山势便夭矫起来，几十步路便有一个水湾，碧深的富春江，激湍飞流，一泻直下；两岸的青山如同翠壁，山坡上开了无数的红杜鹃花，夹着翠绿的松林，有时有几棵雪白的梨花相映着，又娇嫩，又好看。那时我们到了钓台和谢皋羽痛哭之处。我与朱先生说："我若是失足江流，就与吾家皋羽公同归了。"那时正是"一二八"之后，所以朱先生说："你如果投江，我便与你开追悼会。"时间过得很快，由孟春而徂秋，现在又到滔滔盛夏了。

二十一晚上，我们就全由高中下了船。夜十二点钟，一钩残月从月牙山畔出来，照着漓江，江水面上映着一道白光。我在船舶上站立多时，一直看到月色朦胧才回船去。在半夜中，只听见打桨的声音；及至醒来已日上三竿，船已开出好几十里路了。可惜篷舱太小，骄阳迫人，如同置身蒸笼，实在热不可耐，幸而在夕阳中，我坐在船边上，濯足中流，看着两岸的山色，山傍树林中有两三人家正在那里做饭，使我体会到"渡头余落日，墟里上炊烟"的风景，足以消释这一天的郁闷。

到了夜晚，船停泊在野港荒湾，船家烧了一锅热茶，用大沙壶盛着，我们与船夫围着沙壶，同坐在船头，听他们谈乡下的故事。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四天四夜，到二十五日下午才到梧州。在广西大学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四时便乘汽船赴三水。船到三水的时候，已经夜深三时，由广三铁路工友招待我们到广三车站。我看见前次撑船的小朋友，穿着一身烤绸衣服，在这里吃吃地笑，但我们已没有机会坐他的船了。自从我们到梧州，天气骤热起来；既到了三水，热不可当。虽在微明的天气，我们只吃得一碗粥，还是汗如雨下。这是我生平感觉到最热的一个早晨。广三火车六时开行，九时即到广州。

荔子湾头

我这次旅行，本与徐森玉、虞和寅、王以中三公作伴。既至广州，住在新华酒店，便与竺藕舫先生可桢在一起。我初到广州，就患足疾，徐、竺诸公去罗浮山游览，我一人独游广州。二十八日晨，到豪贤路去访梁廷灿兄，他在中大图书馆服务，因腿上生疮，在家休息。多年不见的朋友，晤谈自然高兴。在他家中吃了午饭，下午五时，他请他的朋友张君，同我去游荔枝湾。乘车到湾头，雇了一只瓜皮小艇子，艇中仅可容两三人；但里面陈设却极精致，座位也很舒服。初下船的时候，是一道小河，两岸有许多茶肆；后来河身慢慢的宽起来，直通珠江，两岸种着许多荔枝树。在夕阳欲下的时候，一对一对的摩登男女，打桨前行；如果在四五月天气，鲜红的荔枝便会自己落到爱人的怀里。这是如何够人艳羡啊！河中弯曲的地方很多，小船可以游到绿荫深处。长条拂着绿水，绿叶如同屏幛，在那里谈情，真是再好没有的了。河中有许多贩卖食物的小船势如穿梭的来往，艇家粥和椰子雪糕最为出名，我一样都吃一点。再往前去，河身越宽，陈列

着一排花船，那便是紫洞艇。在昔羊城繁华之日，每到下午紫洞艇上的游客都坐满了，里面可以竹战，可以招妓侑酒，声歌彻夜，一直到月落乌啼，客才散去。如今繁华的程度大不如前，船也少了一半，排列着的也不过三五十只而已。过了紫洞艇就到珠江铁桥，水势更大，小舟在那里飘荡着，放乎中流，大有飘飘欲仙之势。回忆西子湖边的游艇，在暮春时光，夕阳天气，看着淡淡的远山，软软的柳丝，和乐的春波之上飘着许多的有情的爱侣，粉白黛绿，打桨来往，这固足使人留恋，但是桨声灯影，水调笙歌，还没有荔枝湾头那样迷人呢。

夜中我到张君劢先生处畅谈竟夕，并承惠借路费百元。

二十九日访吴鲁强先生和梁思庄女士，承他夫妇的厚意，雇了一辆汽车约我游观音山、中山纪念堂。纪念堂建筑极为壮丽。由此下山，游五层楼，现在改为博物馆。在观音山下一个酒家里吃午饭。下午同游黄花岗，展拜先烈的遗迹。由黄花岗到白云山，有祠祀苏东坡，泉水在祠旁经过，山脚下全是竹林。取泉水烹茶，坐此听泉，最为舒服。由白云山再到中山大学游新址，校舍系宫殿式建筑，全校面积约有一万多亩。据农学院的计划，五年以内可以供给农科的开支，十年以内就可以供给全校的经费，这在吾国可谓最大的学校了。由校回新华酒店，已下午五时。

三十日，吴三立先生约我参观徐信符先生藏书，所藏多为粤中乡贤名著。承他指示关于搜辑学海和广雅书院的材料，至为感谢。吴君邀我在双门底番菜馆吃晚饭。

关于粤中的风俗，我现在补述几句。广东人最喜欢饮茶，但与其说他们饮茶，无宁说他们吃肉。每到茶馆里面，五味杂陈，包饺俱备，也有甜的，也有咸的。很好吃零食的我，看见这些奇品糕点，不肯不吃，但每吃一回必要泻一次肚。他们那里每天要喝三次茶，就是早茶，午茶，晚茶。茶馆共分三等，最好的叫茶室，其次的叫茶居，最次叫茶楼。茶室每饮一次，要花一块多

钱。茶楼价目最廉，但地方也很干净，就是劳动的朋友们，每到散工以后，也到茶楼里来喝茶，我曾见一个茶楼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赤足劳动的工人。并且我们在傍晚时候，走上马路，也可看到劳工的住户在那里吃辣子鸡。人人皆可得到优厚的物质享受，这便是与北方不同的了。

是日晚，徐、竺、王诸公都由罗浮回来。那时我们定的我与竺藕舫先生、王以中兄乘意邮由九龙赴上海；徐、虞二公则由广州赴长沙，由平汉路回平。我们随于三十一日早由广州到九龙，在弥敦旅馆住一夜。明晨十一时就乘意邮Cauts Rcssu赴沪。虽然二等经济舱，但舱位极为洁净，每天有四顿西餐可吃，比芝沙丹尼船好得多了。九月三日下午二时，船到上海，同住宿于新亚酒店，价目较贵，地方也较为安静。在上海共住了三日，访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和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到陈乃乾先生处询江南的藏书家。又到爱文义路一四九五里访瞿凤起先生，参观铁琴铜剑楼藏书，可惜他们的书全都藏在箱子里面，仅仅看了几部明版丛书和《虹月归来图》，并承凤起先生厚意约我到常熟参观铁琴铜剑楼。

五日下午，陈乃乾先生约我和王伯祥、瞿凤起诸先生在一枝香晚餐。座中识姚石子先生，约我到张堰，可惜在外时间勾留过久，未能前往，只好俟诸异日。王以中兄先回甪直，同他的夫人在苏州等我。我遂于初六日九时乘京沪车到苏州，住三新旅舍，以中夫妇已早到了。午间在观前广州食品公司吃饭。下午一同到吴苑品茶，地方幽洁，品茶的人大半闲情逸致，十足表现三吴的风味，与广州的茶楼又不同了。到护龙街文学山房，遇见书肆主人江杏溪，同游逸园。以中兄因有约他往，晚间江杏溪约在观前吃晚饭。初七日早，与以中兄乘汽车赴常熟。

常熟铁琴铜剑楼

常熟这地方本来是鱼米之乡，文风很盛，从明代以来，就有不少的藏书家，如杨氏万卷楼、钱氏绛云楼、述古楼、毛氏汲古阁，我们是知道的了。到了清代，还有稽瑞楼陈氏、爱日精庐张氏。当道咸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荫棠先生绍基喜欢藏书，那时黄丕烈士礼居和汪氏艺芸精舍的书刚刚散出，其中宋、元秘本一半归聊城海源阁杨氏，一半归了瞿氏。瞿氏自荫棠先生至良士先生，已保守了四代；现在良士先生的公子旭初、凤起诸君都能爱惜古书，克绍箕裘。数十年中所称的海内四大藏书家，丁氏、陆氏、杨氏和瞿氏，三家的书已风流云散，惟有铁琴铜剑楼巍然独存，这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呀。

瞿氏是常熟的大族，自明季瞿式耜以后，代有闻人，他们的家在罟里村，聚族而居，大约有二三百家。罟里距城十二里路，四面菰蒲，桑麻盈野，是一个充满了诗人意趣的地方。昔日由城里乘小船，飘荡两点钟的工夫，便可到了。村中有书可读，有饭可吃，夕阳时候可以到村外田陇散步。这次我们来虞山，是先到城内新县前访瞿良士先生，承他的招待，由旭初先生作陪，乘公共汽车同往。可惜在民国初年，因为避乱的缘故，好书全运到上海，其次的都在城内，家里的人也不敢在乡下住，仅留下一座空洞藏书楼了。楼凡前后二楹，仅剩下几十个书柜，和几个古雅的楠木书棹，陈设的非常有次序。要是在插架完足的时候，可以无限量地在那里翻阅书籍。前三年，袁守和先生来常熟的时候，本要照一个像，但因光线太暗，没有照成。我们从楼上下来，看见院中生了无数秋海棠和几株桂花，野趣盎然。在楼下古雅的书斋中，坐了半天，仿佛置身在需道的时候，我心里想着："我假若有这样好的藏书楼，我终身也不出去问世了！"下午五时我们由藏书

楼走到野塘桥边等候汽车。瞿旭初君说:"自修筑公路，我家里的田地划归公路里来的已有二百多亩，小户人家有两三亩田地，就划完了。现在簇新的汽车来往开行到上海或苏州去，乡下的大姑娘也知道买城里的桂花油和新式花样的绸缎了。"六时车来，到城里同游言子墓和公园，在公园饮茶小憩。晚上在瞿家便饭；看顾千里、龚自珍所藏的六朝及唐碑，次日以中兄夫妇同游虞山，我随乘汽车到苏州搭车北上。

馀　记

初八日从苏州行后，下午五时到南京，因为时间关系，未能去看京中好友，遂乘平浦车一直北行。我买的是来回票，仍坐的三等车，在茶房车上找了一处可以安稳睡觉的位置。火车一站一站开过，许多乡下同胞因为不肯花几个运动费，只好坐在车的角壁间，在那里打盹。三等车是没有纱窗的，车厢里污秽不堪，在车中过了两夜一天，满身灰尘如同囚犯。初十日上午九时十九分就到旧都了。

秋风萧瑟，凉气袭人，由街市上送来的凄凉叫卖声和晚上壁间蟋蟀络绎的鸣声，声声送到我的耳朵里来，我一人在那里玄想着：

一、同是中国地方，到广西为什么要入口证?

二、桂林风洞山卖米粉的，自我们去后不知买卖怎么样? 三水撑船的小朋友还在那里吃吃的笑么?

三、平浦的道路有两夜一天的光景，不为不长，为甚么不加置三等睡车? 国家是以人民为单位的，难道吾国的老百姓，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乘三等睡车的权利? ……

我长久地想着。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属草，二十一日早写毕于旧京达子营之佣书堂。

（原载《禹贡学会游记丛书》，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版，署名谢刚主）

三吴回忆录

闲云流水两茫茫，底是何人话短长？
我本无情惭西子，小姑岂有嫁彭郎。
藕丝已断三千尺，柳絮空来八月狂。
君自言尔我自听，洞天清露倍凄凉。

——《西泠金鼓洞题壁》

我虽生长在北方，但自幼就缅想着江南。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常听我祖母谈江南的故事，所以江南的风景，印象在我脑子里很深。我原籍是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罗墅湾乡下人。当清咸丰年间，太平军破了常州，先曾祖携着祖父行，避乱跑到河南的商邱，就寄居在河南了。从同治初年到光绪末年，祖父仲琴公以教读游幕为生，生活非常困难，到光绪末年生活稍为安定了，不久的时光，在光绪二十七年的夏天，我母亲就生下我来。我的祖母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忽然得了一个孙子，那是非常的高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同我一床睡。我那时虽然认不识几个字，但是已经喜欢听讲故事了。躺在祖母烟盘子旁边，一边用一双小眼

睛，看着我祖母吸烟，一边要求我祖母讲故事，祖母吸完了烟，手里拿着茶杯喝着茶，才开始说道：

“那时还没有你爹呢，我不过八九岁，跟着你太舅公从常州乘船到河南去。是一个六七间舱的大船，两边都有玻璃窗，可以看见两岸的风景，屋里陈设着红木的家具，坐在椅子上可以看见岸上的行人，和岸旁的杨柳。一到晚上，船靠在芦苇塘的旁边，月光照在船面上，非常皎洁，清光照人。我们都舍不得去睡觉，到了三更时分，都才去安歇。但是不久的光景就听见岸上劈扑的响，接连着外间舱里家人惶忙着来说：‘老爷不好了，有歹人来了！’那时吓得我们连忙往舱板底下藏。待了好一会，外边的人说：‘贼已走了，快出来罢！’……”

我听着非常的高兴，忙问那船是什么样？贼到底走了没有？祖母说：

“天不早了，快睡罢，明天再讲给你听。”

第二天的晚上我又重新问我祖母七间舱大船的故事。祖母又接着说：

“我们坐着船，幸而平安无事，不到几天就到了清江浦。换了骡车，头一站就是红花埠。一路上风沙拍面，走了半个月才到开封。开封这个地方，灰土是怎样的大，每到春天，黄风扑面，桌椅上的土，都有一钱厚，要是刮了大风，天色昏黄，对面都看不见人，哪有江南春天那样的美丽。要是提到食品，更不如我们常州了。我们在家乡的时候，每天晚上可以吃到水磨汤团和绉沙的馄饨，但是一到了河南，哪里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风味呢？”

说来说去，无非是这一套的故事，无形中我就对江乡起了个很好的印象；可是我虽然到江浙不少的次数，但是总未遇见七间舱的大船。

我二十岁以前曾到过常州，看望我外祖父、外祖母。二十以后我到清溪与我妻段庆芬女士结婚，虽然是父母为我作主，但是

我们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融洽，有时吵几句嘴，但是不到一刻的工夫，又言归于好，相视而笑了。我写这篇拉杂的文章，就是我的太太为我研的墨。我这两次到江南，都是逗留了几天，谈不到有甚么感想。我稍觉着得到一点印象的就是近十年来漫游江浙，共有三次，一是民国十九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命，赴江浙观书；二次是二十三年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三次是二十七年由香港回到旧京。看到了美丽的山水，遇到了无数的师友，触到了无限的感慨。在寒风扑面的旧京，晚来欲雪的天气，在火炉旁边，缅想以往的故事，写我游历江南的绮思。这短短的文字，就算楔子。

海上观书

在旧都文津街有一处碧瓦朱甍的建筑，就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我们在办公室里，可以看见北海的琼岛和一泓的秋水，北海边石栏上依着不少的游人，水面上飘荡着残荷，还有几只野鸭子在游泳。那种幽静的光景，真是一个读书的最好所在。那时我正服务馆中，整理明清的史料，因为要参考的缘故，馆长袁守和先生就派我到江浙去，参观江浙公私各家的藏书。我听见上海涵芬楼藏书最为完备，而力成其事的，就是张菊生先生。菊生先生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老友，我当日在任公师侍席的时候，曾经代任公师写了不少的函札，可是未见过面。那天的黄昏，我就到藏园去，请傅沅叔太世丈写一封介绍信，傅先生说：

"菊老是我的前辈，你见了他，必须要特别的恭敬。"

我只有静默着，听着他老人家的吩咐，接到傅先生的介绍信，才唯唯的退出。同时请陈援庵先生介绍到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图书馆去看书。又请冒鹤亭丈写信给南浔嘉业堂刘翰怡先生。部署已定，就于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由北京动身，在天津乘船

到上海去。二十二日的早晨，到了上海，住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同学陆侃如兄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到极司斐尔路四十号张菊生先生家里去。那是一座极幽洁的楼房，楼房前面，草地如茵，种着几颗芭蕉，和几棵桂子和棕树。由侍者引导到客厅里去，侍者端上一杯茶来。我看见屋内陈设着无数的土俑和其他的壁画。不一忽，一位极矍健的老者，轻松的步履从楼上下来，那就是张菊生先生。我连忙站起来，深深的鞠了一躬，携上沅老的介绍函，陈述了我的来意。菊生先生问起我的家世。很和蔼的问我：

“堂上可好。”

又继续说道：

“先母原籍武进，侨居岭南。据《毗陵谢氏家谱》，先母应该是你的太姑母行，我实在忝长一辈了。”

说完了这套话，老者哈哈一笑，复继续着说：

“母家还有念书的人，这也是可幸的事。”

我连忙站起来，改口称呼表伯，并且回答道：

“小侄少年失学，毫无所得，不过还喜欢念书罢了。”

菊老约我明天到他家里来看涉园的藏书，以后再引导我到涵芬楼去看书，并且又介绍我到平湖看葛嗣威先生传朴堂的藏书。菊老这种和蔼的态度，诚笃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

菊老对于出版业的努力，远在数十年前。在清光绪戊戌变政的时候，任公师创办《时务报》，菊老就与任公师和汪大燮伯唐，在宣外松鹤庵举办印刷事业，后来和夏瀫芳、高梦旦诸君，创办上海商务印书馆，瀹灌新知识和影印宋元秘笈。一直到现在，他虽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是我们青年的领导者。

菊老的藏书，约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乡邦的文献，一类是古籍秘刊。对于海盐张氏的家学，他编有《涉园张氏丛刊》，已在商

务印行。于乡先辈最服膺的彭孙贻先生，他得到了张氏刻本《茗斋初集》、刊本《百花诗》、抄本的《茗斋诗》五厚册，后来又借到武昌徐行可君所藏的《茗斋诗》稿本十二册。他把这些书合拢来编了一部《茗斋集》影印于《四部丛刊续编》中。

其次便是搜辑佳椠，影印流传。他以毕生之力，所编的《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续古逸丛书》，早已脍炙人口。其中他最用力的要算是百衲本《廿四史》了，他不惮山南海北，域外东瀛，去访求佳本，而且汇合众本，校其所长。百衲本《廿四史》问世以后，他又把生平所撰的校记，选其最精要的撰了一部《校史随笔》。傅沅叔丈为他撰《序》说：

> 列史旧多缺文，今得宋元初本补《南齐·地志、列传》二叶，《宋史·张栻、田况传》二叶，而夺行衍文更难缕指。若夫片语单词形音易舛，而一字偶失，千里随差。如《南齐·纪》"口中出血"，展转误作"舌言"。梁书纪傿进土囊同逆乃遗王伟罪状出入，得此究明"鳪衣"为隋后采桑之服，今作"鸠衣"者皆诬。"钩鱼"为辽主游畋之礼，今作"钓鱼"者大失。获此孤证，幸存典章。

沅老盛推其书，谓：王氏《商摧》、钱氏《考异》、赵氏《劄记》而后，为仅有之作。菊老为人精明矜慎，但魄力之伟大，有为人所不可及处。即如他编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商借了不少的旧本佳椠，先制成了底版存放着，只要发现了更好的版本，他立刻就把旧的底版毁掉，虽价值千金，亦所不惜；可是给朋友写封信他老是用翻过来的旧信封。近来藏园老人，也是仿照这个办法。听说请了位工人，替他翻制旧信封，日来的工价太贵了，结果比买新信封还要贵。

涵芬楼，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图书馆的一部分。商务

印书馆编译所为普及市民教育，创办东方图书馆，捐了数十万册的书，以供民众阅览。至于商务所购的善本书，镌盖上涵芬楼的图章，另外存贮，算是商务的私产；虽然在东方一处，性质是不一样的。民国十五六年以来，宝山路一带很受了几次兵燹，所以把宋元佳椠，都送到银行库里去保管，外边的人颇不易看见的。这次承菊老的介绍，在菊老家中看完书后，就到东方图书馆看涵芬楼的藏书。

涵芬楼所藏善本书的来源，可分三种：一种是该馆历来购买的善本；一种是密韵楼蒋梦苹氏的藏书；一种是何秋辇的藏书。秋辇是何栻的孙子，何栻在道同间很有能力的名称。但是他藏的书，却不甚好。涵芬楼所藏的书，要算是蒋梦苹氏的书内容最为完善。蒋氏获有周季贶氏书钞阁的藏书，内中有傅节子、戴子高的抄校本，所以涵芬楼中收罗的明季史乘也不在少数。其次便是涵芬楼历年所收的方志，曾编有目录流行于世。

我所要看的是明季稗乘等类，而且这些书，也不很为当局所注意，所以我可以恣意的阅览。我见到戴子高望所批校的《南疆逸史》，和傅节子校辑的明季稗乘，我都把它辑录到拙编《晚明史籍考》中去了。但是先哲精神所寄的抄校善本，不幸自从事变而后，都化为云烟了。

在涵芬楼看过书以后，我就到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去看书，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除了几个教友能阅书外，其他的人非有人介绍不可。我经陈援庵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主任徐润农司铎，才应许我登楼观书。

这个藏书楼始建于八十年前，是徐光启的故址，园林布置得很不坏，园中桂花盛开，时时可以闻到香气。藏书楼共分两层，楼上藏外国书，有十六七世纪的古本，楼下藏中国书。我看他藏书的特长，约有三点：

一，楼中所藏方志，有一千六百余种之多，如果再加四百余

种，那末各省县的方志就可以齐全了。

二，古钱的收集，从上古一直到现在，有好几百种，尤其是明清两代所铸的钱及太平天国等钱，差不多都全了。

三，书目的编制，是用笔划来编的，他特长的地方，是每屋里分了好些书格子，格子上和每层都注着号码。譬如一格有九层，一面有十二格，他书架上都有一个表，把每格和每层的书都添上去，一目了然，这是办图书馆的人所可取法的。

楼中所藏关于明季史乘，并不很多，其关于明清史料的，我已抄在拙著上了。

嘉业堂的藏书，虽然在南浔，但藏书楼的主人却住在上海，我承冒鹤亭丈的介绍会见刘翰怡先生。嘉业堂的藏书以明代史部、集部和方志为多，但秘籍佳椠仍存在上海。我在刘君寓庐看到宋刊巾箱本《五经》，纸白如新，李壁《王荆公诗注》、《韦苏州集》，元刊《赵松雪集》，查伊璜《罪惟录》稿本。刘君藏查氏著述很多，《罪惟录》以外，如《先甲集》、《后甲集》、《敬修堂诗》。自查氏之书遭乾隆间毁禁以后，故家深固秘藏，幸得保留于世，可谓海内的孤本。还有董若雨的日记，日记封面是周季贶夫人李蕙题字，书法遒健，酷似何子贞，这是很有趣味的。刘君约我到南浔去，看嘉业堂所藏明代史乘。座中并遇见董绶经先生。

在沪上认识了郑西谛先生，西谛约我到他家吃晚饭，看了不少的好书，如明版《磨忠记》、《修文传》传奇、五色套版《西湖佳话》、明刻《绣像列女传》等书，饱我不少的眼福。我在沪滨遇到了不少的师友。前辈当中遇见了蔡孑民先生、胡适之先生，同学当中，遇见了储皖峰、杨鸿烈、朱右白、姚达人诸兄。皖峰为人诚笃真挚，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初到上海，是不认识路的，他天天领我到东方图书馆去看书，陪我出去玩，同我到味雅一类的广东酒家去吃晚饭，看电影。后来皖峰到旧京辅仁大学教书，前年我病了，是得了副性伤寒症，躺在法国医院里，皖峰不隔三天，

就来看我的病，一直到我病好了，他还是到我家里来看我。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皖峰竟为患脚气病怛化了！那天是阴惨惨的天气，飞着几点雪花，我到嘉兴寺去送殡，凄凉的灵堂，悬着老友皖峰兄的遗容，他的夫人远隔在徽州，尚未能赶回来，灵前跪着两个不知啼哭的孩子，可怜当了一辈子教授，遗产不到四五百元，这是怎样凄惨的事呀！听说达人兄近来也不在上海，同学少年在上海的多半都风流云散了。

南京在望

从繁华的上海，人声嘈杂中，来到安静的南京，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由天津乘船到上海，全是欧化的商埠，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倒是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去，一路上的风景，真是有天然江乡的风味，青翠的远山，碧油油的水，疏落的村庄，怎样的增人诗兴呀！十月一日下午五时到了南京，我几年不见的南京，于今重见了。自从南京建为首都，增加了平坦的中山大道，和几处洋式楼房，其余的也和以前差不了多少。下了火车，一直到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柳翼谋先生到镇江去了。馆员钱和甫君引我到后院一间房子里居住，院内有一丛芭蕉和一棵梧桐，点缀着许多花草，朦胧的初月，看不清楚了。到夜晚来，虫声唧唧的叫，风吹梧桐作响，一盏孤灯照着，非常的清寂。吃过晚饭以后，手里随便拿一本书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馆外乌龙潭散步，潭后是清凉山，潭边有几棵柳树，对面山根下，是图书馆的藏书楼，在丛碧里面，煞是好看，倒是一个极好读书的所在呢。晚上柳翼谋先生回来了，一位面团团五六十岁的老者，很恳切地与我谈了许多话，并叙述到图书馆的历史，他说：

本馆的地址，是清代陶文毅公澍所住的地方，后来办了个惜

阴书院，薛慰农时雨曾在这个地方掌过院。到光绪末年，端陶斋尚书买到仁和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内中有不少的善本，而各县的方志也很完备。后来又收到五局的官书、范氏的藏书和宋教仁的藏书，还有不少的名人书札，都归拢一起，就成立了一个江南图书馆，请缪艺风先生荃荪主持其事。缪先生在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在南京又创办南京图书馆，实在有关吾国的文化。可是江南图书馆，公开阅览的时间极少，名称也改了许多，晚近才改名为国学图书馆。

至于图书馆的经费真少得可怜，在民国七八年间，是不公开的，每月只有二百元的保管费，后来公开阅览了，才加到四百九十元，到十六七年间，我（柳先生自称）到馆后，仿浙江图书馆的办法，经费始增加到每年两万二千元，善本书、普通书都公开阅览了，并且把馆中的善本影印了好几十种，一般民众才知道有国学图书馆。

柳先生这套话，说得很能动人，他特意在善本室为我辟了一个座位，于是白天在馆中看书，下午有时到夫子庙，重登奇芳阁，喝一杯茶，暮色苍然，始返馆中。接到张菊老来函托我校对《新唐书》。住在馆中，好像在深山里一样，晚来风急，灯火昏黄，读苏东坡的诗和宋人词，听着秋虫的凄鸣，如同鼓吹两部，这种幽静的境界，和上海老靶子路的夜半歌声，那是迥乎不同了。

有一天下午，刘衡如先生来馆找我，刘氏是北平图书馆的旧朋友，见着自然高兴，约我一同逛玄武湖。出了玄武门便看见一片的山色，雄壮而且秀丽，我们由水闸乘船到五洲公园，在公园的一角，觅了一个能看山景的地方，在那里喝茶，远看着青山和一带笔直的城墙，从山边上看着远来的火车蜿蜒的过去，可是火车被树遮着了，只看见天空的青烟，漫漫的散去。到了夕阳西下，人影散乱，衡如兄约我到秦淮河边老万全去吃饭，座中认识

了胡小石、缪凤林、李小缘诸兄。又过了两天，是中秋节，柳先生约我在馆中午餐，下午李小缘兄约我在他家里过节。衡如兄先到馆中来，同登汉西门城楼，全城风景，历历在望，随便闲谈着，就到李小缘兄家里去，小缘兄藏目录学的书很多，谈到夜半，才回馆中，打算明天就去苏州。

阊门纪游

十月七日，六点钟就起来了，吃完了点心，就到车站，从清凉山角丛残的羊肠小道，穿过一带的竹林，金黄色的阳光，照在青翠的竹林和丛树上，晶莹的露珠，微朦的晨霭，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走过了这一条山路才到了三牌楼，沿着中山大道，来到车站，买了一张二等车票，即刻登车，下午三时半到了苏州。就找到阊门一家东吴旅舍住下，房间倒还干净，盥洗了面，独游附近的留园。留园建筑非常曲折，进园子来，有一个池塘，池塘当中，有一座曲折的板桥，池塘上面有一个很疏畅的阁子，阁中设有茶座，可以喝茶，潇洒秀丽，足以表现南方建筑的优美。稍停留一刻，我就到苏州女子中学访我的同学王以中兄，以中兄在我们同学中最为忠厚长者，雅号有“圣人”之称。他见了我的面，头一句就说：

“您到天堂来了。”

上半年，我们还在一块儿，不久又在苏州遇到，那自然是很高兴，谈了一会话就约我逛玄妙观去。路上遇见了姜亮夫兄的爱人陶女士，是一位很温柔娴静的小姐。说起来姜亮夫兄也是我们的同学，他原籍云南，人是极漂亮的，可是眼有些近视，自从清华毕了业，到上海教书，认识陶小姐，两下的恩情非常相投，就结下不解之缘了。陶女士家里本来是很富有的，一个富商巨绅的家庭，哪能识得穷书生的长处，结果陶女士的家长提出了意见，

非请亮夫出去留学，不镀金回来，不得履行婚约，亮夫毅然的到法国留学，住了三年，才回到祖国，中间又生了不少的波折，才和陶女士实行婚礼，同到南边去了。这也算一段极有趣味的故事。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着，不一刻工夫，就到了玄妙观。其实玄妙观的样式，和旧京的隆福寺、护国寺差不多。我们稍微停留了一会，就到观前街，找了一个酒家名叫松鹤楼的去吃晚饭。我们上得楼来，检了一个清净的座位，叫了几样合口味的苏州名菜，要了一壶老酒，我们喝着酒，面上都现了春色，以中兄开始说道：

“苏州这个地方，是很安适的，可惜是一个不长进的地方，人们到了这个地方，安居乐业，就不想动了，所以苏州人在外面的很少，像顾颉刚先生这样好著书，好活动，实在是个例外。现在有好些在野的军阀政客，因为这里生活又便宜，又安逸，都跑到苏州来作寓公，享着他们安逸的日子。”

“至于苏州的人们，是很好修饰的，尤其是妇女们，又因为生性儿爱好自然，外表修饰的很好看，因为离着上海很近，上海的习气却传染到苏州了。”

说着话，不觉时光过得快，已经酒阑人散，约有八九点钟了，以中兄会了帐。下得楼来，以中兄回学校去了，我到护龙街文学山房访江杏溪君，买了几本书。回到店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吸着纸烟，想来想去，虽在秋夜孤灯，大有春色撩人关不住之概。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省立第二图书馆晤馆长陈君，参观了书库，藏书不很多，说是学古书院的旧址。由图书馆到对面的沧浪亭，门临荷塘，曲径通幽，建筑得非常灵巧。玩了一会，就到苏州女中去找以中兄。在女中吃午饭，一同游狮子林。原来元代倪云林隐居的地方，现在收拾得过于华丽，反失去了原来幽闲的境

象。由狮子林到拙政园，园是明代文氏的故园，虽然颓坏了，但是奇情幽致，颇有沧茫荒寒之意。小小的竹阁子，数丛的水竹，半颓的荷花，飘荡着，好像有临风依人之意。我们到画舫上，坐了一会，舫前石几上，摆了几棵盆景的古松，一边是荷塘，一边是曲廊，真是幽邃极了。

我们从拙政园出来，就雇了两辆黄包车，出了阊门，走过了七里山塘，便到了最有名的虎邱，在河边的桥上，下了车。拾级登山，过了石桥，就是黄色虎邱的山门。再往上走，便看见顶上有一个五色斑驳半颓废的宝塔。再往前边走，道的左边是鸳鸯墓。我们进了庙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小亭子，便是真娘墓。再往上走，就看见宝塔下面的剑池。我在剑池的半边同以中兄拍了一张照，作游虎邱的纪念。再绕到宝塔的前面，往下面走，到了冷香阁，因为阁前种了许多梅花，所以名作冷香阁。我们到阁子里面，检了一个茶座。喝了一杯茶，凭栏远望全城的风景，暮云烟树，闾巷万家，都可以隐约的看见。喝完了茶，会过了茶钱，慢慢踱下山来。到了山脚跟前，回头看山腰里一座半断的石桥，桥边有几棵倒垂杨柳，微风荡漾着，塔影照在水里。往上看去，黄金色的夕阳照着万绿丛中，五色斑驳的虎邱塔，愈显出宝塔无限的庄严和无限的静妙。我信口就说出来："这真是诗情，这真是画境，宜乎顾苓的文集，叫作塔影园了。"我们在石桥边流连了一会，凭吊着昔人，抚想着来者，不觉着夜色黄昏，月上柳梢了。连忙从小道回到店中，和以中兄在一家京江饭馆吃了夜饭，又和以中谈了许多的话，以中进城，我就睡觉了。

南浔嘉业堂

我尝欣赏卧游的话，如今可以实现了。今天七点钟，我就起来，到湖州班的船上，买了一张官舱票到南浔去。这班船两面都

是玻璃窗，设备的非常清洁，躺在榻上可以看见微茫的远山、河中的碧波和岸旁的杨柳。船还没有开行的时候，我买了一碗莲子粥和苏州的食品，不多的时光，送客的人走了，船工拖去了跳板，船就浮动了。早晨的太阳照着古老的城墙和两岸的弱柳，河身也宽阔了，看着这只船从姑苏城外五十二空的宝带桥边过去，桥身这样的长，绿波这样的柔，渺渺的秋风，送着乘客的孤舟，往前面飘流着，真有御风之概。这是何等畅适呀！到了中午时光船穿震泽的街市过去，两岸的街市，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真是身居泽国。吴都赋上所说："户藏烟柳，家具画船。"非身临其地，不知道他这两句的好处。下午四时就到了南浔，嘉业堂主人已经派人接我了。收拾了行李，就到岸上去。

从街市的边上，穿过一段桑麻的小径，前面有一塘绿水，便是刘家藏书楼，书楼是一座西式二十八间的楼房，布满了书架，楼旁有一所旧式房屋，题作"抗昔居"，取陶诗"抗言在今昔"的意思，是主人校书的地方。刘家的家人，就领我到这屋里居住，窗明几净，插架琳琅，收拾的非常雅洁。窗外有一排假山，山下有一池秋水，水中央有一个亭子，布置的极为精工，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地方。我在抗昔居稍为休息一会，司帐的刘君实君，约我到他们别墅小莲庄去玩。原来南浔有三个名园：一个是龙氏的宜园，一个是张钧衡的适园，一个是刘氏的小莲庄。

园在藏书楼的右边，在园门前就可以望见一带的假山石。进了园来，便是一片池塘，残荷未凋，弱柳生姿，塘边夹杂着好几处亭阁。再往里去，有一所洋式楼房，匾额上题作"七十二鸳鸯楼"，不知是何取意。从这楼再往后边走，是一条极小的竹径，转了两三个弯，才见一座假山。登到山顶，有一个茅亭，可以瞭望全镇的风景。下得山来，有一个水阁名叫掩醉轩。小莲庄的全景大概如是了。晚上承刘君实君的招待，在抗昔居为我设筵，吃到了莼菜和鲈鱼，鲈鱼倒还别有风味，莼菜真是有其名无其

实了。

第二天，管理藏书楼的周子美先生从上海赶来，他领我去看楼中的藏书，据周君说：

嘉业堂是翰怡先生私人的藏书楼，不是公开阅览的，然有知好来此看书，是极所欢迎的。可惜本楼经费不甚充足，每年只有五千元的经费，是由二千亩田所出的子利。至于楼中的藏书，明代集部和善本，大半是抱经堂的故物，其余的书是翰怡先生历年所购买的，现在楼中所藏已近一百余万册，并影印善本书影分贻同好。

我在南浔嘉业堂，共看了五天书。我所要看的是明清史乘，都记载在拙著《晚明史籍考》上了。其余还抄了一点明代社会史料，如张溥《七录斋集》、朱为弼《为可堂集》等类，就编了一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临行的时候，承周君的厚意送给我嘉业堂刻本蜀大本《史记》、《章氏遗书》、《郑堂读书记》、《嘉业堂善本书影》，都替我寄到北京去，总可算饱载而归了。

烟雨楼头

原来由南浔到平湖，须在嘉兴换船的。我凌晨就起来了，乘了刘家的船，到码头上去，七时开船，十二点就到了嘉兴。我尝读吴梅村的《鸳湖曲》，很慕鸳鸯湖的名，尤其烟雨楼，更足使我向往了。我下了船，就到鸳鸯湖边，雇了一只乌篷船，撑船的却是很标致的姑娘，穿着肉色的丝袜子，烤绸的裤褂，拖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我上得船来，坐在舱中，她轻舒玉腕，摇着双桨，黑色衣袖露出雪白的胳膊，戴着金黄色脱条，倒也洒洒有致，细看舱内收拾得非常清洁，几上陈设镜台和茶具，舱的一角，晾着淡红色的汗衫，在仆仆风尘当中，不觉得有一种异感。我一面玄想着，一面看着沧茫的烟水，不一刻就到烟雨楼。

我下了船，上得石阶，进了院门。院内种了不少的芭蕉和其他的野花，虽然是深秋天气，还是红紫芬芳，更显得一种野趣。走过了花径，正中便是烟雨楼，楼上张挂着不少的名人对联，楼是四面临空，凭轩远眺，四围的景色都历落在目。淡悠悠的湖水，微茫的苍天，两三个飞鸟，附近楼旁，还有竹篱茅舍，好几处人家，微风摆动着檐前的酒帘，缅想昔人诗酒流连的地方，而今也有点残破了。

说起来烟雨楼的沿革，是五代时吴越钱元燎所造的，后来经文人的赞美，就成了有名的地方。吴梅村《鸳湖曲》，是最有名于时的了。朱竹垞还编了一部《鸳鸯湖櫂歌》，更使斯湖生色。宋朝杨万里有一首诗说道：

> 径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幸有园林依修竹，不妨蓑笠钓鸳湖。鱼歌欸乃声高下，远树冥濛色有无。徒倚栏杆衫袖冷，令人归兴忆莼鲈。

我出烟雨楼，仍乘着原船，买了一包绿色的湖菱，一边吃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湖滨，连忙坐上去平湖的小汽船，天色黄昏，就到了平湖。

平湖传朴堂

从南浔到平湖的船，刚到了西门，葛府上就派人来接我，一直径到葛府。走过了重门，便到了大厅，大厅上正中挂着伊墨卿写的“爱日吟庐”隶书扁额，非常的瑰奇雄伟。一位老者立在厅前迎接，那就是葛嗣彤先生。葛先生是前清进士，长于诗文，尤喜搜辑乡邦文献，菊老常与葛先生一瓻相借，书疏往还，不但是亲戚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葛先生为人很热诚，是一位很喜欢谈话

的老人。他除了喜欢藏书籍字画以外，还喜欢办教育和社会事业，他在平湖办了尊古精社，还办了一处中学。他见我从远方而来，非常的高兴。晚上留我吃饭，非同我喝酒不可，老人的酒量很豪，他喝得还未尽兴，我已经酩酊大醉了。

第二天早晨，开始看传朴堂的藏书，大半普通书居多数，但是也有好些种善本，如宋版的《范文正公别集》、《干禄字书》、残本《会稽志》和精刻本的丛书，及明季小品文字。其中最精的，要算乡邦文献了，如《李蜃园文集》、朱为弼《茶坪诗集》等书，收藏不下百种，这是很值得钦佩的。晚上葛老先生正式请我吃饭，约了不少的人作陪。坐中有金兆蕃先生，他曾修《清史稿》中《阿哈出传》，是很有名的。我在葛家共看了三天书，本打算要走了，葛先生强留我住一天，约我逛当湖的弄珠楼。当湖是东湖的古名，楼本在湖的中央，去年修了一座桥，便可以直达了。葛先生与我一同出了东门，过了桥，便到了弄珠楼，建筑已经颓废了，实在不如鸳湖的烟雨楼。不过楼前有一片草地，四围种植了许多花木，现在已辟成公园，草地中间建筑了一个水阁，上得阁子，可以四面远眺，极为轩朗。东边可以看见往乍浦去的船，南边可以看见往上海去的船。天际归舟，风帆来往，不知多少思家游人，在阁上落了多少眼泪。后面是一曲横塘，塘三面种着杨柳，虽是深秋的天气，一塘碧绿的池水，衬着未凋的柳树，还有寒蝉在那里凄叫着，使我极浮躁的心，顿生了清凉之感。阁子的东面，靠着湖又有一个轩，名作远山初月之轩。因为我们在轩中，往东北方，远远的看去，好像浮着一座山，山过去，就是乍浦的海岸了。东边是一片的湖水，湖中有几个小洲，洲中有个小塔，要是月亮出来的时候，照着一片汪洋的湖水，看见很远浮着的青山，山上有几点断云，远远的几处渔火，这是怎样美丽的景致呀！所以当湖这个地方，中秋在这里观月，实是再好没有的了。

我们逛完了东湖，就到孔子庙前一个面馆里吃午饭，老先生

是好喝酒的，又劝我喝了好几杯酒。下午，葛府的家人替我收拾了行李，并送我嗣威先生自著的《传朴堂诗集》、《续槜李诗繫》、《当湖诗逸》等书，承葛先生这样殷勤的招待，实在过意不去，亲自送我到门口，并在门前池塘旁边，一个茶馆里喝了一杯茶，就拱手作别了。

下午三时离开了平湖，乘船到嘉兴。可巧有从上海开来的火车，车上倒不很拥挤，车开了不多时，就到了我的好友吴其昌兄的家乡峡石镇。上来两位很漂亮的姑娘，车不一刻就浮动了，在车窗里还看见峡石山上的塔。下午八点钟到了杭州，雇了一部黄包车，到湖滨清泰第二旅馆，找了一间楼上靠着湖边的房间住下，在夜色苍茫中，可以看见隐约的湖光。

西泠片羽

因为急欲要看西子的风光，凌晨就起来了。从微茫的晨霭中，到湖滨公园，看着一片白茫茫的湖光和湖那边山上尖而瘦的保叔塔，在湖边闲踱着，找了一家粥店，拣了一个座位，吃了一点点心，看着湖滨的游船慢慢的浮动了，岸上的游人来来往往，倒也觉得有趣。出了粥店，雇了一部黄包车到西泠印社去访朋友，遇见一个童子，他说：你问的那位先生，前一个月已经走了。从西泠印社出来，到省立图书馆，馆长杨立诚先生也不在馆，我觉得很失望；但是我生性喜欢独游的，可以到深邃的远山，可以探苍茫的幽谷，一个人高兴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要是找到不适当的游侣，反倒受拘束了。于是决定了游踪，一日游山，一日游水，连忙雇了黄包车作我引道，约定上午逛北山，下午逛南山。

从图书馆出来，先到香山九老洞，由香山沿到玉泉寺，据张岱《西湖梦寻》上说：

玉泉山为故净空院，南齐建元中，僧昙起说法于此，龙王来听，为之抚掌，出泉，遂建龙王祠，晋天福三年，始建净空院。

玉泉面积不到半里，水清见底，池里游着五色金鱼，最大的有二三尺长，成群结队，游泳水中，若是抛进去一点饼饵，大小的金鱼都来抢着吃，颇有鱼跃于渊之乐。出了玉泉寺，从蚕丛小道经过普福寺，庙的梁上悬了一串最大的念珠。从普福寺出来，不远就到了灵隐，进了巍峨的山门，看见左边一片玲珑剔透的奇山，那就是飞来峰。

说起来飞来峰的石佛，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但是那样的恶劣的大佛，真是为名山之玷。原来元代胡僧杨琏真伽掘了南宋六陵，宋代的遗民谢皋羽、吴玉潜、林霁山辈，偷偷检拾六陵的遗骨，重新埋葬，种了许多冬青树，这是宋代遗民月湖汾社怎样可纪念的事情！胡僧不但掘了六陵，还在飞来峰上刻了无数的狞猛的佛像，逼肖杨髡的样子，西子有知，能不气死？但是一般的游人，偏偏愿在石佛旁边，拍一个照，这是我不解的事。

我在冷泉亭小坐移时，便鼓着勇气直登灵山，走着崎岖的山径，两旁全是青翠的竹山林，隐蔽不见天日，微微的阳光，从竹林里穿过来，更显得青光可喜。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转了好几个弯，腿觉着累了，鼻子里微觉喘息，颇有废然欲返的意思，忽然发现高处一抹黄墙，隐约的可以见"韬光"二字。那时只有鼓着勇气再往上走，不久就到了佛庵，僧榻小坐，远望着竹林，喝了一杯清茶，顿觉着羽翼生凉，大有超然尘表之概，宜乎张京元《韬光庵小记》上说：

韬光庵在灵鹫后，鸟道蛇盘，一步一喘，至庵入座一小

室，峭壁如削，原出石罅，汇为池，蓄金鱼数头，低窗曲槛，相向啜茗，真有武陵世外之想。

我坐在庵中啜茗，仿佛还有明代的景象。看着时已近午，慢慢的踱到山门外一家饭铺，要了一碗素菜，一碗竹笋汤，吃着别有风味。吃完了饭，在饭铺中休息片刻，就从庙门由北而南。在山畔的小道中，有无数私人的别墅，曲折的小花园，半亩的竹园，苍虬的老树，一幅一幅的云林画境，都到我眼前。经过于忠肃祠，横穿过山岭，山岭上有一个阁子，过了阁子不远，便是烟霞洞，张岱描写烟霞洞说：

过岭为大仁禅寺，寺左为烟霞石屋，屋高敞虚明，行迤二丈六尺，状如轩榭，可布几筵，洞上周镌罗汉五百十六身，其底邃窄通幽，阴翳杳霭。

洞门遍生苍苔小树，极为幽雅，从洞门往右边走，经过了许多房屋，仿佛已到尽头，忽然从房屋的套间里，走进去是一个阁子，前面和右面临空可以眺远，雪白的粉壁上挂着胡适之写的白话诗横条。我从阁子外边的走廊上往下看，看见阁子下面，全是青翠的树木，绿叶飘荡着，大有凌风欲仙之概。由绿树的外边，可以看见一片白茫茫的湖水，湖水的外边，便是钱塘江。那时我感觉到的，如置身在万绿丛中，可以看见婆娑的绿树，绿树外的湖水，湖边隐约可见的红楼，红楼外如带的钱塘江，江外隐约可见的青山，而我的眼，我的心灵，真有一望无穷之感，真不知道山外还有山，水外还有水了。我更觉得坐在阁子上远望湖山，闲品清茶，固然好了；要是风雨来时，山色凄迷，湖光灿烂，或是驾一叶扁舟，披着蓑衣在舟中看雨；或是披着蓑衣，骑着小驴，走过山径竹树丛中，来到山寺的阁子上听清翠的雨声；或是在阁

子上看见竹树环合，丛翠摇动，湖山改色，大雨滂沱，点点飞来，一望无际，不知是山，是水，是湖，真是有如东坡所说“千山动鳞甲，万谷撼笙钟”的气势，那时候必定另有一番景象。我远看着湖光，正在那出神。黄包车夫突然催着我说：

“先生，时候不早了，要是再不走就逛不过来了。”

我走出阁子，顺着小道，到了龙井，由龙井折回去，到虎跑泉。一座小山上两面全是树林，树叶经霜，已经渐渐的变红了，深黄的斜阳，照在碧绿和微红的树叶上，格外觉着秀丽，泉水从水涧树林边流出来，微微的可以听见泉声，树上有几个小鸟在那里叫着，与流水合鸣，恰成了音乐一部。我忽然想到，北平西山卧佛寺前门的甬道上，两边全是古柏，成了一带的长林，太阳从森林中发出清光，显着格外的皎洁，泉水从涧中潺潺的流着，颇有虎跑的景象，但是没有虎跑那样的幽洁蔚茂。不知不觉走到虎跑寺后院山下的亭子里面休息，泉水曲折从亭子前面流过去，命茶博士泡了一碗龙井茶，喝着非常的清冽，沁入肺腑。眼看着天色不早了，从虎跑寺出来到六和塔。游玩了一天，自然觉着疲倦，鼓着勇气，一直登到五层，凭着塔的墙栏上，可以远望青山，近抚江水，无数的风帆，来往的过去，眼界为之开朗。下得塔来，天色已近黄昏，顺着大路从南屏山下经过，雷峰塔已经化为云烟了。除了苍霭的树林和张苍水祠堂，雷峰的遗迹已无从凭吊。匆匆的走到运木寺，在暮色苍然中登大雄宝殿。那里正在做水陆道场，万灯齐明，光辉灿烂，僧众们披着锦绣的袈裟，唱着铿锵的梵呗，奏着微妙的音乐，善男信女，跪拜如云。尤其是夹杂着漂亮的小姐们，时式的衣服，婀娜的身躯，和黄鹂出谷的娇声，也在那里皈依空王，顶礼膜拜，于是乎吾不能不叹杭州人念经的艺术。

既回到旅社，天色已经曛黑，略为休息，就到王顺兴吃烧豆腐、件儿肉，喝了三杯老酒。跑到法院路去访余越园先生，数年

不见的朋友，见面自然高兴。归来夜已三更，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顺着湖边到孤山后面放鹤亭上吃了一碗藕粉，亭子前面有一道极宽的桥，去年西湖博览会时造的，名西湖博览会。过去桥就是葛岭。我因路不熟悉，放鹤亭茶馆里还没有客人，茶博士引着我在孤山一带游玩，经过苏玄瑛墓，在湖滨一片荒寒的地方，一抔黄土埋葬诗人，不禁有无限苍凉之感。茶博士替我雇了一只瓜皮艇子，我上了船，从孤山这岸，渡到对面的葛庄。满院种着美人蕉，走过曲折的回廊，便到对湖的轩里，可以看见全湖的景色。由葛庄乘船到葛岭，我从船上下来，船夫引着路同登葛岭，路较韬光平坦，不多时就到葛岭上面的抱朴庐，是晋代葛洪修炼的地方。从抱朴庐出来，再往西走，一路上瞻玩着风景，不期而遇着二位老先生，在一块走路，听着说话，好像带点河南口音。我问他们姓名，才知道一位是南阳王先生，一位是钱塘李先生，是两位商而好道之士，谈得很投机，就结了游山的伴侣，一边说着话就到了初阳台，是葛岭最高的地方，左边山坡下是削而瘦的保叔塔，前面可以看见全湖的风景。从初阳台下来，由黄龙洞到紫云洞，一路上全是山岭，山上的树，四面环合，山岭忽高忽低，岭下的深谷生长着无数的青翠树木，在树林中间隐约着有一条小道，别有曲径通幽的风趣。转过山岭便是紫云洞，洞是非常深邃的。身上的汗到洞里全消了。而李先生越发与我熟悉了。他与我谈了无数的修道的经过，并且知道是善于相面的。从紫云洞出来是极宽的石阶，阶旁长着无限的修篁。出了庙门，经过白沙泉，又走了一里多路，山路更窄了。看见一条最高的山道，两边全是郁茂的长林，那就是金鼓洞，别的洞是很宽阔的，金鼓洞却是以幽邃胜。前面是一个大殿，殿后便是一个如屋的洞。洞里摆着几个石凳子，中间一张石桌子。洞的前面，被庙遮着，只看见一线的天和洞上的青苔野草，除了听见洞上的鸟声，看到微微的阳光从洞隙上透过，一切都归于寂静了。

于是李先生开始谈他的相术，我鼓着好奇的心问李先生说："李先生，您看我相貌怎么样?"他说："谢先生相貌很好，将来一定有二十年的好运，可是有一桩，如果是不怎样，……那就更好了。"我说："怎么样?"李先生吞吞吐吐的说："要是到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不被娘儿们引诱，那就更好了。"我说："我又不嫖姑娘，那又怕什么?"李先生面色忽然郑重起来，很正色的说："花钱取乐，不损人格，那又怕什么！只怕是不花钱的女人呀！"由李先生这句话，引起我想不到的感慨。可怜我是一个书呆子，只喜欢读几本线装的书，还有点历史癖，偶然读点风花雪月的诗词，但是既无二陆的才情，哪有锦心绣口的文章产出。海内有不少认识我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又肥又胖，还有点呆头呆脑的，哪有漂亮的小姐们来爱我。难道说一个穷念书人也配讲恋爱吗？在一个道学先生年谱上偶然记一段浪漫的故事，这也是极有风趣的，而实在是一桩不可能的事。不禁引起我的诗兴，诌了几句，写在下面：

闲云流水两茫茫，底是何人话短长？我本无情惭西子，小姑岂有嫁彭郎？藕丝已断三千尺，柳絮空来八月狂。君自言尔我自听，洞天清露倍凄凉。

回想这十余年来，经过了无数的波折，生了无数的白发，经验虽然是增进了许多，真情也斲丧了不少。深盼有一天机会来临，可是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尚未遇见一回事，真是书生老矣，机会不来。我那时正在那里玄想着，李先生还在那里说：

"要是没有这回事，那就更好了！"

我们从金鼓洞出来，李先生陪我一同逛岳庙。由岳庙到杏花村，他约我在那里吃午饭，李先生是吃素的，他为我预备的，却很丰富，如西湖醋鱼，鱼生带柄等类，我都吃着了，增加我不少口福。吃完饭以后，从岳庙门口上了船，沏了一壶清茶，和两位

老先生吃着茶，谈着天，逛了湖心亭、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不少的地方。温柔的湖水，飘荡着轻舟，微风吹来，万柳千条，拂着船面，引起我无数的情丝。眼看着金黄色的夕阳，照在嫩绿的柳条上，船已经到湖滨公园了。我谢过两位老先生，说声："再会，再会！"就回到旅社，忙着收拾行李，预备我的归程，但是西湖的秋柳，仍是浮沉在我的脑海里。

重到秣陵

由北平开往上海的通车，过了济南，便是山路崎岖，如果留意风景的人，便会看见巍峨的泰山，靠近车站，有一座西式楼房，便是津浦宾馆。正是七八月中旬的天气，在深夜里从泰安下了火车，便到津浦宾馆，找了一间面山的房屋住下。当时洗了澡，身上非常清爽，推开窗户一看，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在高山上，窗前种着几棵古松，清风摆荡着，很显着一番诗意，我那时非常兴奋，就与我朋友吴子馨写了封信，大意是："松影侵窗，明月窥人，层峦嵯峨，北斗横斜，迢迢良夜，秋露欲滴，如此清宵，恨不能与足下共之耳。"

既到了南京，是我旧游之地，就在中央大学附近高楼门地方，与同学方欣安兄同住。朝出暮归，寄居人家，很过意不去。缪赞虞兄便在学校中的寄宿舍名作教习房的，找了一间房屋，叫我搬在学校里居住。教习房在梅庵旁边，极为幽雅，合于读书，那是比较便利多了。那时同事中间，与我要好的是缪赞虞兄。前辈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黄季刚、吴瞿安两先生。黄先生素来是好骂人的，但是对于后辈则极为奖借，他时常到教习房来与我谈天，黄先生喜欢谈话，是滔滔不绝的。有一天他本来到学校上课，可是与我谈久了，竟把上课时间忘掉；一直谈到傍晚，他便叫我约他一同到花牌楼安乐酒店去喝酒去，黄先生喝了几杯水酒以后，

他的谈锋更犀利了，说了许多平生治学问的门径和遇到的人物，我真感觉到获益不少。因此我便想到，我所遇到的师友，黄先生以外，便是钱玄同先生和徐圣与先生，钱、黄两先生先后相继均归道山，只有徐先生远在海上，真有天涯寂寞之感了。近来偶读到玄同先生遗作《刘申叔遗书序》，文字老到，斩尽枝柯，而叙述简当，分析入微，真是一篇绝作。

第二年的春天，朱逷先先生来到学校任史学系主任，朱先生与我在半师半友之间，是研治明清史的前辈，虽然褊急些，却不愧是一个良师益友。既然同在一校，承他的指导，自然是更不寂寞了。在春假当中，他便约我同游西湖，乘杭江线的火车，横渡过钱塘江，由义乌到金华，再由金华乘船到严州，从严州便换了小船，到七里泷游严子陵的钓台。正是暮春天气，水流的很急，山势曲折的转来，两岸的青山，开遍了嫩红色的杜鹃，夹杂如雪的梨花和奇伟的古松，煞是好看。我们同登钓台，远望对岸的青山和岩下的急湍，便鼓着勇气去访谢皋羽的墓，寻幽探胜，风味无穷。当天晚上到了桐庐，住在江边一个旅社楼上，下瞰着富春江，对面便是高山，冈岭起伏，一幅巨源的图画，如在目前。第二天早晨起来，初出来的曦阳，照在楼角上，楼下岸旁停了无数的渔船，正在那里做饭，炊烟直起，舟子渔妇，熙攘往来，真有一番承平的景象、江乡的风味，那是何等的幽美呢！在那天的中午，我们乘船过富春江到了杭州，第二天便回到南京。回想起来，转眼已经有八九年了。

香岛归程

那正是民国二十七年旧历的除夕，我乘着长途汽车，从郁林到梧州。岭南春早，虽然是严冬的天气，也和二三月里差不多，满山开着梅花，夹杂着深绿的树木。山下边有几间竹篱茅舍，小

孩们穿着新衣服，在门前跳跃。赶集人们手里提着鸡和猪肉，从城里归来，在陌上走着，倒是有一番过年的意思。那天晚上到了梧州，就在梧州度岁。本来是要到香港去的，因为有事要到肇庆，旧历正月初四，乘船来到肇庆，事办完了以后，久闻鼎湖的名胜，就在那一天晚上乘小轮船到罗隐。天气阴沉着，一望漆黑，辨不出方向来，不久就倾盆大雨，只听见雨打篷窗和橹橹的机声。夜深了，旅客们都入了睡乡，我正点着一支烟，在那里听窗外的雨声，微觉着有点倦意，就有人招呼我说："客人醒来罢，已到罗隐了。"我走到舱外，幸喜雨声已住。下了小轮船，乘划船，渡到岸上一间板屋里休息。在这间屋里，也有客商，也有劳动者，也有抱着孩子的妇人，也有朝山进香的和尚，都济济一堂。在欲曙的时光，天气虽然没有北方这样冷，但是人们都感觉到一点寒意。我在屋内踱来踱去，看见墙角边坐着一个枯瘦的僧人，一肩行李，穿着草鞋，别无他物。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是衡阳人，到鼎湖去修行的。我走出屋外，看见天色已明，雨也住了，便雇了一顶山轿子到鼎湖去。山上的树木经过了春雨，格外的青翠茂盛，卓砾的石阶，全呈显著紫色，转过了几个山弯，便看见伟大的瀑布，经过两三个曲折，流到山涧里去，一白如练，声势雄伟。再转过去，便是山顶的庆云寺。庆云寺是依山建筑的，层层的上去。我到寺的左边幽室里小坐，推窗远眺，正看见，匹练直垂，绿树婆娑，卧对松涛，静听泉声，别有一种幽凄的景象，假若为这间屋子取个名，真可叫作观瀑室。在庙中进了素餐，就依原路下得山来。那时梧港航行已断，只有乘轮船到广州去。于是我到广州以后，就打电报到香港徐圣公处，盼望他在港等候我。那天晚上，一轮明月，警报声中，乘广九车到九龙，已夜深二时了。乘轮渡到香港，就住在海滨新亚酒店。在深夜里，圣公从般舍道来看我，他头一句就对我说："你跑来跑去，干些什么？"

我对着徐公，真是想不出什么话可说，但是只觉得天涯间遇见知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我在香港共盘桓了五天，便乘法邮船回到上海。船进了黄浦江，波涛依然的汹涌，但是两岸多半是残破了。船到了浦东，便就靠岸，乘着摆渡，到新关码头。由友人的介绍，便一直到八仙桥青年会，找了一间房屋住下，倒也感觉到清静。

第二天下午，我到开明书店访王伯祥兄。在编辑室遇见了西谛兄，他便拉着我一同到绍兴酒馆去喝老酒，酒一杯一杯的喝到肚里去，慢慢的泛到脸上来，这不是苦雨老人所谓陶然，实在是酩酊了。看着天色不早，下得酒楼，西谛脸喝得通红，拉着我的手，临别依依的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到北方去？何不就在上海。"

这几年来，我一个人坐在书斋内，常常这样的想，当年认识的好朋友，多半都流散了；有些朋友又都很忙，我又怎好意思去找他。只有躲在角落里，过我仰事俯畜平凡的生活。我不禁失笑。我真成一个商人了。

那末有功夫的时候，便逛逛琉璃厂，与书坊店老板谈谈天，有一天傍晚，我到来薰阁书店，遇见了陈掌柜新从上海回来，他说："徐先生和郑先生都问你好。"并且说："刚主人虽然老实点，倒很有意思。"在岁寒时暮，风雪满庭的时候，千里迢迢，得着好友的安慰，这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即旧历小除夕，天晚微雪，
记于旧京持筹簃史斋

（原载《蠹鱼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版，署名谢刚主）

扬州纪游

余偶读王渔洋《红桥雅集·浣溪纱》“绿杨城郭是扬州”的词句，仿佛那碧水涟漪，绿杨绕郭，远看着红桥，有两三只画舫在那里临流荡漾，也许船上坐着一两位美人，在那里手摇团扇，目送斜晖，的确是一幅绝好的画图。我想，在以往的一百年或者二三百年前，扬州不但是风景佳丽之区，而且是人文荟萃之地。前者如王渔洋、孙无言诸君的红桥酬唱，稍后便有马氏玲珑山馆的邗江雅集，预会的人，如全祖望、厉樊榭诸君，集句联吟，读起来怎样的令人神往，所以我早蓄有欣然愿往的意思。可是我屡次南来，游遍了五湖三泖，看了不少江乡的烟景，不是因为风波未静，便是路途阻隔，扬州总没有去过；今年清明，我本打算到扬州去了，又因病中止。到了炎暑初退，白露初凉的季节，我与我的朋友何杰午兄，约定在最近期间，无论如何要到扬州去逛一次。乃于十月十日的早晨，竟然成行。

这几天来，上海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到了晚间，天已放晴，我们非常愉快，是日凌晨，搭七时的火车，十三时即到镇江。下了火车，改乘人力车到了江边，登过江的轮渡。在轮渡上候了有

一点钟的时光，然后开行。到了六圩，重上汽车，上下的人非常拥挤，几无立足之处。路是崎岖不平，颠簸得像摇篮的样子，走了约五十分钟，远看有些村舍房屋，大家都说到了扬州了。我们下了汽车，便看见古老的城郭，城外围绕着长河，我们步行过了渡桥，进了城门，雇人力车到安乐巷十二号何杰午兄的家里，他的大哥绍周先生已经在家里等候着我们了。我们在何家稍微休息一刻，就跑到辕门桥去游玩，石皮的道路，窄狭的巷子，两旁古老的房屋和店面，这些房子，至少建筑在二三百年以前，还保存着原来的样子。走过了两三条窄巷后，到辕门桥一家书店里访一点旧书，可惜这一家很有名的陈恒和旧书店已经卖起新书和文具来了。主人陈君绍和蔼的给我找出几本旧书来，刘天淇、刘恭甫的手稿，也都断烂不全，不禁教我失望。我们从书店里出来，就到富春花局去吃茶，提起了富春，那是扬州最有名的茶馆。维扬的风俗，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一天的生活，要大半消磨在茶馆里。我们进了富春的矮矮大门，便看见错综着好几处茶厅，正是菊花和桂花开放的时候，微风吹来木樨花的香味，茶厅的窗上，摆列着深黄的菊花。我们进到屋子里来，看见里面放着七八张方桌，几张骨牌式的方凳，桌子上摆着茶碗和杯筷，桌面上浮出来浸润的油光，这是表明多少年来茶客光顾的成绩。一般老顾客，一边吃着茶吸着纸烟，一边吃着点心，却不因为座位的不舒适，桌面上的油光，而减少了悠然自得的心情，仍是一点钟两点钟这样的坐下去。我们拣了一张在厅堂中间的方桌旁坐下，随便吃了几杯茶，叫了一碗干丝，吃完了信步仍回到何家。这时已到黄昏时候，主人替我们点了一盏煤油灯，摆上四样菜和一碗鸡汤来，无非是红烧狮子头，一些扬州的名菜。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谈着天，一直到街传更鼓，四壁寂然，连街上行人的足步都可以听得见，这和上海的红尘十丈，车走雷声，真大不同了。以前蒋剑人的诗“入梦繁华记不清”，已是陈迹，而今恐怕要比同光时

的扬州，更要清静了许多。刚刚敲过了九点钟，杰午兄为我收拾了一间极洁静的卧室，引我到那间屋子里去休息，我看见那卧室内，陈列着一张楠木架子床，床的右边放着一排楠木衣柜，床的右面，摆着楠木长桌，靠着窗户，有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以及梳妆台之类，十足表现南方闺阁一般的陈设。这时候，我觉得我真是置身在江乡了。及至一觉醒来，清晨的阳光，已透过纱窗，我觉得时候不早了，马上起来，杰午兄已经等候着我了。

我们洗过面后，就到富春去吃茶，随便吃了些包饺，便走出了福运门，过了板桥，在河边的土坡上雇了一只瓜皮艇子。下得船来，信风荡漾着往前走。这正是中秋初过，草木未凋的时候，城根河边，一排青翠的杨柳，拂水掠影，非常的蔚茂，不愧称为绿扬城郭。转了几个弯子，就是有名的红桥，船从红桥底下穿过去，经过了小金山，远望着五亭桥，金碧辉煌，浮在水面。可是隋堤上的杨柳桃花，早被人斫了去，只剩得童童然一条长堤，再往前就是法华寺，过了法华寺，萍藻阻梗，鼓桨前行，便到平山堂。舍舟登岸，过了长岗，走进了平山堂，楹柱上挂着长联，上面写着是："登堂如见其人，我曾经泰岱黄河，举酒还生千古感"；"饮水当同此味，且莫道峨眉太白，隔江喜看六朝山"。我们在平山堂凭眺移时，江南金焦诸山，如浮水面，历历在望，山岗上绿树环合，这无怪名做平山堂了。可惜顶好的房子，满堆了稻草，已经糟踏得不成样子。我们信步下山，乘船到小金山游览，虽然比平山较为好一点，但是也呈荒凉的样子。我们在湖上草堂小坐，水光浮照，桂子飘香。我想，在当时不知有多少浓妆艳抹的小姐们在那里游玩，现在只剩下几个野老俗僧与海鸥为盟了。这里有不少扬州旧守伊秉绶的遗墨，湖上草堂的匾额，雄伟秀丽，疏密得宜。堂上悬着墨卿隶书"白云初晴，旧雨适至"；"幽赏未已，高谈转清"的对联，古拙雄浑，这可以想见邗江雅集，诗酒流连的景象。我们从小金山出来，仍到原处下船，沿着城墙往前

走，天宁寺已驻了兵，不能进去。走不多远，就是史阁部祠堂，和梅花岭的衣冠墓，我们不能不进庙瞻拜。祠堂里只剩了牌位，墓门的影堂里，悬着："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对联。我急欲瞻望最有名的梅花岭，才发现阁部墓旁有一棵小树上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仅留残梅一株岂堪再折"。我正在那里徘徊，恰遇见一位老者，便请问他为什么梅花岭上没有梅花，他老人家很和蔼的回答道："这里本来有很多的梅花和其他的花木，江北的天气，不像江南梅花那样开得早，可是一到初春天气，梅花盛开的时候，士女如云，都来看花，既而经过这次的事变，扬州陷落，被日本鬼子斫了不少；不久，这里又驻了兵，虽然有白部长保护民族英雄煌煌的告示，但是剩余的几棵梅花树，全都斫去当柴烧了。"闻之不禁愀然。吾想不但梅花岭上的梅花岂堪再折！就是吾国的人民，屡经事变，疮痍未复，也正应如爱护梅花的心理，不堪再折了！我们从梅花岭出来，沿着城墙闲步，路旁有不少养金鱼和卖花的地方，进得城来，还见有胭脂花粉店。这表明虽然是古老的扬州，在昔盐商鼎盛的时代，正有不少有闲阶级，在那里附庸风雅，粉饰太平，虽然是没落的家庭，还是留了不少的遗迹，正和北平一样，老是保存着温雅的态度。但是扬州因为交通不便，在江乡地方保留旧式的样子，比任何城市都要丰富。我从梅花岭回来，天色已经不早，吃过晚饭，便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辞别了杰午兄，仍由原路回到镇江。因为时光尚早，顺便领略镇江的景物。先到金山游览，四面临水，凭眺长江，登到金山的顶上，烟水树木，城市街道，历历在望。我看金山寺的全景，和北平北海琼岛的景象差不多，也许是乾隆皇帝下江南，采取了金山寺的格式来修筑琼岛吧！在法海洞小坐片刻，下得山来，到第一泉啜茗。这时红蕉盛开，绿树成林，点缀其间，极为幽洁可喜。从第一泉再到北固山的甘露寺。到了后山

亭子上远眺，俯视焦山，蜷伏江心，乱石崩云，惊涛裂岸，虽非赤壁，然犹可以想见其景象。及重下山来，业已四时，连忙到火车站赶五时的凯旋号回到上海。虽然短短的行程，来往仅有三天，只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谈不到有什么领略，可是偿了我游览维扬的夙愿，减去了不少的疲乏。回到上海虽在午夜，仍是霓虹灯在那里照耀着，路上仍然车水马龙，风云电驰，在市声嘈杂中，仍度我“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生活。

（原载上海《永安月刊》，署名谢刚主）

济南一日游

东风送暖百花香，
开到芙蕖韵满堂；
一片清芬无限意，
大明湖畔柳丝长。

这是郭沫若同志吟大明湖的诗句。我于荷花刚要开放的时候，来到济南。当天便急于看看趵突泉，到了西门往南拐，便已看见一片苍翠的园林，潺湲的流水。十年来未到的趵突泉，现在已修饰的焕然一新，大非昔比了。原先的吕祖阁已经改辟为山东博物馆的陈列室。我在水阁上凭栏闲眺，看着几股泉水涌出，如浮雪堆玉，池中的水藻飘荡流移，水清一望到底。正在那里观赏清晨幽洁的美景，管理园林的同志对我说："趵突泉自从改辟为公园，扫除了芜秽，种植了花木，从原来的趵突泉，一直往北，把金线泉、马跑泉，好几个地方，都包括进去，有很多名迹，可以游玩。"我看见前面如带的小河，枕河临流，布置着稀疏的亭馆，点缀了"绿肥红瘦"的花木，曲径通幽，苍苔满地。人家都说："济

南风景似江南”。我以为济南风景各有其不同之妙。我从吕祖阁往北走，经过了尚志堂(清代的书院)，堂中陈列了各样的花木盆景，争奇斗艳。再往北行，欣赏了金线泉，忽然看见了石栏上刻有“漱玉泉”三字，我想可能是“柳絮泉”吧，这就是我们新建立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祠堂了。我进了李清照祠，看见墙上挂着四轴李清照的画像，玻璃柜中陈列有李清照的原著和选集，词人芬馨的名句，真可以为湖山增色了。我偶然想到，我在天津曾看到清代吴式芬所摹临、题识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的画像，还有清初刊本、首列李清照词句的《林下词选》，似乎可以采访了来，陈列在李清照的祠堂之内，对于李清照的遗容和其著品的版刻，更可以丰富多采了。

接着去游大明湖。我回想以往的大明湖，长遍了芦苇，船行在芦蒲当中，掠过芦苇的叶子还喳喳有声。今天我穿过了芙蓉街，从院夹道走到了鹊华桥，一片湖光，非常开朗，前面有一个朱红的牌坊，便是大明湖公园的前门。我在公园前门的码头上乘了一只画舫，撑画舫的是一位青年。轻舟在湖中荡漾着，亭馆楼阁，荷花垂柳，历历在望。不觉来到历下亭，久所不见的何绍基所写杜少陵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对联，又呈现我的眼前，我便舍舟登岸，真是亭阁如旧，而气象一新。在大厅上，看见了清光绪间蒙族画家松年所写的长联：

游宦卅年余，仅饱看画舫蒹葭，朱楼杨柳；天生俊杰，叹少陵北海，继起属谁？何俊业高名传不朽。

雄心千里远，只赢得营巢燕雀，隔座笙歌；地接沧溟，见蜃市蛮云，纷来工变幻，惊奇感俗暗先几。

旁边题着是：“光绪甲辰秋日，蒙古松年撰并书。”那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危机四伏的时候，诗人在这里寄托了无限的感

慨。我正在玄想，那位撑船青年忽然告诉我："您不看大厅前面包柱上还有郭老写的对联吗?"我忙着去看，原来上面写的是：

杨柳春风，万方极乐；
芙蓉秋月，一片大明。

我所以不殚烦把这记下来，恰好说明在清朝末年一般文人无聊的情绪，和解放以后，由郭老的诗句中所代表的前途无限光明及乐观的气氛。尤其是建国十周年时，在湖心建立了垂柳亭，把汉奸张曜的祠堂改为南丰祠，把济南的北门汇波门，改建为汇波桥，纪念了词人和学者，使湖山胜地，顿然改观。描写济南风光而久所脍炙人口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是无法享受这般迷人的景物了。

（原载《人民日报》，日期不详，署名刚主）

锦城游记

一九六三年一月间接徐中舒兄来信，约我到成都四川大学去讲学。我本想在五六月间去的，旋以授课时间关系，须提前到成都。不久历史研究所组织上表示同意，并通知我到川大讲学的日期，还为我购得四月四日下午八时往成都的火车票。这样，久想到四川去游历的愿望遂能够实现了。

四月四日

早晨准备应带讲课的参考书籍，老妻为我检点行李。下午磨墨，替朋友写字，写的实在生疏不好。晚饭后辰生八弟夫妇、刘永成同志的爱人刘士荣和彬珍侄女均来送行，同到车站。八时登车，八时二十八分火车慢慢地开行。我就拥被大睡，在睡梦中听见火车到了我的故乡安阳。一觉醒来，已经到新乡了。

五日

从郑州到洛阳，火车路线两旁的建筑，焕然一新。古老的洛阳已经是工厂林立，大非昔比。要不是解放，哪会有这样辉煌的建筑呢！这正是清明时候，微飘着细雨，一路上桃红柳绿，田地上到处长着青青的麦苗，煞是好看，大有丰年气象。车到潼关，

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坐在餐车上，看见窗外山上有皑皑的白雪，山下面一片绿树林中点缀着粉红的桃花，在暮色苍茫的时间里，火车蜿蜒着过去，别有一番景象，遂诌诗一首：

千山万水远相迎，雪映桃花一片青；细雨迷濛云雾里，时间端合是清明。

六日

我在未来以前，已诵读了杜甫发秦州以后的诗句，是为着要寻看剑门和栈道的遗迹，但是火车经过时，穿山越岭，开得很快，崇山峻岭，涧水山松，转眼即逝，两眼应接不暇，看得不能仔细。自解放以来所修建的宝成和鹰厦铁路，同为国内最伟大的工程，古来的栈道是难与伦比的。尤其是在穷僻的深山里，火车两旁出现了新的工厂和新的城市。我还想到去年春天从厦门到福州去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在深夜里看见离福州不远，有一片灯火新兴的三明城市。这次我乘火车度过秦岭，有些坝子与新兴的村镇，和它的情况也差不多。若拿风景而论，秦岭有它的雄伟，武夷有它的峻丽，各有各的好处，未可以遽分高下。火车经过阳平关，看见山岩上有一座红栏绿宇的庙，风景是幽雅的。晚间十时到达成都，徐中舒兄和川大党支书刘同志已到车站接我，晚上住在川大招待所，地方非常清洁安静。

七日

早上，中舒兄同我看望多年老友蒙文通、缪钺诸先生，中午在政协餐厅吃午饭。下午独游望江楼和薛涛井，听蒙文通先生说：薛涛井本在万里桥，这是明代蜀王制笺纸的地方，遂把薛涛的故址迁移地方了。望江楼在锦江边上，锦江水并不甚大，但是望江楼和吟诗亭的建筑，画栋飞甍，连阁垂廊，极尽绮丽之致，我在吟诗亭小坐移时而归。晚饭后，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散步，

穿过池塘，柳叶倒垂，花树密茂，时听见蝉声。在绿树林中的教室大楼上，已经是灯光灿烂，倒影到池塘里。微风吹来，使我觉得心旷神怡，这才知道锦官城的幽美。遂做了一首七绝：

暮春三月已闻蝉，默默池塘静晚烟；无限风光诗意足，锦江环绕校门前。

旋走到绿杨村访华忱之兄，谈到九时始归。

八日

早预备为川大历史系座谈会的讲话，题目是“我这几年来学习的经过”。下午乘公共汽车到春熙路温泉浴室去洗澡。在街上遇见北京书友吴希贤君，陪我到古籍书店楼上去看书，买了《天启黄山大狱记》和《工部浣花草堂考》。晚上访冯汉骥先生，谈省博物馆情况。

九日

座谈会改在星期四举行，这两天我没有事。吃过早餐后，就到水井街访蒙老，未遇。与他的文郎蒙默同志同访赵幼文先生，谈了一个小时，略谈彼此离开北京后的情况。分手后，蒙默同我到街上游览，先逛了文殊院。这是成都城内一座大寺院，建筑的非常雄伟，尤其是以窗格著名，四围全是竹林。我们在禅堂里稍坐，喝了一杯茶。时已过午，出了文殊院，想到闹市找一家饭馆去吃饭。我看见成都的街市上有几个特点：一是茶馆多，茶馆内摆着好几排竹椅子和矮桌子，许多劳动人民在那里喝茶休息，而不是品茶。二是草药店多，有医治百病的雪莲花，石枣子，各种各样的名色，听说吃的恰当了很有效验。三是小吃多，大街上挂着很多奇异的招牌，什么田抄手呀，陈麻婆豆腐呀，就在这条街上。我们就到陈麻婆豆腐家去吃豆腐，虽然很辣，却味道很美。蒙默酒量甚豪，记闻博洽，颇有父风，我仅衔杯濡唇而已。蒙默

抢着会账，只有谢他的盛意了。饭后又到古籍书店，小坐一会，乘四路汽车返校。晚上与缪彦威先生略谈，遂写日记。

十日

早九时，冉光云同志陪我到省图书馆去看书，该馆藏的全是普通的书籍。馆中负责同志介绍我到光明街十六号善本室去阅览。这个藏书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宅第，颇像北京的四合院子。承善本室王位中同志的招待，给我拿出来颇多的书籍，在版本方面，如明蓝格钞本《册府元龟》，有"季振宜"、"沧苇"等收藏印；渭南严氏钞本顾炎武《肇域志》；明嘉靖甲子成都刘大昌刻《华阳国志》；张澍《蜀典》八卷稿本。在史料方面，有旧钞本吴世济纂《太和县御寇始末》，记明崇祯八年张献忠率领农民军进攻太和事。丹棱彭延庆著《当阳县避难记》一卷，记清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教军起义事，述农民军组织颇为详备。佚名著《滇匪纪闻》一卷，记同治初年云南农民起义事。佚名著《平黔纪略》二十卷，记独山杨元保起义事。赵熙著《辛亥疏钞》，记辛亥革命事。以上各书颇有史料价值，均值得注意。看完书后，又到文物商店去看碑帖字画，没有什么可看的。与冉光云同志到春熙路吃水饺和汤元。回校已经二时了。晚上写日记。

十一日

早晨预备功课，下午在新会议室参加川大历史系所召集的座谈会，主要谈的是我这几年来，怎样与集体一同工作和学习，以及参加写中国通史所得到的教育。谈话两个半小时，四时三十分散会。晚到华忱之兄处夜谈，归来写讲稿。

十二日

今天为星期五，教工食堂打牙祭，杀了两头猪，早餐时看见地锅内正在煮猪肉，热气腾腾，厨师傅们在那里切肉，准备午餐。我到校内理发室理发。下午开始讲课，共讲两个课题，一为明清重要史籍介绍。二为明末清初史专题研究，拟分为四五个小

题目：（一）为明末清初社会的背景及南明王朝的建立；（二）为清兵之入关及其统治政策；（三）为明末农民抗清之战争；（四）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抗清战争；（五）为明末清初之学风。听课的约二三百人，讲到四时半下课。晚到春熙路散步。

十三日

早写讲稿，华忱之兄来谈。下午稍睡，徐中舒兄来谈，漫谈往事，不觉已到晚饭时候了。今天为星期六，晚上学校请我在大礼堂看川剧，所演的剧目，以当头棒原名刘承吉所演的《绨袍赠》，表演得最为精彩，做工细致，刻画入神。川剧为我国优良传统剧种之一。当清朝初年，昆腔就流传到四川。清乾嘉间川剧名演员魏长生曾到过北京，红极一时。京剧在表演细腻的地方，即吸收川剧之所长，丰富了京剧的内容。听蒙老说到清咸丰同治间吴棠做四川巡抚的时候，他最喜欢看戏，川剧才繁荣起来。因为他请江苏人在四川候补的官僚，懂得戏曲的人来教戏。在当时是官僚中荒淫无耻的举动；但是在无形中把川剧汇合了吹腔、弹戏、高腔、秦腔等项声调，而加上精彩细腻的做工，成为川剧中的特点。有些剧本还是蜀中文人像赵尧生等人所编的，词句也很为优美。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期，艺人为生活所迫，投武人的所好，戏剧就流于庸俗，并有些黄色不健全的成分。自解放以来矫正了以往的情况，编制了新的剧本，发挥其优良的传统，川剧才慢慢地发展起来。

十四日

今日为星期日。早，修改旧稿。十时，徐中舒兄约我到青羊宫去游玩并聚餐。我们先到盐市口逛书店，买了一本《成都风光》。就乘公共汽车，靠近青羊宫河边下车，顺着河沿走，就到了青羊宫门前。看了一会花会，陈列着农民用具和各种货物，仿佛旧时北京隆福寺的庙会，不过青羊宫是一座花园，陈列的花木特别多罢了。我们游览过后，就到海棠春饭馆，座间已有蒙文

通、冯汉骥、朱竹修及裱画家刘少侯等共有九人。因为客人太多，厨师傅忙不过来，三点钟才能吃饭，先在这里吃了蛋糕和鲜橙汤作为点心，蒙老就引我们去逛道院。蒙老一边走一边对我说：青羊宫重修于清乾隆时，是苏州张清夜道人所修建的。我们进得青羊宫的道院里来，院中摆着假山石，假山石旁边陈列很多花木盆景，微淡的太阳，照在花木上，别有风致，屋子里面也收拾的非常洁净，我看见抱柱上有一副对联，写的是“涧松寒转寂，碧海阔逾澄”，题“长洲八十老孩张清夜”书。道士邹率一很恭敬的端上茶来，陪着坐谈。蒙老介绍给我们说，邹炼师是一位诗人。大家在那里大厅上坐谈，我一面听他们谈天，一面欣赏院中的景物，就作了一首五律：

久闻邹居士，诗名满阆中，高谈惊四座，茗椀酿春风。
日澹园愈静，林深花满丛，我至时何晚，归来听远钟。

说着已经快到三时了，我们重回到海棠春去吃饭，喝的茅台酒，吃的是道地的川菜。蒙老对我说：川菜是山东的烹调汇合而成的，所以菜味清腴，汤清见底，在前些年最有名的厨师是黄师傅，现在流传下来的，所谓黄派。今天所吃到的除了鱼肉海味之外，还是四川春天的名产，鲜笋、胡豆、王瓜、豌豆，最足以饱我的朵颐。可惜我不能喝酒，只能濡唇了。饭后，中舒、蒙老陪我到二仙庵看花鸟虫鱼，各样的花木极为茂盛，而且鲜艳，阶前花池中丈把高的牡丹，虽然盛开已过，可是还有红润的花瓣。正是杜甫所说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了。虽然早晚不同，但是露湿欲滴，花的秀丽色彩是一样的。这时天已近晚，游客渐散，笼中的鸟鹊，有的学人说话，有的在那里喳喳的叫。我们回到校中，已近七时了。

十五日

早点后，缪彦威先生约我去逛玉龙街的旧书店，又到春煦路文物商店看书画，没有什么可看的，其实我对于书画什么也不懂。我和彦威多年老朋友，他前几年到天津南开大学来看过我，我们互谈往事，他就请我在春煦路几家小吃店小吃。下午写讲稿。傍晚的时候，出得校门，沿着锦江散步，重游望江楼，在吟诗楼上徘徊了一回。我看见楼下大厅抱柱上有一副对联，是清代伍生辉所撰，而且是谢无量补书的。对联是："古井冷斜阳，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第？大江横曲槛，点楼烟月，要平分工部祠堂。"写的颇有气魄。望江楼公园以竹子著名，园中栽种了五十多种竹子，各种形式不同，色泽也不一样。我从吟诗楼又往前走，到锦江春色楼，楼内楼外陈列了无数竹子盆景，有的像老树杈桠，有的似铺地丛生，临风荡漾，飒飒有致，可说是一个竹公园了。归来吃晚饭后，一灯独对，温习旧业，重写讲稿，四壁凄清，颇觉适然。

十六日

早备课，下午在第一教室上课，听课的除了本校以外，还有西南师院，民族学院，川剧院的听众，济济一堂。回想起来，那时我预备的不够，实在是惭愧之至。

十七日

早，看袁庭栋同志写的《张献忠传》的稿子。下午，参加历史系的政治学习。今天阴雨迷濛，天气突然变凉。晚饭后乘公共汽车到东大街散步。我是喜欢吃南食的，在小吃店里吃到真珠元子和叶儿粑一类的东西，不减江南风味，其是"逸性复思吴"了。遂乘公共汽车到九眼桥下车，时浓云密布，天色漆黑，沿着锦江慢慢地走回。看见对岸人家稀疏的灯火，岸旁泊了两三个船只，那样寥落的微光，想起了杜陵："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芙蓉自古今"的诗句。祖国的锦绣山河，何地无人才？何地无景物？惟有伟大的诗人杜甫才把锦城的风光刻画出来。读了杜甫的诗，更足

以知道锦官城之美也。回校后兴致盎然，遂写这几天的日记，一看手表快要到午夜了，马上入睡，睡的很浓，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了。

十八日

中舒兄及系中同志来谈，并写讲稿。下午上课。晚到中舒兄处闲谈。上课时眼为粉笔灰所眯，颇为不适。

十九日

早备课，下午上课约两个半小时。晚饭后到缪彦威兄处闲谈，归来读有关清初史事的书籍。天气连日阴沉，突然降温，夜间读书，微觉寒冷，小有不适。

二十日

今日为星期六。早餐后，冒着细雨，乘公共汽车去游武侯祠，即现在的南郊公园。在南门外车站下车，看见红色的墙壁，那就是武侯祠了。杜少陵的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我进得祠来，虽然没有看见古老的松柏，但是新植的松柏，青翠成林，原因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树木砍掉，房屋倒塌，毁塌的不成样子，解放以后，把祠宇重新修建起来，栽种了花木，改辟为南郊公园。我从祠门走到了正殿，在静远堂中看见了诸葛武侯的塑像，两庑里陈列着有关诸葛武侯的书籍，和南阳隆中各地方遗址的照片，唐柳公绰所写的诸葛武侯碑，所谓"三绝碑"依然存在。我在静远堂的旁边，临着荷花池的曲槛上坐了一会，碧树参天，水清见底，鸟鸣鱼跃，颇有自得之趣；就从走廊后出去，经过刘备的陵墓，围着园子，穿过杂木林、楠木林和柏树林，再往前走为果圃。走了一遭，到茶亭里吃了一杯茶，歇了歇脚，身上觉有微汗，精神顿觉爽适。一看手表已经快要到十二点钟了，即乘车到盐市口成都餐厅吃饭。饭后略睡午觉，预备功课。晚上又乘车到春煦路丘一茶社听四川清音。李月秋所唱的《赶花会》，以清脆的歌喉，唱出四川本地的风光，唱的最为好

听，其次是四川的相声，表演的也颇有趣。未及散场，我就回校，写这两天的日记。

二十一日

今日为星期日。早九时在微雨当中，中舒兄陪我去游杜甫草堂。在南郊下了公共汽车后，因为找不到草堂的大门，我们从田野的小径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梵音寺(又叫草堂祠)走进去，再转过去就是杜少陵的草堂，祠门前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吏情更觉沧洲远，诗卷长留天地间。"祠堂正屋有一副何绍基写的对联，是"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与济南历下亭何氏所写少陵的诗句"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左边是杜诗版本展览室，右边是有关少陵事迹所画的图画和字迹展览室，多为近人之作。我们从草堂出去游王氏园，为昔日四川军阀的别墅，现在已与草堂合并在一起。我们在水槛上略为休息，遇到了冯汉骥先生，一同到茶亭中去吃茶。喝完茶后，就从正门中出去，游赏了一会浣花溪。我觉得浣花溪的小桥流水，绿树婆娑，真是柳暗花明，大有"黄四娘家花满溪"的光景，要是没有杜甫的诗句，也显不出浣花溪的优美了。冯先生对我说：成都的风俗，每逢春节旧历的正月初一必游武侯祠；人日必游草堂祠，到了那时，真是游人如鲫。冯先生是去游玩过的。我们由浣花溪步行到青羊宫，仍在海棠春聚餐。时已过三时，在座仍为蒙、冯诸君。他们对我说：前次聚餐所说川菜中的黄派，就是姑姑筵的嫡传，所谓姑姑筵，哥哥传，是四川儿童们拿小锅小碗烧火做饭做着玩的意思，当时起这个名词有自谦和别叫人笑话的意味，实际上我已经两次吃到姑姑筵的风味了。吃完饭后，中舒同我去访梁仲华先生。回校已经七时了。

二十二日

早，备课写讲稿。十一时后访黄少荃先生。因为天气突然降温，衣服穿少了，偶感不适。午后略睡，即赴人民公园散步，人

民公园在旧的少城旁边，门前环绕着小河，水上飘荡着浮萍。再往里走，绿树荫中有一个水榭，有许多游客在那里吃茶，颇似吴门风味。我围绕着园林闲步一过，身出微汗，精神渐觉舒服。回校吃晚饭，饮了一杯广柑酒，服药睡觉。

二十三日

早仍觉感冒，但不甚重。中舒兄陪我参观川大历史系所藏的巴县档案，同志们正在那里作整理工作，分门别类，已经整理出来不少的文件，这些文件起始于清乾隆二十二年，迄于民国三十年，大约有十三万件之多，旧存于重庆的公署内，一九五七年从重庆博物馆移到四川大学来整理的，已经整理的尚不及十分之一，同志们把已经整理而装裱起来的给我看，有乾隆二十九年严防嘓噜子的告示，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的十家牌，大意是十户立一牌，十牌立一甲长，互相联络，轮流稽查。嘉庆七年壬戌楚黄机碑。这都是清朝政府严禁农民起义及约束手工业工人定有工资价格，制止叫歇(罢工)的重要文件。下午讲课，明清重要史籍介绍业已讲完，开始讲明末清初史专题研究。

二十四日

早备课，午睡起来到春熙路古旧书店去看书，买到沈菽园旧藏明嘉靖刻本白棉纸印唐荆川辑《左传始末》八卷六册，价人民券十八元，书品颇好，价钱也廉。又到玉龙街姚姓的书画店里闲看，没有什么可买的。就在陈麻婆豆腐店吃晚饭。晚上回来，中舒兄来看我，因为中舒是研究左传的，就把这部书让给中舒兄了。

二十五日

早备课，下午讲课二小时半，尚不甚累。晚上到成都剧场去看川戏，因为没有什么好看，未看完就回校了。

二十六日

早应冯汉骥先生之约，与中舒、忱之诸兄去参观省博物馆。

先到陈列室参观博物馆所藏的历代古物，我对于考古本来是门外汉，冯先生给我讲解了一番，如同上了一堂课。我所感觉到的是战国时代巴和蜀的铜器形象花纹上都有所不同，巴的铜器铭刻上，有象形文字，同时兵器戈头上挥出去是有响声的，这就是所谓鸣镝之流了。还有新津出土的汉代石画，刻画着墓中人的事迹，并有文字，如："孝妇赵夫人字义文"、"南常赵买字未定"、"贤儒赵椽字元公"，以及耕种、舞乐的图像和土偶，如汉代说书人的土偶，绘声绘形，形象逼真，都在那里陈列着。其它如新出土的食案，案上摆着杯箸饮食器具，由这些实物中引起我重新研究汉画的兴趣。参观完了后，又到客厅里来，拿出了很多的名人字画，有宋刘松年和元赵松雪的大幅立轴，尤其是张大千旧藏的石涛山水册页，在我看来颇感到兴味，我看过后，把一幅山水上的题诗钞在下面。原诗是："千峰蹑树树为家，头鬓蓬松薜蘿遮；问道山深何所见？鸟衔果落种梅花"。"枝下人济为至老道先生博笑，乙亥。"承冯先生这番盛意的招待，至为感谢。遂返校午饭，下午上课。

二十七日

今天是星期六，本来约好到蒙老家中去的，吃过早餐后，有人敲门，突然进来一位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女同志，她说她的父亲名叫马清臣，她的母亲是我的三姑母，她的名字叫马孝聪，在建筑学院任助教。我和三姑母三十多年不见了，她在报上看见我来成都了，非常的高兴，甚至当天晚上没有睡着觉，所以叫她女儿来看我，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就看她们去。等她走了，我就步行到水井街去看蒙老，坐了一会，他同我到东大街古大圣慈寺去吃茶，大圣慈寺俗叫太慈寺，据说是唐玄奘出家的地方，是一座古刹，虽然没有古柏，但建筑的却非常雄伟。我们到大殿上去游览，又围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就到东偏院厅堂去吃茶，竹篱茅舍，地方却非常清洁，已经有许多老人在那里喝茶谈天，颇有悠

闲自得的趣味。我们拣了一个座位坐下，服务员沏上两杯盖碗茶来。我一面喝茶，一面听蒙老的高论。他说他年轻时期，曾在南京内学院读书，中年又曾在南京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过书。他熟于古代史事，精通巴蜀的掌故，又且写过有关辩论窥基、圆测学术异同的文章，从而又谈到川剧的源流。他老先生是老成都，认识人是最多的，茶座上到处有人与他打招呼。这时候恰巧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蒙老招他同坐，并介绍给我说：这位是成都老艺人兼编剧导演家徐鉴庵老先生，因为他住在南门，而又精通戏剧，依着成都称精通戏剧的叫圣人，因之大家都称他为"南方圣人"。我们坐定以后，仍然继续谈论戏剧。徐老先生说：当清同光年间，成都的剧种很多，有演秦腔的泰鸿班，有演昆腔的舒颐班，有南门外演高腔的庆华班。到民国初年，这些剧种就汇合而为一台了。蒙老连忙说：徐老先生就是昆乱不挡，擅长须生，能演一百多出戏的老手。徐老先生谦让着说：我那能够像我的老前辈黄吉安老先生呢。我就问他黄吉安的历史，他说：黄老先生关心时事，是一位戏剧改革家，黄先生曾编过一百多出戏剧，像《江油关》、《哭祖庙》、《探狱》(演文天祥事)、《杜十娘》等戏，至今还在演出，都是他老人家编的。他还长于做诗，遗留下来的诗集约六厚册。因为他对于清末的时局，深感不满，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遭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处处失败，而且官吏贪污、政治腐败已极，他写出了好多爱国忧时的诗句，或编为戏剧，以抒发他的烦闷。黄先生故后，已无人过问，我们代他保存起来。又因为他无后，每逢清明，黄门的弟子都要到坟墓上去祭扫。解放了，成都文化局才把他的剧本编出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又把他的诗集钞了一部带回北京，准备整理后出版。蒙老又问徐老先生：还演出吗？他说：有时高兴时凑个热闹，下星期三在南门外茶馆里，有几个老朋友等着我，因为班配齐全，或者要清茶相候呢。我说：到那一天我深盼听一听老先生的清音。说着

已经快过午了，彼此分手后，蒙老同我到东大街上一家小吃店内吃小笼蒸牛肉、锅魁及豆花等类，饱尝了成都风味。谢别蒙老，我就乘公共汽车到老西门三道街看我的姑母和姑丈。多年不见的姑母，已经白发苍然了，三姑丈久患胃病，最近还摔伤了脚，身体非常瘦弱，但是儿女满堂，家境过的还是很好的。我就把家中的情况，天南海北地闲谈了一下午。回到学校已经快要到六时了。

二十八日

今天学校本来要招待我游桂湖，参观杨慎的遗址，因为没有车，未能去成。财务科江同志为我买了一张荀慧生所演《铁弓缘》的戏票。晚上到锦江剧场去看戏，顺便在文物商店买了一本郭尚先题跋的《兴福寺碑》，并不甚好。荀慧生演这出戏，以七十老翁作小儿女之态，看的很不快意，而且也没有什么戏情，我本约冉光云同志一块儿去的，他也不积极看下去，戏未演完，我们就回校了。

二十九日

早备课写讲稿，黄少荃先生来访。午睡后，仍游春熙路文物商店及古旧书店，购得《北宫词纪》残本而归，因为卷六有版画一帧尚精，为他本所无，所以把它买下来，至今尚存箧中。晚上写日记。

三十日

早备课，下午讲课二小时半。晚，华忱之兄约我到锦江剧院看川剧《百花公主》。因为明天是假日，排队近半小时才挤上了公共汽车，又在春熙路吃赖汤元，粘以芝麻糖酱，别具风味。及至到了剧院，已经开演多时了。我不明了这出戏的戏情，可是表演的极为纯熟。散戏后，我与忱之兄夫妇散步街头，见万家灯火，饮食店里供应各样的饮食，热气腾腾，游人如织，非常热闹。回校已经十一时了。

五月一日

今日为劳动节。中舒兄约我到政协餐厅去吃午饭，因为常扰他，我辞谢他没有去，在屋里看了半天书。下午三时后，访蒙文通先生。他约我到芙蓉餐厅便餐，蒙老酒兴甚豪，我请教他所素研究的《山海经》和《华阳国志》。他说《山海经》上所写的尧舜，和《尚书》上所说的尧舜，迥然是两回事。如通常所说尧“生于鸣条，卒于苍梧”。那时隔山阻水，交通极不方便，尧生在北方何以能够死于苍梧?这显然是各地方对于创世的始祖，皆有尧舜的传说，后来把各地方所传说尧舜的故事混为一谈了。至于常璩著的《华阳国志》，是研究吾国西南古代历史的重要书籍；但是其书亦有所本，所记巴蜀的古代史迹，主要的是本于《蜀王本纪》和《三巴纪》。他已把这两部书的佚文搜辑起来。我这次来成都，受到蒙老和中舒兄的益处很多，在研究先秦两汉史上颇有所启发，更坚定我写汉代社会生活史的决心。吃完饭后，同去南门大街茶馆里去听“南方圣人”的清唱，四川话叫做“去听围鼓”的。到了那里，因为节日，茶馆中人太多，没有容足之地，没有演出。我们闲步街头，逛了逛百货商店和人民市场，时候已经不早，彼此分手，我就回学校了。

二日

上午看袁庭栋所写《张献忠传》的稿件。四川师范学院派杨同志约我去讲学，我因为连日讲书，比较累了，答应他下星期去讲学一次。下午写讲稿。晚上读袁小修《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

三日

早餐后，闲步江畔，因为近来连日小雨，春水丛生，锦江上的水，业已盈漕，水波荡漾，两岸的杨柳拂人，从堤上走到望江公园，甚觉幽闲有致。在公园的茶座上，沏了一碗香片茶，坐下来写讲稿。十一时半回校。下午讲课两小时有半，把课题全部讲

完了。看见听众颇有喜色，我心中也觉得如释重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晚到中舒兄处闲谈，他说梁仲华先生约我和中舒在他家里吃晚饭。冯汉骥先生还约我明天晚看川剧，仍是《百花公主》。我从中舒兄家归来后，把《袁小修日记》读完。虽然是晚明公安派的小品文字，但他有时反映现实，破除风水迷信也有可取的地方，至于文字写的极为峭利。看完了写家信，并写日记。今日为我的生日，早已忘掉，到了晚上才想起来了。

四日

昨天晚上突然腹泻，今早到校医室去看病，服了药后，不久即告平复。冉光云同志陪我谈天，到十一时半，与他一起到春熙路吃午饭，吃的是矮子斋的抄手，我因为腹泻初停，未敢多吃。下午回来睡午觉。四时后，中舒兄与我一道到梁仲华先生家吃晚饭，饮绍兴酒，吃枣和怀山药小米粥，腹中颇感舒适。恰有古玩客人来，我买了黄寿山石章一对。因为晚间要看戏，未及与梁老细谈，就到锦江剧院看川剧去了。十一时回校。

五日

因为学校中的汽车坏了，许校长和丁书记改约我到青羊宫去吃午餐。盛情不可却，八时到校长办公室，遂与许校长、丁书记、陈主任和中舒兄共五人，一同乘车先游昭觉寺。我们坐车先经过郊外新建的工厂区，有刃具厂、拖拉机厂等，高楼大厦，烟囱林立，气象宏伟，焕然一新。再走过一片原野，就到了昭觉寺。昭觉寺是成都著名的古刹，进得庙门，走了一条很长的楠木树林，穿过前殿，又走了好几层殿宇，才到大雄宝殿，殿门锁了，不能进去。我就看墙壁上所嵌的碑额，知道这庙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是休梦禅师所建造的。到明末清初由丈雪和破山和尚重新修建过，香火甚盛，僧众达一千多人。我正在那里看碑，陈主任和庙中交涉，出来了一位圣雨和尚，引导我们去参观后院的观音堂和禅房，真是曲径通幽，花木茂盛，极为清洁，尤

其是院中的兰花和松竹花木的盆景，数十年的罗汉松长在盆中的山石上，甚是青翠可喜，这是旁处难以看到的。我又走到观音堂的后面塔院，见有清康熙甲辰（三年）邑人刘道开撰《双桂堂破山法师塔铭》。说是明末李鹞子骚扰蜀中，破山劝他不要杀人，李鹞子说：只要和尚吃肉，他就不杀人，因之破山就开戒吃肉，当时有人就叫破山为吃肉和尚。通常书里边都说破山劝张献忠，而碑文中明明说的是李鹞子，这可以说明凡是杀人的事情，统治者都归罪于张献忠身上了，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不可信如此。和尚还引导我们参观香积厨中可以煮三石米的大铜锅，像这样的大锅共有四个，足够斋僧一千多人吃饭之用。参观完了之后，已经十一时有半，就乘汽车到青羊宫管理处在二仙庵后殿里特设的招待处去休息。院中的花木非常茂盛，而且有假山长着莓苔，日光照过去，极为幽雅。先在后殿的走廊上吃茶，一面谈天，一面看着园中的花木。过了一会，就到屋中进午餐。成都的小吃和风味菜，可算是样样俱备，这样的招待，实在感愧万分。吃过饭后，时近三时，就一同乘汽车回学校去了。我午睡了一个多小时，快要天黑了，就到黄少荃先生家，约她明天一同去访老友李孝同先生。恰巧这天晚上黄先生的女儿和系中青年教师童恩正定婚，就约我在她家吃饭，我只好忝陪末座了。可惜我午饭吃的过饱，黄先生亲手烹调的佳肴吃不下去，只喝了一杯陈绍兴酒的喜酒，表示对主人的敬意，饭后围坐闲谈。回屋子里已近八时。连日困于酒食，颇觉疲倦。

六日

早与中舒、少荃诸先生乘学校所备的汽车去访成都大学李孝同先生。孝同是梁任公先生的内侄，我很早就认识他。他学经济，为人颇为诚恳，不见已经三十多年了。这回见了，情挚恳恳，虽然说话不多，然颇有依依不舍之感。他住的房屋颇小，但门前环绕着流水，卧榻上就可以听到泉声，颇有意致。十一时返

校。午睡后写日记。晚，冯汉骥先生约中舒兄贤伉俪和我到锦江剧院看川剧，这天晚上演的五出折子戏，全是成都老艺人演出的，尤以陈淑舫和刘承吉所演的《秋江》，表演纯熟，最为动人。

七日

早备课。下午到四川师范学院去讲课，题目是"我对于学习明清史的几点看法"。在大课室授课，讲课约三小时。川师是从一九五六年由南充迁到成都的。校址建筑在狮子山上，成都附近只有这一个小山，仅仅是一个平卧的山坡，所以叫做狮子山。学校四周围全是果园，流水环绕，风景幽美，颇可为读书之地。张教务长陪我参观了图书馆，馆中藏书虽不很多，然颇有善本，如旧钞本施琅《靖海记》三册，清顺治三年刻大字本刚林修《大清律例》三十卷，内阁大库档册、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明季万历刻本《南柯记》、宋刊本《帝学》。其它宋元刊本，名目陈腐，不甚足观。在师院用过晚饭后，就乘师院所备的汽车到状元街访清华同学黄元贲兄名绶，多年不见，真是"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了。晚九时回校。

八日

今日阴雨未出门，读杜诗自遣。晚到春熙路散步，在赖汤元家吃汤元。回来写日记，夜窗灯火，风雨凄然，此南中景象也。

九日

上午浏览我所写的讲稿。下午二时参加顾炎武学术讨论会。我所讲的题目是"略论明末清初学风的特点"，计分为六节：一、叙说社会的背景和思想的根源；二、明末社集和明末遗民所产生的学风；三、明末的学派；四、明末清初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五、明末清初学者治学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六、明末清初的学风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讲稿约三万字，是在北京预先写好了的。这天参加开会的有各方面的同志，听众很多，我的经验又浅，心情相当紧张，我把心少定一下，从容不迫地谈这个问

题，达三个小时之久。我看见参加的成员听得尚无倦容，蒙老并为我补充了王船山所说“能”与“所”的问题，终于把这个课题愉快地完成了。这天黄元贲兄也来参加讨论会，散会后，我约他在成都餐厅吃晚饭，并到温泉茶室饮茶，回校已近十时。

十日

早到望江楼散步。在茶厅饮茶，遇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孙松年先生，他是从云南西双版纳经过成都，转回北京去的。下午继续开会，有黄少荃讲的顾亭林的抗清运动，柯达中讲的顾炎武与清初的学术思想。晚与蒙老、中舒兄应黄元贲兄之约，在他家中吃晚饭，家庖做的颇为细致。

十一日

今日为星期六。早餐后，与彭同志一同去参观王建墓。坐四路汽车到老西门，走到三洞桥，就到王建墓了。王建墓是一九四〇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挖防空壕时发现的，没有人去管它。到解放后党和政府才把这残破的石冢和隧道整理修建起来，墓中的古物，如玉册和银器，现保存于省博物馆，在这里陈列着拓片和照片。但是我们到王建墓中看见石台上陈列着王建的石雕像，隆目广颡，和史书上所记载的像貌差不了多少，一定是有根据的。四川为天府之国，四面都是崇山峻岭，鸟道丛栈，有险可守。凡是统治阶级抱有政治野心的人，像李特、王建之流，拥有雄兵，一到四川，就想负固自守，称帝称王压迫人民了。我们从王建墓出来到三洞桥，三面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行，在桥的旁边枕泉临流，开设了一个茶馆，再往前面还有一家饭馆，竹篱茅舍，叫做带江草堂。我就和彭同志拣了一个靠河边的座位坐下，喝了两盖碗茶。我一边看窗外的自然风景，听脚下从地板中发出来涓涓流水的声音；一边吃茶，一边谈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我回想到我童年家住在济南，就很喜欢到汇波门外去游玩。汇波门是一座水关，出了水关，全是水田漠漠，绿柳成荫，远远地在绿柳当中有

一个席棚搭的茶馆叫做柳园。那时我不过十三四岁，主要的是没有钱，没有到那柳园里喝过茶，不过是望望而已。今天我能够悠然自得地在这里喝茶，而且我感觉着风景宜人，比柳园要好的多了。遂诌了一首绝句：

天涯浪迹半平生，历尽奇山千万峰；无谓一泓桥下水，大江豪气水流东。

吃过茶后，我就与彭同志分手，到三道街去看三姑母。在她家里吃午饭，谈些家常，一时后回校。睡了一个中觉，因为天气骤变，身体颇感不适。晚上到黄先生家去，请她为我煎桑菊饮。黄先生怕我冷，并借我一条毛毯，学校中同志们对我招待的殷勤，就可以想见了。服药后回屋稍读一会书，就睡觉了。夜中身出微汗，顿觉适然。

十二日

今日为星期日。早餐后写日记。中舒兄约我和图书馆林名均同志在政协俱乐部吃午饭，并参观李劼人的藏画。李劼人是四川小说家，去年故去的。饭后游玉龙街旧书店，购得旧拓本《麓山寺碑》，“英英披雾”四字尚未损坏，但涂抹损字太多。黄少荃先生约我和中舒、彦威诸兄在她家吃晚饭。由黄先生亲手做的豆花和东坡肉，味道很美，饭后畅谭甚快。

十三日

早餐后，到川大图书馆。所藏的书籍，以地方风土志为最多。见有费经虞及其子密所编的《剑南芳华集》二十卷传钞本。此书向无刻本，昨在旧书店见有一部，较此抄本为旧。馆中还蓄存有战前华西大学所出的《集刊》，虽多为考证文字，然外间流传不广。林名均同志并赠我邓少琴编的《益部汉隶》双钩石印本一部，对于我研究汉代史学颇有用处。下午继续开学术讨论会，由徐、

蒙两先生发言。中舒兄讲的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性及顾炎武的学术思想。蒙先生讲的是王船山所提出的能与所的问题。适方国瑜先生从昆明来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方先生是要乘飞机到北京参加编纂杨守敬历史地图会议的，在成都相逢，可算是"他乡遇故知"了。这次学术讨论会共开了三次，今天闭会。晚，到忱之兄处夜谈。晚间偶读甲戌本《红楼梦》，我对于这部书的见解是：它不但以暴露清康熙乾隆时统治阶级腐朽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背景，为其主要内容；同时对于反面人物固然尽情地揭露，就是对于正面人物，如林黛玉的孤芳自赏，过于离群索居，招谗致怨，把她尖刻的地方也描绘出来，而不掩护她的短处，又如作者对薛宝钗是皮里阳秋、深所不满的，可是也不掩盖她的长处。作者把每个人的思想、行动，错综复杂的地方，都委曲宛转地刻画出来，是这部书的特长之点。这不过是粗粗阅览所得到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若是细读起来，领会的地方还要多些。

十四日

早餐后，正要到东大街买些零星物品，适黄元贲兄来访，就同他一块儿去游街市。同访文史馆长张宾吾先生，略谈一会，就约元贲兄在政协餐厅吃午饭。下午二时参加川大图书馆所开的座谈会，讨论增辟明清史研究室问题，并托我到北京搜辑有关明清史的书籍，摄成胶卷，以充实研究明清史史料的内容。五时散会，并留影。晚与学校中来访的同志们谈话。早寝，预备明天早晨学校中招待我去游灌县。

十五日

早餐后，蒙老、蒙默和冉光云同志陪我去游览都江堰。乘十时的公共汽车赴灌县，因为路中耽搁，下午一时始到灌县，连忙与县人委会交际处联系，住在县委招待所。在街上一家青城餐厅吃过午饭，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灌县是一个山城，在山脚底下，有一条长街，远看着一片青山，苍翠可爱。蒙默同志是在这

里灵岩山书院里读过书的，路途很熟。他就引导我们沿着这个长街，往前面走，看见街上有卖草药和虎豹皮的店铺，可见这里离深山不远，有许多猎户了。我们四人有说有笑，从这条街转过弯去，有一座南桥，桥上建筑着美丽的走廊和房屋，远远看去，好像是一条垂虹，这是北方所没有的。岷江从这座桥下流过去，水势极为汹涌。过了长桥，就到离堆公园。园内修竹幽篁，楠木成林。穿过了长林，就到了老王庙。我们走到庙中最高的楼阁上，凭栏往下看去，也不知何年何月，大约是在秦惠王时有名的匠作家李冰把这座玉垒山凭空凿了一个大缺口，真可以说是鬼斧神工。这个地方，现在叫做宝瓶口，把西边各山上流下来的大水，总汇合起来，从这个宝瓶口流出去。由这个地方，分为岷、沱二江，灌溉了成都四周围数百千万亩的田地，怒涛汹涌，气震山河，声势的雄壮，真可以说是海内奇观。老王庙是建筑在这个缺口左面一个象鼻子形的山岩上的，山岩底下水势奔放，一泄如注。凡是山上由这江中流下的木排，必须以象鼻岩作为目标，冲着这个方向走，才能够转过湾去而顺利地流下来。要不然的话，就碰得粉碎，或者留滞在山岩底下了。我们坐在危栏上，往四面看，真是山势回合，气象万千，由于楼底下的涛声激荡，觉着楼阁还在那里振动。我本想作一首诗的，但是这一枝拙笔，实在是难以形容了。从老王庙回来，已经是下午六时。随便吃一点饮食，回到招待所。我们四人住在一间屋内，抵足而谈，大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景象。因为走了一天累了，不久即入睡乡，睡的极为酣适。

十六日

六时起来，略有微雨，在茶铺喝了茶，吃了一个鸡蛋。本来是游青城山的，因为下雨，桥梁已断，主要是我的腰脚不健，没有济胜之具，只好游二王庙了。原来灌县的城，是修在山坡上的。我们拾级登山，出了西门，门上嵌有石刻“西川锁钥”四个大

字。再往前走，就是玉垒关。经过一个山村，茅舍里冒出了炊烟，人家正在那里吃早饭。再往前走，就到了伏龙观，俗称二王庙，是秦代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的庙宇。庙修在山坳上，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走了好半天，才到庙门，墙壁上刻着“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和“逢湾截角，逢正抽心”等盈尺的大字。再往前走，登到阁子上去，往下面看山势起伏，川流密布，东流成为大江，以及江上的索桥和飞沙堰，气象浩大，一览无余，眼界为之增阔。始知山河形势的雄伟、秀丽兼而有之，这是江浙的山水所未有的。下得山来，远望着山岩树林中的老王庙画栋飞甍，真是如仙山楼阁。我们沿着江沿走到了索桥。我到索桥上走了一半，风势甚大，索桥摇摆过甚，就回来了。我们沿着原道，缓缓而归，已经是十二时了。仍到青城餐厅去吃午饭，蒙老点的菜其中有石爬鱼，形象如同鲈鱼而没有刺，是爬在石岩上，吃藓苔生长成的，肉味颇美。蒙老父子的酒量很豪，我们都喝了一点酒，微有醉意。蒙老说：此地因雪山的水初化下来，水性过寒，因之大家都感觉有一点腹泻，稍喝一点酒，是可以御寒的。本来是想搭一时半的汽车回成都，因为买不到车票，只好改搭下午四时半的车回去。吃完午饭后，我们仍到离堆公园去吃茶。茶座很为雅洁，院子里摆着盆景，闲看着远山和窗外苍翠的树林，大有“窗外青山是画图”的景象。在茶座上遇见了灵岩山住持能修和尚，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态度沉稳，步履如同少年一样，蒙老和他熟识，说今天晚上要登山回庙去的。我们看见时候不早了，就到汽车站。汽车开行后，已经是傍晚的天气，我看见汽车公路两旁，田畴万顷，都是水田，活泼的流水在沟渠里流着，一片绿油油的田野，农民们正在那里插秧。成都之所以富饶，都是受到灌溉的好处呀，唯有在今天，农民翻了身，才出现了这样的太平景象。回到成都已经下午七时，蒙老请我们在提督街一家张鸭子店吃烧鹅，颇为肥美。我这次虽然未能去游青城，

然看见都江堰伟大的水利工程，又有好友作陪，可以说是兴尽而返，回校已经快要到十时了。

十七日

早五时就起来，收拾行李。到八时后，有学校中同志们来同我会谈。中午，赵幼文先生请我到晋乐园吃午饭。刚刚回校，黄元贲兄来看我。接着，华忱之、缪彦威、黄少荃诸同志都来看我。学校已经为我买好了到重庆的火车票，吃过晚饭后夜九时许校长和中舒兄及刘支书都到车站送我。这次到成都来讨扰人家很多，而对于学校实在没有什么益处，可是临行时同志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意，使我更觉惭愧。同时我与中舒兄，虽然是同学，久知道他的为人耿介；这次我们在一块差不多一个多月，更觉他平易近人，诚挚可亲，有长者之风，比我这毛手毛脚的要好得多了。因为累了一天，十时火车一开，我就睡着了。

十八日

昨晚睡的酣适，一觉醒来，已经到了江津。铁路修在长江岸上，长江中的小轮船和火车并驶，知道快要到重庆了。十时二十分火车到达重庆，我请了一位搬运员替我担着行李。可巧这天缆车坏了，我从下面上去，爬上数十级的阶梯，走到两路口交际处去接洽，承他们替我找到了学田湾市人委招待所，择定了房间，并替我购定二十日八时江砻号由渝开往汉口的轮船，一等舱票一张。吃过午饭，睡了中觉。因为这里的天气极为炎热，如同夏天一样，我只好穿着单衣，由上清寺乘无轨电车到朝天门码头上，观看江上的风景。重庆是一座山城，轮船泊在朝天门的山脚下面，远望着长江出口的地方，岗峦起伏，风帆来往，眼界为之一新。我从朝天门又乘车到解放碑，略观重庆的市容，虽然是一座山城，可是街道整齐，有一点像上海的样子，要比成都热闹一些。我到川剧院买了一张戏票，剧目是《绣keep襦记》。就闲游街市，到颐之时去吃晚饭。略为休息，就到川剧院观剧，表演的颇为细

腻，因为道路不熟，未看完就乘无轨电车回招待所了。

十九日

今天天气转阴，已觉凉爽。我住的房屋，是在二楼的一角，两面皆窗，窗外的院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好像是一座翠屏风，院内池中种着睡莲，正在开着金黄色的花。还有一棵树木，在窗外临风荡漾，飒飒有致，由于有这样的外景，心中就比较安适。我在这里人地不熟，又不想出去找师院朋友，因之就在窗下写这几天的日记。饭后略睡午觉，提笔再写，一直写到下午四时，才出去游览。由上清寺乘无轨电车到文化宫，也是建筑在山坡上，游览一过，走到花室内，看见陈列着各色各样的杜鹃花，红白灿烂，鲜艳异常，娇红欲滴，这是北方气候干燥，所难与伦比的。在园中闲步移时，本来要参观博物馆，因道路不熟，没有能去成。仍到解放碑游旧书店，一无所获，经过一个菜市场，走到会仙桥，在粤香村吃花生米拌肚仁和猪头肉，佐以大麯酒，风味颇为别致。饭后乘无轨电车回招待所，夜已七时，略为收拾行李，预备明早上船。请服务员为我打水洗澡，一洗积垢，颇觉畅适。

二十日

早六时起床，吃过早餐后，在大雨滂沱中乘小汽车到朝天门码头，冒雨登舟。八时上船，雨已略停。我坐在瞭望厅内，从早到晚，看两岸的山景，岗岭起伏，曲折回环，经过长寿、涪陵，到傍晚的时候，天已放晴，一抹斜阳，照在碧绿的山峦上，江水急湍飞流，把船送上前去，船在江心中屡转弯子，仿佛是山回路转，前面的山岭挡住了轮船的去路，层峦叠嶂，山后面还有一层一层的高山，好像浮飘在江上，有阳朔山水的秀丽，比阳朔的山水更要雄伟。晚七时半，轮船在万县停泊。万县是一座山城，天刚下过雨，山坡很滑，我雇了一乘滑竿，把我抬上山城。街市虽然不很热闹，但是很整齐。我在街上闲逛，就在一家小酒店内吃了一碗抄手，还喝了一杯太白酒，太白酒是万县的名产，气味极

为香洌。微觉陶然，仍乘滑竿下岸，回到船上。我站在船头上，看万县的街，点点的灯火，如同流星一般，水流人影照耀江面上，别有一番风味。回到舱内，洗了个澡，躺在床上读诗自遣。听见窗外搬运货物呼许的声音，经久不绝。晚得七绝一首：

澄江如练晚霞明，一片孤城落照中；叠翠层峦山色里，此身疑在画图行。

二十日

早六时醒来，天已放晴，船已经停泊在奉节码头上。奉节就是古代的夔州。我在船上看奉节是一座山城，初升的太阳照在古老的城楼上，面临大江，城楼旁边的城堞上生长了很老的古藤树，从城门中望过去是一条街市，两面是店铺和骑车挑担来往的行人。我回想到杜甫"夔州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的诗句。那时杜老作客夔州，在书斋里坐看着城楼，远听着悲笳，寂寞的情怀是可以想见的。不久船就开行，过了夔门，就快要到三峡了。首先过的是瞿塘峡，两岸是峭壁嶙峋，因为滟滪堆阻碍了航行，解放后已经把它铲除掉了。但是山势还是非常险峻，江身不过百尺，飞湍激流，水流的波浪作漩涡形。老舵师把准了方向盘，船如疾箭式的往前行走，不久就到了巫山峡。这就是素来以幽邃秀丽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峰形千奇百怪，山下临水的石壁如同斧削，有的像铁盔鳞甲，形状变化多端。我问了同船一位熟于江上情形的医生。他说，他曾随着勘察人员，植立航标，打听了当地的老人，传说下来有说明巫山十二峰的诗句，是：

翠屏百丈起云烟，云翠霞光照圣泉；聚鹤慢夸千代盛，苍龙套上九重天。朝云有雨听飞凤，净坛无路可集仙；试问松峦樵子近，上昇风月数峰还。

把巫山十二峰的名字，全嵌在里边了。他继续说："三峡是自古以来难以航行的道路，山势险要，江身逼仄，山上流下来的瀑布和泉水，东西纵横，水纹造成漩涡形式，船行稍一不慎，就会碰上暗礁。自从解放以来，航运局测量了江身的宽度和深度，铲除些暗礁，植立了航标，砍掉了两岸峭岩石壁上的障碍物。哪，你看前头江南面不是一块刀剑石吗？这块石岩如同刀剑一般伸出到江面来，阻碍了航行，现在已经把它砍掉，航行就通行无阻了。"说着，就过了巫山峡。吃过午饭后，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到了三峡的第三峡西陵峡。那西陵峡如同屏风一般，有像牛肝的，有像马肺的，所以就叫着牛肝马肺峡。西陵峡是这些峡的总名。船出了西陵峡，山势慢慢地平衍下去，到了南津关，天地忽然开朗，险要的山势突然消失。李白诗云："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形容得再好不过的。两岸由丘陵而变成碧绿的田野，江身不知道要宽阔了多少倍，辽阔的江水，掀起了万顷波澜，太阳照耀得金光灿烂。看见江上的船只，张起了风帆，来往如梭，那就是宜昌了。因为船在宜昌停泊不久，我只从趸船上走到彼岸，略看宜昌的市容，就回到船上来，总算是经过了宜昌。吃过晚饭后，夜中九时到达沙市。因为在夜间，我就到船头上看来往的客人，人声非常繁杂。这是宜都楚剧团正在搬运行头戏箱、灯光道具，送到汉口去演出，搬运行李的声音经久才平静下去。又看见泊岸的一只小轮船上正在放送京剧，灯影水声，互相激荡，颇觉悠扬好听。十时开船后，即入睡乡，因天气较热，睡的不甚舒适。

二十二日

晨起在甲板上散步，初出的太阳照在两岸绿油油的田野上，江水被风吹起了白色的浪花，江中还有长满了绿草的沙洲。这时，船正在乘风破浪，驾驶东行，两岸的风光，转眼即逝。我就

到瞭望厅内，吃过早餐，听乘客们谈洪湖赤卫队在这些地方打游击战争的故事。在这个时间听广播员报告说：船快要经过附近岳阳的洞庭湖了，我一面看窗外浩浩荡荡的湖水，一面补写昨天的日记。同时乘这条船来的，有重庆大学到武钢学习的同学，他们正学习雷锋刻苦的精神，帮助船员们清洁船只，打扫卫生。在沙市上船的楚剧团(他们在沙市面向工农群众表演已有四年)这次也由沙市赴汉口。下午一时，他们为了丰富船上旅客们的文娱活动，慰问船上员工的辛勤劳作，自愿为旅客、船员演出，共表演了《刘海砍樵》、《吕蒙正赶斋》、《挑女婿》三出折子戏，悠扬的声调和诚朴的作风，演的非常生动。尤其是船行簸荡，斜阳照在舞衣上，真是羽衣翩跹，飒飒有致，因之又诌了一首诗：

听罢吴歈又楚歌，钗横波影舞婆娑，船中犹唱采莲曲，惟有人间乐事多。

看完戏后，略事休息。下午五时余，我站在船头上遥望，可见长江的大桥和武汉三镇的高楼大厦，就要到汉口了。六时停泊，下船后经交际处介绍叫我住在璇宫饭店，房子很为清洁。汉口这两天炎热异乎寻常，我洗了一个冷水澡，就到马路去散步，观看汉口的市容，车水马龙和天津差不多。访问街上的行人，到著名的老通顺去吃豆腐皮。在那里吃完饭后，仍沿着原道回到旅馆，打开电扇，乘了一会凉，就睡觉了。

二十三日

早七时起来，吃过早餐后，乘三轮车到六渡桥，再乘无轨电车，到武昌小洪山科学院分院去访老同学方欣安兄。我坐在电车上，经过江汉桥，再通过长江大桥，武汉三镇的形势，全都在望，尤其是武昌为机关行政区域，楼房林立，建筑的极为整齐，马路两旁，栽遍了树木，如同公园一样。下了电车，走到小洪山

八号楼一号，会见了方欣安兄嫂。廿余年不见的老同学，见了面谈起来自然高兴。他们夫妇身体都很康健，已经儿女成行，还有三个孙儿。我们彼此各叙离惊，知道他在解放初担任武汉文化局长的时候，曾为省图书馆搜集了一百多万册的书籍，杨守敬、叶德辉一部分藏书，以及徐行可的书籍都在其内，现在该馆正在编目整理。说着已到吃饭的时候，就在他家里吃午饭，并睡了一个安适的午睡，已经快要到三点钟了。欣安本来要陪我去逛东湖或参观图书馆，因时间不早了，少休息片刻，就陪我乘电车到旅馆。经过江汉桥时，他对我说：你看桥左边的池水一泓，水边还建筑着亭台，这个地方叫做琴台，现在已辟为公园。到旅馆后，又请我吃晚饭，吃到汉口名产的鮰鱼。时已七时，就送我到火车站，他亲手提着我的行李送上火车，汽笛一声，他始别去。老同学招待的热情，大有巴山夜雨的感想。火车开后，我喝了半瓶啤酒，就昏昏睡去。

二十四日

一觉醒来，已经六时，天降微雨，气候突然降温，我连忙换了夹衣，火车已经到了郑州了。我去的时候看见一路上桃李正在放花，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绿树成荫，麦秀垂黄，快要上场，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转眼火车就到了安阳，我下了火车，盘旋了一会，马上登车，火车随即驶行。到了傍晚的时候，车过良乡，一抹斜阳，照在西山上，刚下过雨的天气，风景格外幽美，就快要到北京了。火车七时五十三分到达北京，老妻已在车站相候。回家以后，辰生八弟和同院住的同志们听见我回来了，都来看我，问我到四川讲学的情况，有说有笑，热热闹闹聚集了一堂，到夜间九时才都散去。

我这次的行程，乘火车经过宝鸡入川，回来时由成都到重庆，乘轮船游览三峡，路过武汉，回到首都，往返共五十天。在这次旅行中，我看见祖国山河的雄伟和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建设，

宝蓉铁路和武汉长江大桥。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哪会出现这样雄伟的建筑。至于各城市的街道整齐，工厂林立，无不焕然一新，改变了以往的面貌，大有全面开花，画出将来美好的远景。我虽然是走马观花，已经得到良好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我的新课业即将开始，锦城之游到此告一结束，我的游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了。

这篇游记，写成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因为课业较忙，没有来得及翻阅和修改。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我由北京到沈阳参加满族史学术讨论会，住在北陵辽宁大厦里，绿树林子当中，天气比较北京为凉爽，开会并不过忙，等于在这里避暑。因之连着三个晚上，把这篇游记修改了一过，以志雪泥鸿爪。正是：

昔年曾为三巴客，今日重为辽海行；当使义山增健羡，支离漂泊任西东。

香雪海观梅纪游

久想到邓尉山去看梅花，蓄愿已久。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我由上海来到苏州，住在苏州医学院内兄段伯武、舅嫂徐鸿贞贤伉俪家里。因为连天下雨，只有到旧书店里去访书，得到许锷著的《石湖櫂歌百绝》稿本，足以补吴门的掌故。其他也颇有几种钞本。等候着去看梅花，今天终于成行了。

十日清晨，雨虽然稍止，但未放晴。鸿贞贤嫂为我买了由苏城到光福的汽车票，伯武夫妇陪我一起到邓尉去探梅。上午八时二十分由南门乘车，随即开行。在轻云弥漫中，汽车往西直行，公路两旁，仍是初春的天气，枯树杈枒成行，柳条渐吐嫩黄的颜色，田中的麦苗和蚕豆叶深绿如油。路行宛转，前面的西山为云雾所笼罩，云烟出岫，遥远在望，水流田径间，潺湲有声。汽车开的很快，山色云雾，迎接不穷，显出了江南锦绣的河山。我坐在汽车上，好像是由灌县开往成都，三百万亩的良田，苍翠密茂江流的局势，弥漫的谷苗，形成了陆海。大江东去，吴头楚尾，天府之国的称号，与这曾没有两样；又好像坐在西子湖边，九曲十八涧的山中，特别感到了江南山水的秀色。

缅想之间，汽车已经过了木渎灵岩，九时有半，就到了光福西边香雪海一站。我们下了汽车，步行先到汽车公路南边的司徒庙，现改建为小学校，校中花园里有青奇古怪的四棵老松柏树，古树外边设有铁栏，防人摧折。可巧这天有美术学校参观，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到槛内去观看。看见这几棵老树的姿态，有的冲霄鼎立，有的俯地偃仰，有的臃肿如驼背，有的矫劲如卧龙，各种姿态真是奇绝之极。尤其是在苍翠的古柏旁边，栽着一株粉红的梅花，经过微雨洗尘之后，娇红欲滴，和葱绿的古柏互相映照，有形容不出的好看。我不禁联想起来：回溯到五十多年前，我正在春明上学的时候，也正是春天，时候或者晚一些，我一个人独游天坛，已经是断井颓垣，哪有现在修建的壮丽！可巧在这残破的断垣瓦砾之间，遇到了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白发苍苍，穿着褐色的长袍，由林徽音女士搀扶着缓缓而行，可以说是翘松与朱梅相媲美。不觉一刹那间就过了半个多世纪，思成、徽音已墓有宿草，可是夙志常存。风云变换天地改色，巍峨的天坛尤觉雄壮。光福苍翠的古柏和迎春的寒梅，也更加秀丽了。

我们出了校门以后，再往北去。路两旁全是梅花，白色居多，然也搀杂着粉红和朱红。循着梅林，走到山坡上的小径中，旁边有较矮的茅屋，是卖花人家，正在种植梅花的盆景和各种花木，可以说是宋代朱勔的后人吧。我们就此沿着山路往上爬，一层一层土阶走向上去。走不到半里多路，山坡上有一个长方六边形的亭子，正在修建，可能是清康熙乾隆间所建立的“御碑亭”吧，姑且叫它为香雪亭。我们站在亭子的栏杆旁边，倚槛而望，可以看到山坡上下，枯树丛林，一直到田园路旁，农民家中，在云雾缥缈当中，渺渺茫茫地全是梅花，微风吹来，清香扑鼻，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香雪海了。我感觉到与黄山看云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上看去，高处在十丈开外，还有一个亭子也正在修

建，可惜我腰脚不健，未能攀登上去。我们就此从西边的山坡石阶上走下去，沿着公路往前走约有七八里路，山脚下，路旁边全种着梅花，间以嫩黄的垂柳，苍翠的老松。我来的时候，以为时间晚了，想不到正是寒梅盛开的时候，很觉高兴。我们一面谈着一面走，不觉已走到潭东太湖的边缘上。这时太湖边上正在修建围田，广事种植。从太湖边通向围田修建了一座太湖长桥，将来还要在太湖桥畔建立新的村镇。我们不知不觉地穿出了花径，走到了太湖桥畔。看着白茫茫的湖水，遥远的青山，再看山坡两旁枯树荒林，漠漠平沙，还是冬尽春初的光景，我才体会到，说梅花用“先春”二字是再好不过的。

邓尉山区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最近在梅岭中间建设了硫铁矿厂，好多工人师傅正在从事工作。在潭东的山坡上，树林间还修建了两座疗养院，都是万绿丛中的红色琼楼玉宇。原来群山三面环合太湖桥的一角，是一个避风港，有几十艘三个桅杆的大渔船，都停泊在港内，炊烟密集，正在那里做饭。因为春二三月正是游鱼养卵的季节，渔民正在休息；而在这里的太湖公社是一个养鱼公社，生产以渔业为主。走到这里，眼看着就要正午了，我们走到湖边渔民休息室里去休息。承看守休息室的公社社员朱同志盛情招待，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大碗新沏滚开的松萝浓茶，充满了香味。我们就围坐在大方桌子四周，吃带来的面包，椒盐饼作为午餐。朱同志为我讲解太湖公社成立的故事。他说：“太湖新村不久就修建起来，公共汽车不以潭东作为终点站了，通过太湖桥可以直达，那里有饭馆子，有鱼虾可吃，到了莺歌燕舞的时节，欢迎你们再来。”我们感谢他招待我们的盛意，告辞而去。走到潭东的汽车站，在花间流水沟旁一块大石头上坐候。乘三时四十分的公共汽车回去，到家已经快五点钟了。

这两天接连着下雨，唯独今天虽然浓阴而没有落雨，在潭东散步赏花时，还见过一抹斜阳，映照在青松红梅的树林上，眼福

非浅，增我游兴。我立刻想到这样的诗句：

忆昔西山红叶候，光福犹及见梅花；置身千仞香雪里，老去情怀漫足夸。

第二天起来，仍然下雨，昨日之游，可算是幸运极了。吃过早餐，天阴雨止，我就拉着伯武到网丝园去吃茶，坐在五峰书屋内，看窗外竹林，婆娑生姿，大有悠然自得之趣，回思昨天游览的盛况，作了个素描。四月十五日天气晴和，尽半日之力，重为改定于沪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

书趣文丛……③ 瓜蒂庵文集

旧诗

诗　序（五首）

但求心平如止水，不畏风浪涌潮生；摒却私心与恩怨，我与人间最有情。

李义山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苏长公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生于世，当知生活之趣，作人之旨，若终日昏愦，无益于人，且不谙于己，虽寿至百年，与醉生梦死何异？

平生耽书原成癖，寤寐情怀俱依依；斐君笑我痴顽甚，如鱼饮水只自知。

余谈明清人诗文笔记稗乘之作，习其时代，知其人物之生平，因之对于明清以来之版刻，一望而知为某时某地所刻，因其书而可以论其世，一卷读来，悠然自得。赵斐云兄笑我痴顽过甚，然养成积习，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亦不易也。

文章何堪与世争，胸怀辽阔自峥嵘；不求秦宓虚谈论，俯首人民作老兵。澄江如练晚霞明，一片孤城落照中；叠翠

层峦山色里，此身疑在画图行。

八十年来一布衣，局促辕下见应稀；破帽遮头过闹市，惯乘驽马逐轻肥。朝参大地风雷动，暮到斜阳送落晖；书卷生涯吾愿足，喜看新巢乳燕飞。

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

忆往伤逝

忆童年(十七首)

一灯如豆静含烟，渺渺情怀入眼帘；忽地常来忽又去，
纷纷落絮忆童年。

余最喜读鲁迅先生《野草》中《好的故事》一篇，大致谓昏沉之夜，一灯如豆，万籁俱寂，口含纸烟，烟雾徐上，抛卷而坐，蒙胧仰视，于是仿佛乘小舟置身于山阴道上，两岸风物，应接不暇，山色峦光，一望无际，流水澄澈，一清见底，萍藻游鱼，随流荡漾，美景良辰，涌在目前，追之即逝，回思已远。正欲凝视，忽如投石激水，水花乱飞，遂成片断，浮花碎影，不可究诘，于是小舟不见，灯火昏黄，纵之即逝，是不可不记。

祖母含饴喜抱孙，团团绕膝倍情亲；回首多少痴顽事，
涕笑无端感旧尘。

强要祖母讲故事，祖母喜讲我听之；两目迷矇不肯睡，坐听更柝漏声迟。

祖母为余讲太平军战役之后，乘舟北进由常州入汴梁情况，所述两岸风景，历历在目。又为讲西游记、聊斋志异中故事，每至可喜可谔之事，听之入神，虽更深人静两目迷矇，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

小时喜爱听驴鸣，晨柝更传枕上声；炯炯两眸初唤起，扬鞭得得晓来行。

犹记余幼时随慈母由济南乘轿车至观城等地，出省会经齐河，每至黄昏，抵集镇，御者扬鞭急响进入旅店，饭后，甫入夜即卧于当窗之土炕上，倒头即睡，至午夜醒时，听窗外驴马之啮草声，驴鸣马嘶，颇觉有趣，五更初动，天色未明，即准备作晓征矣。

残月高悬茅店门，荒湾秋水一乡村；纷纷晓市人多少，寒具尝来倍感馨。

余出茅店乘骡车，幼小无知，虽有车涔马蹄之声，颠荡之苦，然仍在睡梦中，比见一曲荒湾，数棵绿柳，晨曦东上，悬在树间，而早睡初醒，见市集之上，茅檐之下，罗列几案，长条板凳，乡人正在炸油条烙烧饼，家人为余买而食之，初炸寒具食之弥甘，馨香无比。

栖霞久是闻名地，遗踪兰皋不可攀；拔草诛茅新辟室，晚来犹得见南山。

余父在栖霞时，获有郝懿行之《郝氏遗书》，比余稍识文字，尤爱读其中之《晋宋书故》及《晒书堂笔记》。犹忆吾父于衙署两偏辟书室三楹，祖母携余至书室中，在插架上信手拈取《史记》，为

吾讲刘邦斩蛇起义故事。时近黄昏，见窗外山坡上农民耕罢，荷锄而归。栖霞山城，风俗敦朴，当时虽文风郁茂，犹目为小邑。

小径崎岖路不平，杂花蔓草遍山生；归来采撷能盈掬，犹自喁喁笑语声。

余六岁入私塾，散学归来，家人携余至屋后山径闲步，但见山花蔓草，所在皆是。余信手采撷，不觉盈掬，归后为吾祖母道之。

芸师诏我"公羊学"，始辨今文与古文；启我愚蒙警我惰，推移于世却沉沦。

余年十二三随父宦游砀山时，余父为余兄弟延铜山梁芸孙师，为余等讲授《公羊》今文之学，及诗古文词，余始稍知治学门径。

杂花小草傍阶生，插架无多亦有情；巡迴朗诵两童子，夜深时闻读书声。

小院闭门如世外，为凭远眺且登台；读罢不觉垂日暮，时有老叟卖花来。

明湖一角碧城隈，菡萏芙蕖次第开；芦苇声中人语动，微波载得酒船来。

余年十二三岁时，随母居济南大明湖畔之汇波寺阁子，宅后临湖，年幼嬉戏，由岸上跃入采莲之木盆，几至倾覆。然当夏末秋初时乘小舟游湖上，见蒹葭秋水，荷芰披靡，偶见游艇笙歌载酒，荡桨中流，庖厨之船尾随于后，年幼无知，心颇羡之。

济南城外东流水，荇藻常浮自在流；喜见红桥隈绿柳，蓼花泽畔系渔舟。

大红桥去小红桥，绿树荫浓逸兴遥；漫数游鱼清见底，行到红桥第几桥。

余父自栖霞卸任后返济南，侨居于济南城外之东流水，即济南城垣之护城河，绿树荫浓，水清见底，萍浮荇牵，游鱼可数。在绿荫丛中，两三红桥，参差其间，历历如绘，惜所居未久，而留余印象甚深。

邺下风光久闻名，祖父堂前见一灯；教我说文解旧诂，月穿花影读书声。

余年十一二，随母返安阳旧里，与五叔洹生公共读，家居于北府胡同，早出晚归。祖父仲琴公每晚授余说文部首，兼教以毛诗，堂中置保险灯，灯光灿然，院中颇有花木，夜读甫毕，已花影摇窗矣。

蕙公为我话桑麻，罗墅荒湾是吾家；谢家代有才人出，春及堂前栖暮鸦。（罗墅湾位于江苏常州近郊）

游子身上衣屡线，尽是慈母手中裁；一自萱堂永逝后，孤儿到老有余哀。

风灯过眼雨如丝，渺渺情怀信所之；谁谓年光能倒转，儿时可有再来时？

忆外家（二首）

洪氏述闻纪外家，江乡风物洵堪夸；我亦随同阿母去，
携妇将雏乐事赊。

余最喜读洪稚存《外家纪闻》，以余祖籍昆陵，而外家又久居武进城内，故读之尤足感人。余随慈母赴武进到外婆家不止一次，最后一次余已与吾妻段庆芬结缡，抱有弱女莹儿矣。外祖母之见外孙喜可知也。见孙妇抱重孙至，抚孙妇之鬓，又回视曾孙，啧啧称赞者再，为余亲调羹饭，当准备午馔时，余推窗闲眺，则见小舟载草，荡桨由窗而过，于是始知"户藏烟柳，家具画船"之趣。

观子巷前傍水隈，外母喜孙笑语开；手携孙妇教羹饭，
推窗又见草船来。

忆故里访书

狭巷访书夜未阑，无端风雪夜漫漫；自从养得耽书癖，
一灯如豆喜回看。

余年十八又返安阳，仍住故居，闻归居西巷某家有鬻书者，乃雪夜踏雪访之。余幼即嗜书而不识书，仅选得《古文眉诠》而归。又见肆间有明刻本《天下名山胜览记》首册，刻图绝精，亦交臂失之。

忆刘盼遂(五首)

兴观群怨诗人事，平生最喜义山诗；赖有达诂君教我，春山秋恨有谁知？

忆某年春暮余与盼遂出复兴门外散步护城河畔，时碧桃已谢，流水潺湲，盼遂为吾咏义山独游曲江“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之句，颇有风荷荣枯之感。义山诗意内言外，蕴藏甚深，盼遂为吾述义山流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诸作，颇有别解，启迪甚深。

淡于月白清风夜，娓娓谈诗倍感亲；羡君不为因人热，愧我沿门乞火人。

余自津门返京华，与盼遂过从甚密，几每周必相聚，非吾至君家，即君至吾处，坐谈书史，兼及杜陵义山之诗，娓娓动听。戒余矜躁，喜于奔竞，为吾讲《后汉书·梁鸿传》不因人熟之事，至足深省，回首思之，余驰于外务，不知检束，实沿门乞火，至老无成之人也。

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苑；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内外即天涯。

刘盼遂兄与余生同豫中，同学清华，又同客春明逾四十年。盼遂性情纯笃，学问渊博，记诵详核，言之有据，每相过从，获益良多。犹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之晨余访盼遂兄，见其小园中盆植荷花，纷红骇白，映以朝曦，鲜艳欲滴，晡间约盼遂兄至吾家赏兰花，佐以盘飧，晤谈至快，不觉夜阑，余送至门外，举手言别，再谋良晤。孰意未隔数日，君为“联动”所冲击，误伤自沉以没，所藏书籍，荡然无存。余闻耗潜至其地，则见君家双扉

顿开，日影在墙而已，每一思之，有馀痛焉。

安命何由观物化？梁园小聚转成空；我来君家君已逝，褒信郊原听晚风。

1934年间胡文石青约余至大梁修《河南通志》，余与盼遂同居于河南大学，时主讲河大者有同学姜亮夫、高亨，及友人李笠诸君，朝夕过从，时至味莼楼小聚，访书于大梁书社，回首前尘，犹如昨日。“文革”前夕，余偶读苏曼殊小说绛纱、焚剑诸作，曾记庄湘博士博学多情，历观世变，寿命独长，曼殊上人谓之安命观化人也，余因想盼遂体健逾于余，步履轻捷，必可以安命得观新社会美好之无限远景矣。余举以语盼遂，而盼遂反若漠然无关者，余甚为诧异，未几而君卒矣。至六六年八月余来息县东岳公社，东岳毗邻褒信，君家也，使君若在，可以携手周游君之故里，话旧河梁，岂不快哉！而今则只有独坐郊原，耳听晚风，读顾宁人“夷门留得老侯嬴”之句。至为凄恻。

两手如锥但持螯，老来忽漫习风骚；若使刘郎今健在，一日定当走千遭。

忆王以中(庸)

南方之强君健者，君之所能我未能；冠盖京华君寂寞，峥嵘气节见平生。

同学中余最钦佩相交深而能规戒余者，同里有刘盼遂，江南则有王庸，庸字以中，无锡人，为人耿介，长于历史地理沿革之学。

忆向觉明(达)

嫉恶如雠君健者，讲通绝域实堪惊；笺注图经书数卷，甘伏辕下廆君情。

向达字觉明，湖南人，余与君及贺昌群、赵万里诸君同供职于北京图书馆，时方裘马少年，朝夕共处，早已相知，至晚年承君相勖而交尤笃。

忆吴子馨(其昌)(二首)

讲学南雝趋江乡，暂为停骖岱岳旁；松影窥窗人不寐，题诗遥为寄潇湘。

一九三二年秋余自北平赴南京，道出泰安，爰为登岱，车抵泰安时，已近子夜，宿于泰安宾馆，风清月洁，岱色苍茫，松影摇窗，景极幽邃，余不能寐，乃移书致同学好友吴子馨(其昌)，谓如此良宵美景，惜不能与兄共之也。

典衣沽酒津沽市，痛饮狂歌村酒香；灯炧夜阑客散后，八里台畔月凄凉。

余与吴其昌同学于清华，同馆于饮冰室，又同执教于南开。君治学甚勤，而兴甚豪，时典衣沽酒，痛饮津市，有时归校过晚，走水旁小径，芦村茅舍，狗吠而来扑，余与子馨拥抱疾行，幸而抵校，夜已深沉，此情犹历历在目。其昌字子馨，浙江海宁硖石人，治盘盂历数之学，兼治宋代学术，能词章，执教武汉大学，忧心国事，而又发奋钻研，以积劳早卒。

忆冯仲翔(国瑞)

愧我无能学张俭，羡君多艺歌孔融；忆昔泛舟沽水上，陇云西去太匆匆。

西北才人不世出，出必有达者。同学冯国瑞字仲翔，天水人，能诗善书，劭其乡贤张澍人之学，著有《张介侯年谱》，固一翩翩书记才也。一九三四年左右君因避祸来春明，余曾拯之于厄，君居西山，时相过从。解放后，君访余于沽上，联榻共眠，畅谈至快，泛舟于水上公园，以诗相赠，未及数年而君卒矣。

忆傅沅叔(增湘)先生

海内藏书数江安，燃藜点校志穷源；自从修史追随后，一庭风露忆藏园。

江安傅沅叔太世丈曾与先祖共砚席，藏书之富，鉴别之精，海内外皆知，而校书之勤，已逾万卷，曾校书于西山大觉寺，为避嚣也。自归道山后，手校群籍，均归于北京图书馆。予以后进，得受提携，畀以纂修《绥远通志》之事，双鉴楼藏书悉资披览，园中风物得以领略。

忆张菊生(元济)先生

藏园而外忆涉园，毗陵门第溯流源；谬荷畚山校史役，向阳小草近墙熗。

海盐张菊生先生，为梁任公师之莫逆交，亦为傅沅叔丈之谈书友。当戊戌政变之时，菊老在宣外之嵩云草堂为泥模范字发刊《时务报》及宣传文字，遂奠定其传播震旦文化之伟迹，从创学

风，校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流播宇内，不胫而走，犹其余事。余以沅老之介，得识先生于沪上，出《昆陵谢氏家谱》相示，先生之母为桢之祖姑行，而桢则忝属子侄辈也。先生性素孝，遂以外家有后相勖。余时读书盔山，移书属校《旧唐书》，发凡起例，约近万言。后每至沪上，常相晋谒，为桢刊印菲作，得以流传江南塞北，皆先生推挹之力也。

忆余樾园(绍宋)

忆昔饮冰相共饮，定香桥畔话离痕；能史能书兼能画，壁间尺幅已无存。

余君樾园名绍宋，龙游人。君治法律之学，而能诗善书画，著有《龙游县志》、《书画书录解题》等书，余遇之于饮冰室席上。君酒量甚宏，酒后挥毫，至为雄快。

忆章太炎(炳麟)、黄季刚(侃)先生

卓越才华惊四座，许郑博辨尽称雄；呼酒传笺巡迴诵，零玑碎玉古人风。

因范老文澜之注《文心雕龙》以及修改《通史》，动笔之谨慎，思想之缜密，有汉学家之遗风，而联想及黄季刚、章太炎诸先生，当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炳麟借明季抗节之风，发扬革命，鲁迅称其本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晚年"渐入颓唐"，革命气节遂为汉学所掩。黄季刚侃，余在中大，颇承其奖借，书联以贻，有"贬视当时权威势力，网罗天下放佚旧闻"，感愧实深。犹记黄君为余述辛亥革命遗事不觉盈晷。黄君喜骂人，而独提携青年，鄙视权贵，闻居正见忤蒋党下狱，黄君携酒入狱，与之对酌，即此可见一斑。犹记某岁，太炎、季

刚两先生先后同来春明，当时后进孙人和、吴检斋、刘盼遂及余等，同宴之于西四之同和居，太炎先生不习北语，必赖舌人，季刚为之作译，在座诸君问及论语骈枝，六书通故，汉学渊源，朝野遗事，问题甚多，于是呼酒索笺，章黄两公彼此互谈，笔诸笺纸之上，来回往复，积至盈寸，时光易驶，已近黄昏乃散。其稿藏余箧中，嗣来南北奔驰，不幸佚去，惜哉！

忆柳亚子先生

南社诗人柳亚子，不畏强御卧沧江；发潜彰幽陈佩忍，松陵文献有辉光。

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吴江人，南社之钜子也，抗日战争时期，君搜辑明季史乘，吴江志士吴日生诸人抗清事迹，在蒋党统治时期，君贬视当时反动势力，高蹈沧江，著有《怀旧集》，发扬民族气节以见其志。又吴江陈去病字佩忍，别号垂虹亭长，著有《五石脂》、《明遗民录》等书，均载于《国粹学报》中，松陵文献、潘柽章、吴炎诸烈士修史被累，英勇不屈慷慨就义之事，赖之以传。

忆朱逷先(希祖)、孟莼孙(森)先生

暮春三月江上行，杂花生树闻流莺；逷先已逝莼孙远，严陵台上晚风清。

余执教南京中大时，时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朱逷先先生希祖偕余渡钱塘江，宿于桐卢，次日泛舟于富春江上，时满山杜鹃花盛开，田间菜花与麦秀相妍，五色绚彩，淡黄粉红，碧竹幽兰，娇翠欲滴，清香扑鼻，而流莺巧啭，时送耳根，此一时富春江之盛景，至今仍不能忘。然逷先先生藏明季史乘甚富，乃

悭于示人，能藏书而不能著书，而孟莼孙先生森收藏不富，但撰述甚勤，清初明季之事，八旗制度，人文遗事，均有所发明，读之引人入胜，绍余实多。今两君均先后云逝，惟念昔日与逷先先生同登严陵钓台及莼公共话春明，问难请益，犹历历在目耳。

老妻(三首)

久阴忽已报新晴，桂影斑驳分外清；饭罢闲行无一事，杖藜遥看月东升。

一九六二年夏余偕老妻庆芬，逭暑香山，宿于香山饭店，校辑余所著《明清笔记谈丛》。晚来新晴，月光皎洁，桂影斑驳，影照林泉，泉水淙淙，清光寂然，至今犹未能忘。

老去情怀百不禁，无端怅触往来频；正是北云迴望合，一纸书来倍感人。

老妻动手术后，尚未完复，弱女假满已返沪渎，无人帮助，一纸书来，颇为感触。

少年结缡老来亲，嘘寒问暖倍情真；题诗磨墨成佳语，同归白首定属君。

梦中(二首)

何来青琐警顽心？滴残玉漏更愁人；田田荷叶香脂里，沥沥莺声入梦频。娇语无邪渐忘老，温存情绪转凄侵，潇湘已逐清波远，留得心欢一片新。

七十残年未觉衰，无端忧乐入中来，老妻卧病分两地，

弱女相将远道陪。何事忘情竟若此？未有涓埃答圣裁，劳荷同济相问询，破除疑虑小惊猜。

悼亡之作

酒到愁来强自斟，低徊悱恻倍沉吟，白头谁料君先去，死别生离寄恨深。老去始觉书为累，嘘寒问暖更何人，九原尽多知心友，请君待我备庖珍。

追　怀

形影相依五十年，一回想望一怆然，细琐勃溪行处有，转喜回嗔返笑颜。旧事亦堪成新忆，获落生涯梦里怜，我本胸怀旷达者，怅触无端到酒边。

绝句(二首)

但愿有花兼有酒，何堪无书更无人；读得义山诗一卷，慰我寂寥倍感亲。

九曲桥与陶然亭，北花南雪最分明；何当与君共游赏，一杯清露浅深情。

庆芬忌日有感而作

忆昔鹣鹏同携手，今朝孤鹤向北飞，世事百年如过隙，空潭柳影又送春。压肩行李惟书卷，料理名山入翠微，喜看儿孙开口笑，椒盘饮罢独低徊。

时　事

南行过解放区

我马已疲日昏黄，暂息民家古道旁；劳荷父老遥相问，话出当年斗志昂。

一九四六年春余父卧病安阳，余因友人之请得通过解放区回里侍疾，过石家庄后，天已昏黄，参谋某同志导余宿于民家，儿童为余扭秧歌，父老为吾畅谈解放军及民兵穿过铁路线袭击日寇碉堡事，气势极为激昂。

幸会范文澜同志

我本粗犷君恂恂，萍水相逢寄托殷；解衣推食党义重，独立苍茫忆范君。

范文澜同志余虽识之，然交不甚深。余来邯郸，范老接待甚殷，情谊逾旧，萍水相逢，托以至沪上为北方大学采购图书之重

任，并留余在北方大学任职。知己之感，匡教之益，遂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邵伯所见

邵伯湖上雨初晴，浩荡雄师作霄征，负锅荷枪齐疾走，渡江前夜气豪闳。

余乘长途公共汽车至高邮邵伯，夜已近晚，见新四军准备渡江，气势雄伟，整齐浩荡，令人兴奋之情如此。

开国大典

天安门上彩云飘，灿烂红旗气象饶；正是人民初建国，群呼万岁震云霄。

余在华大政研所学习时，得以参加建国成立典礼，时小雨初收，六街无尘，百八礼炮，响彻云霄，晚放花炮，五色灿烂，如同白昼，全国欢腾。余因在游行，得躬逢其胜，永不能忘。

悲悼周总理

天空海阔大星沉，风刮来云卷去云，五丈原头光万丈，祖国山河第二人。

悼陈毅同志

一声狮吼震环球、卓越才华照九州；优秀党员好称号，于公而外更何求！

小小寒流锁陈云、空山还忆大将军；腐鼠安能成大事，

青史流芳总在君。

闻陈毅同志不幸逝世消息，不觉义愤填胸，悲感交集，提笔书此，既挹其清风，壮其气节，痛恨鼠辈，且志吾哀。

赠　友

游吴门网丝园赠伯武内兄

来苏甫七日，只有两晴天，小桥通曲径，丛林晓日圆。亲朋如手足，姊妹庆团圆。不因伤逝者，结好在林泉。

访王伯翁时病初愈

伯翁惜墨重兼金，点勘芳华寄慨深；愧我无才空索句，羡君出语倍精神。

谢陈从周先生赠红梅画卷

淞南剪烛倍相亲，寄来折枝长精神；何当共结名山约，邓尉山头定晤君。

高桥雅集

舟次观奕罢，游鱼逐浪花，高桥风景好，文物在君家。

丙辰五月之望陈子从周约余至高桥王京篚先生斋中雅集。王君喜藏其乡邦文献，零圭断羽无不嗜之。出示明陆俨山行书诗卷，字极精妙。其诗真迹已刻于陆氏祠堂中，近已损坏，其残石仅存“舟次观奕罢”五字。王君又藏有归玄恭字条立轴，仅存“浪花”等字，余约其意，而成是诗，即席书之，同人无不欢甚，乃洗盏更酌，已夜阑更深，从周偕余乘轮渡而归，时见黄浦江上明月高悬，万里晴空，江天一色，万吨巨轮，灯火辉煌，烟囱林立，榜人工作之声不绝，余为之气爽神豪，大有凌云之志，乘风破浪之心，而余夜深犹不归，已急煞吾莹儿矣。用为记之。

赠雷梦水同志

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

赠杨冠珊先生花甲之庆

六十能诗未为迟，秋花绰约展新姿；携来五岳芬香笔，写出人间绝妙词。愧我无小惊岁晚，羡君采撷更多奇。何当岭海重游日，共话河梁信所之。

明港杂诗（六首）

大雪纷纷送我归，首都初日落朝晖；百花灿烂稷园里，新添长廊饰带围。

秋雨兼旬未放晴，椒花时节到收灯；缘何逋逋春明路，来听明港夜雨声。

祖国风光在眼中，苜蓿葡萄出汉宫；南疆拔海三千丈，天山湖上诵诗声。

余观郭老陪同柬埔寨英萨利大使访问吾国西北新疆影片，见郭老以大耋之年在天山湖上，荡楫中流，凭栏吟诗，为之神往。

檐头山桃长蓓蕾，木笔辛夷次第开；正是一年好风景，明港原上又重来。

书卷行藏久寂寥，胸中忆念度元宵；行看陌上花开日，暗数归期自解嘲。

迷濛细雨出明港，灯火稀微路径长；汽笛一声烟雾里，载将乡梦过黄粱。

自 慨

明季遗闻数绍衣，秋室钩稽转称奇；我欲驰骋辽海上，林深伏莽意迷离。

全祖望先生生于清康乾之际，严于文网史禁之时，独能不畏强御，发潜彰幽，表扬民族气节，南宋明季志士仁人抗节之风，赖兹以传。而杨凤苞氏苦心孤诣，征访遗事，注释《鲒埼亭集》，钩稽之勤，出于钱本之上。余略知甲乙遗事，实由全、杨诸家之书启之，仍欲旁及辽事，上溯金源。辽、金之史，虽已点定，而立志未定，驰于外务，学业荒落，遂至垂老无成，曷胜叹惜。

黄 校 本

佞宋无如黄荛圃，较宋无如顾涧苹；我得黄批书数卷，琳琅朱墨见情深。

余曾服务于北京图书馆，正铁琴铜剑楼瞿氏、海源阁杨氏藏书散出之时，赵君斐云在上海访得黄批顾校旧抄善本书籍约十九种，余曾借观黄校刘祁《归潜志》，当时荛翁延施国祁北研至吴门

为之校定者，改正错字误句甚多，余曾移录于《知不足斋丛书》本上。余后又得黄校本《礼部韵略》、《吾汶稿》以及海源阁藏旧抄本《元人选元诗》，傅沅叔太世丈为之作跋，不幸皆以易米，至今悔之。

王晚闻跋《韩柳年谱》

萧萧落叶雨声中，偶翻《韩谱》见兰丛；一自涧苹移书后，计程应已到淮清。

余得清雍正间刻本宋吕大防撰《韩柳年谱》，写刻至精，为王宗炎晚闻居士藏书，其子端履初举乡闱，顾广圻孝廉以此书相贻致贺，孝廉来书已佚。《韩谱》后附有晚闻居士跋语，谓："吾儿计偕北上，涧苹孝廉举此书相贺，令其携之至京，计此书达时，吾儿想已抵清江浦矣。"江浙士子应试北上，至清江浦红花埠，舍舟登陆，改乘骡车，即黄沙扑面，风尘仆仆矣。蒲松龄曾游红花埠，记其遗事颇多，可于《志异》中见之。读史论世者，历史与地理相联系，因古知今，乃弥感成趣。

鲍批《五七言今体诗抄》

鲍氏评诗老更成，小东题字义分明；恰是明湖秋夜月，寂然四壁一灯清。

四叔父菊农公赐余姚惜抱《五七言今体诗抄》原刻本，中有鲍瑞骏桐舟用五色笔批校，并于杜诗陆诗增选数十首写于眉端，余朝夕读之。书首有鲍氏题语云："此书小东仁棣所赠。同治二年九月望日桐舟鲍瑞骏识于明湖寓庐之西窗，时明月如水，万籁寂然。"小东名朔，能草隶，有伊墨卿之遗风，余甚喜之。余尚收有

鲍瑞骏《桐华舸诗抄》稿本，今归于文学研究所。

宋起凤《稗说》

老屋荒寒风雨声，割鸡煮酒话离情，元见梅隐云从画，写来《稗说》见平生。

宋起凤字来仪，号紫庭，清顺康间人，沧州人副贡生，曾官山西灵丘知县等官。晚好游，足迹几遍天下，居富春江上，石田烟雨，林峦入画，著有《稗说》四卷，记春明掌故，明清之际人文遗事甚详，而记其与陆元见、萧尺木，来往道旧，交情尤深，可见元见、云从之风格，原书未有刊行，余得其稿本。

喜获《不下带编》

《不下带编》金埴著，零落空山二百年；昉思已逝流风在，更与何人话昔缘。

余于藻玉堂书肆插架上，获清初山阴金埴著《不下带编》稿本，钤有名号印章，海内绝无传本，盖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已二三百年矣。埴字苑孙，字小郯，深于音韵之学。仇兆鳌注杜诗，小郯曾为校订声韵之讹。与并时词人洪昇、孔尚任，过从尤勤。其记与洪昇交往云："每夕阳栖堞，秋露凝皋，翠雨轻飞，香泥软步，偕余散诞于东园郊郭间，游鱼水曲，欲曲还留，啼鸟知闲，将行复伫。盼思辄诵'明朝未必春风在，且为梨花立少时'之句。遽成诗谶，不堪追忆耳。"然洪昇生卒年月，卒赖是书所载而传。

弹　词

曲曲流水小桥东，芳草天涯话雨中；莫道姑恶寻常事，分明怨恨古今同。

《三言》、《二拍》，虽为明代短篇小说，然记明代社会风俗，民间琐事，写来生动，各种人物，呼之欲出，生活情况，历历如见。由《三言》、《二拍》，概括选摘而为《今古奇观》已家喻而户晓。沿至清代，遂演变而为弹词说唱，谱诸管弦，余每至苏淞小桥流水，肆巷人家辄听到丁东演唱之声也。《三言》、《二拍》虽描绘寻常琐屑之事，然嫉恶怜贫，阶级压迫，郁抑不平之事，每于此中见之，所谓“分明怨恨古今同”也。若以此三吴民间所喜之民族歌唱形式宣扬革命事业，祖国建设之精神，岂不快哉!

留　题

书间偶然落鸿泥，红叶轻挥月向低；抚卷徘徊思往事，于今如何不留题?

书籍文物，虽铭心酷嗜，然饥来驱我，不能常守，每一思之，辄为腹痛。犹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载《元人百家诗》，有名闺秀陈坤维题句云：“‘典及琴书事可知，又从案上检元诗，先人手泽飘零尽，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鸡林求易得，他年邺架借应痴，亦知长别无由见，珍重寒闺伴我时。’丁巳九月九日厨下乏米，手检元人百家诗付卖，以供饘粥之费，手不忍释，因赋一律塍之，陈氏坤维题。”我曾得清嘉庆刻本《崇祯宫祠》，封面前有太平军战役前某人山水之画，孤峰小塔，山色蔚然，画虽不佳，然可见当时某氏兴到之笔，余颇奇之，即此鸿泥指爪，余非为名，然后之视今，亦如余之视昔也。至书籍碑版亦有失而复得

者，余曾有萧山朱氏旧藏明拓济宁五种，佚去已久。解放后，旋又得之，今犹存于笥中。

归玄恭文

归庄不愧老头陀，携酒寻花发啸歌；自从品题骊黄外，天涯芳草又何多。

余读归玄恭之文，叙述明季昆山抗节之士，辞严义正，踔厉风发，慷慨悲壮；既阅其《寻花日记》，又何风光绮丽，醒而复醉，夜对名花，荟萃于一瓶之中，抑悲愤之气一寓之于酒，期待来者，天涯芳草又何多耶！

野史笔记

杂谈巷议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网尘封虚岁月，重翻如见故人来。

野史笔记，鲁迅先生谓如森林密叶，月光从密叶中反映在莓苔之上，多少可以写照出当日之事实。余年来搜集明清笔记，已近千种，偶尔读之，亦是一快。

达　人

旷达世情学苏老，心迹双清忆文贞；黑云压城昌谷子，达人何必尽长生？

古人有“早闻道，夕死可矣”之义。鲁迅谓：“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乳。”苏子瞻之旷达明理，杜少陵之心迹双清，李昌谷之出语惊人，石破天惊，明义已足，虽死犹存。

鲁迅绝句定公诗

鲁迅绝句定公诗，幼撷芳华不自知；自从识得搴旗手，
光辉相映足多师。

余素喜读定公绝句及鲁迅先生之诗，然仅拾其芳草，未能明其真谛。比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见主席曾写定庵及鲁迅先生之诗，主席称鲁迅为最伟大英勇之旗手，中国文化革命之主将，鲁迅亦亟称定庵之作。

定公绝唱

旧作焚尽又题诗，中酒情怀不自持；蚕丝未尽需当吐，
定公绝唱是吾师。

坡翁诗意好

浟天云雾雨濛濛，骀荡春风见晚虹；忽忆坡翁诗意好，
无如“寸寸弯强弓”。

坡翁诗：“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余深味其言，至老而更知其趣。

读《李白和杜甫》

高适学诗未为老，郭老著书我未能；学习新知理旧业，
金篦刮目快平生。

高适五十始学诗，余年逾六十始学吟咏，微见其志，自知无成。近读郭沫若同志《李白与杜甫》一书，始破余李太白为天才之

谜，李白虽名为谪仙人，然眷怀儿女，亦自犹人，鲁迅所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学习新知，再理旧业，心目为之一新，快慰平生。

积雪空庭翠墨新，短评长校见情深；柯周已逝蓬山远，屡屡翻来扫旧尘。

汉李孟初碑，中间缺字颇多，俗谓之“明月照积雪”。余所得者为周季木君旧藏，“陶唐伯祖”等字犹存。柯燕舲兄为吾述其彼此商讨，得碑时之情况其详。写之于原碑之上。

讳字双垂张公颂，书含篆隶季将碑；翰题收藏廉夫画，犹见寒林写照时。

余得明拓张迁表、高字不损本孔宙碑，有陆廉夫画得碑图。孔宙碑“高”字、“玄”字笔法皆字含篆隶，近拓本已去本来面目。碑为吴江沈氏故物，邓秋枚编《神州国光集》，多借印其藏品。

题秋浦周氏季木以宋纸精拓所藏汉魏石经残石(二首)

故友声容尚宛然，开阳门外有遗编；世界不与我同死，流水无情怅逝川。

短短星辰短短宵，蝉翼如雾影还遥；可怜四十五年事，犹得摩娑永岁朝。

余既藏周季木汉晋残石墨本，绍良弟复为致季木先生用宋纸精拓汉魏石经残字，王静安师为之手写石经图，考证其石经残字位置甚详，墨迹如新，甚可宝也。季木精鉴别，喜藏石，惜为纷

华所累，绮罗所煎，偶撄疾遽卒，年四十有五，盖与张皋文同岁也。徒以家世簪缨，豪华成性，未能竟其所学，惜哉！然其平生夙嗜，积石藏陶，留为后人治学之资，固与资产阶级富家郎贮金玉宝财货者有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晚溽暑困人，夜不能寐，展阅旧藏，怀念故友，重录题碑绝句，不觉凉风习至，热为之减。

一九七五年元旦试笔题潍县陈氏旧藏汉器及其他拓本后

校改攻坚事万端，何暇襞积理丛残？河山举目无穷碧，尚留花絮在人间。

题庄缙度手校汉魏碑（二首）

小蓬莱阁著声闻，裴斋踪迹继前勋，贤哉任城两司马，苔痕时见老龙鳞。

前尘梦影渐消沉，坐守青毡我似君，琅玕翠竹周千亩，和烟滴露长风云。

题黄小松拓郑季宣碑

没字碑成有字碑，小松绝技洵入微，海天渺漫光无际，漠漠平沙鹘鸠飞。

癸丑四月初十为余七十三初度之辰，晴窗佳日玩阅古刻，喜不自胜，信笔书之。

得小松拓本多种及嵩洛泰岱访碑得碑影本略备

嵩洛泰岱在胸中，绘影题诗气味通，喜得维摩共一室，琳琅满目听松声。

题方药雨藏汉砖画《小舟捕鱼图》

贞珉曾亦贾张罗，大好年华逐逝波，赤凤朱龙消散尽（昔年所藏汉画多以易米），晚来留得一渔蓑。

题刑徒砖拓本

莫笑司空城旦书，蔡邕犹自出钳徒，拨云披雾明人眼，多少髡钳是丈夫！

残碣犹记永元年，奇觚文字赖兹传，留得寒林一片石，五陵宫阙长风烟。

路工同志属题赵松之延祐观碑并让予旧拓韩仁铭碑

松翁妩媚本天成，此独岩峣效褚风；何事时贤共欣赏？叔明遗翰见孤忠。（叔明兄为国捐躯，死于日寇之难。）

劈剔丛残并世无，羡君买椟不还珠，吴装素裹明人眼，

泛舟何异到姑苏。（让余无锡秦氏藏旧拓汉韩仁铭吴中装裱本也。）

漫成二首

一字之易金成铁，黎花院落起酸辛；若使奇苑竟爱惜，金谷宁有坠楼人。

那堪秋波那一转，不风流处也消魂；纵得无颜开口笑，先生有知愧梅村。

索居无俚，偶尔阅肆，购得《秦邮帖》、旧拓墨本《苏诗》、清康熙间刻本《西堂杂俎》，有正书局铅印本《黄九烟诗钞》等书，归后暑夜灯窗拉杂读之，顿忘汗流，亦深自喜。《秦邮帖》拓本不精，不称梅溪抚刻古碑碣盛名，然读黄山谷之黎花诗“金谷园中无数红”诸句则洒洒有致；而旧拓本《苏诗》槌拓纸墨极精，光彩照人，有刘石庵、戴醇士诸家藏章。余素喜长公诗及书法，因题其后云：“百读不厌，洵为铭心妙品。”碑应当读，此世所共知，而后生亲戚有为誉之过甚者，余乃勉从其意，改读为临。尤西堂以“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名题之制艺，实开清代吴门游嬉佻薄之风，而取媚于清帝。其集中有《梅村词集序》等篇盛推梅村之为人，亦知梅村临终自题“词人吴梅村之墓”之意，使尤侗生而有知，当愧对梅村多矣。余又喜黄九烟“客来古寺谈秋雨，天为高人放夕阳”之句。凡此诸帙，徘徊雒诵，不觉忧之从中来也。

读《两当轩集》

平生酷爱效渔洋，今日遍来读《两当》。八十残年浑不死，感君身世倍凄凉。

读陈寅恪师《论再生缘》有感

南花北梦久消沉，再生何处证前因？人间自有拈花手，赢得端生出语新。往事那堪成追忆，西园落絮渺无垠；寅师已逝蓬山远，收拾铅华定有人。

题任心叔《尘海楼诗稿》

老气横秋未觉尊，识高语隽自温文；即看多少才华者，前有中郎后属君。

题史树青先生藏陶篑山兰亭遗迹卷

兰亭茧纸入荒坟，欧临褚抚太拿纷，汉家草隶分明在，甄别骊黄定在君。

海门远绍泰州风，左派王学气象通，岂独温陵标异帜？稽山又见一灯红。

题平伯尊人陛青先生《集外集》

平生足迹遍江东，但惜未得到垂红；每欲停桡询故迹，君子馆里见春风。

曲园门第旧家声，细字书来倍有情，我愿临摹千万本，年华彩笔共长青。

题张全新君《新声集》

下马观花我似君，羡君博辩作舌人，回首廿五年前事，庾信才华倍盛新。

读《郁达夫集》有感

浮花浪蕊太匆匆，今古无端入梦中，年来才尽江郎笔，枨触情怀拜郁公。

读黄仲则诗有感

一醉始觉天地宽，年华无计挽狂颠；管他明日生公事（为北大讲课），且尽樽前苜蓿盘。四壁尘昏多漠漠，孤灯照影尚旋旋（丧偶之凄）；检点从残寻旧[illegible]听笙歌海外传。

纪　游

南　京

扫叶楼头素面香，毗近梅庵大道旁；为觅任师旧题句，摊书寺内费思量。

一九三二年于南京，时至鸡鸣寺小坐，食素面而等之，余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即于寺内拟稿，初步写成。

迷濛烟雨秣陵秋，绿水轻盈自在流；小市收灯人散后，唱经楼上暂勾留。

青溪路上，小市收灯，茶馆人散，景象凄清。今春余再游金陵，林荫之道，绿树成荫，人烟稠密，熙熙往来，大非昔比。

丁氏藏书八千卷，盋山精舍庋如新；把卷读来人不寐，一窗蕉影月窥人。

余在北平图书馆纂辑《晚明史籍考》时，曾来南京读书于龙潭

旁之盋山精舍，始识柳翼谋先生，相勖甚殷。

长桥矗立大江东，天半云霄架彩虹；魏武缝囊终何益？轮车电驰往来风。

北　京

筑得碧梧青藤馆，西府海棠后檐栽；曾于此中理旧业，灯光如电听惊雷。

三十年代余曾卜居于阜成门内小水车胡同，面城而居，厅前植有藤蘿梧桐，厅后窗下植西府海棠两株，每当花开时，我坐窗下，粉红骇白，浓翠欲滴，光艳照人。每当散值归来，独居此室整理旧业。余《丛书刊刻源流考》、《陈则震事辑》、《河套民族变迁考》等篇即写于此室之中，时当午夜，迅雷震耳，电光闪闪如白昼，盖足以发蒙振聩，警予顽心矣。

稷园小集日初凉，雅谑庄言兴味长；曾是越缦登临地，泰丰楼上话沧桑。

余在北京图书馆日，徐森玉先生每偕斐云、觉明、以中诸兄及余游公园，遂饭于煤市街之泰丰楼，即李慈铭日记中所谓“丰楼”也。森老熟于版本掌故之学，而于清末民初五四运动以后所接触之人物尤盛。每与同仁，饭罢茶余，侃侃而谈，听之令人忘倦，惟惜墨如金，不肯笔之于书。

欲送春归春已阑，杏花已放海棠残；惟有耽书医不得，乘兴还来看牡丹。

稷园牡丹天下夸，那堪风雨横交加；老鳏不是无情者，

犹来拄杖看残花。

一九八〇年春末游中山公园见牡丹经风吹雨打后玉碎花残，遂写此。

济　南

汇波门外水潺湲，万顷荷塘碧涨天；一片芙蕖数株柳，酒帘高出柳园前。

汇波门内月轮高，水阁风来桂影摇；最是一灯蟹簖里，嗷嗷欲上笑儿曹。

熊家扁食从来好，子鸡尝来分外香；饮罢不知垂日暮，鹊华桥畔月如霜。

济南称水饺曰扁食，鞭子巷熊家扁食个小馅精，肴核熟食店之桶子鸡保存鸡汁原味，清腴可口。犹记余服务北京图书馆时曾至历下，阅书于山东图书馆，得识王献唐先生，示以山东乡耆著述。偶尔散步街头，询鞭子巷旧址，食熊家扁食，佐以桶子鸡，举杯独酌，不觉陶然。时已垂暮，过鹊华桥，月华在地，树影萧疏，步月而归旅舍。清同光间匡源主讲尚志堂书院，著有《鹊华桥杂著》，记鲁东风物诗文遗事甚详，余曾有其书，惜已遗去。此游余曾于书坊间得清乾隆间《山东省奏请销毁违禁书目》一册，至今犹存。

河　南

清泉沥沥水淙淙，想见孙登歌啸风；漫道中原无妙迹，淇园绿竹胜江东。

余以赴豫修《河南通志》之便，道出辉县，即见绿野盈畴，水磨之声淙淙。既进入百泉，则见水清见底，泉水涌出，如泻珠玉，楼阁矗立其间，绿树环峙，而遍地翠竹林立，所谓淇园绿竹不减江南风光，殆犹胜之。农村学校同人为余下榻于共姜祠，安榻甫定，而山雨骤至，惊雷电驰，风起云涌，池水波涛，惊骇万状。已而雨过天晴，斜阳在树，百鸟齐鸣，如奏笙簧。次晨醒来，乃拾级前行，登孙登啸台，访夏峰遗址，比峰迴路转，日高花影重矣。绕园一周而去，晋唐以来名胜古迹，悉在目间。

迷漫积雪皎皎夜，许昌城头学醉歌；与祖同游为姚子，于今识者已无多。

先祖仲琴公讳愃，原名惛，刘孚京镐仲《南丰文稿》有《书谢惛事》。先祖少居许昌，雪夜偕挚友姚诗志痛饮许昌城上。余曾见姚氏所书隶字箑面，书法遒隽类赵之谦，今已无存。惟先祖清同治二年于洛阳市上所获乾嘉年间刻本张注《文心雕龙》，今犹存于笥中。

怀铅握管大梁城，乘兴来寻郦禾农；青毡坐对应如旧，踏雪寻碑问祖风。

郦禾农为先祖之弟子，从游甚久，知先祖之遗事甚详，能隶书，收藏颇富。余访之于其寓庐，青毡坐对，款谈甚快，观其架上书帖充斥，犹写碑如故。

平生作客遍天涯，于今作客当还家；回思郸上趋庭日，赖与吾叔数岁华。

余来往郸上共有三四次，然不及一岁。自来息县、明港共住有一年又八个月，反较居郸时间为长。现在郸上已鲜亲属，能与家人说往事者惟吾四叔父耳。四叔父菊农公年已八十有六，体健

神充、年登大耋，百龄可臻也。

上海

桥迴九曲越瓯香，徒移亭前屡品尝；今日乍知天气好，童心牵惹九秋光。

豫园虽小好风光，山石玲珑照夕阳；迤逦行来通曲径，雕栏画阁改新装。

一朵华云海上来，喜见菊花六月开；自是巧夺天工手，画出人间别样才。

余在沪上，见八大山人《菊花酒瓮图》影印本，饶有风趣。喜而爱之，告诸公渚。公渚先生为余画《菊花酒趣图》，自青岛寄来，时正六月下旬也。

持筹籀史非吾愿，旅食沪渎爱南烹；赖有故人存问我，压肩书卷我将东。

余旅居沪上，仍在大中银行任秘书之职，与郑西谛、王伯祥、王以中诸君相过从，偶参与其酒会。余借叶揆初丈杨凤苞校注《鲒埼亭集·内编》，移录成帙，即于大中银行办公室写成之。余在沪渎，金毓黻先生曾约余至东北博物馆，为西谛兄所劝止。静庵致余诗，有“满地干戈谁念北？压肩书卷我将东”之句，其情可感，实则余将北行也。

卜居临水沪西偏，栽竹移花屋数椽；筑室未成我已去，微风疏雨绿杨边。

余弟国栋借资为余筑室于大西路，室未筑成，国栋走厦门，

余由昆明讲学北返，从此劳雁分飞，徒以志趣不同各不相问。余以一九四九年二月由镇江潜渡长江，时积雨初过，泥泞载途，持杖负行装，步田径上，由仙女庙至维扬，我方有支君名冲者招待甚殷，居于绿杨旅舍，为觅公共长途汽车，北返，晤范老，固得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

苏　州

昔人曾为题老桂，寻诗端合到天平；枫叶未丹花正好，芬馨馥腴远相迎。

曾见木渎石家饭店题壁诗有"老桂开花天下香"之句。灵岩余所素游，乃访胜天平，时木樨盛开，枫叶未丹，小坐范石湖堂前，桂影婆娑，香满庭宇，桂子沾襟，久久乃去。余曩得郑叔问《灵岩丹枫图》立轴，旋亦失之。

荡桨山塘七里遥，虎邱河畔此停桡；今人未解昔人趣，走马阊门未足高。

明清人士游虎邱者，多由阊门登舟，荡桨山塘，两岸垂杨，笙歌盈耳，旂亭酒壁，百货杂陈，见于顾禄之《桐桥倚櫂录》。自清朝官军所焚毁，劫掠一空，听俞平伯先生言，昔曲园老人犹目睹其惨状，今已无人道及此者。此游余偕内子、友人景霖君出阊门，觅小舟容与中流，微风拂面，两岸人家，幽闲静适，虽画舫消歇，而风景不殊。

我爱枫桥景色幽，寒鸦飞绕碧池头；霜天晓角钟声晚，不是征人也解愁。

乘舟由虎邱折返，荡桨中流，遂至枫桥，大河前流，小舟摇荡，宛转其间，即抵寒山寺矣。古木横斜，寒鸦飞绕，灵岩诸

峰，历历在望，景极清幽，气象萧然，足以使张翰增悲，承吉起愁，凄清之景，至今犹萦人心目，不足为不知者道也。

一九四八年

为访莫厘蔚苍苍，泛舟犹及到横塘；昔日红军争战地，石湖无限好风光。

余以一九五三年秋赴沪，收拾沪上书物，携以北上，曾游吴门。从盘门乘小火轮，游东湖庭，泛舟石湖，坐船旁啜茗观江乡风景，其喜可知。既抵东山，宿友人家，导余游览，山势苍茫，寺观林立，洞庭中秋观月，为太湖胜景之一，何幸余乃能得之。是夜余登玉皇阁上，铁匠师傅正在赏月，美景良宵，为昔日斗方名士玩赏之地，今已属于工人矣。归时友人为余述东山岩穴为昔日红军隐避抗战之地，今则交通舒畅，四通八达，非复昔日景象，大可一观。

叱咤风云岁月惊，胸怀辽阔觉身轻；多年兄弟能相聚，吴门喜见老人星。

一九七二年五月于苏州访内兄段伯武，登堂拜其母，年已九十有四，步履尚健，吴门喜见老人星也。

午睡初兴日已曛，留园久别往来寻；幽岩曲洞应如旧，翠绿盆盎又一村。

王杖河头忆周家，秋来开遍满园花；莺飞蝶舞归平淡，清奇古怪见才华。

一九六二年秋余观书于西泠之文澜阁，遂至吴门，访周君瘦鹃于王杖河头。

香雪海观梅

香山未能采红叶，光福十里看梅花，苍茫摇漾如云海，红白缤纷似彩霞。枉读诗书虚岁月，广阔天地是生涯。即看太湖桥边路，公社渔庄是吾家。

杭 州

湖楼读罢日初斜，沿堤闲步履平沙；照庆寺里黄昏候，灿烂花枝照晚霞。

西泠湖上文澜阁

参天树木蔚苍苍，映出西泠别样装；小草涧花皆自得，幽兰飘荡满天香。

西泠湖上雨初收，为访顾氏且登楼；促膝谈心如旧识，石墨一卷至今留。

顾君鼎梅所著《石言》及为范鼎卿所摄《河洛访碑图》足资余见闻。余旅居湖上，大雨初过，访君于其寓庐，促膝谈心，赠以所印石墨拓本，多有汉代罕见残石，余曾蔚为一集。

海 宁

万马奔腾如蹈海，江天一线涌潮来；恰当八月中旬月，月映寒晖晚色开。

宁　波

先生辞家当还家，双韭山房岁月赊；岂为鸿博轻去浙，端为搜讨到京华。绝学遥继蕺山业，修史长存汐社葩；今日登临见真迹，补组无计愧交加。

壬戌初夏

访书甬上忆重游，携手同登范氏楼；汉砖魏瓦应无恙，寒梅犹自出墙头。

余讲学南京中大时，曾访马隅卿先生于甬上。一九五六年冬余在南开，校订《鲒埼亭集》，又至甬上，得晤冯孟颛先生，出其所藏，得资抄存，因同游公园。隅卿早故，而所搜集汉砖魏瓦刘宋遗物辟室收藏，安然无恙，不觉有怀念故交之感。

寄蜗庐内书成堆，沿阶苦竹长莓苔；一自郑君搜访后，录鬼一卷未成灰。

孟颛并偕余访寄蜗庐孙氏藏书，傍河而居，矮屋数椽，小院中杂植丛竹杂卉，意境萧然，颇得天然之趣。然所藏诸书，多为范卢诸家残本，余获得残本《闺雅》、《元宝媒》等书。忆二十余年前郑西谛、赵斐云访书甬上，与马隅卿同至寄蜗庐，见有明抄孤本《录鬼簿》，叹为惊世孤本，得未曾有，孙氏坚不肯让，郑赵马三君乃借其书，分担成抄，一夕写成之，归还其书，有三君手写之书影印本。今原书已摄影上石，印为精本，流传于世。

桂　林

玉簪花开白又妍，秋海棠花艳复鲜；徒留虹月归来影，顿教罟里长风烟。

一九三六年王以中与余参加广西桂林地理学会会议。返沪渎时，曾同至虞山，访瞿良士先生。先生遣其哲嗣凤起陪余等，泛舟至罟里参观铁琴铜剑楼旧址，屋宇清洁，插架如恒，而藏书已迁移一空，但出示其《虹月归来图》而已。时院中秋海棠、白玉簪花盛开，秋景甚浓，小坐移时而去。

衡　阳

衡阳气势郁迢遥，山色苍茫不可招，一叶扁舟送我去，洞庭波影雨潇潇。

余由衡阳至梧州，一叶扁舟，载我而去，时已夜深，见一老僧，局促船头，大有“洞庭波送一僧来”之概。

长　沙

涉水临流风露清，为访杨君话别情；正是桔绿枫丹候，闲步来登爱晚亭。

一九三七年余在长沙时，居西南联大，访杨君遇夫于岳麓山师院，涉渡两川，回时在爱晚亭小坐移时而去，时尚未知为革命胜地。今已时过境迁，因读毛主席之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之句，而心向往之。

昆　明

万里峰峦咫尺过，层峦叠嶂脊相摩；侧身岭海阔无际，风帆数点近昆河。

堪与华清相比温，翠华湛绿却清新；紫藤开遍莺声里，

升庵毕竟是才人。

距昆明城外八十里有翠玉温泉，为明杨升庵先生慎谪居盘游之所，有升庵题字。

拾级曹溪揽胜游，松风水月冷清秋；遥闻碎玉淙淙响，扫尽人间万古愁。

杨碑读罢见元梅，旁有昙花四月开；勿谓人生一刹那，一刹那间骋奇才。

过螳螂川，步行二里许，即至曹溪寺，寺后有珍珠泉，泉涌水出，如真珠然。寺建于元代，有杨升庵集二王碑。殿前有明永历帝书“松风明月”匾额。殿前有元梅两株，尚有昙花一树，每年四月间黄昏放花，色香俱佳，移时即萎。余自真珠泉返寺僧进茶，出素纸索书。余意元梅至今，犹尚遒秀，乃由昙花开放，积一刹那时间而成，因之人贵自立，一刹那时间未可放过。因之有感，奋笔疾书，成此两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五华遥峙翠湖滨，殿阁嵯峨气象森；谁谓商山鸾影在，瓦苍庄外阵云深。

同乡秦缜略先生约游瓦苍庄尼寺，见所藏陈圆圆《商山鸾影图》及浮花碗，吴逆三桂已灭迹尘消，惟陈沅鸾影尚存，堪供凭吊。

苍茫滇海静无波，孙髯书联逸兴多；我登翠华最高处，茶红冷艳照山河。

老朋白小松兄约余作大观楼之游。于君招余登西山时已隆

冬，而山茶已放花，深林积翠逞红照耀于山河之间。（后二首为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整理旧作，追写。）

厦门即事诗

金厦鸡笼共一家，水操台上逞才华；即看收复台湾日，此馆当生万丈霞。

迩来讲得无人学，遥想龚公与魏公；如此风云增物色，即看诸子出群雄。

淼漫烟雾草凄凄，海上风光望欲迷；课罢不觉春日永，推窗时闻午鸡啼。

迂迴石径蔚兰丛，暮霭沉沉见一灯；平生未谙无生旨，爱听普陀晚寺钟。

闽南相聚忆重游，卓越才华气尚遒；愧我无学绍季野，与子同登万仞楼。

一九六二年

锦城杂事诗

澄江如练晚霞明，一片孤城落照中；叠翠层峦山色里，此身疑在画图行。

甲寅仲夏纂辑初罢游黄山作

检点丛残荏苒过，一春花事竟蹉跎；繁花无数飘红雨，杏子迷离绿叶多。自分一生甘摒弃，雄心到老不消磨；万言写罢观云海，观瀑楼头足啸歌。

编 后

时光易逝，父亲离开我们不觉已近十载，现在只能从堆积在案头遗著的字里行间，依稀看到他的音容笑貌了。当我整理他的遗稿，读着他写的一篇篇论著时，仿佛又听到他那毫无倦意的爽朗话音。父亲一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明清史方面，为柳亚子先生誉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的《晚明史籍考》，出版于一九三二年，全书八十万言，是父亲三十岁时编著的。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先生曾称赞他"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南明史略》，是平实完整地介绍当时抗清斗争史的一部力作。同时，他对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各类问题，也有渊博的学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料学概论》，系统地阐述了史料学的形成、学科特点、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及其在史学中的地位。甚至在十年内乱期间，于河南息县明港劳动之余，父亲也没有忘记收集两汉时期的资料，重读《两汉书》，研究了两汉的社会生活，以后完成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一书的写作。此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所选的有关史学方面的文章，篇数不多，但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从出土文物

中看东汉黄巾起义到《通过〈宛署杂记〉等书谈编印北京文献》，还有对近代书院学校制度、河套民族等变迁的考证，都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收集的题跋，只是父亲所撰写的大量题跋中很小一部分。翻阅他丰富的藏书，可以看到许多书籍、碑刻拓片上都留下了字迹隽秀的行楷书题跋，可惜的是没有来得及全面系统地加以整理。这些题跋的内容涉及文献作者的生平、主要著作、文献的版本或内容简介、影响与评价。此外，父亲还常在题跋中写出他获得这些文献的经过和欢快心情。当我阅读这些题跋时，眼前又浮现出他不顾年迈，风尘仆仆，步履艰难地在大江南北的旧书店、藏书家那里收集旧书、碑刻拓片的情景。

许多年来，父亲为杂志、报纸的副刊写了不少短文、散文、游记和诗，有些朋友好意地劝他不要写这些小东西，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历史工作者，想写好文章，还要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他博览群书，善于学习，对许多名著都能背诵如流，出口成章。这不仅使他史学著作的语言生动活泼，而且还留下了不少散文、游记和诗。史学界有许多人读过他在四十年代写的《三吴回忆录》，至今还说这是一篇绘声绘色的难得的优美散文。他写的《清华四同学》，充溢着真挚的友情，使我想起当年他那些风华正茂的好友，在我家作客时高谈阔论、妙趣横生的夜晚。《天坛·泰戈尔·松竹梅》一文中将白发苍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婷婷玉立的女诗人林徽音和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描写得栩栩如生。他在晚年对写诗的兴趣更为浓厚，一共写了二百多首诗，抒发自己的情怀。他的诗感情深厚，富有意境，文笔清新隽永。每读到他写的《悼亡之作》，我就想起过去母亲陪他夜读、为他研墨书写，以及母亲去世后独饮消愁的那些时日，不觉潸然泪下。

每当读着他留下的这些遗稿和手迹，使我感到父亲不仅是明

清史专家、版本学家，而且也擅长散文与诗，因而不禁想到何不把散见于各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未发表的手稿集中编辑成册，公诸于世。这样既可实现父亲的宿愿——将研究成果传给后人，同时，从我这方面来说，也算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吧！于是我把上述想法向父亲的研究生任道斌同志谈了，他极力赞成，并将翟清福同志辑的《谢国桢著译年表》寄给我，这样，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们分头收集到一百多篇文章，由任君和我分别编成两本书：《谢国桢明清史谈丛》和本书。

这里收集的文章半数以上曾刊登于解放前后全国各地和香港的各种报刊上，其余则选自未发表过的手稿。文章按体裁、内容分类，以发表年、月或写作日期先后排列。旧诗部分除将若干述怀之作做为诗序外，其余则按内容分类，照时间先后排列。诗前有标题者都是作者原有的；没写标题的，写有附注的，也一律保持原貌。

现承辽宁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不胜欣喜之至。限于篇幅要求，遂删去若干序跋及碑刻题识，书名定为《瓜蒂庵文集》。

在送出版社之前，全书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姜纬堂先生重新做了编排、增删，并对全书再次做了校订。书内“论述”部分曾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柳曾符先生校订过。另外从收集到选材，我们得到了上海、北京、浙江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图书馆，以及文汇报总编室、资料研究部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帮助过我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谢纪青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写

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修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瓜蒂庵文集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３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２８／ｄｉｓｋｉａｃ／ｉａｃ４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ｐｄｇ